

# 公益慈善周刊

2013年5月26日

2013年第18期(总第072期)

## ◎政策点击

- 四川芦山4·20强烈地震救灾捐赠款物及使用情况统计报表发布 ..... 5
- 多省开展市级非公募基金会登记试点 ..... 5
- 广州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优势参与新型城市化发展 ..... 7
- 安徽出台《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意见》 ..... 7

## ◎专家视野

- 王振耀：从草根到专业，破解基层社会组织困局 ..... 11
- 王名：“春天”还是一个概念 ..... 12
- 陈振平：发展合作社事业离不开第三种资源配置力量 ..... 14
- 陈健民：我提倡新的北进精神 ..... 16
- 专家共议：“去行政化”是否是中国红会改革的必由之路？ ..... 23
- 专家共议：怎样的监督机制能让公众满意？ ..... 26
- 专家共议：民间力量成长：公信力是王道 ..... 28

## ◎行业观点

- 人民政协网：灾害救助，慈善机构应建联动协调机制 ..... 34
- 京华时报：芦山地震开启公益捐赠新格局 ..... 35
- 光明日报：让公益更高效——政府携手公益组织共同推动善款灾后有效利用 ..... 39
- 学习时报：震灾凸显了协调型公益组织发展的必要 ..... 41
- 学习时报：政社分开，在“各就各位”中形成合力 ..... 43
- 经济观察网：善款如何花？官民协作雅安模式 ..... 45
- 南方周末：十个关键词 记录企业公益 25年 ..... 48
- 南方日报：宗教慈善应从“救济”走向“服务” ..... 56
- 南方都市报：被吞没的“地震”议题 ..... 56
- 南方都市报：赈灾需要健全的民间社会 ..... 58
- 南方都市报：帮城管“拆掉”铁笼，NGO介入很必要 ..... 60

中国工商时报：民间公益事业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	61
信息日报：“抄袭”难界定公益如何维权 .....	65
公益时报：如何保持企业基金会的独立性 .....	68
公益时报：流动儿童帮扶社区中心模式探索 .....	69
公益时报：资金池“膨胀”后的壹基金 .....	73
公益时报：失语的中红会社监委 .....	76
中国经营报：“利益交换、利益输送缠绕”，争议红会社监委 .....	80
青年环境评论：警惕第三部门越来越大公民社会却越来越小 .....	85
华尔街日报：中国公益界的“左倾”怪现象 .....	87
中国公益慈善网：社会组织如何获得政府“订单” .....	89
慈讯网：如何才能发展慈善超市 .....	90
创思客：盛名之下，其心也善——明星救贫穷可行性报告 .....	91
民间力量成长：公信力是王道 .....	97
王石：做慈善应该是全球的 李嘉诚等只局限于中国人 .....	102
龚维斌：加大对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引导力度 .....	112
安猪：坚持做有创意的“公益产品” .....	114
刘洲鸿：NGO如何向基金会筹款 .....	115
程立岩：社会组织如何获得政府“订单” .....	117
刘奇：尽最大努力尊重捐赠人的意愿 .....	118

## ◎行业动态

“2013中国慈善名人榜”在京发布 .....	122
“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在京启动实施 .....	124
民政部更正数据 还红会清白 .....	125
中国扶贫基金会公布捐款流向 .....	126
“创绿家计划”第二季资助团队名单揭晓 .....	127
盐城红会回应“强捐”：不再定数额 .....	130
9个灾后重建项目签约共计投入4000万元 .....	132
雅安地震月度盘点：基金会募款金额已超汶川地震 .....	133
芦山地震灾后重建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	134
壹基金的算盘：为每个捐赠人开发票 .....	137

壹基金捐赠人遭遇免税难题 民政税务“踢皮球” .....	142
爱心赶走饥饿：免费午餐将开通网游捐赠平台 .....	145
民间康复机构面临注册难困境 期待政府购买服务 .....	146
小心！“黑客”入侵公益圈！ .....	150
让环境公益诉讼真正走在“阳光”下 .....	152
淘宝挂号上线三天被迫暂停，商业不能染指公益？ .....	155
广东黄埔首创公益监护人制度，将考虑社会人士准入制度 .....	156
<b>◎公益人</b>	
张宁的公益开源创意 .....	159
<b>◎亮机构</b>	
微基金：靠“精神领袖”支撑的公益如何走得更远 .....	166
大爱清尘基金——从抗争到合作 .....	169
<b>◎国际观察</b>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十周年庆特刊（三）：以设计为导向的政府部门创新.....	173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非营利组织的 10 种资金来源模式 .....	175
集体募资的规模正在越来越大：从热门美剧募资案例看行业动态 .....	181
美国社会组织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经验 .....	185
美国慈善业如何在文化领域发挥作用 .....	190
谁在改变教育？重塑美国教育的“未来项目” .....	193
大社会资金运营一年回顾 .....	196
社会企业改变传统援助发展模式 .....	198
国外志愿者培养：从小培养“回报社会”精神 .....	200
非洲取水项目启示：评估标准要清晰简明 .....	203
打通“最后一公里”健康之路 .....	204
大公司问路“穷人经济” .....	207
<b>◎企业社会责任</b>	
CSR 专家访谈：经济效益是引导“负责的”中国供应链的关键.....	210
中国海外投资需恶补“社会责任”课 .....	213
沃顿商学院研究综述：社会影响的财务影响 .....	214
让世界更加可持续 .....	219

UNEP 发布知识与合作平台，促进向更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转变..... 223

世界资源研究所发布企业价值链排放核算最新指南 ..... 224

公益遭遇营销：奥克斯要找美丽新娘 ..... 225

**◎公益布告栏**

更美好的世界——福特汽车环保 NGO 系列工作坊 ..... 227

JA 中国“金字塔底端的创新”青年创业培养项目征集..... 229

**◎新书快递**

《索罗斯的救赎》 ..... 234

## ◎政策点击

# 四川芦山 4·20 强烈地震救灾捐赠款物及使用情况统计报表发布

5 月 17 日，民政部发布“关于社会组织接收和使用四川芦山 4·20 强烈地震救灾捐赠款物统计情况的通报”。

据了解，截至 5 月 16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 14 家在民政部登记的社会组织向民政部报送了救灾捐赠统计数据。这 14 家社会组织包括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等。其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募集款物达 1.3 亿元，已使用 1500 万元。

从发布的通报中我们还了解到，截至 4 月 27 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收到地震救灾捐款为 0 元。该基金会收到 1436.76 万元的物资捐赠，全部投入使用。

四川芦山 4·20 强烈地震发生后，民政部发布了第 277 号公告，提倡社会捐赠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要求开展捐赠活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接收捐赠单位依法做好信息公开，按照《救灾捐赠款物统计制度》填报捐赠统计数据，接受捐赠者、社会和政府监督。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zcfg/201305/d47c5482dcf248b08b603644b0e03c99.shtml>

[【返回目录】](#)

## 多省开展市级非公募基金会登记试点

5 月 10 日，武汉市慈惠助学基金会正式获得市民政局的准许登记行政许可，成为武汉市登记管理的首个非公募基金会。

在 2012 年 3 月举行的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民政部表示将加快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已经在一些地方并将在全国下放非公募基金会审批权、异地商会审批权等，促进行政效能的提高。

早在 2009 年 7 月，民政部和深圳市政府签署了《推进深圳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授权深圳市开展基金会、跨省区行业协会、商会登记管理试点。安徽省也于 2009 年在合肥、芜湖、蚌埠三市开展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试点，其中包括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实行市级民政部门登记管理、报省民政部门备案制度。2013 年 5 月开始，安徽省全部地级市和两个直管县均可以登记

管理非公募基金会。

据基金会中心网 2012 年 6 月发布的数据，全国 1463 家非公募基金会中，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占 5%；在省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占到 93%；在市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有 24 家，占 2%。2013 年以来，浙江、福建、湖北多个省份纷纷开展试点工作，将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下放到地级市。

### 市级管理更加及时便捷

湖北省此次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改革试点有武汉、宜昌、荆州三个城市。据了解，湖北省基金会总数已从 2009 年底的 20 多家，增长至去年底的近 70 家。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公募基金会，且有向市州基层发展的趋势。

武汉市民间组织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赵祥告诉《公益时报》记者，试点的准备工作去年年底就已开始，今年 3 月 14 日，民政部正式复函省民政厅，同意开展试点工作。赵祥说，由于此前没有基金会管理的经验，具体工作中也在向省级民政部门学习，“及时反馈，请他们来把关。”

武汉市慈惠助学基金会在 3 月份提交申请，市民政部门对其申报材料、单位人员组成、原始基金、场地等情况进行了严格审查，5 月初批准成立。赵祥表示，原来在省级民政部门申请基金会性质的机构，审批门槛较高、管理严格，不太容易申请成功。放在市级登记管理，首先是距离上监管方便；其次，虽然都是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审批，但相对来说，在市里申请登记要容易一些；在具体事务管理上，由于市级民政部门对本地基层事务更加熟悉和了解，也更能够对基金会进行细致的沟通和面对面指导。比如慈惠助学基金会，“理事长是一位退休人员，两家企业捐款，这些事就在我们身边。”赵祥说。此外，也不断有人来咨询成立基金会的事宜，但很多还是想成立公募基金会，对此，赵祥表示只能请他们继续到省里申请。

### 企业基金会为主

较早开始试点的安徽省，非公募基金会的市级登记管理目前已在在全省展开。安徽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旋向《公益时报》记者表示，由于省内经济环境和公益行业的发展，近几年基金会增长的速度在加快，往年可能一年增加一家，2012 年一年内，全省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共成立了 14 家。目前市级的非公募基金会有 8 家，发起方还是以较有经济实力的企业为主。王旋说，市级管理不仅省去了申请人往返几次省里咨询、送材料的麻烦，市级民政部门指导工作也更方便及时。为便于管理，省民政部门对各市级非公募基金会进行了备案。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vil/gvzx/201305/4f34f8c3731f4437bff6b878b7f7d23c.shtml>

[【返回目录】](#)

## 广州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优势参与新型城市化发展

23 日下午，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深入市总工会、市妇联，继续开展“加强机关建设、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专题调研。万庆良充分肯定市总工会、市妇联等人民团体在联系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动员群众参与新型城市化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鼓励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继续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特殊优势，用“中国梦”团结凝聚市民群众，为广州加快发展促转型、推进新型城市化作出新贡献。市领导王世彤、赵小穗参加调研。

万庆良希望市妇联充分发挥联系妇女群众桥梁纽带作用，动员广大妇女群众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围绕加快发展促转型、推进新型城市化拼搏奉献、建功立业。充分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优势，做好“联”、“家”、“美”三篇大文章，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建立健全集信访接待、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心理疏导于一体的维权工作体系，更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抓住建会 60 周年的契机，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将妇女干部队伍打造成为美丽广州的形象代言人。

万庆良要求市总工会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4 月 28 日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工作，整合资源，擦亮品牌，打造广大职工最可信赖的“职工之家”。要把服务职工群众放在第一位，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服务职工工作，推动解决基层一线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困难职工的实际问题。要弘扬劳动最光荣的时代主旋律，开展好建功“三个重大突破”劳动竞赛等岗位练兵活动，带领职工在加快发展促转型、推进新型城市化中建功立业。要在维护职工权益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劳动关系和谐。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相关要求，带头发扬劳模精神，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以身作则团结带领广大工人群众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来源：广州日报

地址：[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3-05/24/node\\_1.htm](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3-05/24/node_1.htm)

[【返回目录】](#)

## 安徽出台《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

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现提出以下意见。

###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1.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创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提高社会组织建设质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 基本原则。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巩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社会组织改革创新成果，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坚持分类指导、突出重点。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为出发点，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坚持宽进严管、依法监督。以发展为主线，以规范为手段，一手抓数量，一手抓质量，实现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提高。

3. 总体目标。加快建立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力争到2020年，形成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完善、作用明显的社会组织体系。

### 二、改革登记管理体制，推进社会组织社会化

4. 简化登记程序，实行直接登记。除政治法律类、宗教类社会组织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在皖代表机构等外，其他各类社会组织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实行直接登记。登记管理机关、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业务指导和管理服务。

5. 下放管理权限，创新组织形式。探索非公募基金会和异地商会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委托外来投资企业较多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管理异地商会。继续实行城乡基层社会组织登记和备案并行的双轨制，探索建立城乡社区枢纽（联合）型社会组织，增强社区自治服务功能。

6. 实行政社分开，推进自主办会。支持社会组织依法按章、独立自主开展活动，切实解决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行业协会商会和工商经济类的联合性社会团体，一般只吸收企业会员，秘书长可通过聘任或向社会公开招聘等方式产生。现职公务员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得在行业协会商会、工商经济类的联合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兼任领导职务；严格限制上述人员在其他类型社会组织兼任领导职务，确因工作需要兼任的，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从严审批。规范离退休人员在社会组织担任领导职务。政府及部门、企事业单位要从职能、机构、工作人员、资产和财务等方面与社会组织脱钩，实行政社、社企分开。

### 三、完善培育扶持政策，改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

7. 推进政府职能转移, 建立购买服务机制。各级政府部门要全面梳理自身职能, 逐步将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 以授权、委托等适当方式依法交给具有相应资质的社会组织承担。通过项目购买、项目补贴、项目奖励等方式, 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8. 加大资助和支持力度, 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完善资金保障方式, 用足、用好公益性、福利性社会组织的税收减免政策, 推进公共财政对社会组织的资助、补贴和奖励, 采取多种形式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推动建立各级社会组织发展孵化基地, 为初创期社会组织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完善福彩公益金资助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服务等扶持政策, 各地每年可从福彩公益金中安排资金资助基层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服务活动。鼓励金融机构为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供信贷支持, 拓宽社会组织筹资渠道。

9. 发挥社会组织参政议政作用, 拓展社会组织发展空间。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强与社会组织的信息沟通, 在制定政策、实施重大决策等过程中, 注重广泛听取社会的意见和建议, 提高社会组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党的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可适当安排社会组织代表, 在政协增加社会组织方面的委员。

#### 四、优化结构布局, 提高社会组织建设质量

10. 着眼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民政部门编制社会组织设立指引, 鼓励发展慈善组织、学术性组织、社会服务公益组织、新兴产业行业协会等。对行业性、专业性、自然科学学术性社会团体, 可突破“一业一会”或适当细化分类设置, 通过适度竞争提高服务质量。建立和完善退出机制, 对活动不经常、作用不明显的社会组织, 由民政部门督促整改; 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社会组织, 依法予以查处; 情节严重的, 依法撤销登记。

11. 优化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 提高社会组织建设质量。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 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独立自主、权责明确、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会员(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制度, 实行决策、执行、监督分立。积极推行会长(理事长)兼任法定代表人制度, 提高秘书长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合理确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规模和负责人数量, 逐步推行差额提名和无记名投票表决的选举方式。每个社会组织均应配备与其业务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12. 强化社会组织社会责任意识, 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投身社会互助和慈善事业,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加强社会组织诚信自律建设, 严格规范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和收费行为。加大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 促进社会组织人才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和年轻化。鼓励社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聘用持有职业水平证书的专业人才。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推动解决社会组织专职人员社会保险问题。

#### 五、创新服务管理模式，提升社会组织服务管理水平

13. 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提高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逐步理顺社会组织党建管理体制，探索建立结合业务抓党建的工作机制。坚持“应建尽建、应派尽派”的原则，采取单建、联建、挂靠组建、区域或行业统建等形式，抓好社会组织组建党组织工作；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或联络员，指导社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在社会组织开展工作。

14. 推进社会组织法制建设，加快完善社会组织评估机制。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法制建设，推动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强化法律监督，严格依法监管。按照政府指导、社会参与、独立运作的总体要求，建立社会组织评估指标体系，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评估制度，形成组织健全、程序完备、操作规范、运转协调的评估工作机制，发挥评估的导向、激励和约束作用，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制定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推进信息公开，完善失信惩罚机制，提升社会组织公信力。

15. 加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力量，提升服务管理水平。进一步发挥各级党委领导下的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切实加强对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民政、财政、公安、司法行政、审计、税务、物价、质监、外事、金融等部门信息共享、齐抓共管的联动工作机制，形成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的工作局面。加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力量，建立与其业务相适应的登记管理机构，提供经费保障，配备必要的执法装备，建立管理信息平台，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地址：<http://mjj.mca.gov.cn/article/xzglxw/201305/20130500460326.shtml>

[【返回目录】](#)

## ◎专家视野

**王振耀：从草根到专业，破解基层社会组织困局**

提问：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

基层社会服务组织具有很强的草根性，在很多国家是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主体。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深入推进，草根性社会服务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广阔。但目前，这类社会组织的发展环境比较窘迫。仅从资金来源看，受不能公开进行社会募捐、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尚未成熟等的制约，绝大多数草根性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缺乏资金支持，有的甚至面临生存危机。草根性社会服务组织如何走出困境，找到可持续发展路径？

回答：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过去，由于一些草根性社会服务组织能够满足部分困难群体的急迫需求，因而得到一些慈善家或较大型基金会一些项目的支持。但现在，随着我国社会服务需求迅速增加，这类社会组织规模偏小，提供的服务项目有限，因而很难得到政府和较大型基金会的支持，更不可能得到较多的社会捐赠，维持和发展难度加大。摆脱这一困局的出路在于，促进草根性社会服务组织走专业化之路。

深化对草根性社会服务组织的认识。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社会功能上看，小型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都是未来社会组织的主体，具有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基本功能。这类组织贴近社会，了解大众的多样性需求，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以较快速度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以全国近千个儿童自闭症组织为例，许多组织的创办人往往就是有关儿童的家长，这些组织对自闭症的理解更加贴切，具有特殊优势。这类组织的日益发达，能够更有效地将慈善事业与大众爱心转化为具体的服务项目，促进诸多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

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现在，主管单位体制正在被打破，这将促进服务大众多样需求的社会组织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需要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例如，为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而落实这项职责，最基本的社会依托就是各类社会服务组织。在香港，类似内地城乡低保与高龄津贴之类的救助资金统称为综合援助资金，年度预算大体为 400 亿港元，其中有 100 亿以上用于支持社会服务组织。

加强草根性社会服务组织专业化建设。这类组织应认识到，其出路在于专业化，应以专业化为基本定位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满足社会服务需求的针对性。可以在专业化社会服务领域成立行业组织，建立行业服务标准和程序、技术等，促进专业化发展，避免过度竞争。健全专业化社会组织发展的生态链，包括信息加工、专业研究、培训与教育等都应有相应的组织或项目支持。在业务开展

方面，应增强服务功能，并通过提供专业化服务获取收入，增强自身造血机能，实现良性发展。

发挥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大型枢纽型社会组织应主动与草根性社会服务组织建立有机联系，为其提供发展依托，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转型发展。在现代社会，决定社会组织影响力的关键是其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如果大型枢纽型社会组织不能与草根性社会服务组织建立体制性联系，就有可能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就会淡出人们的视线。具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应加快转型，真正发挥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之家的功能。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地址：<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3/0519/c1008-21531115.html>

[【返回目录】](#)

## 王名：“春天”还是一个概念

摘要：社会组织的春天还是一个概念，真正的‘春天’还需要政府、立法机关、社会组织、媒体、学者的共同推动。

近日，国务院将备受关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下称《方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并被批准。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NGO 研究所所长王名表示，“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不仅仅是社会组织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整个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也是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非常重要的关键步骤。”

但他同时表示，“社会组织的春天还是一个概念，真正的‘春天’还需要政府、立法机关、社会组织、媒体、学者的共同推动。”

### “向社会放权”是革命性的制度改革

《华夏时报》：你如何评价方案中提到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王名：在我看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不仅仅是社会组织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整个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也是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非常重要的关键步骤。

《华夏时报》：改革的突出亮点在哪里？

王名：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取消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这意味着多年来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高门槛”被撤销。

据我初步测算，四大类社会组织约占我国社会组织总量的 2/3，目前已经登记注册的大约 47 万家，但实际数量可能接近 80 万家。如果开放全国四大类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将有大批社会组织得

到激活。可以说，这种“向社会放权”的做法，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革，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制度改革、制度创新。

《华夏时报》：《方案》里还出现了很多具体的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变、涉及到政府如何培育支持社会组织等很多提法。

王名：我认为《方案》核心是两大方面：一是推动既有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另外是尽快形成新社会组织体制。

对于前者，3月26日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任务分工的通知》中非常明确地提出要求民政部 and 国务院法制办在2013年底完成，这相当于从国家层面制定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的日程表；对于新体制的建构，《通知》也明确要求在2017年也就是5年以后基本形成政社分开、职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对此，我的理解是：任务很艰巨，一个是改革旧的要求今年必须落实，要求新的五年后要建立。这个难度很大，但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给出了社会组织“春天”的框架，但能不能和何时到来，或者什么时候落实到社会组织身上，我觉得还有一个过程。

### **转换政府和社会关系是难点**

《华夏时报》：你如何评价业务主管单位这样一种制度形式？

王名：社会组织登记要找挂靠单位是80年代后期建立的一种双重管理体制，中国所有的社会组织要登记注册需要两个政府部门进行审批，接受两个不同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必须承认，“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存在公共管理方面的合理性。

但经过20多年发展，社会组织“被需求”已成为解决社会问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面临很多的社会问题要通过社会组织来参与解决时，双重管理体制就成为社会组织发展桎梏，成为束缚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障碍，主要问题在于社会组织难找“婆婆”。因为它要在行政、监督管理、法律等方面都要承担重要的职责。

《华夏时报》：那你认为即将全面铺开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在哪儿？

王名：转换政府和社会关系应该是重点也是难点。其实，上面提到的三个文件里都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预示着政府和社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要求各级政府和官员必须逐渐转变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和态度。

其实，高层领导的顶层设计已经很明确：人们需要社会组织，政府、社会乃至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需要社会组织。基层官员都应当接受这样一种观念，不要还害怕“把握不准”，怕因为社会组织“出事”而丢掉自己的官帽。对此，业内也呼唤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的细则及早出台，包括地方层面的管理细则。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要把社会组织看作是朋友，或是合作伙伴。

王名：除此之外，主管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政府部门还面临能力建设和转型问题。目前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能是登记许可，未来的职能则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登记许可，工作量会更大；第二，支持培育，建立包括孵化扶持、购买服务、税收优惠等在内的一系列机制；第三，监督和执法，整个社会都应该调动起来参与其中，包括政府监管、媒体问责、行业自律和公众监督等。

《华夏时报》：要具备这些职能，应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王名：在我看来，社会体制改革包括三个阶段，一是“还组织于社会”，二是“还服务于社会”，三是“还治理于社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社会组织的春天”说法，现在只是一个概念，《通知》的出台也仅仅意味着我们刚刚迈出第一步。但未来我们必将走得更远，因为社会组织的成长、社会力量的涌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部门、立法机关、社会组织、媒体和学者都一起来共同推动，这个春天才会真正到来。

来源：华夏时报

地址：<http://www.chinatimes.cc/pages/128469/moreInfo.htm>

[【返回目录】](#)

## 陈振平：发展合作社事业离不开第三种资源配置力量

摘编：合作社作为一项社会经济事业，单纯依靠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力量并不足以体现合作社事业理应包含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取向，甚至造成合作社事业的定位不清。在此情况下，发挥第三种资源配置力量在合作社经济中的作用既有客观必然性，其现实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 合作社事业是一项促进民生的社会经济事业

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欧文和傅立叶发起组织了“合作共同生活小区”，期望通过相互合作而非剥削的经济活动，达到改良人类社会的目的。1844年诞生的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作为全世界最早成功经营的合作社，使合作社从理想主义转向实用主义，并形成了成员资格开放、民主管理、独立自主等七大基本原则。19世纪末期的英国“费边社”对于合作社推广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们把合作社当作和平、渐进地改良社会的手段，希望以合作的方式重建人类社会的经济，这种思路也影响到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孙中山在其著作《三民主义》中曾提到过合作经济，并将合作经济作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手段；以晏阳初和梁漱溟为代表的中国旧知识分子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也试图通过合作实现改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目的。1995年9月，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

的国际合作社联盟第100周年代表大会修订通过了《关于合作社特征的宣言》，对合作社的性质、价值和基本原则作了如下规定：合作社是人们为了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需求和愿望，通过联合所有民主控制的企业，自愿联合起来的一个自治的组织。合作社的基本价值包括：自主、平等、公平和团结。合作社社员信奉诚实、公开、社会责任和关心他人的道德价值观。

合作社发展到今天，其经营性作用愈加明显，甚至有人将合作社作为另一种形式的公司看待。但合作社并不是公司，它作为一种经济组织与公司组织有着一定的区别。公司是资金所有者为追求更多利润而结合起来的经济组织，而合作社主要是经济弱势群体互助共赢的结合，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公司的进出方式是持有或出售公司的股份，权力控制在股东（主要是大股东）手里，而合作社的进出方式是自愿入股或退股，社员通过民主投票拥有对合作社的管理与控制权；公司的盈余依照出资比例来分配，合作社的盈余依照交易额来分配。可见，合作社是劳动者的联合而不是资本的联合，它可以追求效益，但更关注社员的利益共享和共赢。合作社采用成员民主投票的方式经营，可能会降低其运行效率，不利于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但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合作社社会经济事业的本质。从宗旨来看，合作社旨在运用合作组织的力量，激发基层民众自立自强的精神，解决其共同困难，协助其改善生活，发展事业。从意义来看，合作社有助于建设团结和谐、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经济弱者的经济利益。可见合作社是一项社会经济事业，对促进社会民生建设有显著作用。

### 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资源配置力量

在传统经济学看来，资源配置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种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另一种则是国家或政府，它在市场配置起着基础作用的前提下，运用强制力对资源配置进行调控。市场配置依靠价格和市场供求关系进行资源配置，其本身伴随着社会分配的不均衡，可能会造成公共品的供给不足。政府配置以权力为依托，通过行政命令来调动和分配资源，这种方式可以补救市场失灵，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和保证社会公共品的供应。但政府配置本身也会失灵，政府配置作用的发挥受到现实政治的强烈影响。

除了市场和政府配置力量之外，是否还存在第三种资源配置力量呢？回答是肯定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鲍勒斯通过研究表明，除了市场和政府，利他主义行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也认为，现实中存在一种非政府非市场的公共治理和资源配置方式，这一发现使她获得了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内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第三种资源配置力量的存在，他们将其表述为“第三种调节”、“第三种力量”或者“第三只手”等。在本文看来，第三种资源配置力量就是除市场和政府之外，由习俗惯例、伦理道德等组成的对资源进行补充性配置的力量，第三种资源配置力量包含处于基础地位的习俗、社会心理层面和处于上层领域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层面。

合作社作为一项社会经济事业，单纯依靠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力量并不足以体现合作社事业理应包含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取向，甚至造成合作社事业的定位不清。在此情况下，发挥第三种资源配置力量在合作社经济中的作用既有客观必然性，其现实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 合作社事业发展离不开第三种资源配置力量

首先，“互助合作精神”是合作社建立的必要条件，这离不开“第三配置”的作用。虽然经过两百多年的演变发展，合作社已从崇高的社会经济改造理想，发展为现实的合作社经营组织，甚至有被移植到世界各国当做建设国民经济、农村经济的政策性工具，但合作社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理想没有改变过，“互助合作精神”始终是合作社事业的灵魂。

其次，规范的制度和契约精神是合作社良好运行的关键和保障，这需要发挥“第三配置”的作用，将合作规范“内化”给合作社的每个成员。这种内化机制可以固定社员的行为范式，设定社员的行为界限，而这对于维护合作社的管理机制、提高合作社的运行效率，节约交易成本等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最后，合作社要切实改善全体社员经济社会状况，也需要“第三配置”力量发挥作用。只有按照合作社的基本原则，让合作社的所有成员共享合作社发展的成果，合作社才能不致于成为少数人操纵的工具，才能沿着持续健康的轨道发展，这将决定合作社这一社会经济事业的兴衰成败。

（作者单位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

地址：[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3-05/19/nw.D110000gmrb\\_20130519\\_3-07.htm](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3-05/19/nw.D110000gmrb_20130519_3-07.htm)

[【返回目录】](#)

## 陈健民：我提倡新的北进精神

摘要：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陈健民多年来以公民社会研究者的身份，持续向内地输入现代公益理念，积极研讨公益方法论，在学术和行动层面贡献了丰富的见解与资源。此次对话，陈健民坦率地评价了现时期公益及公民社会。他不讳言对前途的乐观，而这份信心源于他的学术视野。

**“我可能是一个过度的乐观主义者”**

很想知道，你来到内地，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不同的阶段，我的定位可能不同。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解释理念，比如什么叫公民社会。很多人不理解，特别是政府对它有很多误解。一定要有第三方站出来启蒙。另外，虽然传统里也有民间社会的概念，可是它和公民社会有很大差距，对人的权利不一定很尊重。对民众而言，也需要长期的介绍过程。未来二十年很重要，如果能铺垫公民社会这个基础，将来会有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

我理解就是一个现代公益的启蒙者。当你向政府或民众阐释理念时，困难在哪？

政府希望什么东西都要在它的掌控里。超出掌控范围，政府都非常没有安全感，觉得是一种敌对势力，可能造成社会不稳，这个是最基本的难处。但现在的社会治理，单靠政府是根本处理不了这么多问题的，需要有一个独立于政府的部门跟你合作，才能做好。怎么让他们理解，难度很高。

2008 年汶川地震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被认为是大陆公益元年。你也去震区实地观察，写了文章。回顾这五年来的内地公益，你最乐观和最悲观的各是什么？

最乐观的，政府对这个领域已经有相当多的改变。政府还在不断调整对这个领域的看法，所以我觉得不完全是那么悲观。当然，这领域最大的发展动力不是来源于政府，而是民间及海外公益领域的参与。我从 1996 年开始做这方面研究，当时在广州很难找到一家真正草根的公益组织，现在各种公益组织都在发展中。我觉得这领域要走 30 年才能成熟，带着这种眼光，我觉得近年的发展还是不错的。我可能是一个过度的乐观主义者。

就没有一点悲观的情绪吗？

总的来讲，还在往前走。走得太慢了，可是还在往前走。可有时候，也感到非常气愤。为什么很气愤？举个例子，就慈善捐款占 GDP 比例来说，中国差不多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中国不应该是这样的！

### **“草根 NGO 要坚持在一个边缘位置”**

从 2009 年到现在，每年的捐款总额也有波折。主因是官办慈善的公信力出了问题。你生气吗？

生气，这块我真的很生气。他们把公益垄断起来，却做成全球捐款水平最低的公益。垄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政治原因，就是很怕独立的基金会出来以后，这种钱国家没法控制了；第二个原因，是利益原因，垄断集团不用做什么，动员单位就来捐款了，没有挑战。人大康晓光教授曾说，世界上有不同的恶，但有一种恶是最坏的，就是不给人家做好事的恶。我现在讲的，就是犯了民生里头最坏的恶了，当然会生气。

这两年提“社会建设”，用“社会组织”来代替“NGO”，用“社会建设”来代替“公民社会”。你怎么看？

政府对这个领域采取比较正面的态度，但我们最担心的是第三部门越来越大，公民社会却越来越

越小。什么意思？第三部门的传统概念是说提供服务，可是公民社会它不单单是提供服务的，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监督政府。如果只是提供服务，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事业单位，根本就没有完成公民社会的使命。现在要警惕这个过程。

如何做才能不被吞并？

一定要做两个事情，一是在政府资源之外，另一件事是开拓民间资源。如果NGO只能靠政府购买服务的话，它会完全变成一种附庸。另一个方面固守公民社会理念，NGO培训很看重财务管理、市场推广等，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理念。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一定要做，你不打破这个垄断，你不做这种培训的话，它就会变成“二政府”，最后没办法完成社会改革。

就你近距离的观察，社会建设的“顶层设计”给公益界带来了什么？

简化登记、枢纽型组织、政府购买服务等是顶层设计很重要的内涵。它如果有正面意义，就是赋予这个领域以正当性，承认需要公益领域，跟政府一块来解决社会问题。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看见很多地方很快扭曲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草根NGO要怎么办，才能不被边缘化？

我觉得一定要面对现实，在比较长的时间里，要坚持在一个边缘的位置。现在比较焦急的，是需要打破筹款方面的垄断，不在政府的拨款范围内，它还能走下去，这个是很重要的。

今年有人提到，说要从每个人的工资当中，收取定额做慈善税。我想问的是，慈善行业的“国进民退”究竟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伪命题？

现在是很乱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我认为很重要的是媒体。做媒体的，一定要把这套理论体系讲得很清楚。政府不单不应垄断一切，还要找一个很健康的对手来监督自己。譬如香港的审计局和香港电台就是政府出钱来批评政府的。我觉得内地开始有这个要求监督权力的氛围了。举个例子，郭美美事件以后，假如捐款没有减低，反倒让人害怕。既然民众有反应，对监督权力是有要求的。所以去年我就说，感谢郭美美，她一个人的透明，就说明整个领域不透明。

### **“对青年人抱着非常大的期待”**

内地把公益的含义及功能进行级化，把它从好人好事变为公民建设的途径。这反映了内地怎样的趋势？

如果慢慢看这个问题你知道，传统的慈善概念是很不够的。我过得好，你可怜，所以我来帮助你。可为什么他这么可怜？他可怜是没有一个平等的机会，跟你一样接受教育，变成一个教授，变成一个做生意的人，所以你真的要解决他的问题，真的要关注他的话，是你要把他背后不平等的状态要改变，要给他一个平等的机会发展起来。所以，真正做公益的人，不可能不碰到一个体系的问题。我是乐施会的成员，乐施会的这个概念是很好的。它以前的公益就是我给你一条鱼，后来我教

你钓鱼，让你有能力自己去解决问题。可是后来也觉得不够，为什么？因为遇到河污染了，你学懂钓鱼也没有鱼给你打，所以一定要解决污染的问题他才可以钓鱼。所以，你一定要去到问题的核心，也就是背后的社会结构。

2011 年的时候，公益传播中提出“跨界联合”，你如何看待？其品质如何？

要促进改变，往往要整合各类资源包括跨界合作。我觉得企业界人应该参与到公益，但目前企业的公益理解仍然是非常传统，停留于捐款。一个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从它采购、生产到销售，对环境与社会的影响都是要关注的。至于政府的参与方面，长远有许多角色要扮演，但目前，政府能明确往后退就够了，目前它管太多事情了。

政府会不放心。

所以它要学着放心。有时候，独立的力量才能真的帮助它，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太严重，是不能让政府包起来做的。

内地公益界在转型中出现了很多人物，比如说徐永光、杨团、梁晓燕等，还有一些 80、90 后的年轻人。这是一个显著变化，你有何看法？

我佩服年龄大的这群人，因为他们从体制内走出来的，能够对体制内不恰当的一些事情进行抵抗，呼吁改变，比如对基金抽税不合理、捐款要汇总给政府捐款等等。他们是推动我们改革的非常重要的力量。可是也有限制，有些问题可能不会碰的。

那些年轻人呢？

我非常欣赏在广东地区这群年轻人做的事情。保护恩宁路、举牌青少年、女权运动等等。我觉得他们很懂在一个安全的领域里行动。每个人都有很多恐惧，以前以为站出来会有很大的后果，可走出来也没有什么后果，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个非常重要的启蒙过程。我对这群人抱有挺大的希望。

### **“使命，就是使用生命的感觉”**

谈到改革，你认为内地公益界能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吗？

如果希望影响政策的话，基本上很难产生影响力。我觉得还是有挺长的路。我经常说，中国头 30 年是单靠政府，后来 30 年是市场，未来 30 年一定是发展公民社会。连香港那么自由的地方，也大概走了 20 年、30 年才慢慢成熟，就是比较多元化，而且社会上有独立的力量可以跟政府做伙伴关系。中国有这么多的限制，更是一个困难的过程。

如果要比较香港和内地两地青年人，比如动员或组织能力，他们有怎样的差异？

他们处在不同阶段。香港做公益已经变成很多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从幼儿园开始，差不多每个小孩都尝试过，星期六跟着家长也好，跟着学校也好，去卖旗、去筹款。我们去年的调研，有 40% 的人在过去 12 月做过志愿者，中国内地大概是 15%。在今年香港年轻的社运界朋友中，有两个主要

的议题很重要，一个就是政治参与，另一个是环境保育。手法超越以前，可能会更激进一点。从现在看，我也很理解他们要这样去做。

内地的年轻人现在很习惯在网上发泄，但也许网络恰恰阻碍了他们的行动力。

在香港，我们觉得单靠网络上是不够的，网上网下要互动。可持续的运动基本上都是需要组织，碰面，要规划等等。邓飞他们也不单单靠网络上面的事情，线下有相当多的公益组织碰面，在不同的地方。我很看重他们现在的工作，能够有组织地用这个网络平台，通过做传统的公益项目，如免费午餐和大病问题等，推动社会进步。

刚才我们提内地公益界世代分野问题，您怎么看？

记得香港争论“反高铁运动”的时候，有年轻人用所谓暴力，不是真的暴力，就是跟警察有点推撞。老一辈的认为，需要有基本社运伦理，我们香港坚持非暴力，到了某一个点要停下来。年轻人觉得你们这些人老了。当时，我强烈地感觉到我老了。我想每一代都会面对这个情况，我也经常检讨：是不是我们这一代有一点落后了？也不是说两代人完全对立。我们最近构思那个“占领中环”行动还是用我们老的概念，非暴力的，完全不跟警察冲突的。你可以说我们比他们更“激进”，因为我们不单不与警察有肢体冲突，还会自己投案，甚至到法庭是不抗辩的，你就判我刑啊。我们希望带着爱与和平去占领，把两代人的风格糅合起来。

我觉得有些事情要向年轻人学，敢于打破常规；可是我觉得我们老的伦理也有它的价值。我觉得我们这个做法，主流的港人会信我们、接受我们的诉求。新一辈的平面化网络动员力量很大，对引起话题很有作用。但去中心化的结果有时令议题没法进深，也没法形成组织的力量去跟人家谈判。改革过程中，有很多问题不是非黑即白的，要寻找中间点。我相信中国也会出现类似问题，如何避免大规模的动乱却又维持改革的进程是一个更迫切、更重要的课题。

谈到资助年轻人，南都基金设有银杏计划。就公益整体环境而言，对年轻人的资助是否还是很少？

这类计划有点像一个国际民间组织 Asoka（阿育王）的做法。希望支持两三年的生活费，让他们不用愁，集中做社会创新，我觉得这个做法在圈里面都是很正面的，需要支持。但这种项目很少很少，大部分基金会连项目行政费都不给，更不要说特别资助年轻人，根本不会关注这一点。

年轻人会在现实与理想间饱受折磨。你作为过来人，在对待这种冲突方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心安顿下来？

当年大学毕业，我去到一个社会服务中心工作，90%的同事都是拿政府资助的，我那个项目做社区的，没有的。我的工资比他们低三分之一，可是我觉得生活还过得去。我上了业绩之后，服务中心每个人都尊重我。因为我能力不比同事低，而且我拿低工资（笑）。我对很多年轻人讲，重要的是

工作有意义。要很懂得把生命跟机构的使命连接起来。我很喜欢台湾慈济证严法师的话：什么是使命？使命就是使用生命的感觉。不要抬得太高，其实就是把我们生命里头美好的东西用起来。

### **“我很怕极右极左的东西”**

1997 年之后，你选择留下来，并在文章里认为自己做了人生当中最正确的选择。现在，这个话还成立吗？

成立。1992 我从耶鲁大学回来之前，教授说：留下来吧，你应该可以找到教职。那日子是香港移民高潮，人家往外面走，我往里面来。但现在证实，我当时所学的东西正是当代要思考的问题。过去 10 多年，我在内地主要推动公民社会，在香港推动民主化。我每天都在运用我的知识推动转变，令我觉得生活很充实、很有意义，所以我很感恩。

在你个人网站里有一个签名：以理论政，以心观照世情。很想知道，这个理性跟感性怎么融通？

这个正是双鱼座经常面对的问题。香港社运中人，有时候觉得我太冷静了，还要思考对手怎么想等等。在我自己做一个运动之前，我要思考到通透。为什么我争取的方向是对的？当然，我愿意花精力去研究一件事情，是因为我有强烈的关怀。若没有感情的推动，不会坚持很久。但如何不让这种感情影响我理性的判断，是我要经常提自己的事。我虽然相信民主，但很怕将民主教条化。我关注基层百姓困境，但很怕给群众“绑住走”。

我很珍惜自己做学者之前，从事了三年社区工作经验，令我不会对群众太迷信。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听到“群众”、“基层”这些字眼就头脑发热，好像他们永远是神圣的。我也为他们争取过权利，可我也不会觉得他们的想法一定是对的。你可能说我是精英心态，作为一个学者，我经常把自己抽离出来，在投身于群众运动时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地判断世界。

你选择了非左非右的中间路线。这样会不会很辛苦？

两边都骂你的。我觉得没有人绝对掌握真理的。我们都在摸这个“大象”，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所以这也给我带来一个影响，就是比较宽容。我对于保守和激进都能够理解，我能够站在中间的位置。我觉得不是那么绝对的，所以我很怕极右极左的东西。可是，坏处就是两边儿都不讨好，激进的人说你挡住我们，没有你们，我们改革更快。而保守的人从来不相信你，觉得你跟激进的人是一样的，你是捣乱的。有时候是非常孤独的。

### **“我提倡新的北进精神”**

在内地看来，尤其在珠三角地区，会面临“香港内地化”的判断题，你如何看？

香港跟内地交往越来越深，一定会产生内地化；倒过来讲，香港对内地也有很多影响，内地也可以香港化。现在很多人会怕香港内地化，就说要支持反蝗虫什么等等一大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我觉得两方的交往一定是互相影响的，看谁影响谁更快。我提倡新的北进精神，在经

济发展以外，香港可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这种影响从我个人经验可以见到，我在内地教学比在香港教学更开心，我在中山大学看到学生对公民社会理论有很高的热情，锲而不舍地发问。我看到在内地这种环境下，也有一群有理想的年轻人起来参与社会行动，很是鼓舞。

你说你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可是你花了 30 年时间做温和改良，这样一个转变的时间点，对其他人有参考价值吗？换言之，什么时候可以放弃和平主义？

很多国家的经验，看不出暴力是最好的。对我来讲，尽量用改良方法，用温和的方法。特别我相信在香港用温和方法是有效的，因为主体的人群是非常温和的人。在香港这个环境里，我觉得走得太激进是脱离群众的。主体既然是温和的，你以为你很激进是进步，可是却脱离群众了。当然，如果长时间用了温和方法还是没有用的话，就要思考转换手法，就像当年曼德拉在南非反对种族歧视运动中亦转换策略数次。不过，我觉得在香港还没有到这点，要放弃非暴力运动。现在的问题是，在内地根本没有开始去尝试，那种和平的、非暴力的、不合作的，却可以产生影响力的表达和参与，我觉得人们还不太认识。

改良和革命的关系你怎么想？

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谈国家的进步，其实有不同的实现路径。有革命的，也有从官方体系内改革出来的，也有互动的，即民间力量在体制外推、改革派在体制内作出回应。从上世纪 70 年代中到 90 年代中，全球民主化过程里比较多的是从上至下和互动为主，革命的极少。所以，如果谈当代民主化过程，革命不是主流，可以有很多其他方法。通过革命产生的民主，如果它之前没有做很好的准备，崩溃的可能性很高。如果通过改革铺垫好社会基础，如公民社会、法治等等，民主建立起来以后，崩溃的机会就减少。从这种经验看，我们要尽量思考，通过改良方法实现改变转型，那种代价比较小。

一个国家那么大，谁也不知道下一分钟走向哪里。电影《三峡好人》的最后一幕，一个人在高空走钢线。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隐喻。风往哪边吹，平衡杆要是不摆动，人就会掉下来。那个人真是很厉害，一直往前走，可是在下面看着也很恐惧。中国每天往前走，但还没有稳定下来。

来源：中国财富

地址：<http://zgcf.oeeee.com/html/201305/07/56396.html>

[【返回目录】](#)

## 专家共识：“去行政化”是否是中国红会改革的必由之路？

近几年，中国红十字会不断遭遇公众的质疑和批评，新旧问题不停交叠，改革未见突破性进展。那么，红会改革方向和方法为何，关键点在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健刚以及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创办人刘开明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皆表示，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之所以反复、艰涩，究其原因，是其体制身份上的尴尬导致的，而“‘去行政化’则是中国红十字会改革的必由之路”。

### 不偏颇地认知红会意义

随着对于红会的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公众对于红会的存在意义也产生了怀疑。邓国胜告诉记者，红会的改革一定是在对红会的历史与目前现状综合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成功的改革离不开客观公正的认知。

“毋庸置疑，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重要成员，中国不仅需要红会，并且需要红会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邓国胜首先肯定红会的作用。他向记者介绍说，在战时或武装冲突中，红会可以援助冲突中的受难者，具有不可替代的人道救援作用；在日常，红会则发挥备灾救灾、卫生救护培训、人道救助等作用；另外，作为国际红会的成员，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合作中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例如，在没有建交的国家中开展人道救援。

邓国胜告诉记者：“中国红会不仅在救灾中可以呼吁国外红会的援助，而且也可以通过红会系统，让中国的人道援助开展到其他国家。”

朱健刚也以肯定的口吻阐明了红十字会的独特作用：“中国红十字会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国际背景的本土公益慈善机构，其动员管道、救援途径都是一般的公益机构所无法比拟的。红十字会历史悠久、知名度高，它是能够传递和延续一种公益习惯的，所以中国红十字会有存在理由的。”

### 去行政化是改革关键

三位专家均认为，运转多年的红会由于其官办背景和资源对接渠道的强大，在筹款和灾后援助等方面确实有着其他基金会和公益机构所不能比拟的优势。但其与政府在行政方面的交错，又确实难以保证其自身在运作上的透明度和有效性。然而，“去行政化”改革到底要具体做哪些工作？又是否有先例可循？邓国胜为此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所谓“去行政化”改革，就是“与国际接轨，坚持红会的独立性、自主性”。“毫无疑问，各国政府与本国红会均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甚至是各国红会主要的资金来源。但是，各国红会相对于政府而言，具有自身的独立自主性，政府不干预红会内部运作。这正是中国红会未来的主要改革方向。”邓国胜说，“具体而言，中国红十字会需要完善治理结构、去除行政级别与参公编制待遇、加

强内部管理、增强公开透明度、提高服务质量与效率。”此外，邓国胜还认为，必须要修订《红十字会法》，依法推动红会自治。

对于最后一点，长期围绕企业社会责任与 NGO 进行研究的刘开明为记者列举了香港红十字会模式，希望能够给目前棘手的红会改革带来新的思路。

“香港红十字会是有立法承认和保护，它的身份是法律赋予的，因此具有法定地位。但香港红会在运作上是独立的，和普通公益组织无别，同样要参与竞争、接受监督。事实上，香港红十字会受到港府委托，履行人道主义救援职责，而港府在救灾方面也会首选红会。”刘开明这样说道，“一句话说：香港红会地位受法律保护、身份独立、运作市场化，政府不掺和，但会优先选择与之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红会是参与竞争的，所以，如果做得不好，香港红会也同样会筹不到钱。”刘开明补充道，“目前中红会的社监委，其实是在试图使红会在运行过程中‘做得更好’，但社监委性质有些尴尬。”

身为社监委委员之一的邓国胜也承认：“目前，社监委只是中红会聘请的社会监督员，监督中红会的合法性不足。在红总会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社监委本身并没有权限对地方红会进行监督，这样一来，社监委的身份就显得极为尴尬。而总会与地方红会只是业务指导关系，地方红会的人员任命与资金由地方政府决定。但地方红会一旦出问题，一损俱损，会殃及整个红会的信誉。”

据了解，香港红十字会通常召集社会上有信誉名望的人加入其董事会，这与中红会社监委在人员构成上有所类似。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陈启明曾表示，香港红会的董事会由不拿薪酬的社会专业人士构成，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和专长，在参与红会工作后会提供专业意见，并带来一定的商务网络、人脉资源，红会也因此可以多得到一些捐助。他们一方面是香港红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也是香港红会的监督者。“但这一切，都必须基于‘非行政化的土壤以及立法的保护’。”刘开明这样说道。

### 借鉴同行经验

虽然“去行政化”是红会改革方向的选择之一，但是，像红会这样一个行政化历史久远、组织架构庞大的基金会，怎样进行改革才会显得没那么“撕心裂肺”？邓国胜表示，其实此时正是考验政府和公众力量的时候，政府要下决心推动红会改革，否则红会很难恢复公众的信心，当然也要给红会以“去行政化”的信心，而非让其惧怕改变、不敢担当。除此之外，邓国胜还觉得公益基金会的同行们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具有重大作用。

他说：“红会的危机，对于其他官办慈善组织均有警示作用，官办慈善组织只有改革才能重生。目前，很多官办慈善组织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改革，仿佛事不关己，这一点非常遗憾。红会危机，其实已经影响到公众对整个公益慈善领域的信心与信任了，从 2011 年、2012 年捐款不断下降就可以看出。”

“改革需要渐进，红十字会可以向公益界的同行们多多学习。一般而言，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是比较可行的方案。而这一套具体的方法，中国公益改革先锋——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开创性革新经验就是值得红会借鉴的好表率。”

“作为官办的慈善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去行政化’改革堪称‘豪迈’、‘勇敢’、‘彻底’。而它的成功，无不昭示着现代化、市场化的制度对于中国慈善机构的改革与发展有着巨大的裨益。”邓国胜对记者这样说。

据了解，扶贫基金会的去行政化所包含的点非常多。首先是职位设置不再和政府级别挂钩，比方说以前扶贫基金会的秘书长可能相当于正厅长的级别，那么现在就不是了，此外事业编制也被取消，完全按照民间组织的编制形式自行进行人员设置和管理。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王行最曾表示：“这样基于项目的人员需要、预算估计，合理招募和安排人员，不会造成队伍的冗滥，实现了人力资源和行政管理的去行政化。当然，扶贫基金会虽然实现了去行政化的制度模式，但是改革之后其管理仍是有层次的，人员也是有分工的。”

邓国胜认为，公益基金会去行政化还包含募捐手段的更新以及人才的市场召集。据他介绍说，中国扶贫基金会“去行政化”之后，不再以行政的手段和行政力量去募捐，政府发文件指定谁来捐款这种上级对下级命令的方式的筹集模式被市场推广手段彻底替代，选择具有灵活度高、有竞争的项目策划执行方式。尊重个人的选择，是“去行政化”非常重要的特点。同时，中国扶贫基金会又引进了很多的强专业型人才，譬如投资人才、法律人才、新闻人才、项目管理人才等，业务考核严格，淘汰机制完备。

朱健刚则表示：“一直以来，‘清水衙门’的印象，是阻碍公益机构发展的重要原因，如果红会去行政化后，能光明正大地提升福利待遇，势必能促进红会的人才建设。此外，红会领导层的人才建设也需要调整，理事会要进行变革，理事会成员可以引入一些企业家、学者等人才，秘书长要挑选有市场理念，乐于竞争创新，而不是把红会当成跳板，用完之后就甩的人，红会也要赋予秘书长实权，这样才有利于领导层发挥真才实干。”

“当然，‘去行政化’也意味着对公众负责，基金会运转中的透明度就显得极为重要。像中国扶贫基金会将民政部注册编号、注册时间、注册资金、法人代码等，财务报表、工作人员信息、项目运转资金、受益地区是哪儿、群体是谁、救助标准等都作为可公开的内容，这样的坦诚值得推广。”邓国胜补充说。

朱健刚认为：“若中国红会能华丽转身、成功改革的话，我认为它将是最能发展出独特战略、最能打造出中国公益品牌的公益慈善基金会。引入市场竞争，确保政社分离，是使整个中国公益领域产生良好生态的不二法门。”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yaowen/201305/295210e709dc4e299848a9ad9416b0eb.shtml>

[【返回目录】](#)

## 专家共议：怎样的监督机制能让公众满意？

曾几何时，在关于公益组织信息透明公开的各种论坛中，业内大佬们把“引入第三方”挂在嘴上。“第三方”究竟是什么？它能够在基金会抑或整个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当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社会监督委员会的中立与否被拿来质疑的时候，一组问题浮出水面，怎样的第三方才能让公众信任？什么样的监督机制会让公众满意？

### “社监委”的角色

如果说关于引入第三方监督的思考从中红会的社监委开始，社监委的江湖地位便也要从大家心中走上台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 NGO 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坦陈了自己的观点：中红会的社监委是一个内部的中立机构，现在基金会要求有理事会、监事会，它有点相当于监事会的角色。监事会本身也是独立的，但还是组织的一个内设机构，不是完全的社会第三方。

“人是第三方的人，组织设计很像监事会的角色，这样的话，最重要的是监事的选择上，如果是独立的监事，包括法律上对这种监事的责任界定得也比较清楚，这种监事本身也有业内公认的话，监事会确实也能够起到内部中立监督的作用。”

贾西津认为，实际上社监委的设计对中红会自己而言是进步的，纳入了社会独立的力量来对它进行监管。但一个机制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方方面面多元的机制。

“如果红会自身的运作机制捋顺了，它的这种社监委便是很好的第三方监督机制。但反过来红会自己在现有的法律关系、权责、决策治理机制等等不清楚的情况下，希望靠社监委来建立公众对红会的信任是不现实的，社监委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作用，这不是社监委自身的问题，而是红会的问题，不是靠这样一个机构就能解决的。”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朱晓红也认为，中红会社监委的设立是红会努力

提升公信力、完善监督机制的制度尝试，对于完善其内部治理具有进步意义。社监委委员属兼职工作，各有本职工作，因此，社监委应是启动、配合其他监督形式监督手段的制度设计，不能把相关事件处理责任全归于社监委。

然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友华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自己的困惑：“监督需要被赋予权力，社监委是否拥有对地方红十字会日常运营与项目开展情况的监督权，有待法学家从法律上进行详细考证。如果法律上没有授予社监委对地方红十字会开展项目的监督权，又如何监督？”

### 第三方——监督还是服务？

事实上，不管红会的社监委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公益组织对第三方的实际需求已然不能阻挡。

瑞森德企业社会责任机构总裁段德峰这样和《公益时报》记者分析：我国当前来讲，第三方在对各家组织内部的风险控制、监督方面，专业力量较弱。而就国内的基金会规模来讲，让它内部有个专门的风险控制、监督的机构是很难的。“中国现在没有一家基金会的规模是上千人的，在美国那种几百上千人的基金会是很多的。这种情况下，内部的细分才更专业。目前我国的一家基金会有的二十几人，这种内部监督是很难的，这时候就需要有第三方参与。”

贾西津认为，第三方监督审计对大的项目，尤其大规模的募资，或者有些购买项目的评估，是比较中立的。

“第三方应该是指专业性的独立审计机构，也还可以有一些社会上的评估机构，或者自律性的组织。像国外还有一些组织做透明度，现在我们的基金会中心网就在做类似的事情——审核发布基金会的透明指数，这个其实就是个第三方，中立方。它的公信力应该是由业内逐步认可的。再一个，如果是特定的政府购买，在项目中由政府来寻找一个在那个机构或研究机构也可以，来专门评估项目。比如，当时在江西第一次尝试扶贫购买的时候，就很好，他们请来一个德国的机构来评估这个项目的成效，也是个第三方。”贾西津说。

瑞森德企业社会责任机构也曾为一些公益组织做过评估。在段德峰心中，第三方参与有几种：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其实不是监督，是帮助完善组织内部的合规体系，是服务形式的。比如基金会中心网这样是帮助你内部程序的完善，很难说是第三方监督的机构，更多的是提供行业自律的平台。“我理解的第三方比如媒体监督，这种才是真正意义的第三方监督。当然，还有行业协会这种。”段德峰认为，第三方最终的目标是形成一种机制，来让市场上的捐赠者学会怎样判断一个组织的好坏。无论第三方是平台、是监督机构，还是政府。

### 监督机制如何才能让公众信任

公益组织对第三方机构有需求，但目前这类第三方机构却处于稀缺状态。接受采访的学者们多数认为第三方也只是监督方式的一种。那什么样的监督机制才能真正地让公益组织得民心、得信任呢？

朱晓红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红会危机反映了社会组织监督体制有待完善，政府监管机制、社会监督机制、行业自律机制有待完善，亟需整合。比如，我国缺少社会组织的同业组织，也就是社会组织领域自愿联合的产物。主要功能是交流社会组织领域信息、组织会议、研究公共政策、增进社会组织的公开性和透明性，起到相互监督、行业自律的作用。我们可以考虑培育类似社团管理者协会、基金会协会的行业组织，做为独立第三方对社会组织进行服务与监督。

而在陈友华心中，引入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加强对公益慈善机构的监督，促使其公开透明与健康发展是必要的，但仅仅依靠此也是远远不够的。

他认为，除了引入独立第三方的监督之外，以下这些监督可能也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政府监督。政府不仅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政策与资源的供给者，更应是公益慈善组织运营的监管者。其次，媒体监督。目前，这一监督方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再次，捐赠人监督。这对捐赠人与公益慈善组织均提出很高的要求。除了大额定向捐赠的监督相对容易以外，其他类型捐赠监督，无论是对于捐赠人，还是公益慈善组织可能都较为困难，且监督成本也可能较高。第四，社会监督。关注、参与，甚至是监督公益慈善组织活动，是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最后，行业自律。公益慈善组织要坚持信息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各方的监督。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yaowen/201305/d00c1bb9d744489cae9e4dff2379cc32.shtml>

[【返回目录】](#)

## 专家共议：民间力量成长：公信力是王道

“郭美美”等事件引发人们对公益组织严重信任危机，余波未了。两年间，新的基金会崛起，官方背景的公益老牌基金会求变。作为后起之秀，壹基金如何把“透明”进行到底？作为公认的赢得公信力的扶贫基金会，如何在雅安救灾中把握改革步伐？

“4·20”芦山地震，壹基金和中国扶贫基金会成为最受网友关注的两家基金会。5月16日下午，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壹基金传播部总监姚遥，公益学者邓国胜等共聚最公益讲堂，

探讨“从汶川到雅安：灾害救助的民间力量”姚遥认为“不是人们有多么喜欢壹基金，而是可选择的太少”。刘文奎分享了“扶贫基金会之变，从自己成为灾民，到如何构建一支专业化救灾队伍”。邓国胜老师从学者角度做了精彩点评。以下为现场讨论实录：

姚遥：不是人们有多么喜欢壹基金，而是可选择的太少

姚遥：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公益老大哥，很早就在专业化道路上做了探索，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壹基金发展历史虽然比较早，但真正成型发展是 2010 年取得独立公募资格后，开始在专业化方向走得更快一些。

壹基金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被很多人知道，非常幸运。我先讲一个玩笑话，庐山地震时，杨鹏秘书长天天坚守在最前线，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一天媒体采访问他：“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壹基金？”疲惫之余，秘书长说了句“老百姓喜欢我们吧。”，第二天这句话成为媒体的头条大标题公布出来，变成“壹基金说，老百姓喜欢我们。”后来有另外一篇评论报道说：不是我们喜欢你，而是可选择的太少，我们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取得一些成果的同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反思和优化。壹基金要不断发展、进步和完善自己，更加专业化，得到大家的信任。

这次救灾，壹基金捐款人次达到近 500 万人，在壹基金的历史上都是破记录的。当然我们在工作投入上也是创记录的。芦山地震中，我们建立 14 支救援队，联合 47 家合作伙伴，投入前线的壹基金工作人员 16 人，和合作伙伴一起包括救援联盟、联合救灾超过 200 人，发动志愿者 800 人。有了这么多的人力和组织才可以完成在芦山地震运进一百多车物资以及保障其它零零碎碎的各种事务顺利进展。

地震结束后，我反思为什么这次地震中壹基金关注度比较高？我想可能是在民间救灾中壹基金回应了五个问题：

一是参与问题。一方面，从动员式定点捐款到多渠道便捷参与。汶川地震期间，绝大部分捐款是动员式的或者单位体制的，大家集体捐，可选择的渠道比较少，参与的通道主要通过手机短信。现在我们解决了参与通道问题，利用比如支付宝、财富通、网络微公益等，包括最传统的邮政汇款等方式，多渠道参与。

另一方面，解决志愿者参与热情问题。汶川地震时大量志愿者涌入，场面很混乱，无法有效工作反倒带来更多问题。这次我们通过组织化消费了个人参与问题，最终动员了 800 名志愿者，分检了和检验了两百万个包裹，将一个一个包拆开，看日期，分检食品、药品、水、帐篷、电器、衣物等，然后配发下去。通过组织化解决参与问题。

二是壹基金回应了救灾中制度化、专业化的参与问题。比如救援联盟，我在前线遇到河南救援联盟的下车情况，感觉跟特种部队一样：首先是保护自己的装备，其次是轻型的绳索等搜救和相关

的装备。我们是轻型救援队，轻型救援里的准专业水准。对于物资发放，技术平台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壹基金每天有人做现场评估，然后发给后方，我们在成都有一个采购小组，第一天完成评估，晚上发给采购小组采购，然后发货，第二天可以开始物资发放，有效解决物资延时问题。灾区物资需求变化太快，快到难以想象。专业化背后需要有经验，救援队第一时间往芦山跑，成都工作人员走得比较早，提前进入震中，其他地方的工作人员因各方面问题很难进去，怎么办？凭经验，因为地震绝不只是震中，所以他们去了震中周边区域，在那里采集到消息，把消息发给成都，成都采购物资，第二天在上里进行发放。央视新闻在微博上说，天全县缺少大量的物资。其实我们在媒体发现前就开始做了，并且第三天开始发放物资。

三是透明问题。壹基金每天都发一篇救灾日志反馈救灾行动。而且所有物资都是我们自己亲自去发的，因为老百姓信任度很低，我给你的钱只能由你发，交给别人发我不放心，所以所有物资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跟到村、跟到户发放，解决老百姓对你信任的问题。

四是公平问题。中国老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一袋米分不平肯定要打架。我们在社区工作时，做好细节问题，比如把大米拆开包后，一人称十斤半，桶装的油，用矿泉水瓶分装，按人头领，解决公平问题。

五是发展问题。人们在救灾时第一想到的是矿泉水，第二是方便面。方便面可以应急吃，但天天吃是不行的，作为中国人正常吃的是大米饭，这是饮食习惯和健康所需要的。所以在我们自己采购的物品里，一直坚持大米和食用油，没有方便面，都是很多爱心老百姓通过包裹发给我们方便面，我们作为临时补给发了下去。

最后，我要说三个感谢。第一要感谢大家的信任与支持；壹基金很幸运，民政部第一次没有指定基金会接受捐款，大家才有可能选择我们。第二要感谢自媒体平台，壹基金很注重自媒体平台，比如腾讯微博 300 多万的观众关注，这是我们自己发布消息的一个很好的平台。第三要感谢腾讯乐捐等新技术网络捐款平台。腾讯 35 万人次超过 1500 万元的捐款，新技术平台的搭建，让我们接受公众的捐赠带来了更多机会。壹基金很幸运赶上了形势。

主持人：壹基金可以说是生逢其时。虎嗅有一篇文章《幼年壹基金：捐款多信任重，要 Hold 住》，这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希望你们用好这份信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这方面有更丰富的经验，请刘老师讲中国扶贫基金会是怎么做的。

刘文奎：扶贫之变，从狼狈的灾民到专业化救助

刘文奎：今天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救灾项目成立 10 周年，当时我们针对的不是地震，而是 1998 年大水。但 2008 年汶川地震让我们措手不及。水灾救援和地震救援不一样，比如水灾地区有房子可以住宿。可汶川地震时，我第一时间拉着拉杆箱去了，去后发现自己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没带帐

篷，宾馆不能住，自己成了灾民，很狼狈，这是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汶川地震发生后，有大规模的资金和大量的物资通过各种渠道汇总到前线指挥部，有陆运、铁运、通讯，当时没有经验。一个礼拜后才摸索出流程化的东西。很狼狈。

不过从2008汶川地震到今年的雅安地震，我们不断摸索和总结了很多专业管理流程，包括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出发时要求带上的装备（平时有训练），先把自己个人问题解决好，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另外是物流系统，第二天就建立，各个流程组织在成都、雅安、芦山、天全、宝兴，我们工作人员在那里把自己的工作站建立起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到现在为止，我们共计筹集了5000万物资，加上自己采购的总共6000多万，目前5000多万物资都已发到灾民手中，剩下一部分在调运中，未来一个星期内会基本结束。

很多人问扶贫基金会救灾和其他机构有什么不同，定位是什么，为什么要做？借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第一，基金会为什么救灾？因灾致贫是导致贫困的一大原因。这次雅安8个县，受到灾害影响有12万贫困人口，因灾致贫的约53万人，中国扶贫基金会以“扶贫”为宗旨，对他们救援是理所当然。救灾从哪儿入手？干什么事？一是救济救援救灾，二是过渡安置，三是灾后重建。

救济救援阶段有两件事：生命搜救和生命保障。从废墟、危难中抢救出来；抢救出来后，由于地震、水灾所有生活物品都会短缺，短缺造成的困难是一大问题。所以扶贫基金会在这阶段的定位是做生命的保障，将人从最危险的地方转移出来，提供食品、水、衣物、被褥、帐篷。

过渡安置阶段，我们简称为生命陪伴。救出来后，因灾害的巨大创伤，灾民心理会出现问题，我们会做一些心理辅导、心理干预，让他们的压力得到释放，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让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

灾后重建，根据灾区情况我们注重做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社区的基础设施恢复，主要是村组织小型的设施，比如饮水系统重建。二是生计和产业的恢复，有了房子住和基础设施——路可走，还有收入来源，扶贫基金会长期关注，也是我服务的方向。三是社区能力的建设，包括社区服务组织，公共服务的提供，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是做什么。

怎么做？用什么方法？我想有两个结合：一是经验和创新结合，我们将从汶川到玉树地震救援积累的经验很快复制到雅安的灾后重建工作中。除了经验的复制，我们追求每一次灾害，根据最新的实践成果，把最新的理念、方法引进来，用创新的方式解决灾民的问题。最近我们评估组除了灾后评估，也开始走出去到各地去看社区恢复，社区建设，包括社区营造做得比较好的案例模式，希望把一些做得好的经验引进来。三是我们非常注重培养灾区社区的能力，要注意保护大家的积极性，在项目执行中很多项目设计都要考虑这一点。这是基金会在救灾方面的定位。

我们做很多准备，希望灾害不要来，但没有办法，灾害要来时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再加强学习、加强训练，把我们的备灾、防灾能力提高，这也是我们在灾后重建里的一个重要议题。。

邓国胜： 公益圈吐故纳新，公信力就是王道

邓国胜：从汶川到雅安，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在座几位就可以看出中国五年来救灾民间组织的成长。老牌 80 年代成立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成长中的壹基金，汶川地震后新成立两家 NGO：卓明信息小组和益云，中国救灾类的民间组织数量大幅度增长。这些组织有些是当年在汶川地震时做志愿者，他们慢慢学习、反思、总结，发展出一个专业的志愿者组织。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支持性组织越来越多。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基层一线做事的组织数量很多，真正最缺的历来都是支持性的组织，这种支持性的组织能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草根 NGO、基金会搭建非常好的平台，能更有效率的提升救灾的工作。

第三，我们也可以发现正是由于五年来高科技技术的不断引入，使公众参与打破了空间限制，不是每个参与救灾的人都要到前线去。高科技让我们在后方都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真正实现人人可参与，人人可奉献。

第四，民间组织的迅猛成长。以壹基金为代表的民间组织迅猛成长和发展，说明只要政策放开，社会的活力就能得到很大的释放，壹基金是芦山地震杀出来的一匹黑马，一鸣惊人。募捐过程中现在基本稳居老大地位，募集的资金特别是现金流量最多，这说明只要给予空间，民间就会有活力。为什么壹基金有活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压力大，不是靠行政手段、垄断地位获得捐赠，而是靠自己的透明、公信力赢得捐赠人的信任，赢得社会人的捐款。所以他有压力，得自己亲自去发放、监督，否则没有办法给捐赠人交代。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组织的存在，民间公益慈善的活力由于有了竞争机制，我相信会不断成长和发展。

另一个方面，以扶贫为代表的老牌的、有官方背景的 NGO，只要改革了，照样魅力四射，充满活力。而不改革，会很难赢得公众的信任，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公众可以用脚投票。可以选择，这对其它有官方背景的公益慈善机构来说是非常好的警醒，也是非常好的榜样，为中国未来慈善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是民间组织蓬勃更多的发展，不仅需要壹基金，而是需要更多的壹基金，需要更多的民间公益慈善机构，这个领域才会更加有活力。同样也需要有官方背景的，因为他们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只要他们变革会使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更有力量。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变化，五年来扶贫基金会不断改革、不断前行，无论是在救灾透明度方面、效率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当然看到积极变化的同时，还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问题表现在：一是纯民间组织虽然学习能

力很强，成长很快，但组织能力相对来说还不够高，专业化程度有待提升。

民间组织已经有很多平台，也有很多网络。比如扶贫基金会和壹基金既有救援队伍网络，也有庞大的 NGO 网络。但这些网络之间没有协调、互动、联动，网络之间很分散，没有稳定的联动接口，导致政府即便想和你们对接也很困难，因为面对这么多网络政府到底跟谁对接？比较便捷的、让民间能够有制度参与渠道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这些民间组织自己能够联动，能够形成统一的声音，这样政府才可能让你纳入进来。比如在美国，只有当救灾的 NGO 形成联合会时，政府才会打开一个空间，让你制度化的参与进来。

公众不仅要在紧急阶段参与，更重要的是在灾后重建阶段也能够积极参与进来。文奎秘书长也说到，在紧急救灾阶段 NGO 和志愿者热情、参与激情最高，最需要的是灾后重建阶段，而这时志愿者潮水般的退去。我对汶川地震做了调研，一开始有数百万志愿者，成千上万的志愿者组织，但一年后，剩下的志愿者不到 5 万，志愿者组织不到 50 家，如潮水般退去。

最后，我想提一点，很多媒体看到这些困难的局面，看到部分公益机构做得不好，自己就勇敢从幕后到前台。这里我要奉劝一句，社会有分工，媒体要守住本位，做好自己的事，尽到媒体的责任，不是说媒体不要去做公益，但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边界，媒体做公益，不要和其它基金会、NGO 发生竞争性的关系，你是一个支持者，是一个平台，给所有 NGO 一个公平参与的机会。谢谢！

来源：腾讯文化

地址：<http://cul.qq.com/a/20130520/022246.htm>

[【返回目录】](#)

## ◎行业观点

# 人民政协网：灾害救助，慈善机构应建联动协调机制

从汶川到雅安，5 年间，民间慈善力量越发积极参与到救灾、减灾、防灾、灾后重建等过程。连日来，在汶川大地震发生 5 周年之际，公益慈善业内针对民间慈善组织在灾害救助中的成长与不足举行了多场研讨会。多位专家指出，灾害救助的民间慈善力量需要进行制度化建设，要搭建具有公信力的灾害信息救援平台；与此同时，政府和慈善组织之间也需要建立一个长效应急救援协调机制。

5 月 16 日，据雅安地震过去已近一个月，不少慈善组织已经开始把灾后过渡性安置乃至灾后重建提上议事日程。

当天，多名学者、基金会代表、基层公益组织代表齐聚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和基金会中心网联合在京举办的燕山大讲堂，一起探讨灾害救助中的民间力量如何成长。

“民间力量在此次地震中表现‘抢眼’主要是基于政策松动和公众信任。在壹基金传播部副总监姚遥看来，政策松动让壹基金有机会公平参与募捐，微公益平台的搭建让公众参与更加便利也是一大因素。

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壹基金在此次地震中共募集到善款 26912 万元，排名第一。

“以基金会为代表的民间力量更趋活跃，基金会不再凭借行政手段或垄断地位，而要依靠信任和透明度才能赢得发展。”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5 年来，民间救灾组织数量大幅增长，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公益慈善领域中的支持性组织也逐步成长，使得灾区信息传递更加及时、专业，有助于立体化呈现灾区状况。

但与此同时，民间组织的个体创新需要上升到机制层面，进行制度化建设。“民间组织尚存能力不足，缺乏统一的联动机制，无法达成协同互动等特点，容易导致资源浪费。”邓国胜说。

华夏公益雅安救灾信息平台协调人赫南认为，慈善组织应联合起来，搭建具有公信力的信息救援平台，建立起专业化信息处理机制。“基金会应该先从信息的互通互联开始做起，逐步过渡到联合共享。”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为此呼吁说。

中国慈善联合会此前在北京召开的“从汶川到芦山，慈善组织如何在救灾中发挥作用”的研讨会上，有关专家也提到了要建设慈善组织之间、慈善组织和政府之间的联动救灾机制，构建适应新形势的救灾新模式。

此次的研讨会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慈善组织如何和政府间建立长效的应急救援协调机制；二

是慈善组织之间如何建立长效应急救助联动机制。

就政府和慈善组织之间建立长效应急救灾协调机制，邓国胜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建议 NGO 建立自己的应急救灾联动机制。“救灾阶段涌入灾区的慈善组织特别多，政府不可能面对每一个慈善组织。所以慈善组织最好有一个自己的救灾联合会。”二是在救灾过程中把民间公益慈善纳入现有的救灾体制结构里。三是政府应该建立救灾慈善组织数据库，日常保持联系，了解各个组织的特长。最后，邓国胜还建议政府在救灾过程中更好地统筹捐赠企业，更好地与慈善组织进行合作、开展救灾。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对此表示认同。针对探讨的两部分协调联动机制主题，她认为，一方面是政府和慈善组织协调，如果有统一信息平台的构建，让各个慈善组织知道政府的救灾服务覆盖到哪里，这些慈善组织自然会往其他还未覆盖的地方开展灾后救助。与此同时，在慈善组织内部应当有一种联盟。“不仅是有灾情的时候才发挥作用，平时也有沟通。很难想象平时没有业务联系，当有问题的时候要马上结盟是不可能的。所以平常的训练、沟通，联盟的构建，互通信息是很重要的。”金锦萍还提出慈善组织需要考虑自己在哪个阶段是最有优势的，分阶段、分角色地介入灾后救助。“不能一窝蜂地上。我们的目的是怎么把资源尽可能合理配制，让救灾更加迅捷有效贴近人心。”

“建立常态的慈善组织之间的救灾联动机制，以及慈善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救灾联动机制具有一个长远的制度性的意义。”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彭建梅表示，中国慈善联合会将会就此努力搭建政府和慈善组织之间的沟通合作平台。

来源：人民政协网

地址：[http://epaper.rmzxb.com.cn/2013/20130521/t20130521\\_498332.htm](http://epaper.rmzxb.com.cn/2013/20130521/t20130521_498332.htm)

[【返回目录】](#)

## 京华时报：芦山地震开启公益捐赠新格局

2008 年汶川地震，中国各级红十字会共获得 138 亿元捐赠款物，当年全国公募基金会合募款物为 38.64 亿元，红会捐款是后者的 3.57 倍。五年后的芦山地震，红十字会系统截至目前获捐款物 9.02 亿元，而基金会则为 13.8 亿元，比例已下降到不足后者七成。

在芦山地震中，一些公信力较好的基金会呈强势发展，打破了政府、红会和慈善会三大获捐平台垄断的局面。公众成为推动此次变革的力量。中国公益捐赠资源，正面临着洗牌和重构格局的变化。

## 红十字会

### 获捐款物降至基金会七成

对于红会募款减少的原因，徐永光表示，一方面不排除“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跟本次政府未指定捐款平台有关。

在其中，但对于此次震后 9 亿余元的捐款，公众捐款的人次和金额具体有多少，红会宣传处处长陶艺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尚未进行统计。

不过，在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看来，这次红会的表现可圈可点，不仅反应快，而且与汶川地震相比，专业化程度更高，比如专业的供水队伍、公共卫生队伍，这是其他慈善组织不可比的。

邓国胜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会正在与民间组织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并准备打破以往红会募集资金几乎都通过红会系统实施的形式，“这次准备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

截至 5 月 19 日 10 点，中国红十字总会官网上显示：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在芦山地震后接受社会捐赠款物合计 90225.81 万元，其中，捐物 26030.47 万元。根据其网站上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发展概况资料显示，这个系统里应该包括有全国由省至县里的 3000 余个红十字会。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此前的数据显示，2008 年汶川地震募集的社会捐赠资金中，总计有 21.1% 流向了政府指定的红十字会系统，只有 5.9% 流向了公募基金会。

虽处于社会质疑的风口浪尖，但芦山地震后，红会系统仍获得了 9 亿余元款物捐赠，仅占其他基金会 13.8 亿捐款的七成，而五年前汶川地震时，红会捐款是后者的 3.57 倍。

对于红会募款减少的原因，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一方面不排除“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跟本次政府未指定捐款平台有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分析称：“红会获捐量与汶川相比有所减少，但仍会获得相应的支持，比如一些长期合作的企业仍然会捐款给红会。”

在中国红十字总会官网上，芦山地震捐赠名录保持着每日更新的速度，许多来自普通公众小至一元钱的捐款也

## 慈善总会

### 缺少政府支持遭遇募款难

邓国胜评价，中华慈善总会表现低调可能是因为其缺乏活力，也不擅长救灾，在政府未将其指定为捐款接受平台后，募集不到资金。

与红会一样，作为两大官办背景的公益组织之一，以往每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慈善会均会成为受政府指定的接受捐款平台之一。汶川地震后，中华慈善总会接受捐款 10.76 亿元，占整个捐款

总量的 1.63%，是当时全国公募基金会捐款总量的三分之一，而芦山地震后，据慈善总会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其捐款量降至基金会捐款总量的二十分之一。

截至 2013 年 5 月 15 日 15 点，中华慈善总会共收到

捐款 6069.28 万元，物资 700 万元，共计 6769.28 万元。但对于公众捐款所占比例，中华慈善总会与红会一样，均尚未进行统计。

邓国胜评价其在芦山地震后的表现“非常非常低调”，他认为，可能是因为慈善总会缺乏活力，也不擅长救灾，因此在政府未将其指定为捐款接受平台后，募集不到资金。

无论低调的原因何在，作为官办公益机构，“只有去行政化改革，回归慈善组织的本质，政社分开，去除行政级别、打破铁饭碗，才能涅槃重生。”邓国胜说。

徐永光认为慈善会改革迫在眉睫，“中国慈善行业最大的问题是慈善会系统，慈善会是以社团之名行基金会之实，是一个纯粹的政府基金会，不能按基金会管理条例约束自己的行为，是一个不依法行事的机构。”

## 基金会

### 捐款量大考验组织能力建设

一些新兴的基金会尽管获得捐赠较多，但组织能力未必跟得上，人才短缺，项目官员经验不足，能否花得好社会捐赠，将是很大的挑战。

与红十字会和慈善会捐款比例下降相反，壹基金、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等新力量的崛起，致使以传统老牌基金会为主导的格局发生变化。

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全国约 143 家基金会（其中 81 家公募基金会，62 家非公募基金会）在芦山地震后筹款 13.8 亿元左右（不包括基金会捐给基金会的重复性捐款），其中，壹基金获捐量位列第一，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也名列前茅。

“这是慈善回归民间的转折点，也是公众捐款‘用脚投票’的开始。”徐永光表示。

基金会虽然人气高涨，但仍有空间尚待提升。

据基金会中心网分析，此次基金会的全部捐款中，公众捐款比例约占 10%，而这其中，又有 80% 以上来自壹基金的公众捐款，多数基金会公众捐款比例远远低于这个平均值。

“这次基金会的表现总体不错，但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社会捐赠资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家基金会，个别基金会虽然获得 1 亿捐赠，但也只是一家企业的捐赠。可见，中国民间有活力的基金会太少，公众可选择余地不大。”邓国胜分析。

此次获得公众捐款比例较大的基金会，也不乏一些官办基金会的身影。

除了得到公众认可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外，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截至目前获得了 7587 万元款物捐

赠，其中公众捐赠接近 10%；而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截至 5 月 16 日 12 时共筹得款物 4389.07 万元，公众捐赠达 14.47%。项目扎实、信息透明，是其获得公众认可的共同原因。

“有官方背景的 NGO，只要改革了，魅力照样四射，充满活力，但不改革，很难赢得公众的信任，这对其它有官方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来说是非常好的警醒和榜样。”邓国胜说。

邓国胜也坦言，对于受到公众热捧的基金会能否承担起考验，表示“担忧”。

“个别基金会获得的捐赠太多，而组织能力未必能跟得上，特别是一些新兴的基金会，人才短缺，项目官员经验不足，能否花得好社会捐赠的巨资，将是很大的挑战。”

### 政府主动淡出开放劝募

民政部的公告等于明确表态，我不接受捐赠了，要捐政府只能捐给灾区政府。

此次芦山地震，在业内人士看来，真正具有深远意义的，是来自政府的决心。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此前统计，汶川地震募集的社会捐赠资金中，58.1%流向了只可以接受社会捐赠的政府部门。而据邓国胜随后的调查估算，这个比例可能在 80%以上。

而此次芦山地震，中国政府给了民间公益组织一个前所未有的资源空间。

4 月 21 日，芦山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民政部发出《关于四川芦山 7.0 级强烈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公告在捐赠渠道导向方面规定：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捐赠以资金为主。

“民政部等于明确表态，我不接受捐赠了，要捐政府只能捐给灾区政府。据了解，这次民政部一笔捐款都没有收。”徐永光说。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也表示：“虽然不排除个别地方民政部门也会收些捐款，但因为公告的发布，估计这部分捐款会很少，政府这次很低调。”

“这次民政部门非常开明，正在逐步放开劝募市场，我个人认为，这次政府获得的捐赠比例肯定远低于汶川地震。”邓国胜预测。

而结合慈善会系统的低调表现，邓国胜的另一个揣测则是与民政部门同一个牌子的慈善会为配合民政部而故意让出劝募空间，“如果是后者，民政部门的公告及慈善会的低调非常值得赞美。”邓国胜说。

来源：京华时报

地址：<http://beijing.jinghua.cn/c/201305/20/n3865209.shtml>

[【返回目录】](#)

## 光明日报：让公益更高效——政府携手公益组织共同推动善款灾后有效利用

5月20日，芦山地震整整一个月。一个月，芦山地震灾区已经由救灾转为安置并启动灾后重建规划工作。

在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如何发挥公益组织的作用，发挥善款的最大价值？20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发起的“芦山地震灾后重建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联合会、南都公益基金、腾讯公益慈善基金等多家公益组织，与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一道，分析梳理了公益组织在救灾与重建中发挥作用的路径和方式。

### 救灾经验：公益组织与地方政府“一盘棋”

“这次我们行动很快！”在芦山地震里，公益组织的力量不可或缺。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介绍，经历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等灾害的洗礼，公益组织在芦山地震后更加高效。

中国扶贫基金会自2003年开始实施“灾害救援”项目以来，积累了丰富的救灾经验。在此次芦山地震中，他们迅速到达灾区，把救灾队伍分成接收计划组、储运组、发放组、监测组，各组人员责任落实、分工明确，使得救援效率大大提升，救援物资以最快速度到达灾区群众手中。

刘文奎介绍，以往的情况是，由于不少公益组织的救援队伍和志愿者队伍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他们对灾区的情况不了解，对于自己的任务划分也不明确，也没有和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的衔接，就连他们自己的后勤和安全问题都难以得到保障，救援效率大打折扣。可见，各公益组织之间、各公益组织与政府间只有进行有效对接和协调，公益救助才会更有序、更高效。

值得一提的是，芦山地震后，为整合社会组织的力量，由共青团四川省委牵头，成立了“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他们主要向各社会组织或爱心人士到灾区开展志愿服务工作提供服务咨询；对前往灾区开展志愿服务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进行登记、核实身份、开展培训、统一配制志愿服务工作派遣证；同时收集、整理各县区志愿服务需求信息，争取和整合服务灾区群众和灾后重建工作的各种社会资源，对接重建项目，将灾区需求与志愿服务有效对接，实现了公益救助与政府工作、群众需求的“一盘棋”。

而这，已成为公益组织眼中的救灾范例。

### 开发性扶贫更有助于提升防灾抗灾能力

在灾后重建中，什么样的扶助更有效？专家、社会组织各抒己见，一种共识也逐渐形成：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其防灾抗灾能力也就越差，受灾也最为严重，应通过开发性支持提升灾区的发展

能力。

在玉树地震灾后重建过程中，甘达村运输合作社便是开发性扶贫探索的一个成功案例。

震后，作为重灾区的甘达村得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300万元的重建资金。300万元，拿来做什么？有人说分掉，有人说拿来建房。最后，人们发现，甘达村能开车的人很多，而且当时灾后重建需要大量建筑材料运输，于是“甘达村运输合作社”应运而生。

截至目前，甘达村运输合作社成效显著，盈利近300万元，实现分红3次，许多因贫困迁出甘达村的人陆续回迁。特别是2012年年初，玉树发生严重雪灾，全州牲畜因灾死亡率达20%，而甘达村靠自己的运输队买运草料，全村1万余头牛羊无一死亡。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汪绍高说，由于贫困地区的生产方式以单户经营为主，这使得资源利用的效率极低，而单户经营不论在农产品生产还是流通环节，都处于劣势地位，一旦遇到灾害，因灾返贫、因灾致贫在所难免。开发性扶助就是要通过探索、建立农村合作经济，通过“抱团效应”增强农民在商品市场中的话语权，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刘文奎透露，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接下来的芦山地震灾后重建过程中，将突出“生计类”项目，结合多次地震灾害重建经验，以促进建设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为重点，兼顾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区抗灾的组织和能力建设。

多支基金会都正同雅安地方政府沟通，希望每一个项目都能切中群众的发展需求。

### **阳光操作 提升组织的公信力**

公益组织如何持续保持公信力，将影响其救助效率。

“阳光是公正廉洁最好的保鲜剂！”南都公益基金分享其成功经验，只有在慈善机构内部建立公开透明机制，在各个环节建立有力的监督机制，才能避免公信力的丧失。

刘文奎介绍，对于救灾的公益援助，公众最关注的地方就在于救灾资金的使用和救灾物资的发放上。目前，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救灾资金购买物资环节，采用临时公开向社会招募公益“采购员”，由这些“采购员”组成的“第三方采购团”跟供货商谈判、购买物资；在物资发放环节，要求追查进村一级的发放名单，确保捐助人能对每一笔捐助资金、物资的去向进行追踪。

事实上，在中国，公益组织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是在汶川特大地震之后才逐渐为国人所关注。刘文奎说，希望民众对待公益组织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孩子犯了错，当然应该指出，应该批评教育，公益机构的组织和制度完善，也需要监督，更需要大家倾注关爱。

来源：光明日报

地址：[http://politics.gmw.cn/2013-05/22/content\\_7709179.htm](http://politics.gmw.cn/2013-05/22/content_7709179.htm)

[【返回目录】](#)

## 学习时报：震灾凸显了协调型公益组织发展的必要

从古至今，灾害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相伴相生。“灾”与“害”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灾”未必致“害”。灾害本身是自然界演化、发展的必然产物，离开了承载主体的人与社会就无所谓“灾害”。灾害的本质是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破坏性影响。灾害不仅直接影响建设、民生，还会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化。影响全社会的灾害，要动员全社会来治理，这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其中，公益组织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公益组织以社会公益为目标取向，追求不特定多数人乃至全体人民的利益。公益组织基于公益的使命与价值逻辑，会更加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因此，参与灾害治理成为许多公益组织的当然抉择。在重大灾害发生的情况下，很多公益组织会积极介入。例如，今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里氏7.0级地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在政府主导赈灾的同时，广大志愿者、公益组织以不同方式关爱灾区，甚至顶飞石、翻山岭，冒着生命危险紧急驰援，共同谱写了一曲抗震救灾的英雄凯歌。

但是，我们也看到，不少志愿者、公益组织是有救助意愿然而力量、能力有限，并且是临时性地自发组织起来参与救灾活动。由于他们本身的行动具有盲目性，公益组织人员和物资进入灾区后视情况而定，处于无序化状态。加之公益组织在救援救助中功能定位不明晰，仅凭自觉、自愿与热情，从而使有限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另外，公益组织人员进入灾区后的后勤服务和生命安全也缺乏保证。自发民间援助活动需要协调才会有序、有效，如何使公益组织再“组织化”成为迫切的现实课题。因此，建构整合性的协调型公益组织尤为必要。

协调型公益组织，指的是以运作型公益组织为服务对象，通过信息分享、合作平台建构、组织能力培训等方式以提升公益组织自身能力、合法性资源与社会影响力为目标取向的社会组织形态。

协调型公益组织具有社会组织的一般特征。美国社会组织研究专家萨拉蒙概括了社会组织的五大基本属性：组织性、私立性、利润非分配性、自治性与志愿性。协调型公益组织除具有社会组织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特殊表征与本质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运作型公益组织为主要服务对象。协调型公益组织并不直接参与救灾、环保、文化发展、休闲娱乐、公民倡导等运作型社会组织服务的社会领域与社会空间，而是定位于为运作型社会组织更有效地服务于特定社会领域与社会空间提供支持、资源与发展空间。第二，在运作方式方面具有间接性。这与第一点紧密相连，正因为协调型公益组织并不直接参与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因而其在运作方式上是

间接地作用于社会发展。第三，在组织使命方面，以信息分享、建构合作平台、组织能力建设培训等方式提升公益组织自身能力和社会影响力。

协调型公益组织通过增强运作型公益组织自身能力以更好地供给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从而有力地推动整个公益组织行业的全面成长，为推动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从本质意义上看，协调型公益组织的建立，实现了公益组织再“组织化”和有限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使灾害治理更为有序、有效。

外国救灾经验表明，面对灾区灾后的混乱局面，公益组织要有效介入、有序参与，需要建构一个透明、开放、多层面、整合性的沟通协调平台。如日本阪神地震之后第四天，大阪志愿者协会联合其他公益组织组建了“支援阪神淡路大赈灾灾区人民的市民之会”，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进行协调。根据该组织公开出版的资料，从地震发生到 1996 年 2 月 29 日，在该组织登记的志愿者人数达 11735 人，有效发挥了协调功能。又如，日本“自然学校”是在阪神地震赈灾中“震”出来并不断发育、成长的协调型公益组织。其创始人广濑敏通与其同伴地震当天就赶往灾区。他们发现当时灾区现场非常混乱，于是决定将东滩小学作为活动据点，协调救灾物资供应。当时日本还没有“救灾志愿者中心”，“自然学校”的救助中心有效发挥了协调作用。实践表明，协调型公益组织是其他公益组织的重要支撑力量，对推动社会发展有积极效应，在灾害治理中具有重要价值。协调型公益组织为其他公益组织在灾害治理中遇到的挑战提供纾解管道与合作平台，为公益组织采取集体行动提供了现实基础与机会空间，从而为最大限度提升灾害治理绩效提供保障。

当灾害过后，这些协调平台还要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有效发挥功能，关键是要推进协调型公益组织的制度化、可持续化。如阪神地震之后日本地方的“救灾志愿者中心”这种组织形式保存下来，构成地方性救灾志愿者网络。在平时作为救灾志愿者活动据点，主要对公民进行防灾减灾教育训练，加强与地方政府、公益组织以及志愿者的联系，进行救灾公益组织的信息管理等。当灾害发生时，“救灾志愿者中心”马上启动，招募、接待、培训志愿者，与地方政府协调救灾，协调公益组织之间的联系，接受媒体采访等。在日本多数地方，“救灾志愿者中心”并非实体性机构，而是由地方公益组织、社会福利协会等构成的沟通平台。一般来说，只有当灾害发生时，这些组织才共同组成“救灾志愿者中心”。而在某些地方，“救灾志愿者中心”是常设机构。如京都府 2005 年 5 月在京都社会福利协会成立了日本第一个常设性质的救灾志愿者中心“京都救灾志愿者中心”。

值得关注的是，芦山地震当天，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肖家河，一项由多家本地公益组织联合开展的救援行动拉开了帷幕，这就是“成都公益组织 420 联合救援行动”，有几十家公益组织投身其中，规模大的不过 20 多人，规模小的仅有几个人。据报道，四川雅安市建立了市、县两级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主要职能是负责向社会组织或爱心人士到灾区开展志愿服务工作提

供服务咨询，对前往灾区开展志愿服务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进行登记、核实身份、开展培训、统一配制志愿服务工作派遣证，同时收集、整理各县区志愿服务需求信息，争取和整合服务灾区群众和灾后重建工作的各种社会资源，对接重建项目，从而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支持抗震救灾。

基于对协调型公益组织价值与功能的认识，为了持久、深入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有必要建立区域性、全国性的公益组织协调整合平台，一旦灾害发生马上可以启动起来，而不是等灾害后才临时去组建这样一个组织。

法国著名社会思想家埃米尔涂尔干指出：“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的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活动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中。”可以看出，协调型公益组织是介于国家与社会的“中间层”，既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国家运作社会、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平衡国家与社会、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起中介、桥梁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推动的第三部门的发育使公益组织的成长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资源与要素。要使公益组织真正成为参与灾害治理的积极资源与主体力量，还要进行认真的探索与积极的实践，其中，积极培育并有效引导协调型公益组织显得尤为必要。

来源：学习时报

地址：[http://www.studytimes.com.cn:9999/epaper/xxsb/html/2013/05/20/06/06\\_38.htm](http://www.studytimes.com.cn:9999/epaper/xxsb/html/2013/05/20/06/06_38.htm)

[【返回目录】](#)

## 学习时报：政社分开，在“各就各位”中形成合力

政社分开，在于既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边界，又要保持政府与社会的相互合作。政府与社会是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政府反映公共权力的联结系统，社会则反映公民间的自组织系统。政府需要尊重社会自身运转的规则与逻辑，政社分开的核心在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离。

社会组织，实质上也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和中间组织。这个中间组织需要扎根于社会及社会中的民众，需要具有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理性，需要具有一种不同于政府的独立品格和自治能力。它可以集结社会中的民间力量，民众因此可以诉诸个体利益，从而减少与政府的直接对抗；而政府也能够以此建构与公众的对话平台，政府进行决策时须充分考虑并吸纳中间组织的意见。这

不仅减少了政府与民众因直接摩擦而产生的行政成本与资源浪费，也使公众的意见通过有序的途径进入政府决策，真正实现公民的有序参政。将“民意”引致在法治秩序之内，防止群众因无法表达而产生的“抽象的愤怒”，以及引发极端的群体事件。

政社分开的目标并非是削弱政府权力，而恰恰是建立一个“强政府—强社会”的模式。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整个社会是“嵌入”政府之内的，政社合一使资源、权力以及责任高度聚集在政府一身。这种模式曾帮助中国取得经济发展的奇迹，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矛盾随之浮出水面时，民众则将矛头指向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同时，由于政府与社会之间原本就缺乏有效沟通机制与矛盾缓冲渠道，在日益膨胀的信息传递之下，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致使过去的强政府在如今强大的民意面前常常显得被动和有被弱化的倾向。

因此，“大社会”绝不是说它可以抛开政府的管理或者凌驾于政府之上，而是将社会自治的事情交给社会自身去做，培养社会自己管理自己事务、自己为自己事务负责的能力。由于政府权力空间的相对“缩小”，社会发展的空间得以相对“扩大”，社会自身固有的自治功能才可以被激活，公众个体的差异性才可以通过形式多样的组织载体来表达。

当然，政社分开不等于政府彻底将社会放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不涉及第三人的私人空间和涉及第三人的公共空间，因此社会也可划分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政社分开意味着政府不能擅自或随意干预社会中的私人领域这一部分，而在社会公共领域，则必须要有政府的存在和发挥作用。上世纪后半叶，随着市场经济下的政企分开，我国政府将企业推向市场的同时，也将社会公共领域内的事务交给市场。政府从社会公共领域中抽身的结果是，公共事务在失去政府导向的同时，被市场规则所支配，而本身并不适用于“成本—效率”定律的社会公共事务，在被迫纳入市场轨道之后呈现出并不正常的运行迹象，比如社会不公平显现、教育与就业呈反比关系、公共卫生事件增多、生态环境恶化、劳动者的义务与权益脱钩等。因此，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及其在社会公共领域内，需承担起无可推卸的职责。

此外，社会因其“自治但不自足”的特性需要政府的适度介入与管理才能健康发展。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应当是以制度为依托的间接管理，这将要求我们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社分开，尚需政社之间形成合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属于政府必须履行的社会职能，但它同时关系到社会，也是公众与社会的责任。因此，在社会公共事务与公共生活方面，政府与社会尽管履行职能的方式不同，但二者最终需要形成一股合力。总之，政社分开，需政府与社会的“各就各位”，也需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对话、沟通与协作”。

来源：学习时报

地址：[www.studytimes.com.cn:9999/epaper/xxsb/html/2013/05/20/15/15\\_30.htm](http://www.studytimes.com.cn:9999/epaper/xxsb/html/2013/05/20/15/15_30.htm)

[【返回目录】](#)

## 经济观察网：善款如何花？官民协作雅安模式

连续在帐篷里睡了一个多月后，刘志华长出了络腮胡子。

5月21日，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驻芦山的工作人员，刘志华来到双石镇进行需求调研。在刘志华看来，芦山县龙门乡作为震中，受到了很大的关怀，与龙门乡一山之隔的双石镇，灾情或许还要更重一些，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正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将一个救灾点设在这里的缘故。

从4月20日来到芦山起，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这里前期的工作，主要是发放救灾物资。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紧张的救援工作划上了句号，但繁重的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随即摆在了面前。首先需要搞清楚，震区的老百姓最需要什么？下一步怎么操持生计？

双石镇双河村党支部书记马负林告诉刘志华，村民们的生活不成问题，这两天正在统计核查房屋受损情况。在茨竹坡小组，房屋大部分成了危房，这里的房屋，多数是砖木结构，用砖块砌墙，用木头做支柱，在地震中自然不堪一击，几乎全部倒塌，即使没有倒塌的，也严重受损。

对于经历了汶川和雅安两次地震的马负林来说，意识到了公益组织的强大能力，他希望，政府搞好了规划，社会组织能帮着村民们盖房子。

### 雅安善款

截至2013年4月27日8点02分，根据基金会行业第三方信息披露平台的数据，全国共有115家基金会参与地震救援和确定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共募集善款和物资合10.49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长。

在芦山地震中，一些公信力较好的基金会异军突起。政府、红会和慈善会三大获捐平台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官办慈善正遭遇尴尬。

与红会一样，作为两大官办背景的公益组织之一的各级慈善总会均会成为政府指定的接受捐款平台之一。汶川地震后，中华慈善总会接受捐款10.76亿元占当时全国公募基金会捐款总量的1/3。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此前统计，汶川地震募集的社会捐赠资金中，有58.1%流向了只可以接受社会捐赠的政府部门。而国家民政部曾发文要求公益组织统一将善款交给地方政府使用，也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

时隔5年，在雅安地震后，民间公益组织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4月21日，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民政部发出公告，在捐赠渠道导向方面规定：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捐赠以资金为主。

这表明，慈善募款不再由官方慈善机构垄断，只要符合资格，都可以在市场上公开募款，并开展救援工作，以往由中办、国办和民政部指定救灾组织的格局被打破。

## 官民对接

面对蜂拥而至的公益组织和志愿者，以及迅速集聚起来的善款，如何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带着从汶川地震中获得的经验，经历了两次地震的四川省，在雅安地震发生后，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思路。“对这个问题从汶川地震之后就有思考，雅安地震之后，得以迅速推进。”共青团四川省委机关党委书记赵京东说。在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的直接推动下，政府部门对接公益组织的工作，在地震之后迅速展开。由四川省委一名常委负责这项工作，团委每天都要向其汇报。

4月28日，由共青团四川省委牵头的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服务中心，在芦山街头的雨篷中成立，它代表着四川省政府正式对接公益组织，进行服务和疏导。

实际上，那时的公益组织遍布芦山县街头。每个帐篷，都是一个公益组织。一开始，赵京东带着人沿着帐篷去拜访，大家觉得很惊奇：怎么突然冒出一个服务中心，说可以给公益组织提供服务？

赵京东的承诺很快兑现了，刚开始几天，进入灾区的志愿者，很难找到插座给手机和电脑充电。代表政府的服务中心，协调当地部门，从路灯上接下了电源，很快解决了志愿者充电难的问题。服务中心的名声，一夜之间就在公益组织间传播开来。

设在芦山县城的服务中心雨篷，很快成为了重要的信息汇聚中心，信息分享会常常开到深夜，大家七嘴八舌，把各自参与救援了解到的信息带了回来，而很多信息，是从官方渠道难以获取的。

刚到地震灾区的志愿者，经常是直接找到服务中心，询问可以参与哪些方面的工作。服务中心则根据每天政府发布的救援信息以及信息分享会得到的资讯，把这些志愿者们及时分配到需要人力的地方。

赵京东说，实际上，很多公益组织是带着一腔热血来的，来了之后却发现不知该干什么好，经常盲目地四处乱撞。这样，服务中心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这个组织可以很快做出判断，给出指导性意见，让志愿者们尽快到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

## 善款怎么用

5月20日，芦山地震灾后重建研讨会在成都召开，在这个“需求为本，有效重建”的研讨会上，政府和公益组织相互交流，四川省提出了重建的初步设想：3年完成重建，5年争取跨越，7年同步实现小康。

截至5月21日18点，四川省各市州、县市区慈善会系统接收芦山地震赈灾捐赠款物达13.59亿元，其中捐款10.53亿元。

四川省发改委发展规划处处长邓超介绍说，灾后重建的总体规划，涉及1个总规，11个专项规划，要由国务院救灾协调小组来共同完成，最后由国务院审批通过。这对于雅安来说，无疑也是一次发展的机遇。雅安市属于欠发达的地区，2012年的GDP总量为398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只有30

亿元。而重建的 11 个专项规划里，还囊括了文化旅游规划这样的地区发展规划。

全国各省市对口援建的方式，肯定不会出现在芦山地震灾后重建中。基调已经很明确，即“四川为主，多方协助。”其中，“多方协助”就包括了充分发挥各大公益组织的作用，使其参与到灾后重建中来。

来自地震灾区各个县区的政府官员，都积极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很多官员坦陈，来参会就是希望将各自的困难摆出来，和公益组织的项目对接。

宝兴县副县长任文华在会上发言说，宝兴县最急迫的事情就是解决次生灾害带来的不安全因素。他告诉与会者，宝兴的道路至今仍然饱受滑坡等灾害的威胁，进出宝兴，都要冒着极大的危险。因此，对于宝兴来说，最迫切希望解决的，是道路通行问题。

5 月 4 日，在雅安市一处废弃的医院门诊大楼，共青团四川省委的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 and 志愿者服务中心正式进驻。这个在地震之后紧急成立的机构，在随后的灾后重建中，将成为常设机构。随之进驻的，还有多家公益组织。现在，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等在内的 20 多家公益组织，均已入驻。

入驻的各家公益组织，将免费使用服务中心的房间。很多小的公益组织，也获得了进驻资格。在三楼的大办公室里，经常是一张桌子后面就是一个公益组织。

善款的使用，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对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壹基金这样的大基金会，数额庞大的善款，要分解到一个一个具体的项目，而这些项目如何根据灾后重建的规划来设计和实施，是一个繁复的工作。

事实上，在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中，出现了很多公益机构争抢同一个项目的现象，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知名度不高的地方，很少有公益机构涉足的尴尬。类似的景象，在芦山地震的灾后重建中仍不少见。

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江海告诉记者，在某些领域，很多公益组织都要求参与重建，怎么协调这些公益资源，合理调配，是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大量的草根 NGO，不仅在紧急救援阶段突显作用，在随后的灾后重建阶段，也将发挥作用。

孵化本土 NGO 参与灾后重建，在中国扶贫基金会里，已经有近 10 年的历史。中国扶贫基金会品牌部主任王鹏介绍说，一般项目不超过 10 万元，本土化的 NGO，采用投标的形式，获得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从而开展公益项目。

例如，正轩公益的爱心图书屋，为社区孩子提供课外学习和教育。在地震之后，这一项目在很短的时间里开展起来。目前，正轩的爱心图书屋开在了芦山县的集中安置区旁边，志愿者和孩子们共同做游戏，孩子们聚集在这里，忘记了地震带来的恐惧。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说，芦山地震发生后，雅安地区的贫困人口从原有的 41.68 万人升至 138.1 万人，如何利用灾后重建的机会，让灾区居民长久的生计问题得到保障？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中国扶贫基金会共投入资金 6.36 亿元，其中灾后重建资金投入 4.47 亿元，占比超过 70%。针对芦山地震，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重建策略，仍是着重解决震后农村居民的生计问题。

赵京东说，灾后重建涉及方方面面，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产业扶贫，从心理咨询到孤残帮扶，不同的公益机构，只有协同起来，才能全面重建灾区社会，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大大小小的 NGO 的协同和合作，就成为必然。在服务中心里，大家密集地沟通和整合，会让灾后重建真正有效起来。

来源：经济观察网

地址：<http://www.eeo.com.cn/2013/0525/244516.shtml>

[【返回目录】](#)

## 南方周末：十个关键词 记录企业公益 25 年

### 希望小学

1990 年 5 月 19 日，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基会，在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中心小学原址上修建了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此后，援建希望小学逐渐成为了民间公益善行与政府善举的一种合作方式。

自 1991 年不断涌现的“大眼睛”“大鼻涕”“小光头”等孩子的照片，感动了全中国，也推动这项工作广泛开展起来。希望工程，几乎就是那个时代中国公益的代名词。

希望小学由于具有项目实体可查、便于回访监督、公益效果切实可见等特点，在近年被许多企业和民间人士通过舆论监督、独立运作的方式，将这种公益行为变得更加透明规范。如巴曙松等华中科技大学校友发起筹建的雅安石棉县希望小学，在此次雅安地震中屹立不倒，被网友誉为“房坚强”；最近陕西中奖 5285 万元的彩民，以个人名义捐资 30 万元兴建希望小学，他在捐资筹建希望小学时也选择与当地校长直接联系，从而避免善心旁落。

而中国平安等企业，通过多年的公益探索，在希望小学的运用上逐渐形成了自有的一套体系。中国平安自 1994 年于安徽省六安市捐资兴建了第一所平安希望小学以来，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断努力，在全国各省、市边远贫困地区捐建了 106 所平安希望小学。除了援建，中国平安也同样重视希望小学的维护。从 2007 年起平安设立“平安希望小学日”，启动希望小学百万维护计划，每年划拨百万元维护专款，用于各地平安希望小学的维护，对各校校舍进行修缮，不断改善和提高孩子们

的求学环境。同时平安发起“平安希望小学优秀教师奖励计划”和“平安希望小学教室培训计划”，为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中无私奉献的老师提供物质鼓励，并为他们创造去其他城市一流学校观摩学习的机会，提升业务技能。中国平安对希望小学的投资，已不再是单纯的捐建，而是形成了“援建——维护——鼓励自生”配套的公益体系模型。

### 植树造林

或许中国人对“环保”这一概念的最早印象，就是来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植树造林活动。而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近几年春季北方沙尘肆虐之时，公众对植树造林的呼吁和关注热情。如果说中国第一批环保关注者对动物保护的热情，还是限于圈子的小规模行动的话，植树造林就是普通公众广泛亲身参与环保公益的开始。

现在已经难以查证改革开放后，究竟是哪一年哪些人完成了第一次植树造林活动。但 1980 年 3 月 5 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可谓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对植树造林发出的第一个重要指示。此后 1981 年 12 月 13 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作为一项法律开始在全国实施，“义务植树”也成为了一个新词被提及至今。1982 年的 3 月 12 日，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上种下了义务植树运动的第一棵树。每年的这一天，便成了中国的植树节。

不得不提及一位日本老人——著名的沙漠治理专家远山正瑛先生。他以八旬高龄多次前往内蒙古亲自植树治沙，还号召日本国民每周省下一顿午餐钱，来中国植树。在他的带动下，包括他子女在内的一万多名日本友人先后来到内蒙古恩格贝植树。在远山先生逝世后，他的部分骨灰按照其遗愿葬在了当地，可谓植树造林史上的一段佳话。

近年植树造林已不再是环保领域的核心话题，但仍然是社会各个阶层都最积极踊跃参与的项目。企业的造林行动则从未间断过，阿拉善 SEE 等著名民间组织更是专为造林治沙而成立的。中国平安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两年来共同开展“万亩平安林”活动，在全国 12 个省份营建万亩平安林。营建过程中根据当地不同需求，选择不同种类的树木进行栽植，在保持水土的同时，也能繁荣当地的林业经济。该项活动于 2012 年发起，并在 2013 年持续进行，目前已经完成了河北承德、内蒙古多伦等地的造林计划。

### 支教助学

支教助学，这种促使教育资源更加公平分配的公益行为，在给贫困地区带去先进教育理念和优秀教育资源的同时，也为这些地区的人们打开了一扇窗，成为了城市与农村文化交流的桥梁。

官方发起的最知名的支教助学行动，当属“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它是由共青团中央等四部委于 2003 年发起，每年公开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到西

部贫困县的乡镇从事为期 1-3 年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以及基层社会管理和基层青年中心建设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支教助学真正的国家行为即从此展开，而国家也鼓励优秀青年扎根西部，从而将支教助学工作持之以恒地贯彻下去。

不过我们更为熟悉的是由企业、媒体、公共人物或 NGO 直接发起的支教助学活动。从 2007 年开始，中国平安携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展平安希望小学支教行动，截至目前，共有来自社会各界的超过 2000 名志愿者参加了支教行动，帮助学生约三万人次。2009 年，平安开始在平安希望小学建设多媒体教室“梦想中心”。目前在四川北川、四川拱星、贵州、重庆等地建成的 12 所已经成为当地学校现代化设备的硬件升级样板工程。

另外，中国平安也携手《南方周末》，针对西部乡村代课教师进行下岗再就业培训的“燃烛行动”。通过对乡村代课教师的帮扶和培训，使其获得创业资金和农技技术，授人以渔，从而努力弥补教育体制变革留下的缺陷。于建嵘教授等人发起的随手公益项目中，也包括了支教、关爱乡村教师、设立农村免费图书点等内容。

经过多年发展，支教助学已经从单纯的上课和捐赠教学物资，演变出开发乡村小学第二课堂教育、关爱乡村代课教师、乡村图书馆建设、关注乡村儿童营养等多个支流，将这一公益事业落实到乡村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方方面面。

### 公益基金会

公益基金会在中国的进化史，可以看作是社会多重问题发展的一个集中缩影。在 2004 年以前，国内只有官方公募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所能做的，是捐款到这些公募基金会名下的某个项目，然后通过对方的公开信息来查询善款去向。

2004 年国务院公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之后，正式开放非公募基金会，香江集团董事长翟美卿随即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创立了“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国内目前共有基金会 2561 家，其中公募基金会 1202 家，非公募基金会 1359 家。

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代表着以企业为主的组织机构，可以自行决定公益资金的用途，而不必通过官方公募基金会的渠道，也不必再向后者缴纳善款管理费。在众多非公募基金会中，除了企业基金会已经成为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动机以外，企业家联合创办的企业家非公募基金会则是更为瞩目的一种。唯一成功从非公募转身公募的壹基金，便是企业家办基金会中的领军者。

“明园慈善基金”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下设立，于 2007 年成立，由中国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及其家人捐资设立。首期捐赠 2000 万元，通过逐年追加达到 1 亿元的目标捐赠额，用于扶贫帮困和赈灾、关爱妇女儿童以及贫困地区青少年成长、支持文化发展等公益慈善事业。截至 2012 年，“明园慈善基金”出资援建了 5 所明园学校，并设立了明园奖学金，激励明园小学的学生勤奋向学、

发奋图强；同时，“明园慈善基金”还设立了奖教金，鼓励在明园学校任职的优秀教师，解决贫困教师的生活困难，使其能够安心教学，努力培养下一代。汶川地震期间，“明园慈善基金”向灾区捐赠 500 万元。

### 志愿者

自从 1993 年底，共青团中央决定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以来，青年人的热情和不求回报服务社会的精神，统一以志愿者的方式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起来。1995 年全国开始进行社区青年志愿者服务站建设工作，1999 年 8 月广东省通过了国内第一部省级青年志愿服务条例，2000 年 3 月 5 日被共青团中央确定为全国首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

与此同时，志愿者行动的服务领域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大，在农村扶贫开发、城市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大型活动、抢险救灾、社会公益等领域形成了一批重点服务项目。目前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志愿者项目有：青年志愿者“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计划、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海外志愿服务活动、可可西里珍稀动物保护、奥运会

和残奥会志愿服务项目等。志愿者及其无私的服务，为中国二十五年间公益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家鼓励和民间欢迎的整体氛围中，志愿者服务自然而然地被企业借鉴为公益实践的主体。

一些企业由于其业务模式和组织结构，在志愿者服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积累了丰富的运作经验。其中，安利中国由于其有效的志愿者服务实践，成为了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专业支持机构，为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提供培训。

中国平安在 2010 年正式成立了“员工志愿者协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教育、环境等领域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工作。截至 2011 年，平安志愿者服务时间已累计超过 109,944 小时。一方面，平安广泛发动内部员工参与到各种志愿者活动中，如与外部志愿者组织曲吉梅朵爱心联盟合作的玉树灾区救助公益项目，以及类似“至诚理财团队”这样的内部志愿者团队单独参与的关爱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镇“儿童村”的活动；另一方面，平安也尽企业所能，帮助志愿者活动，如此次雅安地震中平安为奔赴灾区的志愿者免费提供保险的善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而当志愿者服务融于企业文化时，公益行为也成为了企业理所应当的社会责任。

### NGO

中国 NGO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起步，1995 年第四届妇女大会 NGO 论坛，使中国大多数官员第一次接触到 NGO 这个词。从 1996 年起，中国 NGO 开始浮出水面，他们关注的领域十分多样：环境、妇女、儿童、乡村、教育、劳工等等，但将他们推到台前的，仍然是几次大灾中的救援行动。

2008 年“5·12”汶川大地震中，众多 NGO 积极参与地震救灾和震后重建，站到了社会关注的核心焦点。此后多元共治社会的提倡，以及注册管理体系的放开，使各类 NGO 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

雅安地震发生后，大量 NGO 利用社交平台发动慈善捐赠等“微公益”行动，并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资源，前往灾区，充分发挥了机动灵活、行动迅速、透明度高优势，可以发现，在这次救灾中 NGO 开始了相互间的合作，进一步提高了救灾效率。

在过去 20 年中，NGO 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 NGO 处在相对被动的地位，视企业为金主，希望企业可以对自身项目发生兴趣，而企业则对 NGO 抱有防范与不信任的心态。如今在 NGO 受到政策鼓励和民意追捧的形势下，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专业性和行动力，是企业所不具备的优势，两者其实处在平等的地位。

企业公益也在经历数年的发展以后，尤其是经历大灾救援考验后，发现自身的短板，认识到专业公益比“包干”公益更能获得肯定，因此，很多企业开始主动向 NGO 伸出橄榄枝，寻求优秀专业的合作伙伴。

中国平安非常重视与 NGO 的沟通与合作，自 1994 年起，中国平安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始在全国援建平安希望小学，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改善就学条件，2006 年中国平安首次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 1000 万元设立了“中国平安公益基金”。

2002 年，中国平安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价值 1000 万元的 38 辆献血车，开启献血活动、为骨髓捐赠者捐赠保险等红十字活动。

2009 年起，平安与“真爱梦想基金”在平安希望小学建设多媒体教室“梦想中心”。

2010 年 2 月起，中国平安组织公司员工组成 JA 支教团队，每周二、四分别到上海东昌中学和宜川中学给高中学生上“青年理财课”，以普及理财知识，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2010 年至 2011 年，中国平安联手气候组织参与百万森林计划，捐资 550 万元以平安车险 VIP 客户及电销客户名义捐种 110 万棵沙棘树苗，以改变西部干旱地区的气候环境，抵消客户驾车带来的碳排放，鼓励客户以低碳的方式出行。

2011 年，中国平安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援建的 42 所“希望厨房”也在广西、宁夏、山东、安徽等地落户，帮助改善学校孩子的就餐条件。

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平安积极响应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倡议并发起的地球一小时公益活动，承诺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积极的环保改变。

2012 年，中国平安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携手开展“绿色希望工程-万亩平安林计划”，在全国 12 个省份共建造一万亩“平安林”，每片平安林计划种植约 10 万棵不同种类的树木，防止水

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绿色未来。

2013 年,中国平安通过壹基金向雅安灾区捐款 650 万元,并于 5 月 7 日联合壹基金共同发起“儿童平安”项目,旨在普及儿童减灾防灾教育、为地处灾害频发地区的儿童建立长远帮扶机制。

## 低碳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被誉为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最早见于政府文件是在 2003 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英国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它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目前的消费模式,预计 2020 年英国 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同时,气候变化已经迫在眉睫。

自 2003 年以来,我国国务院先后发布了《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关于做好建设节能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关于节能工作的决定》等政策性文件。国务院的号召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碳排放、碳交易、碳中立这些关键词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2010 年 3 月,中国平安正式启动“绿色承诺中国平安”低碳 100 行动,将 100 条绿色低碳举措贯穿在业务推动、日常运营及社会公益三大方面。运营层面通过各种节能减排举措和技术,减少在日常办公、物业管理、后台作业等各运营环节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和整体运营绩效。业务层面充分结合平安业务特点和低碳经济趋势,研发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如“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等。同时将“低碳”与“健康”相结合,倡导全体员工加入到“低碳生活健康行”活动中来,倡议员工“低碳出行、快乐步行,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

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巨大变革,来应对气候变化形势。发展低碳能源技术,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低碳社会消费模式,是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之间关系的基本途径。发展低碳经济既是尽国际义务,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出路。

## 公益透明

透明,是公益组织立足社会、赢得公信度的前提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公益行为公开透明的要求,对信息公开的时效性、动态性,公开内容的多样性、细致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诉求。据民政部调查,国内 75%的慈善组织信息不透明,接受调查的近 90%公众对慈善信息公开不满意。郭美

美事件后的网络调查显示，多达 46.2% 的人认为中国红十字会陷入信任危机的深层原因是“红十字会内部情况长期不透明、不公开、组织神秘”。

如前文所述，公募基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善款的唯一合法流向，导致这些机构已经习惯了“闭门操作”，个人和企业都无法详细得知善款的全部去向。而对于企业来说，一旦合作对象不够透明，企业的慈善公益行为本身的可信度也会被降低。因此，企业也加入了要求公益公开透明的行列。

2011 年 8 月 23 日，民政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 年)》正式颁布，明确提出“推进慈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完善捐赠款物使用的查询、追踪、反馈和公示制度，逐步形成对慈善资金从募集、运作到使用效果的全过程监管机制”。公益慈善机构随即进行改革，壹基金在过去一年来，为公益组织提供系列解决方案，通过开发财务信息披露模板、透明指数、财务培训班、“自律壹夏晒”公益等活动，以倡导、资助和评选的方式，推动整个行业的透明。

中国平安也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公益透明度的重视，2011 年，中国平安携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免费午餐，利用相对透明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发起“一次传递，百分温暖”微博线上活动，引起了公益明星的热情参与，微博转发超过 20 万次，网友评论达到 2 万条。对于捐献的物资，设置专人来负责管理，保证物资落实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并在网络公布数据，接受大众监督。

2013 年 1 月 5 日，民政部主办的“中民慈善信息中心”发布《2012 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报告建议政府资助建立统一的慈善信息公开标准及奖惩机制，搭建公益慈善行业公共的信息平台；行业建立透明自律联盟，形成政府、行业、媒体与社会公众多维的中国慈善透明监管体系。

## 责任报告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比“企业公益”更大范畴的概念，是在本世纪初期进入国内的，在证监、银监等政府监管机构将其引入企业规范后，正在成为指挥企业公益行为的上层管理体系，而企业每一年的责任行为，包括慈善公益在内，都会在责任报告中集中披露。

自 2006 年国家电网发布我国第一份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且受到总理温家宝的鼓励和支持以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2006 年发布了 23 份社会责任报告，数量超过了 2000 年到 2005 年 6 年发布数量的总和；2007 年有 77 家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2012 年，责任报告的发布数量已达到 1000 多份。

2004 年起，平安开始逐年发布企业公民报告，建立并完善了企业公民模型，逐步厘清平安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2009 年，平安首次正式发布《中国平安 2008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第一次将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列入公司五年战略规划，开启了平安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新篇章。《中国平安 2008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国平安 2009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国平安 2010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国平

安 2011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连续四年以最高分获评 A 股上市公司报告第一名，蝉联最佳报告大奖。2012 年，平安品牌价值继续保持领先，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广受海内外评级机构和媒体的认可与好评，获得包括《中国新闻周刊》颁发的最具责任感企业、《经济观察报》颁发的最受尊敬企业、《21 世纪经济报道》颁发的最佳企业公民等众多奖项。

责任报告是对企业跟利益相关方沟通方式的一次彻底变革，企业“做得好不好”、“做了哪些好事”，不再被认为是可以不说内部信息，企业必须主动、彻底、坦诚地公开自己的行为成果，包括正面和负面。这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公益透明度”的难题。

### 绿色投资

传统投资模式是在传统经济下形成的，它不考虑资源短缺和保护环境，通过资本投入实现盈利的目的，赚取利润是投资的唯一目标。这种投资行为使厂商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忽视生产所带来的对社会和环境的消极影响，放弃企业的社会责任。绿色投资则相反。

长期关注绿色投资的环保组织“绿色流域”每年发布《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披露国内主要银行的信贷流向，每一笔投资是否对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是在国家政府明确对银行业提出“绿色信贷”的业务指引后，唯一由民间对“绿色信贷”实际成果进行考察和评估的行为。其考察结果还包括：银行是否有完整的环境政策标准和措施，其绿色贷款和“三高”贷款的比例数字是否真实可靠，以及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投资对象是否受到惩罚等。

2012 年，中国平安签署了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组等国际机构倡导的《自然资本宣言》，承诺将自然资本因素的考量融入到银行经营决策中。中国平安稳步提升绿色信贷披露水平，获得了 NGO 和媒体的好评。

同年，中国平安制定了《绿色信贷政策指引》，对客户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动态评估与分类，相关分类结果作为客户评级、信贷准入、管理和退出的重要依据，并在贷款“三查”、贷款定价和经济资本分配等方面采取差别化的风险管理措施，逐步建立项目贷款环境分类管理制度，要求有条件的分行根据已授信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将项目贷款分为四类，并对不同环境分类项目采取不同的授信策略分类政策。

绿色投资是企业公益领域一个更为新兴的概念，它的诞生证明着公众对企业公益的关注，已经具备了链条式的视野，并找准了资本这一处于最上游端的杠杆。绿色投资的模式，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比法律法规更为有力的企业约束力量。

来源：南方周末

地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90745>

[【返回目录】](#)

## 南方日报：宗教慈善应从“救济”走向“服务”

雅安地震发生后，广东宗教界积极参与了灾区救助，累计捐款捐物 1086 余万元。宗教界公益事业如何更好地进入社会服务领域发挥作用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

昨日，中山大学主办的“宗教、慈善与地方社会”学术研讨会在禅宗六祖故里云浮市新兴县召开。与会专家们热烈讨论了宗教公益如何参与现实社会建设等相关问题。

宗教与社会建设一直都存在着深刻的关联。慈善是许多宗教的教义要求，因此宗教具有在社会慈善事业上发挥作用的天然优势。2012 年 2 月，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六部委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意见》，从国家层面确认了宗教与慈善之间的传统联系。

“过分强调‘财施’，不利于宗教慈善的展开。”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副研究员夏志前提出，佛教的布施中财物的捐助只是宗教慈善的一种。如果宗教的公益事业被简化为单纯的“出资”行为，则难以发挥出更大的在社会慈善领域的积极作用。

而南开大学的袁同凯教授也认为，佛教慈善组织分为“救济型”“弘法型”与“服务型”，目前大多数的慈善组织属于“救济型”，向“服务型”的专业化佛教慈善组织转变，是当前慈善组织发展的关键。

多位专家提出，成立宗教慈善基金会，实行科学管理，走专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发展道路，是推动宗教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经验。在会上，广东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法成法师也透露，广东省佛教协会刚刚成立了专业化的佛教慈善基金会，将探索更专业化的宗教慈善发展之路。

来源：南方日报

地址：[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3-05/19/content\\_7190600.htm](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3-05/19/content_7190600.htm)

[【返回目录】](#)

## 南方都市报：被吞没的“地震”议题

### 公益观察

四川芦山地震不到一个月，地震早期的万众担忧未能持续一周，接下来，地震这个议题就被各种常规问题给“吞没”了。又是红会腐败，又是救灾不力，哪怕有激愤，也影射出悲观。公益组织

趁着地震的震撼，展开了募款竞赛。这个过程持续了不到十天，也告后继乏力，早早歇了。

很多人都说，我们过度渲染了地震。除此而外，我们还过度渲染了公益的德性。

地震后，有一些数据显示，本次震灾捐款中，来自公众个人的只占到两成。在这两成中，考虑到大比例的单位强捐，自愿捐赠者占了极小的比重。对公民社会而言，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兆头。从基金会中心网公布的早期数据，多数基金会受捐资金超过亿元。如果联系到个人捐款严重下滑的实际，有可能企业和机构成为捐赠的主力。这就意味着，公益的商办与官办色彩在加重。

这可能与大家的预期不一样，是否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趋势？这些年来，公益机构一直标榜民办性质，以便与官办慈善切割。吊诡的是，所行的路线竟然与愿望相反。

公益的商办与官办，当然有很大的不同。商办公益在以壹基金为代表的机构中成就最为公众知晓。不排除在一些隐秘的机构中潜藏更多力量，但商办公益已然借芦山地震进入舆论视野。

至于官办慈善，即便芦山地震后的喧哗一如既往地削弱红会的声誉，但红会在赈灾中的地位却是无可撼动的。体制的做法遵循惯性，对舆论的吁求不做回应，这不是新动向。

值得说明的是，富人慈善与商办公益，还有细微的差别。前者体现的更多是财力资源的强盛，而以商办为要旨的公益，则在组织性上有极强的能力。

### “震”出民间公益的新挑战

近期的文章，徐永光先生集中表达了两个观点，一个是对富人慈善的表态，希望“宁缺毋滥”；另一个观点是，“以权谋捐”可以休矣。曾几何时，在民间公益确立主体性的竞争中，对商办与民办寄托厚望，而今情势竟然有极大改变。

徐永光对富人慈善的担忧，主要在于它们对公益建设布局的侵扰，增加了公益新秩序的不平衡与不稳定。公益圈并不缺钱，缺的是如何将资源合理配置，富人慈善与此多有背离。

说到商办慈善，在公益的效率上遵从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些原则与机构经验，对于整体上提升公民社会的运行能力，极有好处。但商办慈善也具有排他性的一面，其路数迥异于传统公益人。

富人慈善与以权谋捐，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公益生态中健康力量的漠视，对那些能促成公益朝向正确方向的规划、原则与人物的排斥。以徐永光的资历，当然能觉察出危险所在。

芦山地震，将这些问题“震”了出来。这些问题形成于汶川地震后的五年，与早前的乐观预期很不一样。如果汶川地震是民间公益元年，那芦山地震，算是暴露了民间公益的新挑战。

### 被打破的梦想

在许多人的设想中，是将民众作为民办公益的基础，也认为后者必将受益于前者的觉醒与赞助。可芦山地震打破了这个梦想，这也说明，民间公益在争取民心民力上的优势，不会因灾难而加强。

内地对灾难的转换，常见的表述是多难兴邦。公益界也曾进行过类似的话语转换，比如将地震

比做发展机会。等到芦山地震，这种转换变得不那么自然，甚至说不合时宜。

普罗大众在不信任的情况下，采用了收缩爱心的本能反应。这种“收缩”不止是对官办慈善的拒斥，也拒绝民办公益。这是个新情况，民办公益再怎么宣扬自个流着道德的血液，也没用。民间公益不能单纯依靠大众的个人力量，讴歌多难兴邦的官办逻辑与赞美灾难促进民办公益没有本质差别，商办的商业逻辑与权力的体制思维相伴而生，带来更深层的困扰。

以公民社会的正常进化来看，芦山地震的分水岭可见一斑。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地址：<http://nandu.oeeee.com/nis/201305/20/53615.html>

[【返回目录】](#)

## 南方都市报：赈灾需要健全的民间社会

美国俄克拉何马州 5 月 20 日发生震惊世界的龙卷风灾害后，美国联邦和州政府都积极参与了救灾行动。这种行动的具体表现我一时还无法看到，唯一能看到的是州长让各地学校下了半旗致哀。身处俄克拉何马，至少在目前，我看到的更多是民间社会的强大活力。

首先，各媒体的报道，在这无序的灾难中产生了秩序。本州电视台连续 24 小时在报道受灾情况和各种通知，使得人们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该怎样或者不怎样帮助。在搜救时，电视台就采访当地警长，警长告诫人们不要前往，以保证搜救道路畅通。后来，电台又告诉大家信号塔故障，除了紧急情况外，周边地区应该多用短信而非电话联系。媒体一再称现场很混乱，但是在这种担忧之后，我发现救援行动还是很高效的。各地警车、救护车迅速调集。接着我们又看到国民警卫队参与了救援行动。军队利用专业设备迅速开展搜救，在天黑之后，仍从废墟中救出了 100 多人。这次龙卷风级别为 5，是灾害程度最高的，直接袭击了人口密集的居民区和学校。至截稿时，死亡人数为 24 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但若应对不力，可能后果更为严重。

龙卷风之后，赈灾渠道很畅通。教会系统在这种赈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少教会迅速成为灾民和救灾物资的安置点。小一点的教会在收集救灾物资，也不计功劳和名声，送往有能力派送的大教会进行转送。大部分教会迅速集结力量，开始筹备灾后志愿帮忙活动，一旦时机成熟，会迅速展开行动。

红十字会在收集救灾物资和现场救援、安置方面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除了可以直接派送物资和金钱支援外，红十字会还有庞大的志愿者网络可以调用。这是个很好的渠道，他们的赈灾手段

毕竟专业一些，能发挥个人不能发挥的作用。到底需要什么东西不需要什么东西，人们能从红十字会网站、Facebook 等多种渠道上找到具体清单。

各地学校也在积极参与赈灾。龙卷风结束之后，我们学校召开了一次会议，为受难者默哀、祈祷，并清点校友和学生家中的受灾情况，主动联络校友和学生，给他们提供住宿地。而摩尔镇不远处诺曼镇的俄克拉何马大学也趁暑假空当，提供学生宿舍安置灾民。灾后安置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后需要的帮助还会有很多。很多组织开始前瞻性地考虑如何支援。例如，俄克拉何马中部大学规定，如果教职工灾后去参与重建，可享受两天的带薪休假。而今很多学校强调社区参与的重要性，亦即所谓“学士袍和小镇”（gow nandtow n）的结合。这种灾后重建，便是这种精神的一种体现。

救灾中，我还看到其他形形色色的组织在行动。平时收集旧货旧衣义卖的慈善商店，如“好愿”（G oodW ill），设置多个物品发放点，帮助一切都被风卷走的灾民。连我们的牙医，因为要去灾区救援，也发信给所有以前的病人，帮助收集救灾物资带往赈灾一线。童子军组织也号召其成员发动捐助和帮忙。

此次风灾，离中国四川芦山地震时间不久，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上次地震赈灾中的种种争吵和质疑。有的人由于不相信慈善组织，自己前往一线赈灾，有的人则在后方对其质疑。本可成为救灾主要渠道的红十字会，也因丑闻缠身丧失了信誉，让人感觉痛心。受此影响，我对救灾程序和组织的可信度和效率问题十分敏感。我注意到，俄克拉何马大难临头的时候，没有人质疑任何一个组织的可信度。我们这里有卢旺达学生，不知道如何帮忙，直接送钱到国际留学生中心让其去转。这种信任和爱心，使得各地的救援能顺利而有效地送达。这种效率在灾难面前非常可贵，因为这关系到很多人的安危、健康乃至生命。

中国的民间组织还很脆弱，在灾难之前种种质疑，使得救助渠道堵塞。能否恢复信任，一要靠慈善组织洁身自好，走出信任危机。二要靠民众主动增加信任和效率意识。大家不要因为一次两次吃亏上当，就觉得自己有理由冷漠，以冷眼旁观、冷嘲热讽为唯一姿态，失却了原有的爱心。要不选择扶持、支持其他有前途的慈善组织，要不对现有组织加强问责，让其提高可信度和效率。总之，我还希望救助的平台和网络成熟一些，这样遇到灾难就能够有效地传送爱心和帮助。

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去商场、教会募捐，俄克拉何马大人小孩都很支持。此时俄克拉何马遇到大难，如果国内有人捐款，我会代为转达。也欢迎利用其他各种渠道，积极参与，回馈他们的善良。（作者系旅美教育工作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地址：<http://nandu.oeeee.com/nis/201305/23/55491.html>

[【返回目录】](#)

## 南方都市报：帮城管“拆掉”铁笼，NGO 介入很必要

继建造水泥锥之后，为了防止流浪汉在一些天桥下过夜，广州城管又有了新举措——在天桥底下设置“铁笼”。据广州市三元里街道办城管科的人员表示，位于白云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前的天桥底下新竖起两个约 8 米长、2 米宽、2 米高的“铁笼”，的确是为了防止流浪汉在此过夜而建造的，同时，这些“铁笼”也可以作为环卫工人的工具房。

作为环卫工人的工具房，当然是城管执法的顺带结果，主要原因则是由于城管接到了附近民众的举报：一些在天桥下居住的流浪汉经常乱扔垃圾，甚至生火做饭，此类行为既留下了安全隐患，也扰乱了公共秩序。从普通市民的利益出发，在天桥下居住的流浪汉的确与现有的公共秩序产生了冲突；并且从视觉美感上而言，许多崇尚精致生活的城市人对于这些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产生厌恶之情，也在意料之中。所以，作为城市秩序的管理者，城管强势介入，通过设置“铁笼”来驱逐流浪汉，应该是为城市居民服务的一种表现。

不过，为城市居民服务也讲究一个方式，去岁闹得沸沸扬扬的“水泥锥”，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同样是为了附近的居民和城市外表的整洁，但这样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方式一经出炉，立马就遭到了舆论的炮轰。今番城管又出新招，以“铁笼”拒流浪汉于天桥之外，从文明的角度出发，同样也过于简单粗暴。尽管附近的居民是满意了，环卫工人亦表示天桥底下的垃圾也减少了，但一根根冰冷的铁栅栏能够防范流浪汉，却无法截留住广州固有的包容气息。

因此，城管的做法尽管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在方式上显然需要再做斟酌。我们希望，广州市的城管能够集思广益，向社会征集办法，也争取获得流浪汉的意见，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思路。

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中，广州之所以可爱，绝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发达，还在于广州较之其他大都市拥有更多一份的包容。广州这座城市看似杂乱无章，实则乱中有序；看似人人精明利己，实则蕴藏巨大的公民力量。所以，在解决流浪汉的问题上，广州不仅仅需要城管执法多一些柔和，更要呼吁本地的 NGO 能够积极介入此事。

城管毕竟是一个执法部门，在其眼中，流浪汉与城市秩序之间存在着根本冲突，驱逐他们是城管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这一点是由城管内在的机构属性决定的。要解决流浪汉与城市秩序的冲突，城管的“堵”肯定是不行的，只有 NGO 才能放弃“对抗思维”，才能走进流浪汉群体，把“他们”变成“我们”，把流浪汉纳入城市秩序。

目前，广州的 NGO 发展非常迅速，如果能够有一些专业的社会组织介入，例如组织社工走进流

流浪群体，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并辅以一定的公共规则意识，效果一定比城管设置的“铁笼”更有效。更重要的是，城管设置“铁笼”实际上等于制造出更多城市的“他者”，铁笼本身也成为城市排斥流浪汉的一记标签。而 NGO 的介入则恰恰是一种拆除“铁笼”的行为，当然，这里的“拆除”，不仅仅是拆除真实的铁笼，更是拆除流浪汉与广州这座城市之间的铁笼。

我们相信，排斥只能制造更多的不满者，对抗无法体现广州的包容，只有广州的社会力量积极介入，才能让流浪汉融入广州，成为包容广州、和谐广州的一部分。如此，流浪汉的问题也才能自动消失。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地址：[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05/24/content\\_1864097.htm](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05/24/content_1864097.htm)

[【返回目录】](#)

## 中国工商时报：民间公益事业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将我国公益捐赠的税前扣除范围、扣除比例以及税收优惠方式等多种要素综合衡量，可以发现我国目前对公益捐赠的实际激励力度并不大。

财税政策之所以能作为激励民间公益事业发展的有效政策手段，关键在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可以对公益捐赠产生调节机制。

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遗产税在调节贫富差距、提倡劳动所得、补充所得税收入不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开征遗产税对我国而言，一方面，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悬殊的现实，对于限制财富过于集中、体现社会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遗产税会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尤其是可以大大鼓励富有阶层的公益捐赠行为，促使他们在生前为社会多做贡献，同时也有助于其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

我国的民间公益事业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自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走出了一条在曲折中前进的实践道路。时至今日，我国的民间公益事业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来自民间的各种捐赠行为、公益活动以及公益组织的成长将公益事业推向了新的高潮。我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政府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支持政策。财税政策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对鼓励我国民间公益捐赠行为和促进民间各类公益组织成长、壮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当前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好财税政策手段，为激励和支持我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全面进步，打下良好的政策基础。

## 一、现行的财税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我国为支持公益事业制定和实施了一些财政税收政策，对民间的公益捐赠行为和公益组织给予了特定的政策优惠，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并壮大了民间的公益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渐增多，公益组织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种种情况表明，我国现行的公益事业的财税政策已经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真正地实现对国内公益捐赠和公益组织的有效激励，必须首先正视当前财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总的来说，其中的问题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 （一）尚未形成支持公益事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

我国支持公益事业的财税优惠政策集中在公益捐赠以及公益组织两个层面，这符合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策惯例。但是，由于我国的公益事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历了长期的压制，真正恢复建设和兴起也仅有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因此，不但在国家宏观层面上没有构建出发展中国公益事业的蓝图，各类公益组织仍处于自我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且在制度层面上至今也没有勾画出一整套合理、可行的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制度框架，从而在经济激励方面，也欠缺一个支持公益事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这一不足主要体现在：

首先，目前对于公益事业的财税政策只是散见于财政与税收政策之中，财税政策支持未形成一定规模，不仅对公益事业整体的支持缺乏力度，已有的财税政策安排也难以形成比较理想的效果。

其次，除对具有官办背景的公益组织的财政拨款以外，预算方面还未设立公益组织拨款和政府购买公益组织服务的支出科目，也就是说，我国没有建立起支持公益组织发展的公共预算制度，因此政策安排都是在体制外运行，影响了财政支出政策的稳定性；而对于彩票公益金是通过建立财政专户进行管理，缺乏部门预算的基础，致使政府资助公益组织的投入十分有限。

另外，对公益组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缺乏必要的控制手段，不利于敦促和提升公益组织的工作效率；税收监管能力薄弱，相关规定缺乏监管部门的权责划分，操作性不强。当前的政策状况，不仅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它制约了民间公益组织前进的步伐，限制了民间公益力量的释放，无法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

### （二）对民间公益捐赠的有效激励不足

将我国公益捐赠的税前扣除范围、扣除比例以及税收优惠方式等多种要素综合衡量，可以发现我国目前对公益捐赠的实际激励力度并不大。这可以通过以下几点进行解释：

一是，对公益捐赠的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比例较低。我国对于企业的公益捐赠，允许其在年度利润12%以内的部分进行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标准，已达到国际社会的平均水平。然而，对于个人的公益捐赠，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只允许扣除30%的应纳税所得额。而西方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

都在 50%以上，这方面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二是，对于企业公益捐赠的税前扣除额超出部分，没有相应的结转规定，这相当于对企业捐赠的额度做了一个无形的限定，既影响了企业公益捐赠的热情，又无益于社会公益资源的集中。

三是，缺乏对实物捐赠进行抵扣的优惠政策。西方国家对公益捐赠的各类形式都持积极的态度，除现金捐赠以外，股票、债券、不动产以及衣物捐赠都可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在我国，实物捐赠仅在特殊时期（如非典、汶川地震）享受过阶段性的税收减免，并没有专门针对实物捐赠制定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和个人参与公益捐赠的积极性。

四是，对现行的财税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政策效果没有充分发挥。据一些权威媒体的调查发现，有过一半的调查对象对公益捐赠的相关减免税政策不甚了解，有少部分调查对象虽然知道有税收优惠政策，但并不清楚具体的政策情况。由此可知，社会公众对公益捐赠的财税优惠政策的知晓度很低，对政策缺乏了解，也就意味着相关政策的实施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 （三）个别财税支持政策不利于维护公益组织之间的公平竞争

就现行的财税优惠政策而言，有一些政策的出台欠缺周密性，容易引发公益组织之间的不公平竞争。这体现在：

一是，财政支持对象向具有官办背景的公益组织倾斜，对民间的公益组织扶持不到位，不利于公益组织之间的公平竞争。无论是否具有官方背景，公益组织在公益事业中发挥的作用并无实质差别，而现实中的财政支出过于偏向官办公益组织，政策有失公允，并不利于培育和壮大民间公益组织的实力。

二是，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认定不利于公益组织的公平竞争。除一般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外，国家还出台了《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60号）和《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0]45号），对通过审核的公益性团体给予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从这几年公布的名单来看，大多数是基金会享有了这一政策优惠，其他类型的公益组织以及一些活跃在基层的公益性团体少有受益，这必将造成公益组织募捐能力的分化。

三是，没有对公益性组织和互益性组织、公益活动和商业活动、相关商业活动和非相关商业活动进行严格的划分，政策优惠对象的范围笼统，针对性不强。尤其是公益性组织和互益性组织的宗旨和使命是有本质区别的，税收优惠不强调不区分二类组织的差别，就体现不出对公益性组织的特殊优待；而公益活动和商业活动的区分，是维护公益组织公益性的重要内容，如果忽略这些，对公益组织的健康成长是十分不利的。

四是，政府购买公益组织服务以非竞争方式为主，易引发不公平。在非竞争方式下，对承接者的选择不是以社会公开招投标的方式进行的。政府一般会倾向于选择声誉良好的公益组织，这一情

况下并不会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造成损失；但另一方面，政府与承接者之间是上下级关系，或是因购买服务而特意建立的公共组织，此时这种“依赖”关系将产生诸多弊端，亦会对其他公益组织带来不公平。

## 二、促进我国民间公益事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公益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需要最大化地动员潜藏在民间的社会力量。不可否认，与政府的行政手段、经济激励、法律制度相比，民间社会团体和公益组织积聚社会公益资源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单纯依靠民间组织的影响力不足以筹集到开展公益活动所需的开支，而中间形成的缺口最终会妨碍到民众享受到应有的社会福利。为避免上述不足，充分动员和募集社会所需的公益资源，理应由政府出面制定相应的政策，对社会的公益行动给予必要的经济激励。财税政策之所以能作为激励民间公益事业发展的有效政策手段，关键在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可以对公益捐赠产生调节机制。其作用相当于一个可以“控制社会公益资源流向公益组织的‘阀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捐赠者的捐赠行为予以肯定和鼓励，对公益领域的各类组织给予认可和支持，从而达到引导社会公益资源流动的目的。综合上述认识，对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提出如下建议：

### （一）建立起支持公益组织发展的公共预算制度

为保证财政支出政策的规范性和稳定性，须在明确财政支持公益事业职责范围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起公益组织发展的公共预算制度。在公共预算的科目上，增加对公益组织的财政拨款和购买公益组织服务的支出科目；并要加强资金来源的控制，尝试将彩票公益金等其他收入一同纳入预算，进行统一的安排与管理。

### （二）优化支持公益事业发展的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方面，要在原有支持力度的基础上，适度增加财政投入的数额，继续有效地发挥政策资金对公益事业的引导与激励作用。在财政拨款方向上，进行一定的调整：由官办公益组织逐渐向民间公益组织、基层公益组织侧重；并对一些与民生问题联系密切又比较薄弱的领域，在财力上给予适当的关照和倾斜。同时，综合运用多种财政支出方式，加强对公益组织能力、人才建设的培养；注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将财政支出与绩效考核相结合。针对政府购买公益组织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政府应尽快完善购买服务的标准、流程及相应的评估机制，推动竞争性购买方式的运用，明确各方责任，以保证公共资源的合法有效利用。

### （三）加大公益捐赠的税收激励力度

现阶段，需整体提高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比例、扩大税收优惠的范围，以促进企业、个人以及社会各界参与捐赠，扩大公益组织的资金来源。具体政策可以从下述方面着手：科学调整税前扣除，适当提高公益捐赠的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比例，使捐赠企业和个人享受到更多优惠；应制定企业捐赠

的超额部分可以结转的政策，以增加对公益捐赠企业的激励力度；扩大享受税收优惠的公益捐赠形式的范围，考虑制定实物捐赠的价值评估标准及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体系。

#### （四）完善公益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及税收监管

对于公益组织免税资格的认定，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经验，根据组织宗旨或开展活动的性质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来决定是否达到免税的条件，这更具有可操作性，也更富有现实意义。同时，各类公益组织在组织特点、运作方式、募集资金的方式等方面也多有不同，应针对组织及活动的不同性质制定差异化的优惠政策，使公益性组织、公益性活动比互益性组织、商业化活动享受到更高的税收优待。与此同时，税收监管对防范和遏制公益组织不法行为，提高组织透明度，维护公益行业的秩序及公益捐赠的热情，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不但要对享受政策优惠的公益组织实施财务信息的全面监管，还要对免税资格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考核，并配合多种监管方式，采取多种监管手段，实现常态化监管。

#### （五）适当时机开征遗产税以促进公益捐赠事业

遗产税是对去世时遗有财产者的全部财产向遗产继承人和受赠人进行征税的税种。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遗产税在调节贫富差距、提倡劳动所得、补充所得税收入不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开征遗产税对我国而言，一方面，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悬殊的现实，对于限制财富过于集中、体现社会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遗产税会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尤其是可以大大鼓励富有阶层的公益捐赠行为，促使他们在生前为社会多作贡献，同时也有助于其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当前，随着国家三部委《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得到批转，标志着政府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意图与决心。然而，遗产税的开征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除一些硬件条件以外，还要特别注重对公众思想意识的积极培养与社会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和谐社会。

来源：中国工商时报

地址：<http://www1.peopledaily.com.cn/24hour/n/2013/0522/c25408-21564313.html>

[【返回目录】](#)

## 信息日报：“抄袭”难界定公益如何维权

草根公益组织、基金会，本该是互相扶持的关系。但今年 4 月，一起公益项目是否被侵权的事

件引起公益界的关注，草根组织表示将起诉基金会。这家草根公益组织是上海浦东新区禾邻社区艺术促进社（以下简称禾邻社），而基金会为某房产企业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近两年，类似的纠纷、公益项目被“移花接木”、“抄袭门”等，随着公益项目的繁荣与日俱增。借鉴和抄袭有办法界定吗？公益组织是否有必要对自身品牌进行维权？16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 引子

### “出局”的禾邻社

4月3日，禾邻社官方微博上出现了一条名为《XX公益基金会违约——草根公益组织禾邻社公开事情经过》的长微博，迅速引起关注。微博中称，基金会窃用非营利组织禾邻社“全民植物地图”方案。2012年9月8日，禾邻社和基金会签订协议，包括详细预算以及具体方案。其中第四条最后条款规定：“乙方拥有乙方制作的项目中所有材料的知识产权和版权，包括工作方法和模式、工作坊教材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影印、复制、抄袭、传播或用作其他商业用途。”条款中的乙方指禾邻社。

完成上海项目试点后，基金会迟迟不回复是否继续开展此项活动。到了今年4月初，禾邻社接到该知名房产公司南京分公司的电话，称已开展“植物地图活动”，但由于执行效果不理想，请禾邻社提供详细方案救急。此时禾邻社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出局”了，因为他们根本没在南京执行这个项目。

4月5日，基金会在微博中向禾邻社发出一份致歉信。但禾邻社认为，这份致歉信不够诚意，并要求赔偿损失。

5月16日，记者电话联系上禾邻社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准备起诉基金会。

## 现状

### 我省暂无版权纠纷案例

随着公益的繁荣，越来越多公益项目存在“移花接木”之嫌，公益“抄袭门”越来越多。今年年初，某媒体通过微博发布消息称，其发起的“爱心衣橱”温暖郑州活动正在进行。随后，爱心衣橱基金及其发起人之一王凯等在微博上发出了“侵权抗议”，称爱心衣橱的名称与LOGO均已进行注册和商标保护，一切不经告知的、未经授权的对名称商标的使用都是侵权行为。

16日，记者在江西省版权局了解到，目前我省还没有公益项目版权纠纷的案例。随后，记者又随机采访了数家江西民间公益组织，这些公益组织对LOGO设计进行商标注册的并不是很多，一些高校学生创办的公益组织甚至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公益组织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就处于弱势一方，这也映衬出民间公益组织维权中稚嫩的一面。”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江西崛美行动发起人、资深公益人阎志强说，特

别在江西的公益组织和机构，维权方面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遇到类似情况时，往往没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去进行维权，不如快刀斩乱麻，从头开始做另外的公益项目。

### **项目越成熟越可能被抄袭？**

阎志强告诉记者，有的人想获取道德光环，加入公益组织或成立公益组织，但事情没有做多少，牢骚发了一大堆；商家或企业参与公益活动，有时也是想让公益活动变现。“比如有些商家推出‘捐献营业利润的百分之多少给某个公益组织或某些特定人群’，但商家真正的利润有多少，一般人并不知道。还有的商家组织员工成立公益队伍，往往也是出于自身宣传和形象建立的需要。”

公益组织的公益项目做得越成熟，受到的关注就越多，随之而来与商家或企业合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难免会发生自己的项目或创意被商家“抄袭”或“拿走”的情况。从法律上来说，公益组织和公司企业都是平等的主体。公益组织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其权益也应该得到保护。但目前很多草根组织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实际上，牵涉到侵权的事例越来越多。公益侵权的事例中，最多的就是公司企业将公益品牌的LOGO用作商业用途，不但误导了消费者，对合作的公益组织也是一种伤害。所以，公益组织越来越有必要提高自身公益品牌的维权意识。

### **模仿和抄袭很难区分？**

江西省产权局有关人员表示，公益项目是否被侵权，要根据双方签订合约协议中的条款具体看待，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主体必须明确。

而在受访的江西公益组织负责人中，有人认为，公益项目是否被侵权一般较难界定。阎志强说，从这些侧面也可以看出公益组织在自己的组织理念方面有所欠缺，鉴别力方面不够，也凸显民间公益组织生存力太弱，“需要别人喂饭吃”。

一位从事公益事业多年的人士表示，好项目的诞生不容易，如果项目真的不错，那么确实是值得复制和推广的。被复制的同时，也是一种被认可的表现。“推广和复制是一种良性渠道，而非直接挪为己用的恶意抄袭。但现实情况下，往往很难区分良性模仿和恶意抄袭。”

## **建议**

### **提高免疫力抵挡“诱惑”**

阎志强告诉记者，这些年做公益，他体会最深的就是，公益组织自身免疫力急需提高。那么，如何提高公益组织自身的免疫力，防止公益项目被人恶意抄袭？首先，团队建设不能混乱，要有集中的决策权。团队建设好了，执行力就强，决策权集中了，就不会多头管理。另外，公益组织要有稳定、正规的公益基金来源，不需要到处找“奶”吃，以避免被商家和企业的资金所诱惑。

近几年，随着公益组织的阅历成长，公益组织的运作和团队建设也逐渐正规起来，一些公益组织有了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免疫力提高了，被别人打擦边球的机会也就少了。风险控制好了，同

样可以双赢。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通过吃亏，公益组织也从中获得了成长，是成长中的一面镜子。

### 核心文案不在网上公开

一位资深公益人表示，如果觉得一个活动方案好，想推广出去，让更多人受益，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必须尊重原创者的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不能出于好心的目的，最终却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他建议，公益组织在平时就做好自我保护，注意保留好自己的劳动成果，有些核心文案等不轻易在网络上公开。从项目创意到最终落实的执行中，过程性的资料需要保留好，以防今后发生侵权的纠纷，可以此作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法律界人士王新民表示，我国目前关于公益方面的法律还不是很健全。所以，公益组织在与其他基金或者企业合作时，首先要坚持活动的公益性，其次合同中要明确双方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尽量避免出现公益项目被恶意抄袭。

另外，公益组织还可以对自己运作成功较有影响力的公益项目申请社团徽章，甚至注册商标，如此公益项目从法律上就应受到保护，属于著作权范畴。一旦发生恶意抄袭的情况，也有助于自身的维权。

来源：信息日报

地址：<http://www.jxnews.com.cn/xxrb/system/2013/05/20/012426367.shtml>

[【返回目录】](#)

## 公益时报：如何保持企业基金会的独立性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截至 2011 年，企业及企业家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已有 285 家，占非公募基金会总量的 22.3%。这些已有的企业基金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因其资金来源于支持其设立和发展的企业，所以其日常运作绝大多数时候都要唯企业马首是瞻。

如何能充分利用企业基金会的资源优势，使之成为公益慈善领域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第一，企业要明确自己的责任，明明白白将企业和基金会各自的责任义务弄清楚，不要含糊其辞。首先，在发起设立基金会时，企业应确定好基金会的宗旨，需多费一些心思和时间想明白基金会成立以后要做什么，集中关注哪些个领域；其次，在基金会成立初期或发展过程中，企业应出资支持日常运作及在宗旨范围内开展项目所需要的资金；再者，企业需帮助基金会实现“独立”：如果企业希望基金会在成立之后，能够实现资金从企业“断奶”，就需要企业（家）帮助基金会逐步

实现这个目标——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帮助基金会培养专业、独立的资金运作团队，逐步实现资金的投资增值。

第二，厘清与政府的关系。一方面，企业基金会要充分尊重国家的法律法规，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另一方面，企业基金会的资产不应该被政府用作其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补贴，尤其是他们不能是捐款的直接受益人。如果企业基金会做不到这两个方面，总是跟政府保持着很暧昧的关系，甚至有很多利益瓜葛和牵扯，那么就很难独立、健康发展，更别奢望成为卓越、优秀甚至是伟大的基金会。

第三，建立独立、务实的理事会。现在有一些企业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多由企业内部的管理层或来自某些与企业有利益关系的单位的人员担任。这样的理事会成员组成至少可能带来两个不好的结果：一是非常强势固执，完全用管理企业的那一套思想来决策，使得执行团队缺乏应有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另外一个结果则完全相反，理事会形同虚设，完全听命于企业大老板，没有独立的思考和意见。

因此，企业基金会要独立运作，就必须建立真正独立专业的理事会，尽量避免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带到这中间来。理事会成员的构成应该多元化，但有公益慈善背景的成员在数量上必须具有优势。

第四，尊重专业。基金会的运作其实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要保持企业基金会的独立性，就必须相信并坚持其管理和运作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只有吸引更多、更好的专业人才来参与设计、参与运作，才能使企业基金会的发展具有基金会自身的特点，符合基金会独有的发展规律。

企业基金会的发起设立者首先必须意识到要使自己的基金会发展成一个优秀、伟大的基金会，就需要保持其独立性，而不是企业或企业家的附属品。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ZLxZL/201305/e9bb36ef4a864c7d8294d6328805929a.shtm>

[1](#)

[【返回目录】](#)

## 公益时报：流动儿童帮扶社区中心模式探索

“你是哪里人？”这样一个我们常用来寒暄的简单问题，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却难以回答。做流

动儿童关注项目的北京昌平木兰社区负责人齐丽霞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她也曾经这样问过孩子们，从出生开始就跟随父母在外的五六岁孩子会回答“我是北京人”，而比他年长一点的哥哥姐姐则会纠正：“你说错了。”

“何处是吾乡？”这样的身份困惑在孩子们的心中也许搁不了太久，他们更关心的还是学习成绩差、没有地方玩儿这些眼前的烦恼。随着流动儿童人群的迅速扩大，这些问题也正得到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

5月10日，全国妇联发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文中数据显示，我国0-17岁农村流动儿童达2877万，学龄前和小学阶段流动儿童分别占27.40%和27.89%。其中7-14岁流动儿童中有1/3流动时间在6年以上。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流动儿童主要面对的困难有两个，“一是上学难，另一个是融入城市难”。

在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后，融入城市难则成为许多公益组织持续关注的问题。《报告》强调应进一步加强家庭和社区干预，在流动儿童集中区域建立社区中心则是公益组织正在尝试和摸索的一种形式。

### 家长和学校照护外的时间

北京西北旺冷泉村的本地人只有2000名左右，外地人则约两万，村内公办小学的大部分学生也是外来人口。由于父母工作地点较远或比较忙，流动儿童在放学后到父母回家前以及周末这段时间形成了空缺。而除了父母，他们在这里没有亲人，也缺少伙伴，面对的是不熟悉的环境。“孩子们需要在课后这段时间有人关注，最初就是这么简单的想法。”青基会社区服务部部长李刚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但怎么服务，开始也没有经验。

2011年，中国青基会与香港十分关爱基金会合作，找到当地的NGO“行在人间”，共同成立了针对流动儿童的希望社区。

租来的不大的院子里，搞了电脑教室、自习辅导教室、活动室等，装备了体育设施、图书、数字电影放映设备，由NGO聘请了3名社工，从开始的家长不了解、不愿意让孩子来，到2012年平均每天活动人数达到了83.5人。现在除了由附近各高校志愿者进行的课业辅导，还有读书、下棋、音乐、体育等各种兴趣小组，羽坛名将谢杏芳也多次作为志愿者来跟孩子们互动。李刚说，这对孩子的自信心培养很有好处。

记者走访的另一家木兰社区位于昌平东沙各庄村，这里比冷泉村更加拥挤，总人口约有4万。相比冷泉希望社区由基金会支持，木兰社区更加草根，它由齐丽霞和几个朋友成立，从2009年曲曲折折走到现在，经历过失去项目资金，经历过拆迁、从东三旗搬到现在的村子，后来在新公民计划

等不同机构的项目支持下一步经营至今。

由于原来的地方房租涨价，木兰社区一个月前刚换了新院子，大小十余间屋子分为电脑室、玩具室、阅读室、活动室等，还有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生活区。4点半后，孩子们陆续赶来，小院逐渐热闹起来。负责人齐丽霞说，活动之外，现在还有40个孩子接受志愿者的一对一辅导。这些孩子由于转学等原因，学业成绩好的不多，孩子自己压力也很大。

### 不只是救助和帮扶

在学习和生活之外，孩子最需要什么？改善流动儿童相对薄弱的家庭关系、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是社区中心工作者的共识。中国青基会研究部部长姚晓迅认为，流动儿童由于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缺乏一种最基础的社会支持网络来给与其安全感。网络需要四方面支持，一是亲子关系；二是建构朋辈关系，给他们更多和小伙伴玩的机会；三是开展更多的校内活动，注重孩子和老师之间的交流；四是参与社区活动。通过这种人际关系网络来建立其自信。这种活动需要持续性，而不是简单的某地一日游等，间断的活动对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刺激，而不是帮助。

在木兰社区，教师出身的齐丽霞更注重孩子的健康人格培养，希望孩子在社区中心学到跟学校一板一眼的教学中不一样的东西，不让社区中心再变成课堂的延续。所以木兰社区的儿童活动时间叫做儿童开放日，而不是课外辅导。孩子自主选择喜欢的项目，在儿童图书室，记者看到十几册小笔记本，里边是爱好阅读的孩子所写的读书笔记，学而思，这无疑是个好习惯的开始。

新公民计划支持的其他全国各地十余个社区中心，侧重点也各有不同，比如上海的热爱家园·太阳花项目以自然教育、生活教育为主，北京通州区的荷花馆更重视对孩子的陪伴成长、个案关注。在完善孩子教育环境的同时，追求教育的本质。

### 需要专业社工服务手法

由于流动儿童多样的家庭环境和自身状况，难免有孩子遇到些特殊问题。冷泉希望社区中，专业社工的个案手法在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涂猛认为，城市化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情，从农民变成城里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做的事情非常多，还是要有针对性的，针对他们需求的层次来提供服务。

冷泉村希望社区对聘用的社工研究了自己的管理方式，使用教育券。到这里来的孩子每参加某一项活动，便赋予其相应的分值，管理方根据这些分值对社工服务进行量化。但提到希望社区能否在其他地方复制时，李刚说，有一定困难，问题之一就是目前专业社工还不是很多，学习这个专业的人不一定愿意从事这方面工作，而我们要建立流动儿童社区中心的地方也不一定有专业社工。

木兰社区的问题则是，当前的工作人员专业性稍有欠缺。齐丽霞说，我们提倡用灵活亲切的方式与孩子沟通，但是背后需要更专业的教育知识支撑。目前在新公民计划的支持下，团队每个人都

有一些机会到外边交流学习。

### 服务项目的筹资难

中国青基会希望社区项目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公益产品价格太高。根据项目需要逐步往里投入，目前已经将近 70 万，加上后续投入可能要突破 100 万。这个价格一般的捐赠方是接受不了的。要降低它的价格，服务可能就不会这么复杂多样。

捐赠方更愿意将善款投入到硬件设施，而对软件投入，尤其是给人付工资的项目不太感兴趣。最初希望社区将社工服务和硬件投入打包成一个项目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与筹款相联系的难点就是项目评估。一般的资助项目，只要把捐款给孩子，将孩子与捐方之间建立一对一联系，通过孩子的信函、银行票据等，就可以获得捐赠方的认可。但服务项目，其成效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有多少孩子和家长参与了活动，办了多少项目点；二是孩子通过服务，其自信心是否得到了提升，社会网络是否有所扩大。姚晓迅说，我们最注重的是成效，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而这些东西如何衡量，“这还是一个未解的问题”。国外也有些大型基金会做类似项目，需要忍得住，等待项目开展起来，效果慢慢呈现，不能急功近利。对于青基会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对此，涂猛表示，在世界范围内看，服务项目资金支持较少也是公益行业的一个规律，从提供服务的角度，公益分为三种：救助类、资助类、发展类。社区中心的社工服务更多地在于发展。这样的高层次公益产品，它的社会购买并不是十分旺盛，市场份额远远小于救助。希望社区目前才做了四个，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源有限，甚至要拿我们的自有资金（投资增资的收入）来投入。大家还是更愿意捐希望小学，雪中送炭的事情做得多一些。

### 谋求自身造血机制

新场地一谈下来，齐丽霞就倍感压力，因为每年 5 万元房租，再加上工作人员经费、各项杂费，对于一个草根组织来说，不是小数目。这些开销都来源于项目经费和义卖店的一点盈利，其中项目经费占到 9 成以上。由于经费吃紧，虽然工作很忙，人手不够，但也不敢随便招人。

早在 2012 年机构注册之后，木兰社区就经历过一次由于项目支持突然结束而步履维艰的状况。对于将来的计划，齐丽霞说，想在周边的村子再建一个社区中心，扩大服务范围。而在资金层面，理想的状态是，3 到 5 年内，做到 1/3 项目支持，1/3 自我造血，1/3 社会支持，让机构有能力自我运转。“如果再像前两年那样单靠大家的力量艰难度日，是不可持续的。”

基于这个想法，木兰社区也一直在探索各种可能性，比如做小型的加工厂、幼儿园、壮大女工互助社等。木兰社区一直是儿童和打工妇女两方并重，女工互助社是现有项目之一，齐丽霞说，由于年龄、家庭等各种原因，社区里很多妇女没有工作和经济收入，希望找到一个方式让他们参与，

我们负责找技术、原料，再确定一个合理的利润分配。这是一个思路，但目前还没看到特别有可操作性的。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yaowen/201305/34cc9afbf04f4375bf71918530aa22c3.shtml>

[【返回目录】](#)

## 公益时报：资金池“膨胀”后的壹基金

——2.45 亿的加法

截至 5 月 6 日 24 时，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金”）已收到爱心公众、企业单位 297 万人次的捐款，捐赠资金 24514 万元，捐赠物资 1375 万元，捐赠总额为 25889 万元。”这是 5 月 7 日上午在壹基金召开的一届七次理事会上，壹基金秘书处向壹基金理事们提供的数据。

此次理事会为临时理事会，召开的目的是很简单：总结前段救灾工作，安排好灾后建设。将壹基金雅安救灾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是理事们在听取了几位地震和灾害专家介绍后一致通过的。

“第一阶段是紧急救援阶段，主要工作为 72 小时内的紧急搜救和配送救灾物资，持续时间为雅安灾后的 2 个月范围内；第二阶段是过渡安置阶段，主要围绕灾民安置点内的用水、洗衣、做饭等基础生活设施的配套以及帮助学校建设，项目的持续时间为灾后的 6 个月到一年；第三个阶段是灾后建设，是中长期项目，分为农民民房示范村的建设和灾害管理中心的建设，项目持续期较长，3 年到 4 年。”

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告诉本报记者，壹基金筹款 2.45 亿的消息被广泛传播后，很多人担心其消化能力。但事实上，按照三个阶段的不同分配数额，壹基金甚至需要筹措更多的钱。

目前，壹基金已经向雅安灾区拨付 2000 余万元善款，而紧急救援阶段，壹基金的计划支出为 3000 万。

在过渡安置阶段，壹基金将项目打散，分成各种小项目面向草根 NGO 及部分企业招标。在其官网上可以发现：“儿童灾害教育读本”和“壹基金儿童服务站”的招标公告已经公示。以为灾区儿童提供安全活动场所的服务站为例，所有在雅安地震灾区开展工作的独立注册的公益组织都可进行申请，每个工作站的最高额度为 6 万，包括 2-3 名工作人员 6 个月的补助及其他办公经费。服务站可

根据社区需求，最高申请 1.5 万元的活动基金。“其他包括像净水系统、洗衣房、有太阳能热水器的浴室的建立都会按照类似的模式进行招标。”杨鹏表示，在该阶段，壹基金的资金支出预算为 8000 万。

这 8000 万元的新增预算案，将在今年 8 月的理事会前，由壹基金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提交。在 3 个月内制定如此数额庞大的新增预算案，看似是不小的挑战，但因为采取了“将大化小”、“覆盖面广”的项目思路，秘书处需要考量的则主要是细节问题。“比如是否让企业参与招标，可能企业比公益机构的执行效率高，效果好。但作为致力于倡导公益行业发展的基金会来讲，我们更想让 NGO 来参与。”截至 5 月 17 日，已经有 30 几家 NGO 向壹基金提交了项目申请书。

“3000 万加 8000 万这就是 1.1 个亿，灾后建设的部分还没计算。事实上，这部分的支出才是大头。”壹基金计划在龙门山地震带有针对性选择几个村落建设减防灾示范村，按照杨鹏的计算，以每村 200 户，一户 20 万为例，一个示范村的建设就需要 4000 万。“建 4 个就是 1.6 个亿。”据悉，该项目的技术支持，将由万科集团免费提供。

而针对“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 70%”的限定，理事们更倾向于选择“与相关政府部门协商年检问题”及“争取将企业类大额捐赠资金引导到灾后建设和其他长期项目中”的解决办法，而没有表决有参会人员提出的“在雅安设立民非，将捐款拨付执行”的建议。

壹基金为整体灾后建设项目设计了一个名称——“4H 计划”：灾民的住家(Home)、健康(Health)、灾区儿童快乐(Happiness)及未来希望(Hope)。每个 H 项下设定了系列项目，如 Home 项下有“减防灾示范村建设”，Health 项下有“净水系统”，Happiness 项下设有“儿童中心项目”，Hope 项下有网络教育项目等等。在此次救灾过程中，有超过 40 家互联网公司对壹基金进行了捐赠，它们提出了在灾区进行网络教育的诉求。

### 招不招人的问题

钱花到哪里不是问题，困扰秘书处秘书长杨鹏的是没人帮他花钱。秘书处的当务之急是要在 3 个月内制定出本年度 8000 万的新增预算并在 3 个月后执行，对于一家全职员工不到 40 人的基金会来讲，这是一个关于内部治理的挑战。

《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当年公益支出总额的 10%来限定基金会行政办公和人员福利的支出上限。在壹基金获得公募资格的两年里，都没有完成年度筹资计划，却在团队人员数量上有了一定程度增加。

壹基金 2011 年的工作报告显示，该年度壹基金的专职工作人员有 38 人，人员福利和行政办公开支占公益支出总额的 7.61%。2012 上半年，这一比例与上一年基本持平，为 7.22%。单从数据上

看，其生存线指标是合格的。但在 2012 年 7 月召开的一届五次理事会上，壹基金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执委会”）考虑到筹资环境变化及筹资团队强化需要时间等因素，建议秘书处压缩开支。

所以事实上，秘书处此前正处于需要减少人员编制的关节。但此次筹资增长，巨大的资金池需要消化，现有工作人员数量又面临吃紧的状态。

这看似是一个裁员和招人的简单问题，但却由于其机构的分权设计而变得复杂起来。众所周知，壹基金 11 位理事构成的理事会是其最高决策机构，壹基金的章程是组织内最高法则。同时为了控制决策风险，平衡执行能力，在壹基金成立之初，还设置了一个介于决策和执行之间的执委会制度。不同于秘书长带领的执行团队，执委会不做具体项目执行，却又被称为“最高执行机构”，实际上就是王石的决策提供意见和依据，为壹基金再度增加了决策环节。目前，壹基金执委会共有 7 人，除了 5 个发起机构代表外，还有秘书长杨鹏和执行理事长王石。

在此次人员增补的过程中，执委会有代表坚持反对，认为应先强化团队建设，细化工作计划。在 5 月 7 日的理事会上，理事会最终授权执委会在 10% 的范围之内增加专职工作人员数量。其他人员增补留到 8 月理事会再讨论。

“救灾紧急状态已过，大量志愿者已离开壹基金返回自己工作岗位。如果壹基金要等到 8 月底才讨论人力增加问题，这期间不准秘书处增加工作人员，等于拖了 3 个月的时间（公众最关注的 3 个月）使壹基金工作处于过大压力状态，这是对壹基金不负责任的做法。并且雅安灾后建设公众压力巨大，不仅是雅安前线的建设项目，包括后方的采购服务、捐赠人服务工作量都急剧上升，由于人力缺乏，工作专业能力降低，已出现公众抱怨。”

杨鹏不满意理事会的决定，在理事会结束后写了一封《关于增加壹基金秘书处部门人员编制的申请》，其中讲到：“现阶段雅安救灾项目的巨大执行压力，秘书处目前现有的人力资源已经严重制约了项目的执行。为了有序、高效地执行好雅安救灾项目，秘书处不能等到下届理事会（8 月份）再讨论人力资源增加的问题，而希望在遵守国家基金会管理条例所规定的管理费不超过 10% 的前提下，可以增加机构工作人员，并开始相关招聘工作。”

同时，考虑到未来壹基金志愿者队伍的长远发展，需要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来统筹和管理，杨鹏建议增设志愿者管理部，专门负责志愿者的招募、培训和管理。在此次救灾过程中，壹基金共动用志愿者 800 余人。

此外，壹基金的执委会制度是在 2011 年 7 月的理事会上列入章程，彼时规定该制度在两年过渡期内运行。也就是执委会制度原则上持续到今年 7 月。但据参会人员表示，对该事件，理事会当日并无讨论。

## 筹资计划

在关于人力资源的问题上，除了考虑到雅安灾后建设需要人手外，杨鹏还做了未来几年的打算。“按照目前超过 3 亿元的筹资现状，以未来每年筹资在 6000 万元的保守估计算，秘书处预估未来三年的年均项目支出都会超过 1.5 亿元。所以这不光是一个短期问题。”

目前看来，每年 6000 万的筹款计划确实保守。有专家建议，壹基金应该借此机会修改机构的捐赠人结构，以公众筹款为主。甚至有人计算，如果壹基金能将此次 300 万捐赠人次转化为固定月捐者，即意味着今后都能通过银行卡、互联网账户等渠道平均月捐 5 元(有 1 元、11 元等方式，取中值)，该机构一年将拥有 1.8 亿不定向捐赠收入。

事实上，壹基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为了更好地服务捐赠者，其承诺为所有捐赠超过百元的捐赠者开具捐赠发票。截至 5 月 16 日，已经通过快递陆续发出超过 12000 张票据。某快递公司承诺为其提供 20000 份的免单邮递。

此外，为了增加公众的公益体验，壹基金即将陆续在杭州、深圳等地举行“为爱同行”大型公众参与类活动。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tjxw/201305/99826314271a4c27961a939967ef1c73.shtml>

[【返回目录】](#)

## 公益时报：失语的中红会社监委

 <b>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名单</b> (按姓氏笔画排序)	
<b>王永</b>	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
<b>邓国胜</b>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b>王振耀</b>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b>白岩松</b>	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b>吕红兵</b>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b>刘姝威</b>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b>陆正飞</b>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会计学教授
<b>张勇</b>	北京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长
<b>迟福林</b>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b>杨团</b>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b>金锦萍</b>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b>郑静晨</b>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警部队后勤部副部长兼武警总医院院长
<b>俞可平</b>	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b>袁岳</b>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b>黄伟民</b>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合伙人
<b>翟晓梅</b>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社会科学系主任, 教授

2012 年 12 月 7 日, 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中红会”)在北京宣布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委”)成立, 通过社会遴选聘用 16 名社会人士担任社会监督员对中红会项目进行监督。

社监委秘书长、北京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伟民当天对公众表示, “监督与被监督是相辅相成的, 红会启动社会监督机制, 成立委员会, 这些委员背后是更多更广泛的社会公众, 他们本身的一言一行首先是受社会各界监督, 受社会公众的评判”。

可就在黄伟民的这番表述 5 个月后, 社监会委员们却达成统一意见, 涉及社监委相关事宜委员

们个人不再接受媒体采访，选择等到6月9日年中会后再作回应，当前一切事宜由秘书处安排回复。

几个月来社监委的监督进程并不平坦，常常饱受质疑和诟病，公众向其反映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涉及红会虚开发票、万元帐篷和餐饮发票、扣留2.5亿日元中国劳工慰问金、艺术家方力钧等百名艺术家义拍8472万元善款使用等，但是社监会的回答几乎均被公众扣上了辟谣、澄清、辩护、解释的帽子，网友们质疑——“这也叫第三方监督？”

而随着“重查郭美美”风波的不断发酵，质疑声浪更是登峰造极。

### 社监委还是公关部？

5月13日、16日，网络爆料人周筱赟在天涯论坛上分别贴出《红会公关部真相：只辟谣不监督的“社会监督委员会”黑幕大起底（上篇）》和《红会社监委黑幕（中篇）：社监委重查郭美美是和红会演双簧》两篇爆料，帖子一出将多日备受质疑的社监委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周筱赟在帖子中说，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委”）就是中红会的公关部，只辟谣不监督，社监委委员兼新闻发言人王永实际控制社监会（指王永的公司与中红会有不当利益牵连），重查郭美美就是在与红会演出双簧，社监委财务并不独立等等，这严重影响社监委对红会监督的公平、公正性。

帖子中称，社监会的新闻发言人王永以举办项目为名与中红会合作，并在成为社监委委员后，于2013年4月间通过自身公司举办“国内十大品牌女性”活动之机颁奖给红会现任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有致社监委不公平监督的嫌疑。

帖子发出当天，王永即在个人微博上就质疑逐条做了说明。但对于王永的回复，周筱赟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回复均没在点上，这种面上的说法太过于笼统，没什么实际意义。”

“社监委运作经费、办公场地根据《章程》由中红会提供保障，这种状况下，社监委每一笔钱支出都要得到中红会批准，如何能够称作社监委自身独立？再则场地和工作秘书也由中红会提供，这种方式运作，我们向社监委举报还能够得到有效、公平执行么？社监委就是中红会的一个内设机构，这种监督毫无意义。”周筱赟说，“王永在成为社监委委员前后，自己公司都与中红会有着紧密联系，拉中红会合作、颁奖给中红会领导，你还说要独立监督它，我不明白？”

面对周筱赟的质疑，王永对《公益时报》记者称：“社监委当时找到我，希望能够担任委员，我当时也考虑了很久，但我看到红会这块品牌，我自身就是做品牌的，感觉到可以试一试，在这种情况下我答应了做他们的社会监督员。”

“作为中红会社监委一名委员，我们接到公众质询后，根据《章程》会向中红会询问并调查，委员们自己开车前去调查，都是志愿者，不拿中红会一分钱。”王永说，“关于自身公司事宜，微博上已经做出过回复，自己公司与红会之间无任何利益往来，举办活动和颁奖并无不妥。”

但根据《公益时报》记者查询社监委《章程》第十一条“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的义务”中第 4 款规定：“当被监督事项与本人利害产生利益冲突时，委员应当主动回避。”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认为：“评选赵白鸽为‘十大品牌女性’时王永已是中红会社监委委员，王永的机构又推动这样的评审，就易引起社会对王永作为社监委委员的公正性产生疑问，合作最好避免，更何况给人荣誉？因为容易有利益牵连，会对其监督带来不公正判断。”

### 为何委员们集体失声？

2012 年 12 月 7 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当天就召开第一次社监委全体会议，委员们纷纷在个人微博上发出消息，当时就有中红会与社监委委员称，“这甚至比当天中红会官网发布这一消息还早，社监委具有很好的独立性”。

这样活跃的互动的依据应该是“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的义务”第 3 款规定：“主动征集并反馈社会舆论和公众对红十字会的意见和诉求。”

但如今委员们却是三缄其口，避而不谈社监委任何信息，均称要等到 6 月 9 日社监委举行年中会议后方做解答，这与先前委员们的活跃程度形成鲜明对比。

《公益时报》记者联系到社监委白岩松、金锦萍、杨团、刘姝威、吕红兵、迟福林、张勇、邓国胜、黄伟民等 9 位委员，他们对于涉及社监委事情都不愿意多谈。社监委主任委员迟福林对记者表示：“现在自己不谈社监委任何问题，在 6 月 9 日年中会上，我们会对社监委之前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形成意见后再向媒体公开。”

社监委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邓国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现在不愿意多讲就是因为规则，6 月 9 日年中会议上我们就会讨论社监委规则，之前很多人都说话，这让社监委声音不太统一。”

邓国胜告诉《公益时报》记者：“6 月 9 日前委员不再对媒体发表有关社监委任何言论是社监委自己做出的决定，跟中红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6 月 9 日的年中会究竟会讨论什么内容？

社监委主任迟福林告诉《公益时报》记者：“6 月 9 日年中会上我们会讨论之前部分委员提出重查郭美美、芦山地震红会接受捐款事宜，当然也包括社监委内部发言规则问题，等等。”

社监委秘书长黄伟民也表示，“之前关于很多细节社监委都在官方微博上进行过回复，包括是否重启调查郭美美事件，社监委使用的资金、场地、工作人员，我们也会进行账目公开，但这一切需要等到我们 6 月 9 日年中会开会后才能决定，媒体有时候太急了，社监委刚成立不到 6 个月，应该说很多地方还需要完善，这需要时间。”

如果重启调查郭美美事件，社监委又将发挥多大作用呢？黄伟民坦言：“这确实是目前面临的一

个难题，这次开会我们就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确定。”

现任中红会社监委委员的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早前于 2009 年 6 月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担任过委员一职，两次社监委委员的经历使王振耀在谈及社监委问题上有着充分的话语权。

他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表示：“作为一个准政府背景的机构，能让社会成员来监督自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中国，公益领域的第三方监督太重要了。”

“社监委和中红会就应该是一种监督关系，但这种监督是一种咨询性监督，不是一种体制性监督，这就是一种改革的尝试，在中国目前公益组织中，太需要这种第三方监督了，应该把这种第三方监督引向更多公益领域。”王振耀说，“社监委是沟通公众和中红会的一个桥梁，把民意和社会意见集中归纳出来向中红会反映，并快速向公众回应相应质疑。”

杨团委员在微博中发言：“红会从性质上说不是政府组织，但是体制上是参公单位，这就是红会必须改革的理由。在参公单位中如何做社监委，如何通过一些措施让其渐变，这是一个探索中的难题。”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yaowen/201305/8432cd71cb53474cb2f84cc6e38902fd.shtml>

[【返回目录】](#)

## 中国经营报：“利益交换、利益输送缠绕”，争议红会社监委

芦山地震让中国红十字会（下称“红会”）再次陷入舆论的旋涡，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舆论的焦点集中在曾被公众寄托厚望的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下称“社监委”）身上。标榜独立、公正、客观的社监委是否能有效地监督红会？但社监委在“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上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令公众失望，也让公众对社监委及其成员的合规性与公信力产生了质疑。

据了解，目前的社监委成员中至少有 3 位委员与红会之间存在利益交换，或通过商业机构的商业合作，或通过公益平台形成捐赠与受捐的纽带。上述利益关系不是普遍定义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应有的关系，这也让社监委作为第三方监督机构遭遇了成立以来的首次信任危机。

神秘社监委

聘任的过程大体相似：红会工作人员发邮件和电话，询问他们愿不愿意担任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表示同意后，监督委员获得聘任。

慈善组织成立社监委，红会已经不是第一家。此前，其主管下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已经于2009年7月成立了社监委，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更早前聘请过社会监督员。

“红会成立社监委后，在当时并没有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比较平静。”4月下旬，红会内部一管理层人士告诉笔者：“这个社监委是遵照国务院的要求成立的，聘请了一些体制外的人士。”

2012年7月1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红十字会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建立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坊间较为一致的评价是，国务院之所以要求红会成立社监委，背景源于“郭美美事件”爆发。

在此之前的2011年6月，那个“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认证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20岁女子郭美美，让红会毫无躲闪地“中枪”。这名女子口无遮拦的微博让几乎所有网友惊奇和诧异，进而引发了红会的信任危机，紧接着是众多网友对所有慈善组织的不信任。

当年7月，红会发布“郭美美事件”调查报告，称经由监察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北京刘安元律师事务所、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郭美美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下称“商红会”）的关系、商红会的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进行了认真调查，认为“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红会没有任何关系，其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及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

这成为红会一直坚持的“郭美美事件”调查结论。

尽管如此，公众对红会的质疑并没有停歇。随后不断爆出“上海卢湾红会天价餐事件”“成都红会捐款箱内善款霉变废弃事件”“红会挪用艺术家8472万元捐款事件”等等。

直到今年“4·20芦山地震”发生后，一个叫王永的“红会社监委”发言人表示“要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人们才发现红会社监委的存在，并且逐步弄清楚这个社监委与红会“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而系由红会聘任的社会知名人士组成。

2012年的12月7日，16名社监委委员由红会直接聘任上岗，被红会认为是“独立监督机构”。

据王永、王振耀等多名委员描述，聘任的过程大体相似：红会工作人员发邮件和电话，询问他们愿不愿意担任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表示同意后，监督委员获得聘任。

社监委成立后，红会才公开了这些社监委委员情况，其中主任委员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担任副主任委员。

因为未进行聘前公示，外界对这些社监委委员的聘任过程及相关情况并不清楚。

## 商业利益交换

虽然目前社会组织接受独立的第三方监督还没有统一的模式与规则，但按照普遍定义，监督方与被监督方不应存在利益交换，否则这种关联交易难以保证监督的公正与客观。

2012 年的 12 月 7 日，红会在社监委成立时称，委员系“经多方推荐和严格遴选”产生，不久又在回应媒体质疑时表示“在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人选的选择上，委员会主要从专业背景、社会公信力、热心公益等方面考量，同时考虑了不同专业人员的协同匹配，包括法律、财务、医学、传播、社会管理、救援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但未向社会公布过推荐人、推荐理由及遴选的具体情况。

然而，“专业人士”王永似乎并不清楚 NGO 与非法社团的区别。

王永的公开身份是“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今年 5 月 13 日，他还在向媒体表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注册的社团。”因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向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颁奖，联盟秘书长又担任红会社监委委员监督赵白鸽，一时引来众多关注。王永也不断通过微博澄清自己“与红会没有任何利益往来，恳请网友拿出证据，一经查实，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但很快，网友及媒体便通过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确认了王永言称的“社团”并不存在，而实际操盘者为王永名下的一间公司。王永对此解释“看到网络质疑后，我仔细看了一下材料，才发现我们注册证书是商业登记注册的证书，这意味着我们（品牌中国）是一个商业机构”。

法律规定，未经注册便以社团（或其他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应属于非法。据媒体报道，2009 年，品牌北京在其开办的经营性网站——品牌中国网上对品牌中国进行宣传，出现了“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成思危担任名誉主席”等内容。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分局认为该宣传中使用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违反了《广告法》及相关管理条例，对品牌北京做出罚款 6000 元的决定。

王永之后，另一位社监委袁岳也公开承认承接过红会的评估项目，“取费 6 万元”。在红会聘任的这 16 名监督委员中，袁岳是为数不多的商人之一，他担任董事长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主体为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下称“零点公司”）自称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提供专业策略性研究咨询服务的集团公司之一”。

2013 年，红会发布《汶川地震灾区博爱家园项目终期自评调查报告》显示，这个“自评报告”即由红会委托零点公司所做。不久前被曝光的“红会挪用艺术家作品拍卖所得 8472 万元捐款事件”中，红会称善款被改投的项目，即是“博爱家园”，红会曾为此道歉。

红会发布的公开资料显示，2012 年年末，红会赈济救护部、训练中心将“博爱家园”项目的外部评估工作委托零点公司完成，称该公司对已实施的“博爱家园”项目进行了整体评估，于 2013 年

4月形成了《汶川地震灾区博爱家园项目终期自评调查报告》，并在全面分析上述项目执行情况的基础上拟定了项目外部评估体系，包括《博爱家园项目手册》和《博爱家园项目外部评估手册》。

这次委托评估的业务，红会向零点公司支付了多少费用，红会和零点公司均未公开。

5月14日凌晨1时，袁岳透过微博回应：“以零点公司积累的公益项目评估经验，含红会在内的公益项目均需落地评估上加强，零点公司对博爱家园评估提供问卷和指标体系设计、报告撰写支持（取费6万元，为非公益常规报价的1/3）也出于此。该项目为红会自评，后续应独立评估本人忝列社监委，前已申明仅提供技术支持，未来独立评估宜由其他第三方负责。”

其实，早在成立初始，社监委就对委员行为有过规范要求。由社监委表决生效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载明：“当被监督事项与本人利害产生利益冲突时，委员应当主动回避。”而在此事件中，人们并未发现相关委员因承接红会业务而提出工作回避的申请。

《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中也明确要求：“各级红十字会要按照规定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做到资金募集、财务管理、招标采购、分配使用等捐赠信息公开透明，切实保障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但是，这一项目的招标情况，红会并未公开。

一位长期从事社会组织治理研究的公益人士认为，类似有偿交易因涉及社监委委员名下公司参与，红会及社监委均应公开金额、数量、有偿服务时间、内容等交易内情。他认为，虽然目前社会组织接受独立的第三方监督还没有统一的模式与规则，但按照第三方监管的普遍定义，监督方与被监督方不应存在利益交换，否则这种关联交易难以保证监督的公正与客观。

残缺的是，袁岳发完这条微博后，其与红会对此事再无回应，至于这6万元来自何处，是否违背捐赠人意愿等疑问，公众没有任何答案。

受益者不回避

2008年汶川地震后，红会通过“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募集的数千万元赈灾捐款被投入“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至今不为人知。

事实上，红会悄然将公众对地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的专项捐款改为他用，不久前爆出的“艺术家拍卖捐款被挪用”并不是特例。

2008年汶川地震后，红会通过“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募集的数千万元赈灾捐款被投入“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至今不为人知。

现在，这个公益研究院已于2012年年初改称“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而院长王振耀也被聘为红会社监委委员。此前的2009年，王振耀（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被聘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2007 年，“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设立后，开始向公众募款，但其募款额发生巨大增长是在 2008 年汶川地震后。那时，来自全国公众的点滴善款通过银行、支付宝等多种途径快速积累，不久突破亿元，均存于红会账户。

为了独立执行这些善款，李连杰于 2008 年 10 月在上海捐资 200 万元设立非公募性质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开始大量接收由红会转来的汶川地震捐款，并将其中的 2000 万元公募善款转手“捐给”同是非公募性质的北师大公益基金会，用于 2010 年开设“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

虽然其中 1000 万元被标为企业“定向捐赠”，但直至 2012 年“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和“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注销公告发布，显示已有约 3000 万元陆续“捐给”北师大的非公募基金会。有来自北师大基金会人士的消息称，善款绝大部分被公益研究院支出。

对于上述内容，红会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及，红会及上海壹基金从设立至注销的公告中也没有善款投向这个研究院的任何报告。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工作报告中，数千万元投入研究院仅被公告为“公益慈善平台搭建”支出。

红会有工作人员曾透露，将壹基金计划募得款转给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去“执行”曾经引发内部争议，因为上海壹基金并非红会下设机构，红会要执行这些善款，应该通过红会系统去完成。但最终这类意见被红会管理层否决。

2010 年年初，王振耀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职务，加盟北师大，组建北师大李连杰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并就任院长一职。此时，上海壹基金已完成 2000 万元红会善款的布局，顺利将款“捐给”了北师大公益基金会。当年，曾有媒体询问王本人，王振耀称自己仅是大学二级教授，月薪约 8000 元。

5 月 23 日，称正在美国访问的王振耀通过短信告诉本报笔者：“慈善界要有那么高的年薪（指传闻的百万年薪——笔者注）就万岁！办院与李连杰关系太大但与红会无关。”王振耀一郭姓助理则表示，她并不清楚王振耀的薪水，只知道研究院系由上海壹基金与北师大合作设立。对于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是否会公布使用红会善款的情况，郭姓助理称“将尽快向领导汇报”后便再无回音。

就这一问题，笔者曾在几天前当面询问赵白鸽，赵未做说明即转交红会组宣部门答复。此后，红会组宣部工作人员称需要了解情况并向领导汇报后再与笔者联系。但直到发稿前，红会对此未作任何回应。

虽然设立于北师大的这个公益研究院从未说明办院经费是来自红会的公募善款，但其运营投入却在不断加大。研究院成立一年后，交付其使用的约 2000 万元善款或即告罄。2011 年年初，公募性质的深圳壹基金已经成立，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不久后即宣布注销，北师大壹基金公益

研究院开始向深圳申请拨款。

这个拨款请求最终未被深圳壹基金全部接纳。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有关人士曾透露，因为资助研究院并不符合深圳壹基金的使命和项目设立范围，也不符合捐款人的意愿，深圳壹基金只有部分项目还在与研究院合作。

2012 年年初，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悄然改称“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去掉了“壹基金”，设立了“筹资部”。

来源：中国经营报

地址：[http://news.cb.com.cn/economy\\_9\\_12678\\_1.html](http://news.cb.com.cn/economy_9_12678_1.html)

[【返回目录】](#)

## 青年环境评论：警惕第三部门越来越大公民社会却越来越小

【大多数群众】你在哪里：10 日上午，昆明市政府就中石油安宁炼化项目召开新闻发布会。昆明市长李文荣表示，关于公众关心的 PX 部分仍在研究中，将坚持走民主决策的程序，“大多数群众说上，市人民政府就决定上；大多数群众说不上，市人民政府就决定不上”。（@中国新闻网）

【知识产权】禾邻社和万科公益基金会的事儿还没完：公益机构禾邻社 4 月曾在微博发表声明：万科公益基金会违约，机构发起人卢璐曾表示，4 月 17 日是禾邻社为沟通定下的最后期限，若仍未得到满意答复，18 日禾邻社将正式启动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沈彬 4 月 17 日下午接受采访时则明确表示：对此事的处理方式，万科基金会坚持致歉信的原则与表述，不会更改，但会保持与禾邻社的良好沟通。

在其后近一个月时间的沟通中，禾邻社仍未得到满意的答复，5 月 9 日，卢璐在对记者表示：“我们大概会在下周起诉。”（@京华时报）

【地下排污】在山东省 14 家企业的名单中，山东省潍坊市出现了三家：5 月 9 日，环保部公布了华北平原排污企业地下水污染专项检查情况，其中 55 家企业存在利用渗井渗坑或无防渗漏设施的沟渠和坑塘排放、输送、储存污水的违法问题。

在山东省 14 家企业的名单中，山东省潍坊市出现了三家，而在今年 2 月，网友爆料潍坊多个化工厂、造纸厂将高浓度工业废水通过了高压水井偷排到地下 1000 多米的水层。当时潍坊方面曾进行过排查并信誓旦旦地说，在潍坊市境内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没有发现这样的企业。（@中国广播网）

【土壤排毒】重新修订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由环保部牵头，国家发改委、国土部、工信部、农

业部等八部委联合制定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初稿已经完成，未来几年，我国将重新修订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并建立包括农用地、工业用地和城市居住类用地等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

中国土壤污染主要集中在农村农田污染和城市工业用地污染，仅仅是农地污染方面，2010年全国被污染的农地就占到耕地总面积的1/5，至于全国性的土壤污染面积到底有多大，目前只有环保部、国土部等方面掌握较为具体的数据。

从2006年到2010年，环保部曾会同国土部首次对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做了大规模的调研。在本次调研结束之前，环保部一位副部长曾公开承诺，等到结果出来，将在第一时间对外公布，但在调研结束之后，环保部对外界的说法变成，全国土壤污染调查数据属于国家秘密，不能对外公开。国土部对此更是讳莫如深。（@经济观察报）

**【公民社会】**第三部门越来越大，公民社会却越来越小：问：这两年提“社会建设”，用“社会组织”来代替“NGO”，用“社会建设”来代替“公民社会”。你怎么看？

陈健民（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政府对这个领域采取比较正面的态度，但我们最担心的是第三部门越来越大，公民社会却越来越小。什么意思？第三部门的传统概念是说提供服务，可是公民社会它不单单是提供服务的，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监督政府。如果只是提供服务，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事业单位，根本就没有完成公民社会的使命。现在要警惕这个过程。（@中国财富）

**【利益捆绑】**管理层“持股”适用于公益行业吗：商业的本质就是“逐利”的，公益的本质是“逐誉”的。所以，提到“利益绑定”的概念时，商业组织必然是通过股份等实现真实利益的捆绑，而与公益组织做“利益绑定”，则更多地应该从“声誉”的角度理解。而这个“声誉”指的是相关人对于公益事业的真正投入以及贡献，这里面包含了时间付出、金钱付出、专业付出等多方面。这样的“声誉”在一些由公众人物来创立的公益项目或机构中尤其重要，因为核心人的“声誉”直接关系到项目或机构的发展。（@公益时报）

**【课税】**对基金会收所得税，是让你做不大；用免税资格制约专业化发展，是让你做不好：基金会用捐款做慈善，是民间公益；政府用税收做公共服务，是政府公益。既然都是做公益，难道非得把基金会的钱全收到政府口袋里才好使吗？前者是私人掏钱做善事，给社会带来的精神道德价值远在金钱之上；后者需要纳税人供养公职人员，还要花销大量三公经费。成本和收益孰高孰低？（@徐永光）

**【行动】**根本的推动力量，来自人们有意识的选择和行动：在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中，“行动”成为最重要的分析概念。复杂市场的形成，其根本的推动力量，来自人们有意识的选择和行动。将米塞斯的“行动”概念，用于公民社会的形成，机理大概相同于行动之于市场的作用。不过在呼吁行动的同时，还强调思考与行动的关系。思考是行动的前提，思考伴随着行动。

(@财新网)

【孵化园】落空的公益孵化器：谈起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的问题，徐启智认为，中国大部分的社会资源依然掌握在“存量”也就是政府的手中，并寄希望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成立之初，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几经努力，并没有建立起他想要的那种对等的伙伴关系，最后不得不黯然离开。（@中国财富）

【灰色地带】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非营利组织公共利益科学中心 3 月份公布的一份报告说，汽水公司的慈善捐赠对象本来是有可能对这个行业持强烈批评态度的。比如报告声称，该行业向“食品研究与行动中心” (Food Research and Action Center)、“养活美国” (Feeding America) 的捐赠，就导致有人对这两大反饥饿组织“与食品饮料企业的长久关系”提出了质疑。部分公众健康代言团体说，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这种关系有可能构建出一个充满利益冲突的灰色地带。（@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左倾】中国公益界的“左倾”怪现象：在公益的语境下，“右”往往指的是通过商业行为来施公益之实，商业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益实体财务的自给自足，以及在这个能力基础上的事业扩展性。目前流行在公益行业的“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企业”的说法就基本属于偏右走但不离公益主线的新理念。反过来说，“左”的思维当然也不难理解，基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公益机构，还是从业个人，都不可以和商业有任何干系，也不应该把收入或薪酬纳入自己的追求范围。（@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来源：青年环境评论

地址：<http://www.greenyouth.org/page/?id=1177>

[【返回目录】](#)

## 华尔街日报：中国公益界的“左倾”怪现象

邓小平在 1992 年南巡讲话中提出一个明确的论点：“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国内的公益圈子里浸淫了一段时间，我个人的感受是这个尚显稚嫩的行业亦有左倾右倾之分，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思维，而且极左的思维对中国公益事业的长足发展弊大于利。所以，从这个角度说，邓公的话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公益界。

在公益的语境下，“右”往往指的是通过商业行为来施公益之实，商业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

益实体财务的自给自足，以及在这个能力基础上的事业扩展性。目前流行在公益行业的“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企业”的说法就基本属于偏右走但不离公益主线的新理念。反过来说，“左”的思维当然也不难理解，基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公益机构，还是从业个人，都不可以和商业有任何干系，也不应该把收入或薪酬纳入自己的追求范围。

凭心而论，这种“左”的心态在公益事业相对成熟的欧美国家也同样存在。Dan Pallotta 是美国知名的 NGO 倡导者和募捐人，他在今年三月的一次演讲中就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公益的思维方式大错特错”，在美国存在一种双重标准，即对非赢利性组织和赢利性机构的工作有不公正的区别对待。对赢利性公司的评判一般建立在业务增长和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对非赢利性组织的衡量标准则有些偏颇，工作质量和效果往往不是首要的考量因素，管理和运营成本的多少反而成了被关注的焦点。

记得去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公益论坛，曾听到一位微博大 V 大发评论，基本意思是美国从事公益的人不讲报酬，完全是出于做善事的热情才投身这个行业。我想这位老兄当时可能把公益和义工这两个概念搞混了，义工的确是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帮助别人，通常不计报酬，但美国从事公益的职业人还是要吃饭的。后来，同事和一位南方的企业家开会，告诉他我们的公益平台有一支专职团队，这位老板听后大跌眼镜，半天没回过神来，说才知道做公益还有全职一说。和欧美相比，国内公益知识结构的不完整及认知的不充分其实也是促成左派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多跨国公司在华设有企业社会责任部门(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负责支持一些在中国当地的公益组织和项目。按道理说，在类似机构做这种工作的人应该对公益的认知相对更到位，但个人经验告诉我未必尽然。由于不少跨国公司 CSR 部门的高级白领自身缺少在国内草根 NGO 摸爬滚打的经验，所以有时候看问题不接地气，思维方式同样容易向左偏斜。我知道的一个公益项目最近递交了项目预算，虽然项目团队的薪水已经减了又减，平均月薪勉强超过北京路边餐馆招聘服务员水平，但年薪几十万的 CSR 经理依然纠缠不休。

我至今对数年前一位校友的公益从业经验分享记忆犹新，她当时提到除了政策和自身的原因以外，国内的“丈母娘经济”其实是各类 NGO 性质的公益组织难以吸引到优秀人才的重要障碍：年轻人搞对象，如果男方在公益机构工作，尤其是草根的民间组织，个人又不是已然余生吃喝不愁的富二代，未来的丈母娘几乎都会毫无悬念地大加反对。正式进入公益界后，我发现这样活生生的例子身边比比皆是，把赢利作为目标之一的影响力投资领域由于在薪酬方面无法和传统的投资行业比肩也在劫难逃。

当然，类似郭美美事件和红十字会现象也是公益组织的管理费乃至薪酬容易触动大众神经的原始驱动力。这些我称为极右的现象，即以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无疑是公益的支持者出于自身保护需

要而思维偏左的又一中国特色原因。不过，虽然中国的公益人要随时警惕极右，从长远的角度看，他们需要意识到，极右可以葬送中国的公益事业，极左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任何因噎废食的态度，都有可能推动公益界整体思维向极左或极右偏斜，但左倾的隐性风险和长期危害要大于容易被辨识的极右风险。

对于中国的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而言，商业意识和执行力的不足依然是这个行业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另外，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对报酬的态度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谈到个人收入的时候，也许是受行业左倾思潮的影响，公益界目前整体的态度还是较为闪烁，有时甚至无谓的扭捏。收入最大化当然不应是公益人的驱动力，但这个行业需要有合理和竞争性的薪酬制度才能吸引到更多更好的人才，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保证行业长期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右倾的路线错误固然不容忽视，但后来的左倾错误因为蔑视人性特点，破坏性更大，而且持续性更强。同理，中国公益界的左倾怪现象也需要特别警惕。

来源：华尔街日报

地址：<http://cn.wsj.com/gb/20130515/ZHT070921.asp>

[【返回目录】](#)

## 中国公益慈善网：社会组织如何获得政府“订单”

5月20日，在“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首期培训课堂上，北京市民政局慈善工作处处长、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程立岩指出，政府购买服务是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重要举措，能加强社会管理、社会创新和社会建设，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她还针对社会组织如何获得政府“订单”，提供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她指出，首先，社会组织应该仔细研究购买服务的相关文件。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文件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对于申请流程、提交资料的方式、各阶段截止日期、购买服务方向、资金使用要求等已经在指导文件中进行明确说明的，要避免忽视和遗漏，从而错失申请的机会。

其次，应确定“有亮点”的服务项目，如选择政府和社会公众现阶段比较关注的人群和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申请项目的服务人群、服务内容具有鲜明特点，项目模式具有创新性。

第三，“老项目”应该有“新内容”。对于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的项目，如果在申请时能够明确，此次申请资金将用于项目的一个新的阶段，可能会更加凸显申请资金支持的重要性，获得购买的几率可能会提升。

此外，项目申请书的文字应简洁、清晰、易懂。如果有一些专业术语，应加以解释，避免评审不解其意。在分析问题和阐述预期成果时，应多用一些数据，这样更能够帮助评审理解项目的意义。最后，她强调，项目申请书提交后，如社会组织被申报机构要求补充其他资料，应做到反馈及时、准确。

来源：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中国公益慈善网）

地址：

<http://www.charity.gov.cn/fsm/sites/newmain/preview1.jsp?ColumnID=362&TID=2013052122241665431>

[5380](#)

[【返回目录】](#)

## 慈讯网：如何才能发展慈善超市

慈善超市，也称慈善商店，国内还有阳光超市、扶贫超市、爱心超市等多种称呼。对慈善超市，学界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国外的慈善超市通常指由以救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为终极目标而组织、经营和管理的非营利性零售机构。

慈善超市，也称慈善商店，国内还有阳光超市、扶贫超市、爱心超市等多种称呼。对慈善超市，学界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国外的慈善超市通常指由以救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为终极目标而组织、经营和管理的非营利性零售机构。国内的慈善超市通常是指在政府支持下，为解决困难群体临时生活问题为目的，以领用券为兑换凭证等形式，由各类组织严格限于慈善目的而开办的超市。

有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0 年年底，国内共有 8000 余家慈善超市，但绝大部分是在政府主导下自上而下设立的，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从组织形式角度划分，慈善超市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由社区中心或街道开办，占比例最大；第二种是由民政部门与社会组织联办，后者负责日常管理，常见的有市慈善总会、工会、社会企业和非营利社会团体等；第三种是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最后一种则由民政部门直接创办。

此外，国内已开始涌现出一些草根性质的慈善商店，如北京务工青年孙恒的同心互惠公益商店就是其中的代表，形式是接受捐赠衣服，再低价售卖给工友，其营收用于经营和其他公益项目。但这种民间自发的慈善超市并不活跃，因其难以注册成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只能登记为企业或者个体户，若不登记则沦为“黑户”。

国内慈善超市的经营情况存在差异性，但是，设立受捐站并再度售卖，商品售卖以救助低保户、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为主，这是各地慈善超市的共性。

在慈善事业发达的欧美，慈善超市大多由非营利组织创办，以法人身份注册，可注册成有限公司或选择其他形式。接下来可申请免税，政府会根据慈善目的进行判断以提供适当的税收优惠。

从形式上看，欧美的慈善商店十分多样化。有些类似于中国的慈善超市，上架商品均是受捐物资，经过洗涤、整理等加工处理；产品一般比较低端，因为免税而价格低廉，面向所有人开放；消费群体多是低收入者。还有些慈善商店如食物银行，则是收集商场即将过期的食物分发给穷人，这种食物银行在美国非常普遍。欧美慈善超市对于经营收入的要求，主要取决于其法律的税收登记地位，具有免税资格的组织，其收益是不可以分配的，经营所得依然应该用于慈善目的；如果不是免税登记的组织，则没有严格的法律限制。

反观国内的慈善超市，则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政府主导色彩浓厚，效率、效果有限。它一般自上而下建立，没有考虑当地的实际需求，同时又被政府附加了多重目的，如将部分行政职能下放到慈善超市，或通过低保户等身份界定需求，定位容易出现偏差。

国内慈善超市之所以尚未发展成熟，主要是由于中国缺少成熟的市场，没有大量的闲置物资，也没有大量的需求与之对接，而即便有需求，也很分散，可通过国家救助等途径解决。同时，全社会也缺乏捐赠的文化意识，比如在中国就办不成食物银行，因为商家一般会通过促销或重新贴标签处理要过期的食品。

要想让慈善超市更好地发展，政府用行政体制吸收和分配社会资源应逐渐退出，通过市场调节需求。政策上，政府对慈善超市给予税收优惠等支持，但不应以行政方式去做慈善；应给予慈善超市独立法人地位，使之成为真正的责权主体。

来源：慈讯网

地址：<http://www.icixun.com/2013/0522/1115.html>

[【返回目录】](#)

## 创思客：盛名之下，其心也善——明星救贫穷可行性报告

Why poverty 纪录片第五集——give us the money，又名摇滚救贫穷，讲述的是摇滚明星 Bono 和 Bob Geldof 自 1985 年以来为减轻非洲极端贫穷所做的社会活动，包括 1985 年和 2005 年联合其他明星举办的大型慈善筹款演出，游说政客减轻非洲国家巨额债务，创立基金会及 NGO 等。明星也

能救贫穷？他们不是作秀娱乐大众的吗？可以说明星参与的慈善活动不免被染上一点娱乐色彩，但也让平素乏人问津的社会问题进入公众视线。Bono 及 Bob Geldof 为非洲贫困所作的努力，吸引了数十亿人的关注，筹得数亿的善款，还惊动了各国政经界要一起参与针对非洲的扶贫工作。如果说一个人改变世界的力量是有限的，那么明星们无疑拥有更大的力量，因为他们的人脉与号召力，让这一个人的声音可以传达到很远。于是靠明星来救贫穷，似乎是一个可行的出路。本文列举 Bono 和李连杰两位明星的例子，不为倡导个人崇拜，只希望简略呈现明星参与公益活动的面貌，及它与我我的关系。

### 西方代表：Bono

#### Bono 是谁？

你也许知道他是叱咤歌坛 30 多年的 U2 乐队的灵魂人物，一名来自爱尔兰的真汉子。但在歌手之外，他还是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因为在非洲贫困问题上的贡献，他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被称为“融合慈善的面孔”（the face of fusion philanthropy）。

#### Bono 做了什么？

音乐之外，Bono 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所作的针对非洲的扶贫活动，包括他创立或共同创立、发起的 DATA, EDUN, the ONE campaign 及 ProductRed 等组织和活动。

一切起源于 1985 年。他与 U2 乐队参加 Live Aid 大型慈善演唱会之后前往埃塞尔比亚，当地极端的贫困情况让他受到了强大的震撼。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盲点是什么？也许就是我们心灵深处不愿相信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简单的事。（What are the blind spots of our age? It might be something as simple as our deep-down refusal to believe that every human life has equal worth.）在这样的心灵触动下，他说：我想做点什么，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我一定要做点什么。于是他交出了这样一份行动记录：

2002 年，他创办了 DATA (debt, AIDS, trade, Africa) 组织，这个组织之后变身为拥有超过三百万名会员的 ONE 组织。它鼓励每一名会员同政府官员联系，向政府施压以改善针对赤贫国家的政策。2005 年，他和妻子 Ali Hewson 创办 EDUN 这个全球服装品牌，在非洲采购、生产服装，旨在将非洲的关注点从援助转移至贸易。EDUN 希望利用在非洲的工厂为工人们提供工作机会及合理的薪资并建立良好的商业伦理模范以吸引投资。

2005 年，Bono 参加 G8 会议，用《时代周刊》的话说，他用魅力感染，用言语威胁，甚至在精神上恐吓 (charmed and bullied and morally blackmailed) 全世界最富有的 8 个国家的领导人，让他们签署减免非洲贫穷国家共计 4000 亿美元债务的承诺，这样非洲国家可以将这些钱用于医疗和教育建设而不是偿还高额的利息。

2006 年，他发起了 RED 活动，吸引私营企业参与抵抗艾滋病运动。RED 的合作方（例如 Apple, Converse, Motorola, Microsoft, Dell 等）可以出售名为 Product Red 的产品，他们将 RED 品牌商品的一部分利润直接捐给 Global Fund 来对抗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病。短短 6 年里 RED 已提供 2 亿美元的捐款，全部用于 HIV/AIDS 项目以消除 HIV 病毒的母婴传播。截止目前，RED 已经通过教育、治疗、咨询、测试项目帮助超过 1400 万非洲人民。

### Bono 的影响力

Bono 超越了一般明星创立基金会、筹款、义演、担任亲善大使等常规的参与慈善的方式，因为他不仅影响歌迷或者一般民众，还同各国政要、商界大贾、宗教领袖取得联系，希望通过影响各界领袖来达到更大的效率。他曾向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及乔治·布什游说针对非洲的捐助方案，说服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同比尔·盖茨，甚至教皇保罗二世合作消除非洲贫困的项目。他成功地将自己理想主义的救世梦想，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向政经界的伙伴们传达，让这些领域有影响力的人们共同参与减轻贫困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为此他被美国的 National Journal 杂志称为最具政治效率的明星。

这十多年为非洲贫困东奔西跑的生活为 Bono 带来了许多荣誉，例如 2005 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2005 年的 TED prize 等等。他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却在 2008 年被诺贝尔获奖者们授予年度和平使者称号（man of peace）。

TED 奖给 Bono 的颁奖词是：作为 U2 乐队的主唱，他利用自己的名气同世界范围内的公平而战，以实现消除特别是在非洲的饥饿、疾病和贫穷的目的。他创办的 ONE 组织通过媒体、政策提高了全民的意识，并呼吁采取广泛的行动。顶着摇滚乐手的头衔，Bono 很容易就被认为是作秀，“不过是一个负疚的白人缠着人们要钱却不管这些钱最后去了哪里”。但他以风趣、随性的娱乐精神吸引人，同时又以列举数字和事实的认真、细致的态度说服人。在名为《The good news on poverty》的 Ted Talk 里，Bono 介绍了过去几年内非洲极端贫困情况的改善：近 800 万人接受抗艾滋病药物治疗，在 8 个目标国家里，疟疾的死亡率减半，5000 多万儿童进入学校，疫苗注射挽救了 540 万人的性命。1990 到 2000 年极端贫困率（日收入小于 1.25 美元）从 43%降低到 33%，至 2010 年，这一比例降到 21%。这枚军功章里，有 Bono 的一点功劳。

此外 Bono 对非洲极端贫困问题有自己的深刻理解。在慈善义演成功筹款之后，他和 Bob Geldof 发现非洲债务这一影响发展的巨大障碍，于是竭力说服大国们减免非洲的债务。并希望从公平贸易这个角度更彻底地改善非洲发展。最后，他希望非洲人民能够获得独立站稳的力量。在援助之外，非洲能够建立起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从而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在纪录片的最后 Bono 说：如果有一天，非洲人民对我说，滚开吧，我们不需要你了，那我会很开心地滚开的，那时候我的使

命就完成了。

虽然 Bono 的行为受到多方赞誉，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少。一位非洲女孩说，他让全世界只记住了非洲积贫积弱的一面，例如“一分钟就有两个非洲儿童死于疟疾，一个妇女死于孕期内，9 个人感染艾滋病，3 个人死于肺结核”这样可怕的画面，但这并不是非洲全部的样子。而非洲草根组织表示，Bono 这样的明星并不真正了解非洲，这些摇滚明星过于自大，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可在 G8 峰会上达成的减免债务和援助加倍的条款并不能真正让非洲人民受益，如果没有实现公平贸易方面的进步，那这次峰会的努力就是失败的。非洲援助行动（AfricanAid Action）的主席 Jobs Selasie 说，外界的援助助长了非洲政府的腐败和依赖性。外界对非洲的援助从未停止，但它们收效甚微是因为活动家们、慈善组织和政府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案，并且把非洲企业家和草根组织排出在外。改变只可能从内部发生，光靠援助是无法终止贫困的。就像 Bono 自己说的那样，援助非洲不是一个明星标榜的事业，而是一个世界级的危机。这个危机的复杂程度远超一般热心人士的想象。如何在热血之外真正把慈善落实到惠及非洲人民的身上，而不仅是明星们自恋式的博爱主义（narcissistic philanthropy），是众多关注非洲的明星，所需要思考和改进的。

Bono 所演唱的公益歌曲：

《do they know it' s Christmas》 by Band Aid

《Don' t GiveUp (Africa)》 by Alicia Keys & Bono

《stranded (Haiti mon amour)》 by Bono, Jay-z, Rihanna

**中国代表：李连杰**

**李连杰是谁：**

他是功夫皇帝，是佛教徒，是好莱坞影迷口中的 Jet Li。2007 年，他有了个全新的身份——“壹基金”计划发起人。

**李连杰做了什么？**

2004 年 12 月 25 日，李连杰和家人在马尔代夫海啸中险些丧命。此后作为佛教徒的他生死和福祸有了新的认识。他说，世界上最利的武器是笑容而最大的能量是爱。他相信每个人的爱，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因此他产生了“壹基金”计划的想法。两年后他在博客里写道：我拍过三十多部电影，我知道怎么拍电影，但搞慈善基金会是真没经验。真心希望大家朋友一起来帮忙，我们共同努力，把这个计划像孩子一样一点点养大。

2007 年，李连杰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合作设立“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以独立运作的慈善计划和专案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开展公益事业。在李连杰的明星效应下，壹基金计划正式启动才一个月已有三百多个演艺界、体育界的义工，李连杰称“这并不是钱的问题，是一份大爱。”在明

星、奥运冠军等名流的支持之外，李连杰更希望调动每一个人的参与热情。“不管你是哪儿的朋友，也许你来自全世界各地，在我的思维里都是一家人。”这是李连杰一直强调的“一家人”的概念。每一位参与“壹基金”的人也因此成为“壹基金”的家人。壹基金强调“一个人，一个月，最低一块钱，我们是一个家，1+1+1=1”。李连杰希望通过这种小额的捐赠达到最大的动员力。“我一直的理念是不在于多和少，在于一颗心。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万个基金关注各种不同问题。我关注和发起的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做，积少成多。我一直坚信，就算是百亿、千亿富翁，捐出所有的钱也没法改变所有的贫困。所以我们要自己帮自己，每人参与一点点，一点点火，别人加点柴，再加点火，再加一点柴，就会烧出一个爱的火。”这样的理念在李连杰的博客及公开讲话中，随处可见。

2010 年 12 月 3 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在深圳注册成立，是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以“尽我所能，人人公益”为愿景，专注于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公益人才培养三大公益领域。自壹基金创立起来，李连杰已经参与 7 次灾难重建工作。2008 年汶川地震后，壹基金捐款 100 万元，各位家人向壹基金捐款几千万，还有众多壹基金的家人和专家义工加入救助。之后的两年时间，壹基金在四川启动了羌绣帮扶计划、修建茂县黑虎小学、援建阿坝州儿童福利院、修建彭州垃圾分拣站等近 30 个灾后重建项目。2008 年，壹基金计划荣获中国民政部颁发的 2008 年度“中华慈善奖”。在儿童关怀方面，壹基金发起“海洋天堂计划”联合全国范围的民间服务机构形成网络工作模式，为脑瘫、自闭症、罕见病等贫困的特殊类型儿童提供救助，联合企业、研究机构与民间机构进行公众宣传与社会倡导，促进国家对特殊类型儿童的关注与政策支持，以帮助他们在确保其尊严、促进其自立、有利于其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下享有充实而适当的生活。在公益人才培养方面，2010 年北师大与壹基金合建成立了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并开始招收 EMPA 生。研究院的院长是前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王振耀先生。

在三大领域之外，壹基金还同各机构合作，推广公益项目。目前，壹基金有 24 个签署正式捐赠协议的爱心合作伙伴，18 个无偿提供财务、法律、市场等服务的专业合作伙伴，52 个无偿提供宣传的推广合作伙伴，42 个共同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公益合作伙伴。2009 年 8 月 23 日，气候组织(TheClimate Group)联手壹基金在贵阳共同启动了“太阳能 LED 照明千村计划”太阳能 LED 千村计划为期五年，项目的前两年将涉及中国的 400 个村庄。在接下来的三年项目将推广到包括中国、印度和非洲一些国家在内的 600 个村庄。

壹基金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民间基金会，也可能是最为民众知晓的基金会。这与李连杰自身的名气和广大的人脉资源是分不开的，也是他自 2005 年起将工作中心转移到慈善领域，为此四处奔走呼吁的结果。李连杰因壹基金而登上了《时代杂志》亚洲版 2008 年 12 期的封面。

由成立“壹基金计划”到成立拥有专业工作团队的上海壹基金，再到深圳壹基金的成立，有人

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形容。可以说壹基金进入了“三生万物的阶段”，李连杰希望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下，壹基金能激发更多的爱心，成为一个能够维系亿万中国人，良性运转的公益组织，让基金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完善，公正、透明的走下去。

### 论明星救贫穷的可行性

明星参与公益活动近些年来已不是新鲜事。国内如王菲、李冰冰、成龙、姚明，国外如安吉丽娜·朱莉、布拉德·皮特、迈克尔·杰克逊、奥黛丽·赫本等名字，都烙上了“慈善”的印记。一方面明星有巨大的有形资产财富，可以直接提供金钱上的援助。另一方面明星有巨大的号召力这一无形资产，吸引眼球，提升公益活动的知名度不说，也能调动广大的“粉丝”出钱出力。以 Bono 为例，试问如果不是有大明星的光环，多少人愿意在为感染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救助、倡导富裕国家减免贫穷国家债务甚而推进全球公平贸易这样的活动上停留目光呢？Make it loud and sexy，是明星对针对救贫穷的慈善活动最大的帮助。在笔者进行的“关于个人参与慈善行为及明星的影响力的调查问卷”中，94%的调查者认为明星参与慈善事业有正面影响，扩大了慈善组织关注度和知名度。相比美国等西方国家已有 100 多年历史的慈善事业，中国的慈善事业仅在近 20 年内得到发展，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调查中，有 68%的调查者将对中国的慈善组织不信任列为不关注慈善活动的原因。明星的正面形象，也许可以为许多观望的群众，打一剂强心针。

然而明星参与公益活动也引起不少质疑。作秀的嫌疑、不良形象带来的坏影响、因为个人的花边新闻模糊做慈善的焦点等都是问题。此外明星毕竟不是专业人员，在一片热心之外，是否能有效地办好事值得人们打一个问号。慈善组织的人说，明星参与慈善活动对非营利组织来说有喜有忧。明星能唤起更多人的意识，但一旦他们陷入私人的麻烦，慈善组织也会受到牵连。有些人做贡献的方式就是举办大型宴会，结果举办这样的活动几乎花光所有的钱。明星都会考虑什么样的事业符合他们的形象，医保改革等复杂的问题不如反对宠物养殖场那样的立场有用。

但就像一位慈善基金会负责人说的，“我承认现在的明星慈善活动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洁白无暇，但如果明星捐出十万美元，每个民众能够相应地捐出 10 美元，那就意味着我们没有白费苦心。只要善款最终切实发挥作用，谁还会在乎款项募集的手段。”

说到底，明星参与公益活动，如果要达到成效，依靠的还是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也许就是 Bono 和李连杰的组织都名为 One 的原因。在调查中，91%的调查者表示知道“壹基金”，其中却只有 30%的人表示会参与。大部分的人选择了“嫌麻烦”和“不知道如何参与”作为不参与“壹基金”计划的原因。但实际上壹基金的官方网站上列出了多达 7 种的捐赠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这个发现揭示了由明星推动公益活动的一个困境，知晓度与参与度之间，往往还存在差距。如何让更多的民众从“知道”到“行动”到“主动行动”，关系到国民教育、慈善事业的推广普及等各层面，只

靠明星的露面呼吁，是远不够的。

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改变整个世界，那么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什么呢？至少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对远方的贫穷和灾难漠然的心，改变心底对不平等的现状事不关己的态度。一个人的力量很小，很多个一个人的力量很大。如果我们想要改变世界，就从改变自己开始吧。Make it happen, 消除贫困与社会不公平，从你我开始。

来源：创思客

地址：<http://www.thinker360.com/page/3770>

[【返回目录】](#)

## 民间力量成长：公信力是王道

“郭美美”等事件引发人们对公益组织严重信任危机，余波未了。两年间，新的基金会崛起，官方背景的公益老牌基金会求变。作为后起之秀，壹基金如何把“透明”进行到底？作为公认的赢得公信力的扶贫基金会，如何在雅安救灾中把握改革步伐？

“4·20”芦山地震，壹基金和中国扶贫基金会成为最受网友关注的两家基金会。5月16日下午，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壹基金传播部总监姚遥，公益学者邓国胜等共聚最公益讲堂，探讨“从汶川到雅安：灾害救助的民间力量”姚遥认为“不是人们有多么喜欢壹基金，而是可选择的太少”。刘文奎分享了“扶贫基金会之变，从自己成为灾民，到如何构建一支专业化救灾队伍”。邓国胜老师从学者角度做了精彩点评。以下为现场讨论实录：

### **姚遥：不是人们有多么喜欢壹基金，而是可选择的太少**

姚遥：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公益老大哥，很早就在专业化道路上做了探索，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壹基金发展历史虽然比较早，但真正成型发展是2010年取得独立公募资格后，开始在专业化方向走得更快一些。

壹基金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被很多人知道，非常幸运。我先讲一个玩笑话，庐山地震时，杨鹏秘书长天天坚守在最前线，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一天媒体采访时间他：“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壹基金？”疲惫之余，秘书长说了句“老百姓喜欢我们吧。”，第二天这句话成为媒体的头条大标题公布出来，变成“壹基金说，老百姓喜欢我们。”后来有另外一篇评论报道说：不是我们喜欢你，而是可选择的太少，我们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取得一些成果的同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反思和优化。壹基金要不断发展、进步和完善自己，更加专业化，得到大家的信任。

这次救灾，壹基金捐款人次达到近 500 万人，在壹基金的历史上都是破记录的。当然我们在工作投入上也是创记录的。芦山地震中，我们建立 14 支救援队，联合 47 家合作伙伴，投入前线的壹基金工作人员 16 人，和合作伙伴一起包括救援联盟、联合救灾超过 200 人，发动志愿者 800 人。有了这么多的人力和组织才可以完成在芦山地震运进一百多车物资以及保障其它零零碎碎的各种事务顺利进展。

地震结束后，我反思为什么这次地震中壹基金关注度比较高？我想可能是在民间救灾中壹基金回应了五个问题：

一是参与问题。一方面，从动员式定点捐款到多渠道便捷参与。汶川地震期间，绝大部分捐款是动员式的或者单位体制的，大家集体捐，可选择的渠道比较少，参与的通道主要通过手机短信。现在我们解决了参与通道问题，利用比如支付宝、财富通、网络微公益等，包括最传统的邮政汇款等方式，多渠道参与。

另一方面，解决志愿者参与热情问题。汶川地震时大量志愿者涌入，场面很混乱，无法有效工作反倒带来更多问题。这次我们通过组织化消费了个人参与问题，最终动员了 800 名志愿者，分检了和检验了两百万个包裹，将一个一个包拆开，看日期，分检食品、药品、水、帐篷、电器、衣物等，然后配发下去。通过组织化解决参与问题。

二是壹基金回应了救灾中制度化、专业化的参与问题。比如救援联盟，我在前线遇到河南救援联盟的下车情况，感觉跟特种部队一样：首先是保护自己的装备，其次是轻型的绳索等搜救和相关的装备。我们是轻型救援队，轻型救援里的准专业水准。对于物资发放，技术平台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壹基金每天有人做现场评估，然后发给后方，我们在成都有一个采购小组，第一天完成评估，晚上发给采购小组采购，然后发货，第二天可以开始物资发放，有效解决物资延时问题。灾区物资需求变化太快，快到难以想象。专业化背后需要有经验，救援队第一时间往芦山跑，成都工作人员走得比较早，提前进入震中，其他地方的工作人员因各方面问题很难进去，怎么办？凭经验，因为地震绝不只是震中，所以他们去了震中周边区域，在那里采集到消息，把消息发给成都，成都采购物资，第二天在上里进行发放。央视新闻在微博上说，天全县缺少大量的物资。其实我们在媒体发现前就开始做了，并且第三天开始发放物资。

三是透明问题。壹基金每天都发一篇救灾日志反馈救灾行动。而且所有物资都是我们自己亲自去发的，因为老百姓信任度很低，我给你的钱只能由你发，交给别人发我不放心，所以所有物资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跟到村、跟到户发放，解决老百姓对你信任的问题。

四是公平问题。中国老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一袋米分不平肯定要打架。我们在社区工作时，做好细节问题，比如把大米拆开包后，一人称十斤半，桶装的油，用矿泉水瓶分装，按人头领，解

决公平问题。

五是发展问题。人们在救灾时第一想到的是矿泉水，第二是方便面。方便面可以应急吃，但天天吃是不行的，作为中国人正常吃的是大米饭，这是饮食习惯和健康所需要的。所以在我们自己采购的物品里，一直坚持大米和食用油，没有方便面，都是很多爱心老百姓通过包裹发给我们方便面，我们作为临时补给发了下去。

最后，我要说三个感谢。第一要感谢大家的信任与支持；壹基金很幸运，民政部第一次没有指定基金会接受捐款，大家才有可能选择我们。第二要感谢自媒体平台，壹基金很注重自媒体平台，比如腾讯微博 300 多万的观众关注，这是我们自己发布消息的一个很好的平台。第三要感谢腾讯乐捐等新技术网络捐款平台。腾讯 35 万人次超过 1500 万元的捐款，新技术平台的搭建，让我们接受公众的捐赠带来了更多机会。壹基金很幸运赶上了形势。

主持人：壹基金可以说是生逢其时。虎嗅有一篇文章《幼年壹基金：捐款多信任重，要 Hold 住》，这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希望你们用好这份信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这方面有更丰富的经验，请刘老师讲中国扶贫基金会是怎么做的。

### **刘文奎：扶贫之变，从狼狈的灾民到专业化救助**

刘文奎：今天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救灾项目成立 10 周年，当时我们针对的不是地震，而是 1998 年大水。但 2008 年汶川地震让我们措手不及。水灾救援和地震救援不一样，比如水灾地区有房子可以住宿。可汶川地震时，我第一时间拉着拉杆箱去了，去后发现自己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没带帐篷，宾馆不能住，自己成了灾民，很狼狈，这是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汶川地震发生后，有大规模的资金和大量的物资通过各种渠道汇总到前线指挥部，有陆运、铁运、通讯，当时没有经验。一个礼拜后才摸索出流程化的东西。很狼狈。

不过从 2008 汶川地震到今年的雅安地震，我们不断摸索和总结了很多专业管理流程，包括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出发时要求带上的装备（平时有训练），先把自己个人问题解决好，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另外是物流系统，第二天就建立，各个流程组织在成都、雅安、芦山、天全、宝兴，我们工作人员在那里把自己的工作站建立起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到现在为止，我们共计筹集了 5000 万物资，加上自己采购的总共 6000 多万，目前 5000 多万物资都已发到灾民手中，剩下一部分在调运中，未来一个星期内会基本结束。

很多人问扶贫基金会救灾和其他机构有什么不同，定位是什么，为什么要做？借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第一，基金会为什么救灾？因灾致贫是导致贫困的一大原因。这次雅安 8 个县，受到灾害影响有 12 万贫困人口，因灾致贫的约 53 万人，中国扶贫基金会以“扶贫”为宗旨，对他们救援是理所

当然。救灾从哪儿入手？干什么事？一是救济救援救灾，二是过渡安置，三是灾后重建。

救济救援阶段有两件事：生命搜救和生命保障。从废墟、危难中抢救出来；抢救出来后，由于地震、水灾所有生活物品都会短缺，短缺造成的困难是一大问题。所以扶贫基金会在这阶段的定位是做生命的保障，将人从最危险的地方转移出来，提供食品、水、衣物、被褥、帐篷。

过渡安置阶段，我们简称为生命陪伴。救出来后，因灾害的巨大创伤，灾民心理会出现问题，我们会做一些心理辅导、心理干预，让他们的压力得到释放，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让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

灾后重建，根据灾区情况我们注重做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社区的基础设施恢复，主要是村组织小型的设施，比如饮水系统重建。二是生计和产业的恢复，有了房子住和基础设施——路可走，还有收入来源，扶贫基金会长期关注，也是我服务的方向。三是社区能力的建设，包括社区服务组织，公共服务的提供，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是做什么。

怎么做？用什么方法？我想有两个结合：一是经验和创新结合，我们将从汶川到玉树地震救援积累的经验很快复制到雅安的重建工作中。除了经验的复制，我们追求每一次灾害，根据最新的实践成果，把最新的理念、方法引进来，用创新的方式解决灾民的问题。最近我们评估组除了灾后评估，也开始走出去到各地去看社区恢复，社区建设，包括社区营造做得比较好的案例模式，希望把一些做得好的经验引进来。三是我们非常注重培养灾区社区的能力，要注意保护大家的积极性，在项目执行中很多项目设计都要考虑这一点。这是基金会在救灾方面的定位。

我们做很多准备，希望灾害不要来，但没有办法，灾害要来时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再加强学习、加强训练，把我们的备灾、防灾能力提高，这也是我们在灾后重建里的一个重要议题。。

### **邓国胜：公益圈吐故纳新，公信力就是王道**

邓国胜：从汶川到雅安，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在座几位就可以看出中国五年来救灾民间组织的成长。老牌 80 年代成立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成长中的壹基金，汶川地震后新成立两家 NGO：卓明信息小组和益云，中国救灾类的民间组织数量大幅度增长。这些组织有些是当年在汶川地震时做志愿者，他们慢慢学习、反思、总结，发展出一个专业的志愿者组织。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支持性组织越来越多。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基层一线做事的组织数量很多，真正最缺的历来都是支持性的组织，这种支持性的组织能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草根 NGO、基金会搭建非常好的平台，能更有效率的提升救灾的工作。

第三，我们也可以发现正是由于五年来高科技技术的不断引入，使公众参与打破了空间限制，不是每个参与救灾的人都要到前线去。高科技让我们在后方都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真正实现人人可

参与，人人可奉献。

第四，民间组织的迅猛成长。以壹基金为代表的民间组织迅猛成长和发展，说明只要政策放开，社会的活力就能得到很大的释放，壹基金是芦山地震杀出来的一匹黑马，一鸣惊人。募捐过程中现在基本稳居老大地位，募集的资金特别是现金流量最多，这说明只要给予空间，民间就会有活力。为什么壹基金有活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压力大，不是靠行政手段、垄断地位获得捐赠，而是靠自己的透明、公信力赢得捐赠人的信任，赢得社会人的捐款。所以他有压力，得自己亲自去发放、监督，否则没有办法给捐赠人交代。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组织的存在，民间公益慈善的活力由于有了竞争机制，我相信会不断成长和发展。

另一个方面，以扶贫为代表的老牌的、有官方背景的 NGO，只要改革了，照样魅力四射，充满活力。而不改革，会很难赢得公众的信任，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公众可以用脚投票。可以选择，这对其它有官方背景的公益慈善机构来说是非常好的警醒，也是非常好的榜样，为中国未来慈善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是民间组织蓬勃更多的发展，不仅需要有一个壹基金，而是需要有更多的壹基金，需要更多的民间公益慈善机构，这个领域才会更加有活力。同样也需要有官方背景的，因为他们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只要他们变革会使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更有力量。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变化，五年来扶贫基金会不断改革、不断前行，无论是在救灾透明度方面、效率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当然看到积极变化的同时，还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问题表现在：一是纯民间组织虽然学习能力很强，成长很快，但组织能力相对来说还不够高，专业化程度有待提升。

民间组织已经有很多平台，也有很多网络。比如扶贫基金会和壹基金既有救援队伍网络，也有庞大的 NGO 网络。但这些网络之间没有协调、互动、联动，网络之间很分散，没有稳定的联动接口，导致政府即便想和你们对接也很困难，因为面对这么多网络政府到底跟谁对接？比较便捷的、让民间能够有制度参与渠道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这些民间组织自己能够联动，能够形成统一的声音，这样政府才可能让你纳入进来。比如在美国，只有当救灾的 NGO 形成联合会时，政府才会打开一个空间，让你制度化的参与进来。

公众不仅要在紧急阶段参与，更重要的是在灾后重建阶段也能够积极参与进来。文奎秘书长也说到，在紧急救灾阶段 NGO 和志愿者热情、参与激情最高，但最需要的是灾后重建阶段，而这时志愿者潮水般的退去。我对汶川地震做了调研，一开始有数百万志愿者，成千上万的志愿者组织，但一年后，剩下的志愿者不到 5 万，志愿者组织不到 50 家，如潮水般退去。

最后，我想提一点，很多媒体看到这些困难的局面，看到部分公益机构做得不好，自己就勇敢从幕后到前台。这里我要奉劝一句，社会有分工，媒体要守住本位，做好自己的事，尽到媒体的责

任，不是说媒体不要去做公益，但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边界，媒体做公益，不要和其它基金会、NGO 发生竞争性的关系，你是一个支持者，是一个平台，给所有 NGO 一个公平参与的机会。谢谢

来源：腾讯网

地址：<http://cul.qq.com/a/20130520/022246.htm>

[【返回目录】](#)

## 王石：做慈善应该是全球的 李嘉诚等只局限于中国人

导读：王石称，爱国主义很容易变成民族主义，比较狭隘。中国经济过去一直是封闭的，改革开放，加入 WTO，显然仅停留在民族主义上是不够的，必须是国际主义。中国文化有局限性，香港是一个国际港，香港上一代的企业家，上至李嘉诚、邵逸夫，基本上他们的公益慈善是局限在中国人身上。就没有国际主义的成分。你如果以全球为市场，慈善公益也应该是全球性的。

### 一、你在社会的影响力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

人物周刊：你刚才提到波士顿在爆炸案后良好的组织能力，现在中国在讨论社会公共议题时，很多时候都只是基于价值观的辩论和对骂。你游学两年多了，看问题的方法论上有了哪些新的工具？

王石：why 的问题必须用 how 的方法，方法论要非常清楚。现在中国很多事情正方反方辩论，可能强调的不是一个事儿，这就没法讨论下去了。我们现在更多讲的是意识形态，是错对问题，在西方更强调方法论，中国在学术训练上非常欠缺。

人物周刊：因为有一套学术方法和工具，所以在方韩大战时你会选择支持方舟子？

王石：对。你接受不接受他的观点是另外一回事，最起码在方法论上他没有问题。我质疑你，我从方法论上证明你写的东西和你父亲的关系，这只是一种方法。

人物周刊：经历过 2008 年，你应该知道网络民意的波涛汹涌，我相信你肯定知道方舟子和韩寒都是有争议的人，你的表态会得罪很多韩寒的粉丝，而他们本来可能是支持你的。

王石：开微博和博客的目的是什么？博得更多的 fans，这是一种目的，更多时候你是用来交流的，要让别人知道你，你也知道别人。

对我来讲，2000 年之后各方面一直比较顺利，登上珠峰，企业也名气越来越大，当然你会感觉挺不错的，但 2008 那一年，网络一下子把你归零了。万科没归零，王石归零了。

虽然你登上珠峰，但你的道德高度没有坟头高，这算说得比较理性的，更多的就是骂娘。当然会有失落感，也有情绪，也会纳闷这个世界怎么回事。

互联网在中国前进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主流媒体还是有相当限制的情况下，自媒体，自我表达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消极意义。你也要认识到80后90后的情绪，那就是他们的想法。

很多人会说既然这样，我不跟你玩了，不跟你们一般见识，很多名人采取封博策略。我也可以这样选择，但我不会。我是中国最早的一批BBS斑竹，博客与微博是现代传播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你封博对你有损失，他没有什么损失。

过去有什么说什么，现在开始知道了你在社会的影响力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

人物周刊：“捐款门”算是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比想象中还大吗？

王石：“拐点论”时已经感觉到了。“拐点论”这是记者问的，我回应说认可，结果就成了王石的拐点论了。“拐点论”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言论问题，还有万科带头降价，对整个行业造成影响，上头也很在乎，这才意识到，之前想的只是洁身自好就行。

人物周刊：你之前毫不讳言，在名利之间会选择名，2008年发现你的影响力这么大，心里会有一些暗爽的感觉吗？

王石：我这人的性格，不会暗爽，我明爽。2008年，我意识到网络媒体的特点——澎湃而来，滔滔而去。你还在乎，可他说我都忘了你还在计较呢。你不能率性而说，你要从公司角度考虑这样说合适不合适，在这个时间点说合适不合适，不是说我不知道不对装着没看见，因为交流就是要表达。

方韩问题上，我不支持方舟子的观点和结果，我支持他辩论过程中使用的工具，这在中国现在非常缺。从这个角度来讲，方舟子是太缺少了，而不是太多了。他主观怎么想，那不重要。只有这么从方法论上分析，事情才能往前走一步，要不然始终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徘徊，非常可惜。

南方报业一直坚持到现在，真的就靠一天一天这样往前走。一百年之后，可能就把社会改变了，但是指望三四十年的改，那是操之过急了。我现在就是这个观点，跟你们办杂志一样，有时候你不得不讲，但有时候要讲策略。我的微博有很多动植物的信息，一个人对动物都没有怜悯，对植物不感兴趣，他对生命会感兴趣？就真的有点怀疑了。我谈植物更多是从分类学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我是启蒙，这个社会何尝不是？

人物周刊：你在做公司时一直提倡彻底学习西方，拿来主义，而中国一百多年来主题之一就是向西方学习，你在哈佛待了两年多，在你看来，国家和公司层面上，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王石：从方法论上看，至少刚开始时拿来主义是一条比较简洁的道路，但是仅仅拿来主义是不够的。因为你必须要回答你是谁，拿来主义没法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开始在哈佛认真听中国传统哲学的课，这是原来怎么都没想到的，我怎么能学这些东西呢？

因为你没法回答你是谁，所以现在还可行，但是下一步怎么办，会有问题。

我已经到了老年，人到七十古来稀嘛。按照传统社会来讲，已经到了要进入一个你随时走都很正常的年纪了，突然你发现你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你他妈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有点无知者无畏的感觉，这个反差特别特别大。到了这个年纪应该啥都知道了，什么都悟透了，人生无憾了。当然你希望再活得长点是另外一个事。你觉得人生该知道的都应该知道了，又突然发现……(摇头)

人物周刊：这是到美国才有的感受吗？

王石：对。

人物周刊：你在哈佛学习中国的传统哲学，是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王石：文化大革命我初二，古文学得不多就中断了，以后当兵，工农兵学员，工作，反倒是一直有意识地接受西方的东西，有意回避中国传统，我的家庭本身就没有传统文化的背景。以前我也很得意，没受什么污染。所以拿来主义对我没有什么障碍，原来一直把这当成个优点。

人物周刊：现在还会这么想吗？

王石：不，这是你的短缺。你没有困惑，所以才会拿来就用。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拿来主义在国家和公司两个层面来说，应该怎么看？

王石：我没有从国家角度考虑，我已经非常清楚把自己定位成企业家。企业家更多考虑的就是“匹夫有责”，有责是你怎么对这个企业负责。再扩大来讲，就是如何对行业有些影响力。如果再扩大点，我们能不能像日本战后的索尼、松下、丰田那样，不仅仅生产产品，成为畅销品牌，还能提供创业精神，对社会还有正面的影响，就到这，仅此而已。

(思考)国家怎么样，国家命运，这是我很警惕的。

人物周刊：你会思考，但是不愿意去做？

王石：中国现在就是太泛政治化，每人都扮演政治家的角色，每个人都在考虑国家的未来前途。到美国你发现，我们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了解，比他们对我们的了解强太多了。

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关心，而且应该是真正研究政治学、国际关系、国家走向这个分类的公知关心，这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当然还有政治家和领导人。

因为作为董事长，你负责的是股民、员工，和你的品牌，这会产生利益冲突。你要是还有那个情怀，先辞职。

人物周刊：那你现在还有吗？

王石：我没有。

人物周刊：这是你和过往的自己所做的切割？

王石：我现在没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儿来，但我最起码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企业家，应该有什么思维方式，最大的能量是什么。和美国一战后的那代企业家相比，我们还是要去承担社会责任，

做公益，这是分内的事。

二、万科的名声对我来讲，要比能控制它，更性命攸关

人物周刊：你在哈佛的两年半里，万科出现了安信地板、人事变动等事件，你作为董事长，怎么看？

王石：我如果不在哈佛，就不发生了吗？万科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和我登山和去哈佛没有直接关系，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和我求不求学、登不登山没有关系的。实际上我交班之后基本的大政方针都确定了，万科如何专业化，如何在转型中一步一步往前走，2005 年底我出的那本书，《道路与梦想》，我在后记上写万科已经没有故事了，你可以看着它就这样一步一步成长下去了。不是伟大公司，但已经接近伟大公司了。

到 2008 年你才发现，真正的故事还没展开呢，换句话讲，离伟大公司差远了。突发的几个大事接到一块儿，万科的团队经受考验。你也看到有些企业家交班之后又回来了，我没有。有人问如果是这种情况，你会不会回去，我说不会接手，我不是说万科一定能渡过难关，我的逻辑是我接手一两年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

如果他不行，你再维持两年，将来还是不行。如果他行，你接手只能证明你很成功，但没法证明不接手他一定是失败的。

人物周刊：但如果你在万科的股份足够多，还会这么想么？

王石：正因为我没有股份，所以更经不起挫折，如果我放手，一旦失败，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股份是我的，我想接手，随时的事儿。对不对？我放手让你玩两年，我说接就接过来，好坏股份是我的，对不对？最大损失是我，我说了算。

反而我是个职业经理人，也才万分之一的股份，这两年真坏了，就真没有机会了。换句话讲，万科的名声对我来讲，要比能控制它，更性命攸关。

一个大企业，规模五六百亿，我控股了，再不行，顶多卖掉嘛。但对我来讲，万科如果不行，我可什么都没有了，输得光光的。

说那么麻烦干嘛，万科走得怎么样？我这么放手还走得这么好，说明这本事太大了。长期玩，长期不在公司，公司还那么好，我威信还那么高，说明这是本事。

我不喜欢意识形态问题，这就是方法论的问题。我和万科的关系若即若离。若离到什么程度呢，只要大股东暗示一下，说王石，这个年纪了，对不对，你辞职不当 CEO 多少年了，这董事长你不能老当吧？你是不是给人一个机会？只要大股东有这个表态，我明天就递辞职报告。

万科是我创造的，虽然没有股份，但不能说绝对离不开万科。我可以离开。因为万科不是一个人的作品，是团队的作品。我种植的是 DNA，而不是王石的魅力。东方文化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英明的君主在是一回事，不在就稀里哗啦。王安电脑当年并不比苹果弱，但你看王安的儿子接手之后，就稀里哗啦。这是中国文化和西方很大的差别。我王石玩什么谋略？没有。

人物周刊：你说的DNA是一种什么东西？

王石：现在没法证明，因为我还在。总有一天会证明的。你不可能永存，一定会离开，这是迟早的问题。只有离开之后才能证明。

人物周刊：你一直都不否认自己和郁亮会有矛盾，而这外界特别感兴趣的，比如商业地产要不要做？

王石：媒体很喜欢找第二代和第一代之间的矛盾。我说如果一切都是顺着我，我不会用郁亮。什么都和我一致，我干嘛用郁亮呢？

第二，我希望看到他们的不同意见能把我否定，这是我的经营哲学。下面来反对我的意见，甚至把我否定，我总是以一种欣喜的心态来接受。你问我和郁亮有没有矛盾，没矛盾还有意思吗？在哪个公司，一把手和二把手没有矛盾的？都有。只不过你承认不承认，掩饰不掩饰。

有矛盾，但掩盖着，等接了班之后再把前面的全部否定，中国不都是这样吗？干嘛等着你不当董事长的时候让人家否定你？我的道理很简单，阳谋。我接受你的不同意见，一定是他有他的道理，最后能说服我，我很欣慰地看到这一点。很多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当然也不全部，如果全部的话那我作为董事长也没有价值了。我当董事长就来证明他们是对的？

人物周刊：最近一次他们证明你错的是什么事件？

王石：事后的例子了。刘爱明，我们从中海挖过来的副总裁，非常优秀，他在上海做了两年之后，郁亮就非常希望能把他调到总部，当总部的首席运营官，我当时就不同意。我的逻辑是当时调整，上海受影响最大，后来就没有同意调。结果两年后，刘爱明辞职了。事后证明，他想回来，郁亮也安排这么调动，那时候如果调动他回来的话，他不会离开的。

人物周刊：这个例子是你坚持了他们没坚持，我想知道他们坚持了而你没坚持的例子？

王石：那也太多了。往美国公司派老总，我坚持要从公司挑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他在公司受过训练，语言上没问题，又了解外国文化的。到现在，我们在美国的老总是从海外直接招聘的。

人物周刊：如果你没有到美国去游学的话，万科还会在美国和铁狮门公司合作么？

王石：那只是时间问题。作为董事长，我就坚持三点：第一要搞住宅产业化，第二精装修，第三国际化。这么多年过去了，坚持就是我的价值。除此之外基本听他们的，不听他们就证明我是错的。

住宅产业化的逻辑非常简单，万科规模经营，如何保证质量，如果没有产业化质量没法保证。住宅产业化就是要更多地用工业的方法代替手工，很多扎钢筋、灌混凝土都是手工做，现在更多来

讲是在工厂里生产好运到现场去装配。汽车全是工业化的方法，你能说失去个性了吗？搞住宅也是一样，这在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在中国，就是因为曾经劳动力过剩劳动力便宜，所以用人工成本低于用工业化的方法。消费者对质量要求不是很高，先购买，越迟买越贵，根本不关心房子质量。我相信中国的消费者一定会越来越讲品质。等到那时候，万科再产业化就来不及了。

现在我们3万人，物业管理人员2万4，管理人员差不多6000，工程师占到2500人，三分之一强。我们没有建筑公司，但我们工程师有2500人。这个企业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其他发展商根本没有意识到万科的本质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的第二坚持是精装修。在工业发达国家，毛坯房，人家听不懂，那是个半成品。但中国70%提供的是半成品，万科现在几乎是百分之百。精装修很容易出质量问题。以前顶多装个宾馆，最多四五百套房子，已经很大的单了。万科一个单就2000套，在一个大城市一年就是一万套，整个公司一年要交10万套的精装修。这在中国，装修工业配合不上，万科的压力非常非常之大。

第三点就是国际化。我去美国加速了国际化的进程。

人物周刊：你很早就主动放弃了公司的股份，2005年你的年薪才只有60万，现在你是A股年薪第一高的董事长，1560万，万科的股权激励也在进行，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王石：2005年，我们销售额才120亿，去年1400亿，这首先是规模概念。第二，2005年的ROE(净资产收益率)才多少，现在多少？

我们最好用理性工具来分析一下，逻辑很简单，当时我不觉得我的低，现在我不觉得我的高。从2005年到现在，还没有十年，但实际上万科是走了很大的弯路。在那个时候，经营规模没有万科大、经营能力也没有万科强的老总工资可能拿600万，但他们再也上不去了。为什么？他的规模上不去，黄金时间也过去了，理所当然要减少，而万科一直在增长。

万科现在对高管真正的回报是期权，工资都是小意思。但是万科发期权，既可能得到了上亿的好处，也可能颗粒无收。万科对自己人非常严苛，我们现在的期权和公司业绩、经营的增长是非常密切联系的。

我当时就值那个价。现在带承包性质的，我超过完成多少，给我提成多少，也没说给多。我们去年交税就交了140亿，这样的董事长在美国至少1400万美元。我当年就把股份放弃了，我和团队是共进退的，不能说是给我很高，下面人给很低。我跟郁亮差得不是很大，郁亮和下面差得也不是很大。我们非常坦荡，该交多少税交多少税

所以我非常同意从方法论上来把握万科，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命题。不要谈大道理，就从方法论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这样去做。

人物周刊：你刚才提到跟郁亮的关系，你交往过非常多的中国企业家，我想请你分析下什么时

候，中国的企业家能过了权谋这一关，要等到你们这一代人都退去吗？

王石：不知道。关于这方面，我是个另类，我想中国需要一百年？

人物周刊：那就不止是你这一代人过去，连我这一代人也要过去了。

王石：那当然，三代之后吧。第一，要不要改，我觉得需要。第二，更需要时间。所以急是不行的。

人物周刊：说到底还是向西方学习的一个过程。

王石：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西方的产物。短期来讲，权谋马上见效，但从长远来看是浪费资源。如果要改变文化，就相当不容易了。

### 三、红十字会要对郭美美事件有个交代

人物周刊：如果今天让你给红十字会提建议，你会说什么？

王石：红十字会是官方的，但基本是一个国际的非盈利的 NGO 组织，和传统的那种完全是官方派生出来的 NGO 有很大不同。它的作用非常大，它的能量、覆盖率、扮演的角色，是没法取代的，而且还是国际上的联盟。如何取信，很简单，透明度。

人物周刊：5 年过去了，似乎改变不大？

王石：现在还要说透明度，再有就是要对郭美美事件有个交代。红十字会的组织系统和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用，是中国的损失，这应该是非常明确的。

人物周刊：我们也希望红会采购物品不要比市场贵几倍，也别用到不该用的地方。透明度能解决问题吗？

王石：应该就可以避免了，NGO 组织有 NGO 组织的逻辑。贪污腐化什么社会都有，包括透明国际排前面的挪威、丹麦、芬兰、新加坡，照样有贪污，只不过是程度多少。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 NGO 的问题。这是中国从传统、近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问题。给你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为什么中国的一些企业在国际上容易被攻击，说你有军方背景，如果这家企业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可能就比较容易来辩解，不透明，就没法说。

如果你的市场是国际化市场，显然成为上市公司是非常重要的。有会计事务所来审核，每年披露报告，甚至有公司专门狙击你、做空，各种考验。为什么万科到美国投资非常容易呢，我们不是一个美国上市公司，但我们发 B 股，虽然 B 股已经没有什么发展的余地，但是每年都要到香港去路演，每年都要在国际舞台披露信息，每年都要到华尔街和波士顿的老基金去解释，因为他们手头拥有你的 B 股。

人物周刊：这次雅安地震以后，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在公益上的表现和汶川相比，差别不大，好像这 5 年来，中国企业做公益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王石：在我看来，改变还是相当大的，应该说比第一次要冷静多了。以万科为例，我们还是 200 万，没有说马上要改 500 万、1000 万，没有像第一次捐 200 万弄得灰头土脸。

第二次要比第一次冷静得多，一些外资企业急于马上表态，那是有，总量来说少。尤其从现金来讲，据我了解还没超过 10 亿吧。

人物周刊：你在书中含蓄地提到有些中国企业的民族主义问题，你们这一代企业家汇聚了几代人的精英，为什么遇到困难时还是会马上想到民族主义？

王石：爱国主义很容易变成民族主义，比较狭隘。没什么不好，但狭隘了就有局限性。中国经济过去一直是封闭的，改革开放，加入 WTO，显然仅停留在民族主义上是不够的，必须是国际主义。中国文化有局限性，香港是一个国际港，香港上一代的企业家，上至李嘉诚、邵逸夫，基本上他们的公益慈善是局限在中国人身上。就没有国际主义的成分。你如果以全球为市场，慈善公益也应该是全球性的。

人物周刊：所以说，还是时间问题。

王石：对，要过这一关。

人物周刊：你不觉得做好产品才是真正的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说你捐多少钱的问题，尤其是经历了三聚氰胺事件。

王石：有联系，但还是不要混为一谈。企业首先要对产品负责，这和社会责任有联系，但还是要分开谈。无论你企业做得怎么样，做公益总是好的。你不能说企业还有伦理道德问题，就没有资格做公益，还是不要问动机。从技术层面来讲，不要去问道德，不要问你的钱怎么来的。能做善事，有怜悯之心，会反过来影响他的一些决策。

第二点谈到企业的产品责任，这是一个行业的选择问题，他这样做迫不得已，因为这个社会就这样，对不对？万科不行贿，这是个选择。你完全可以有理由说大家都在行贿，行贿成为潜规则，你不行贿怎么存在下去呢，这可以成为一个理由。但对我来讲，这不能成立，我宁可经营不下去。

三聚氰胺当年是一个科学发明，中科院下面的一个三等奖，成本竞争的压力加上市场的需求，突然这样地旺盛，就像挖个坑就能赚钱。换句话来讲，在企业道德上，最起码乳业并不比房地产业的道德更低。

自由市场经济下企业家如何成熟，你不能对他们太苛刻，应该多看他们的闪光点。从社会心理学上来说，人都是一半天使、一半魔鬼，看你往哪方面引导。中国很多时候就用伦理道德来判断，对中国企业家始终是道德批判，工农兵学商，放在最末的位置，骨子里是这样东西。

#### 四、让农民工进城是最大的改革红利

人物周刊：有政治家提出要让普通老百姓分享到改革的红利，这当然很好，但在中国，会让人

担心如何把分享改革红利和培育这个国家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对接起来？

王石：这不是一个比较关系，你可以理解富人财富太多了，重新分配，你也可以理解为税收太高。

人物周刊：你觉得改革红利应该怎么分享？现在中国出现新的移民潮，你劝大家别移民。

王石：移民是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问题。真正的红利是如何让农民工变成城市人，就以北京为例，如果你现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变成北京城市户口，北京城里人一定反对，小孩上北大清华的可能性要小多了，首先他们就不接受，还谈不到企业家，真正的冲突是在这里。

人物周刊：你是指平权吗？

王石：这和平权没关系，和民权有关系。我们知道美国在 60 年代黑人的民权运动，就是黑人和白人有同等的权利，同等坐车、上学、去餐馆吃饭，这是最基本的，是你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在中国何尝不是呢？我们不是黑人和白人，我们是农民和城里人。农民进了城，在城里创业，在城里纳税、创造价值，孩子不能享受一样的上学的待遇，看病时不能一样，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不平等。一个是一等公民，一个是二等公民。

人物周刊：这是你的中国梦吗？

王石：这不是我的中国梦，这难道是梦吗？我不用做梦，这就是现实。在我来看，首先让农民和城里人一样平等，这个社会真正的进步，才能说上开始。不改的结果你想想，两三亿农民工的后代，他们也回不到农村去。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城镇化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之前强烈反对造城运动。

王石：我只能说很清楚现在城市里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这是当务之急。第二个你从方法论上来讲你可以简单算个账，平均下来差不多一个农民工要变成城里人，福利差不多是 20 万，3 亿农民工，这个天文数字，政府再不缺钱，也是不可能的，但比如说已经在城里打工 10 年的，正经交税 5 年以上的，可以先成为城里人，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这是渐进的、分批的。

中国农民工，只要看得到希望，他不会给城里人造成那么大的冲击。中国农业税不就一个红头文件解决了吗？你算算收益，不就是 500 个亿吗？为收这 500 个亿的投入都不止 500 亿。

从某种角度来讲，你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你不如来做好企业，对社会进步才是推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两边峭壁上面的一股股潺潺的流水汇聚起来就是滔滔江水，你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可是你看现在报考公务员成了大学生第一选择，报考人数一年比一年高，这个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似乎越来越稀缺。

王石：你从经济角度来讲，它是个效率问题。研究日本很有意思，日本也是这样，左-右-左-

右(小幅度手势摆动), 中国是这样左——右(大幅度手势摆动), 幅度要大得多。

从历史角度看, 我不相信国进民退会继续下去, 因为不符合全球一体化, 不符合商业逻辑。我提出的问题是下轮的国退民进时, 企业有没有做好准备。我和很多企业家交换过看法, 这是我的看法。国进民退我们的销售额还 1400 亿, 如果国退民进了, 你还想怎么着啊?

人物周刊: 如果说登珠峰代表了人生的高度, 你所理解的人生宽度是什么?

王石: 我过去是把登珠峰当成一种理想境界, 所以准备三次登珠峰。第一次上去 2003 年, 对我个人意义非常大。2010 年第二次, 个人理想和环保生态结合起来, 做零垃圾排放。当然想着 70 岁的时候再登一次。

2011 年到哈佛之后一年, 就决定放弃第三次登珠峰, 不是觉得头两次没有意义, 而是到哈佛学习, 对自己有重新审视重新认识, 感觉到在追求知识方面, 尤其在东西文化交流上, 还需要很多学习, 而且挑战完全不亚于登珠峰。学习到什么时候算是有个尽头? 在哈佛, 除了第五学期, 学习之外没有时间, 就是公寓到校园。如果要准备第三次登珠峰, 保持状态至少每年要登一座 8000 米的山峰, 还得 6000 米啊 4000 米啊实施训练。

我权衡了一下, 按照现在的学习计划, 不能登山。人生有比较的时候, 你必须有所放弃。我非常明确学习知识的目的, 为了个人修为, 同时你要用到生活当中。

我给自己定位是“百战归来再读书”, 读书是为了去当老师。中国未来的希望是年轻人, 年轻人的希望在教育, 但是你看现在教育的现状。我希望和更多年轻人去交流, 而不是像泛泛地讲两个小时拍拍屁股就走了那种。

人物周刊: 那你想过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退出公共视线吗?

王石: 这本身是个悖论, 我退出总经理, 一直希望在商业上, 郁亮他们扮演我的角色, 很多 NGO 和行业协会希望郁亮来扮演过去我的角色, 但从社会世俗来说, 都觉得应该是董事长对董事长啊, 你怎么弄个 CEO. 接受你们这样的媒体采访, 如果不是朋友安排, 我基本是不会接受的, 我有退出视线的想法。

去年那个“红烧肉”, 被消费被娱乐, 但终究证明你这个人社会上影响力还在, 我接受你们采访本身在增加影响力, 而不是在减少。

我喜欢拍广告, 不是免费的, 广告费捐给泰国做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的。

就人生来讲, 一定要明确几点: 你在社会的影响如果别人能扮演, 你最好不要扮演, 因为到了这个年龄, 年轻人取代老年人, 这是逻辑规律。

我在哈佛的学习对这社会是有进步意义的。现在有很多企业家也说想去学, 我听了非常高兴, 因为我让更多企业家去学习、去掌握方法论, 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是有好处的, 所以说你有影响力也

没有什么不好。

如果没有 2008 年，去年我也不会处理那么从容。比起 2008 年，那算什么？不就是红烧肉，说来说去嘛，还有什么？

人物周刊：是啊，有什么呢？

王石：就是对你的隐私感兴趣嘛。（长时间沉默）我觉得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特别的时期嘛，千年不遇，简单来讲就是个城市化的过程嘛，你要考虑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来源：凤凰网

地址：<http://finance.ifeng.com/news/people/20130521/8057022.shtml>

[【返回目录】](#)

## 龚维斌：加大对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引导力度

**摘编：**社会组织治理机制不健全。由于缺少必要的分工和管理制度，缺少活动经费、活动场地，缺少高素质、专业性人才，加之成员的团体意识不强，缺少相应的培训，很多基层社会组织处于松散无序的状态，发展能力和服务能力较弱。

### 基层社会组织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于城乡社区的基层社会组织不断发展，量大、面广、种类繁多，成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不足。

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基层服务性社会组织在扶贫助残、文体科普、妇幼保护、法律援助、支教助学、促进就业等领域广泛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左膀右臂”和社会服务的主力军。

促进社区和谐稳定。一些社区社团代表成员反映诉求，成为沟通政府和居民的桥梁，为居民有序参与社区管理提供了平台；一些专业协会、社会矛盾调解组织参与社区平安建设，积极调解纠纷，及时高效地解决社会分歧，节约了司法资源。

培养居民良好的公共生活习惯。一些基层社会组织通过举办各种公益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居民素质，引导广大居民关心和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活动，真正成为社区的主人。

帮助社区居民就业和致富。在这方面尤为突出的是农村各类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它们为种植、养殖、加工、销售、运输、储藏等农业生产经营提供服务，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帮助。

### 制约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

基层社会组织虽然发展迅速，但依然存在数量偏少、服务能力不强、管理服务不规范问题，还不适应社会发展和居民需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缺乏有效的扶持政策。基层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的一种特殊类型，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社区居民，服务范围限于本社区，一般利用的是社区的资源。现在只是按照一般社会组织成立的条件来要求它，缺少对成立基层社会组织的特殊政策。一直以来，我国对于成立社会组织存在门槛过高、条件过严等问题，基层社会组织由于其“草根性”，更是难以名正言顺地建立。全国目前大约有几百万个基层社会组织，其中绝大多数没有经过登记和批准，因此也就难以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社会组织治理机制不健全。由于缺少必要的分工和管理制度，缺少活动经费、活动场地，缺少高素质、专业性人才，加之成员的团体意识不强，缺少相应的培训，很多基层社会组织处于松散无序的状态，发展能力和服务能力较弱。

社区居民参与基层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不高。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有困难找政府，对于组织的功能和作用认识不足，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更是经常被忽视，还没有形成鼓励和吸引人们参与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氛围。从现实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参加基层社会组织活动的人是退休或没有工作的老年人、妇女等，在职在岗的人员对于参与和支持基层社会组织活动兴趣不大。

### 加大对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引导力度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其中的改革措施和新的政策规定（见右图）将为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发挥好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需要各级政府特别是主管部门根据这一精神，研究制定支持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配套措施。

实行登记制和备案制两种并行的管理制度。针对基层社会组织普遍规模较小、经费短缺、实力较弱的现实，适当降低基层社会组织在人员、资金、办公场所等方面的登记要求，把符合条件的基层社会组织及时纳入管理服务范围。对于尚未达到登记条件但正常开展活动且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层社会组织，应当给予备案，实施备案管理。加强对基层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对于违反有关政策规定的行为应及时给予提醒和纠正，引导条件成熟的备案制社会组织申请登记。

加大对基层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购买服务、引导基金会进行合作等方式为基层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办公场所、办公设备等方面的支持。为社区民办非企业单位创造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认真研究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人事保障、职业发展通道等问题，调动他们参与社区服务的积极性，吸引和稳定更多的人才从事基层社会组织工作。

引导和支持基层社会组织提高管理水平。政府部门应要求和指导基层社会组织建立健全规章制

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民主决策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增强自律性和诚信度。同时，通过举办培训班、座谈会、经验交流会等多种形式，提高基层社会组织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素质能力。

提高人们对基层社会的认识。重视宣传基层社会组织在服务社区居民、构建和谐社区、发展社区经济、提高社区自治水平等方面的成功事例，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基层社会的积极作用，提高社区居民参与和支持基层社会的热情。同时，对基层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给予曝光，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促进基层社会健康发展。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

来源：人民日报

地址：<http://paper.people.com.cn/dnis/index.jsp>

[【返回目录】](#)

## 安猪：坚持做有创意的“公益产品”

因为一次偶然的志愿者经历，北京某间写字楼里面少了白领余志海，多了公益人“安猪”。从最初的 2004 年发起“多背一公斤”项目，到后来学校图书室项目、公益贺卡销售，安猪和他的团队用独特的创意尝试了许多不同的公益项目和产品，向着“有自我造血能力的社会企业”不断进步。最近的雅安地震前后，他和团队所设计出的“灾害教育工具包”又即将派上用场。

### 从“一公斤盒子”到“灾害教育工具包”

农村普遍存在着素质教育、第二课堂缺乏的状况，作为资深驴友的安猪深知这种状况。将这种对孩子们需求的深刻了解与自己的创新优势相结合，让安猪创造和设计出的每一款“公益产品”都深受欢迎。

2011 年，安猪和他的团队研发了“一公斤盒子”产品，想为改变乡村传统教育尽一份力。一个“一公斤盒子”里的内容包括一门课所需的材料和一个简单易懂的使用指南，这能让一个志愿者或老师和 36 个学生展开一节主题课。一线的志愿者或老师，只要填写一份表格，说明活动计划并承诺反馈，就可以申请“一公斤盒子”。从 2011 年 7 月至今，“一公斤盒子”项目已经覆盖了全国 24 个省、市的 247 所学校，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

依托“一公斤盒子”，安猪团队推出针对大学生支教的“聪明支教训练营”活动，给大学生支教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

如果说“一公斤盒子”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公益产品，那么他新近推出的“灾害教育工具包”则

是一个即将孕育成功的胎儿。就在雅安地震的前一天，他恰巧正在深圳壹基金的总部讨论如何优化“灾害教育工具包”，计划可以在 5 月底研发成功。在经历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之后，安猪有了理性的成长，“现在我们的专长不在救灾，而是教育。”安猪告诉记者。

### 希望“改变一下教育”

刚入公益圈时，安猪完全是个外行人，但也正因为没有行业知识的干扰，他能用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事情。因为思维方式受互联网影响较深的缘故，在“多背一公斤”等项目整个模式的设计上，安猪都秉承着一种“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和生产形式。

在他看来，传统的公益形式往往是专家式的，要求和指引志愿者做事情，没有太强的志愿者主体性。但他相信，“真正的公民社会应该是我想做的事情我能做主，能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做，而不需要人家去教我怎么做，我不需要去投奔在一个什么机构里面。”

带着这样的想法，安猪希望可以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改变一下教育”。他认为，如今中国的教育方法太陈旧了，无论是方法还是思维。“我希望用公益的方式，对现在的教育带来一些改变。”

来源：南方日报

地址：[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3-05/21/content\\_7191519.htm](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3-05/21/content_7191519.htm)

[【返回目录】](#)

## 刘洲鸿：NGO 如何向基金会筹款

在公益产业链中，基金会是重要的资源提供者。而很多民间组织，并不了解这个申请资金的重要通道，使得筹资方面困难重重。5 月 22 日，在“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首期培训课堂上，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导师为学员们揭开了如何向基金会筹资的面纱。

### 我国基金会发展的现状

据刘洲鸿介绍，目前我国基金会已经超过 3100 家，其收入及支出的增长都很快。2011 年，非公募基金会收入 102 亿，公募基金会达到了 179 亿，同时在 2011 年，基金会共支出约 300 亿元，比 2010 年的 176 亿增长很多。由于民间组织没有公募权利，捐款得到的钱需要缴税，所以大部分钱进入基金会，进入政府。而针对这样的情况，刘洲鸿建议首先要打破官办基金会对公募资金的垄断；其次民间机构要发展自身，提升自己的募款能力。

### 我国基金会资助的特点

讲述了我国基金会发展的概况后，刘洲鸿介绍了基金会的 9 大主要资助领域：教育、科学研究，

医疗救助，文化及扶贫助困等。而对于基金会资助的对象，则需要是合法注册的公益组织。有数据表明，其中约60%的资助方倾向于资助民政系统注册的公益组织。同时，在过去5年中，63%的基金会资助的公益组织数量在10家以内；81.5%的资助方对同一公益组织进行连续资助。

刘洲鸿介绍说，基金会主要通过业内渠道，选择口碑好的机构作为合作伙伴。同样，公开招标和行业活动如慈展会、行业论坛等也是他们寻找合作伙伴的途径。

如果一家NGO具有较强的执行能力和有效沟通能力，且有良好的诚信度、透明度及健全的治理结构，最好还和基金会建立长期的依赖关系，这些都能成为它成功筹资的因素。在这里，刘洲鸿介绍了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他们正是凭借透明和专业，以及积累的相互信任，获得了南都基金会20万的资助。

### 如何同基金会寻求合作

对于什么样的项目会引起基金会的兴趣，刘洲鸿列出了以下几点：首先，项目需要符合基金会的资助领域或战略发展方向，同时，如果一个项目满足了当今的社会热点或运用了创新手段，也会被基金会重视和青睐；其次，项目的可持续性、可复制性和推广潜力也是基金会考虑的方面；再次，对合作伙伴机构经验积累、提升团队能力等方面的帮助，也是基金会考量的重要指标。

刘洲鸿分析了现今向基金会筹款的众多障碍。原因一是在于很多NGO资源意识差，知道的基金会少；二是信息上的不对称，很多NGO不知道基金会资助什么项目；三是在于有的NGO缺乏信心，不敢接触基金会，同时和基金会缺乏沟通；最后，有的基金会看面子不是项目质量，这也是NGO筹款的一个障碍。

针对上面的种种不利因素，刘洲鸿提出了解决的建议：NGO提高资源意识，尽量多地了解基金会或资助方；树立信心，增强互信，合作双赢；NGO认真落实项目，保质保量完成；尽可能多地报告项目进展情况，让基金会及时了解情况。

### NGO向基金会筹款的策略

刘洲鸿就“NGO如何向基金会筹款”为学员们支招：

在寻找资助方的方面。首先NGO要做好内功，做好事情、重视传播、做到公开透明；同时还需要多参加活动，相互了解，在项目设计中考虑让资助方参与进来。

在项目申请前的准备工作方面。首先，NGO必须对自己所做事情的自豪和自信，能够清晰表达；其次，需要知己知彼，做足准备；再次，NGO需要主动沟通，懂得变通，用使命感和信念积极影响资助方；同时，也要有原则，绝不软弱，也不过于僵硬；另外，NGO们还需要了解运用2/8定律，有意识地将注意力放在最有可能支持你的资助者上；最后，不断维护和发展合作伙伴网络也是筹资活动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来源：中民慈善捐赠信息中心（中国公益慈善网）

地址：

<http://www.charity.gov.cn/fsm/sites/newmain/preview1.jsp?ColumnID=362&TID=20130522150738967839798>

[【返回目录】](#)

## 程立岩：社会组织如何获得政府“订单”

5月20日，在“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首期培训课堂上，北京市民政局慈善工作处处长、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程立岩指出，政府购买服务是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重要举措，能加强社会管理、社会创新和社会建设，推动构建和谐社会。

5月20日，在“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首期培训课堂上，北京市民政局慈善工作处处长、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程立岩指出，政府购买服务是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重要举措，能加强社会管理、社会创新和社会建设，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她还针对社会组织如何获得政府“订单”，提供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她指出，首先，社会组织应该仔细研究购买服务的相关文件。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文件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对于申请流程、提交资料的方式、各阶段截止日期、购买服务方向、资金使用要求等已经在指导文件中进行明确说明的，要避免忽视和遗漏，从而错失申请的机会。

其次，应确定“有亮点”的服务项目，如选择政府和社会公众现阶段比较关注的人群和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申请项目的服务人群、服务内容具有鲜明特点，项目模式具有创新性。

第三，“老项目”应该有“新内容”。对于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的项目，如果在申请时能够明确，此次申请资金将用于项目的一个新的阶段，可能会更加凸显申请资金支持的重要性，获得购买的几率可能会提升。

此外，项目申请书的文字应简洁、清晰、易懂。如果有一些专业术语，应加以解释，避免评审不解其意。在分析问题和阐述预期成果时，应多用一些数据，这样更能够帮助评审理解项目的意义。最后，她强调，项目申请书提交后，如社会组织被申报机构要求补充其他资料，应做到反馈及时、准确。

来源：慈讯网

地址：<http://www.icixun.com/2013/0522/1108.html>

[【返回目录】](#)

## 刘奇：尽最大努力尊重捐赠人的意愿

人物档案：

刘奇，中国侨联公益事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2008 年起，任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芦山地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刘奇看到了地震消息，他立刻拿起电话拨给四川绵阳，那里有他牵挂的一群人、一个地方——北川中学。“当我听到校长说‘我们正在上课呢，毫发无损。’我的心就放下了。”刘奇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时说。

随后大概 9 点钟，开始，陆续有记者前往北川中学，他们想看看 5 年前这所在震中新生的学校有没有经受得住考验，“那里也有长时间强烈的震感，但是一块砖都没有掉下来，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作为直接参与和实施人之一，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奇回忆起这些感到“真的很骄傲”。

援建北川中学是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运作比较成功的公益案例。在 2008 年项目设立之初正赶上国际金融危机，大多数华侨的资产缩水，而国内为“汶川地震”捐款的热潮已经结束。在前期救灾资金大部分已支出，并且缺少大额捐赠机遇的情况下，基金会发起了“两个一”的捐赠活动，“我们鼓励归侨侨眷捐 1 元人民币，海外侨胞捐 1 美元。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得到 73 个国家和地区几十万人次的支持和参与，筹得 2 亿元的捐款。”

这两亿元，分量格外沉，因为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作为国内唯一一家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等捐赠的指定基金会，承载的期许和压力也格外重。刘奇坦言，这部分特殊的捐赠群体，对于款项使用、项目运作的知情权以及结果的展示等，各方面要求格外高。“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意愿，让捐赠人满意。”

北川中学有一面墙，当年捐赠 1000 元以上的捐赠人在墙上刻有名字，1 元钱的捐赠者也有电子书记录，这也吸引了很多人回去找自己的名字。刘奇感到比较庆幸的是，目前还没有接到投诉说名字写错了。“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量，但也因为这样，捐赠人会感受到一种尊重，下次还会愿意捐钱。”

《公益时报》：中国华侨基金会的筹款主要来源于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和广大归侨、侨眷的捐赠，那么怎样保证筹款的效率和资金？海外同胞的捐赠意愿和对公益的理解是不是更加成熟？

刘奇：主要服务对象是广大侨胞并不意味着款项大多来自海外，事实上许多侨胞在国内有投资或资产，人民币进账目前还是主流。侨胞捐赠有三个特点：一是在自己的家乡捐赠，回馈父母、家乡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二是在事业所在地捐赠，回馈当地对他的事业上的支持；三是奖教助学比较多。我们在筹款的过程中，都会根据他们的特点设计公益项目，有针对性地募集善款。

海外侨胞捐款大体上经历了由非理性捐赠向理性捐赠这个过程。侨胞对在国内兴办公益事业，此前主要是报效桑梓、刻碑留名、纪念先人等目的；现在除此外，还有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追求和愿望，希望能在某一方面有所回报。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单纯地要回报社会、尽公民义务。另外，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对公开透明和项目设计的要求更高，所以我们在他们捐赠之前会反复确认，把预算详细地做出来。

这部分捐赠群体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同诸多捐赠人一样，希望所捐的钱能全部用在项目建设上，他们不仅关注项目的结果，而且重视项目实施的过程，关心项目后期的运行及发展。如，雅安地震发生后就有很多爱心人士打电话给我们，询问我们有没有类似“北川中学”的项目，从他们的心情上，我们了解到，类似地震这样的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后，捐赠人更多地希望善款能用在灾后重建上。

《公益时报》：中国华侨基金会一项主要业务是遵照捐赠人的意愿设立专项基金，现在基金会下设多少专项基金，在管理上有什么方法和难点吗？

刘奇：我们基金会目前下设近 30 支专项基金，涉及奖教助学、文化体育、低碳环保、扶贫帮困等领域，而且还有合作的意向在接触中。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来看，专项基金的运作是基金会整体运作中重要而高效的组成部分，这既是拓展募集自己渠道的需要，也是吸引更多人参与公益来做慈善的需要。对于我们公益基金会来说，这极大地拓宽了资助和活动的领域，通过专项基金人力、智力的补充，也使基金会的工作更高效。

问题和结果是通过实践的检验，基金成立之初愿望和热情都是好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发现基金运作的的能力不一，有非常活跃的基金，筹款、项目运作和活动开展都令我们十分满意，也有在筹款方面存在较大困难的基金。对于这种现状，我认为基金会能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来帮助他们运作。比如我们现在为他们募集资金提供一个平台，叫做“侨爱心 365”基金，是每人每天捐一块钱的意思，哪个专项基金募集到了钱就归哪个用，我们基金会募集到的钱再根据专项基金募集到的钱按比例配套下去，进行一个补贴。再一个方法，是要和他们在一起，很多专项基金的活动我们要冲在最前面的。三是如果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看不到发展的话，我们认为也没必要牵扯太多时间，会果断停掉这支基金。

《公益时报》：2008 年您当选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这五年您眼中的基金会在项目、方向和发展战略等等方面，有什么成长和改变吗？

刘奇：这五年，慈善项目从微观向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方向转变，向做强做大、做活做实方向发展。像我们的“侨爱心工程”项目实施之初，着眼细节和规范上考虑的比较多，更多的工作是把好事做实、做好，刚开始我们是要求捐赠不低于 20 万，地方配套占很大比例，当地百姓也鼓励捐赠，这样地方的老百姓就可以起到无形的监理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侨爱心工程”影响力不断扩大，

作为侨界唯一的基金会，我们的公益项目越来越被广大侨胞认知和接受。所以在项目的内容的设计上，更趋于多元化，不仅建“侨爱心”学校，又增加了“侨爱心卫生院”、“侨爱心水站”、“侨爱心图书室”等；不仅在硬件上有所发展，而且在软件上有所拓展，增加了珍珠班、树人班、侨爱心学校校长培训班等。珍珠班是港澳台同胞捐资办的，树人班经费来自华侨。像我们的珍珠班目前在全国有463个班，已经参加高考的有6700多名学生，上线率是100%。像校长培训班今年是第五年，这里面95%的校长是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北京，但是他们从来不讲自己的个人问题，都在说校舍问题、缺少设备等等，其实他们自己很苦的。

《公益时报》：这五年，同样是从汶川到芦山中国公益领域迅速成长的五年，那么您看到的这五年快速发展背后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吗？

刘奇：五年来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真是冰火两重天，同5年前的激情火热相比，虽然雅安地震后红十字会等组织也收到了不少捐款，但我们能从社会大众的反应和态度上看到理性和慎重的一面，捐赠人对知情权的要求更迫切，对公益机构的透明和规范的要求更强烈。如何增强大家对慈善机构的认知，提高慈善机构的公开性和规范化是我们应着力解决的问题。这里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应加大对慈善机构扶持的力度，为慈善机构工作提供政策依据，关键时候要站出来为我们慈善机构说句公道话。而我们制定政策依据也可以参照港澳台地区和国际上的惯例。二是慈善机构要做到公开，其实这个公开不难，公开募集资金、公开运作公益项目、公开善款使用的方案、公开善款支付的过程，最后公布项目的结果。比如我们建学校，会把钢筋混凝土等用料的单价公开，有很多网民就会去计算，所以不要害怕公开。三是接受社会的监督，提高慈善队伍人员的素质，现在要找一个公益慈善专业的毕业生几乎没有，再一个就是制定慈善机构人员薪酬标准的相关规定。

《公益时报》：中国华侨基金会有一个很好的资源就是各地侨联，那么我们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推行公益项目的？

刘奇：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是中国侨联管理的基金会，尽管基金会全职的工作人员并不多，每年的行政管理费用占公益支出的比例也很低，但我想最大的优势还是通过侨联系统执行项目。比如我们在项目的选择上能依靠省级侨联；在项目的实施上我们能依托各级侨联；项目的跟踪服务上我们能依赖各级侨联，有做事的人却不用花钱，自然节省开支。从另一方面来说，侨联组织在地方还有一定的话语权，公事公办总比私事公办要来得更顺、更有效果。

所以我认为，对于社会上一些人不信任公益组织，宁可自己直接面对受助人的现象，我们想说的是如果既要追求效果又要追求效率的话，建议还是要有组织地去办，当然了，要选信得过的组织。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tjxw/201305/3b81f67ff4454aa38ebdc282b41a5845.shtml>

[【返回目录】](#)

## ◎行业动态

## “2013 中国慈善名人榜”在京发布

5月19日,由《中国慈善家》评比和制作的“美即2013中国慈善名人榜”在北京瑞吉酒店隆重发布,李亚鹏、王菲夫妇荣登榜首,李连杰居第二,成龙居第三。在上榜的30位明星中,仅有运动员姚明入榜,其他均为演员、歌手和主持人。

著名演员、“嫣然天使基金”发起人李亚鹏,著名女歌唱家、“世界看见”公益项目发起人朱哲琴等慈善明星,以及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中国新闻社副总编刘小青、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WildAid国际野生救援中国区首席代表子雯、《光明日报》国际部副主任肖连兵等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会并发表演讲。

“美即2013中国慈善名人榜”由慈善公益领域首席刊物《中国慈善家》杂志制作,《中国慈善家》是由中国新闻社主管、慈传媒出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慈善、财富、社会议题高端杂志。杂志致力于成为慈善的智库、中国财富的风向标、社会创新的推动者,影响和推动慈善公益话题公共化,团结和培育中国慈善家群体、促进社会经济文明进程。此次榜单得到美即面膜的大力支持,美即面膜作为一家存有信仰与理想的企业,一直以来,美即希望在塑造美丽的同时,也能在骤变的世界,唤醒人们心中的一份柔软,让人们能在现实世界感知不一样的美好。

“美即2013中国慈善名人榜”评价指标总分实行百分制。其中,涉及捐赠额的年度个人捐赠和间接募集,两项所占分值仅为10分和15分;而包括发起公益组织、发起公益项目、参与公益项目在内的公益行动,则占到40分;公益影响力分值则占到35分。

李亚鹏、王菲夫妇在2012年的直接捐赠数额并不多,但他们发起成立的嫣然天使基金募集善款高达5760万元。2012年5月,由李亚鹏、王菲夫妇发起的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慈善医院。因此,他们在个人公益行动和个人公益影响两方面得分均高居第一。

李连杰位于2013中国慈善名人榜第二名,其主要得分原因与李亚鹏、王菲夫妇类似。李连杰发起成立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获得万科董事长王石、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等7位大企业家倾情资助,该基金会已经在救灾专业化、公开透明等方面走在国内基金会的前面。

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认为,“明星慈善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他们本人捐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他们影响了多少人去了解 and 参与慈善,在于他们对慈善文化和志愿精神的正面倡导,也在于他们身体力行地投入慈善活动和社会创新,唤起人们心中的柔软,为世人做出示范。”

多位长期研究慈善事业的专家评价,中国慈善名人榜不再以捐赠额衡量明星的慈善贡献,而以

影响力慈善来判断，意义重大。作为今年中国慈善名人榜的支持企业，“心怀柔软”的美即面膜，其核心价值观与慈善名人的行动理念完全契合，相信这对影视、体育、文化等各界明星提升社会责任感，实现慈善行动专业化和创新性，特别是践行“影响力慈善”，以此激励并带动全民慈善，将起到积极作用。

附：2013 中国慈善名人榜榜单评分表

《中国慈善家》2013 中国慈善名人榜评分表							
排名	慈善名人榜候选名单	职业	2012 年度个人捐赠额(10 分)	2012 年度个人间接募集(15 分) (包括慈善拍卖额、发起的基金会募款额、发起的公益项目募款额)	个人公益行动(40 分) (包括：发起公益活动、参与公益活动)	个人公益影响(35 分) (包括：公益代言、公益宣传活动)	加权总分
1	王菲&李亚鹏	歌手&演员	1	15	35	29	80
2	李连杰	演员	1	15	34	29	79
3	成龙	演员	10	15	29	23	77
4	韩红	歌手	6	12	31	27	76
5	濮存昕	演员	10	3	33	28	74
5	朱哲琴	歌手	6	9	32	27	74
7	姚明	运动员	1	9	33	29	72
8	杨澜	主持人	1	12	32	26	71
9	崔永元	主持人	1	9	33	27	70
10	伊能静	演员、歌手	10	3	30	26	69
11	姚晨	演员	4	3	33	28	68
12	陈坤	演员、歌手	10	3	30	24	67
12	李冰冰	演员	10	3	29	25	67
14	王凯	主持人	1	12	30	23	66
15	李静	主持人	1	15	28	21	65
16	范冰冰	演员	6	9	27	22	64
17	周笔畅	歌手	6	12	24	20	62
17	陈伟鸿	主持人	1	12	27	22	62
17	黄晓明	歌手、演员	10	3	26	23	62
17	刘德华	演员、歌	10	1	27	24	62

		手					
21	张国立&邓婕	演员、导演&演员	10	6	25	19	60
22	张杰&谢娜	歌手&主持人	10	3	25	20	58
23	李宇春	歌手、演员	1	3	29	24	57
24	范玮琪&陈建州	歌手&主持人	1	1	30	24	56
24	吴奇隆	歌手、演员	8	3	26	19	56
26	马伊琍&文章	演员&演员	6	1	26	22	55
27	羽泉	歌手	6	1	25	20	52
28	海清	演员	1	3	26	21	51
28	黄奕	演员	1	3	27	20	51
30	胡军	演员	10	1	22	17	50

来源：新浪公益

地址：<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3-05-20/145942871.html>

[【返回目录】](#)

## “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在京启动实施

5月20日，由民政部指导，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安利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开班仪式暨首期培训在北京实施。开班仪式由彼得·德鲁克社会组织学习中心秘书长、总裁赵华主持，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副处长尹东华，中国慈善联合会执行秘书长、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出席活动并致辞。50名来自基金会、慈善会系统和草根NGO的领导和骨干参加培训，其中80%以上来自草根NGO组织。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曾指出：“目前我们的公益慈善人才数量有限，专业化程度较低，管理经验和国际视野不足，直接制约了公益慈善组织的发育和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安利公益基金会与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联合，在15家国内知名社会组织的支持下，出资1000万元，于2012年12月10日在北京启动了为期三年的“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拟通过实战培训，专家指导，机构资助，海外考察交流，专业论坛与行业课题研究等形式，对接公益慈善人才需

求,支持公益慈善领军人物个人成长,探索公益慈善人才培养新模式,提高慈善行业的专业化水平。

支持“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的 15 家社会组织(排名不分先后)包括:中华慈善总会、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

据了解,此次参加培训的学员是经过严格选拔程序筛选出来的。900 余名来自公益慈善组织的领导和骨干通过中国公益慈善网在线申报,并经过由民政部领导、知名基金会负责人、业界著名学者等组成的专家团严格评审,最终 50 名最具发展潜力的公益慈善人才脱颖而出。录取率约 5%。

据主办方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透露:第一期培训为期五天,以提升慈善组织拓展和获取外部资源能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帮助学员们在获取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向爱心企业、基金会筹款等方面提升专业能力,同时拓展媒体、志愿者等资源。此次培训师资力量雄厚,来自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彼得·德鲁克社会组织学习中心、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英国救助儿童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基金会中心网、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联想集团有限公司、商道纵横、四川省 NGO 备灾中心等公益慈善领域中享有盛名的专家们,将通过理论学习、案例分析及实战模拟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与学员们分享他们在公益资源开发方面的宝贵经验。参加培训的 50 名学员除接受专业课程培训、得到专家的权威点评与指导之外,他们中的 10 位最具潜力的学员,还将获得 100 万元即每人 10 万元的机构发展金,用于其所在机构的项目探索、研发及内部建设等。

来源:中国公益慈善论坛

地址:

<http://www.charity.gov.cn/fsm/sites/newmain/preview1.jsp?ColumnID=362&TID=20130520101657911518053>

[【返回目录】](#)

## 民政部更正数据 还红会清白

昨日,民政部针对红会地震捐赠数据被指前后不一的情况作出说明并更正。民政部表示,此前通报采用的是截至 5 月 9 日的数据。截至 5 月 10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报送的统计数据物资合计

2476.07 万元，并不存在金额差距。

整个事件起因是 5 月 16 日，民政部公布社会组织接收和使用芦山“4·20”地震救灾捐赠款物的统计情况。在目录中，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被列在第一、第二位。其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送的数据截止日期为 5 月 10 日。该会接收的捐赠资金 11399.78 万元，物资为 2051.05 万元，合计 13450.83 万元。但中国红会官方微博在 5 月 10 日发布称，截至当天下午 5 点，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接收捐赠款物为 15926.90 万元，比民政部 5 月 16 日公布数据多了 2476.07 万元。

对于金额差距一事，中国红总会表示，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是红总会筹资财务处通过电子邮件上报的，上报时财务处将红总会数据和红基金会数据进行了拆分。而据中国红总会筹资财务部门介绍，红总会 5 月 10 日公布的数据中，除了红总会捐赠数据之外，还包括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捐赠数据。

在民政部公布的数据中则显示，截止到 5 月 10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所接收的社会捐赠款物为 2429.75 万元。

细心的网友发现，即便如此，民政部公布的中国红总会和中国红基金会所接收社会捐赠总和为 15880.58 万元，与红会官微 5 月 10 日公布数据 15926.90 万元相比，还是差了 46.32 万元。

针对这一问题，昨日，民政部发布“关于社会组织接收和使用四川芦山 4·20 强烈地震救灾捐赠款物统计情况通报的补充说明”澄清质疑。说明提到，5 月 17 日，民政部通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本级和 14 家在民政部登记的社会组织报送的救灾捐赠统计数据，其中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接收情况（资金 1625.05 万元，物资 804.70 万元，合计 2429.75 万元）采用的是截至 5 月 9 日的数据。截至 5 月 10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报送的统计数据为：接收资金 1671.31 万元，物资 804.76 万元，合计 2476.07 万元。这意味着，这次风波只是由于截止具体时间不同造成的统计数据出现差距。

来源：北京晨报网

地址：[http://bjcb.morningpost.com.cn/html/2013-05/20/content\\_225861.htm](http://bjcb.morningpost.com.cn/html/2013-05/20/content_225861.htm) [【返回目录】](#)

## 中国扶贫基金会公布捐款流向

近日，有不少人质疑一些慈善组织存在截留捐款捐物情况。昨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向社会公布救灾工作中宣传、筹资、救灾项目的执行和后续工作等方面的情况。副会长何道峰指出，作为民间

慈善组织，扶贫基金会可按国际惯例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以保障运行。

### 根据评估提供救援物资

何道峰介绍，5月14日，基金会救援先行队抵达灾区，评估灾民需求，最终确定提供粮食、食用油、帐篷、大米及药品等救援物资。

在第一时间，扶贫基金会将库存物资紧急发送灾区，并就近在重庆采购食品、饮用水等物品。5月16日，基金会将捐赠物资通过铁路、公路、航空等方式或组织企业自行运送到灾区。

在德阳，基金会成立了“汶川地震救援前线总指挥部”，下面包括办公室、建设组和物流组，分别负责联络、活动房建设和采购物流，采购物资总计931万余元。

### 将解决两三万人的安置

在接下来的救灾工作中，扶贫基金会将在卧龙、青川、北川、绵竹、什邡和汶川6地建7个活动房社区，预计解决7000户约两三万人的灾后安置。同时还将建300所简易活动房学校，并配备教学设施。从长期需求方面考虑，基金会启动5·12关爱计划，对受损严重的学校进行永久性援建。

何道峰说，目前针对孤儿的捐款已经有650万元，可对1450名孤儿实行连续三年的经济支持，该项目计划捐款能达到1000万元，可资助2000名灾区孤儿。

### 副会长去灾区自掏费用

针对目前争议较大的管理费问题，何道峰指出，中国红十字会属于公务员体制，有政府财政拨款，按规定不应该收取管理费。而中国扶贫基金会则属于非政府组织（NGO），不提取管理费基金会就无法运行。2007年扶贫基金会提取的管理费只占总捐款的5.6%，按国际惯例，提取比例小于10%的NGO便是很优秀的组织。“这个数很低了，体现了我们对捐款人负责的态度。”

至于此次救灾行动，何道峰表示，不同科目收取的管理费不同，但全都低于10%，总体提取情况目前暂未总结出来。“我去四川的所有费用都是自己掏的。”

何道峰说，基金会不会对捐赠物资进行任何提取，而捐款的提取则是按国际惯例提取一定的管理费，而管理费也是用于救灾方面，比如运送物资的运费、支援灾区人员的相关行政费用等。

来源：新京报

地址：[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08-05/26/content\\_210468.htm](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08-05/26/content_210468.htm)

[【返回目录】](#)

## “创绿家计划”第二季资助团队名单揭晓

由 SEE 基金会发起的旨在支持环保公益团队创业期发展的“创绿家计划”第二季终选已于日前结束，12 支团队从 106 个申请团队中脱颖而出进入终选，并最终获得共计 141.91 万元的资助。每支团队获得的资助金额由终选评委在其申请额度基础上，结合各队创业计划进行考量决定，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未获资助的 8 支团队滑入种子库，仍有机会争取下一季资助。

同时，已有 10 支申请金额为 3 万元及以下的团队在早些的初选环节中获得资助。据此，“创绿家计划”第二季共计资助 22 支团队，资助总金额为 171.56 万元。此外，在第二季评选过程中，还有王垚、罗东霞两位 SEE 会员企业家受到申请团队感召，以个人名义共计捐赠 4 万元。

### 青年人的环保活力

相较于第一季，诸多年轻人的加入让此番参与终选的 20 支创绿家团队呈现出“年轻态”的特点。

传承于上海同济大学“绿色之路”协会的“绿色种子计划”团队，通过网络将一群散落于海内外的热爱环境和公益事业的青年环境科研工作者聚合在一起，发挥专业所长协助国内环保组织从业人员提高专业能力；以一群年轻人为主要创业者的“天津绿领”致力于青年群体生态觉醒与环境责任担当，推动海河流域水环境议题公众参与和环渤海污染联防联控；脱胎成长于校园的“绿行家园”更是由刚毕业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大学生主导，将废旧自行车变废为宝，倡导绿色出行；“Relight”团队借助年轻设计师新锐的设计风格将废弃的灯箱海报转变为别具一格的灯饰，让人印象深刻；刚从西藏骑行回来的 80 后袁亮的加入，也让南京市雨花台区百蝶缘生态发展中心焕发出年轻的活力。

因为年轻他们勇往直前，或许也因为年轻，他们仍有着许多的不成熟。但是更是因为年轻，他们拥有开放的思维和心态，与评委诚恳沟通，直视自身的不足并改进。在环保公益领域，我们需要环保老人的经验和韧劲，同样也需要年轻人的冲劲和活力。创绿家的“年轻态”让我们看到未来的更多希望。

### 普通老百姓的环保热忱

除了朝气蓬勃的青年环保创业者外，来自农村普通个体环保力量的崛起也是此次终选面试中引人瞩目的现象。作为普通百姓，这些个体环保者从一己之力出发，逐渐影响、带动周围的人群。他们的淳朴、执着、努力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底层农村老百姓积极主动改变生存环境的力量和希望。

安徽省阜阳市申兴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刘全影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家姑娘。她热爱自己的家乡，关心留守农村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近两年来，出于对当下食品安全的关心，也出于对自己所居农村生态农耕方式的自信，她开始创办有机生态农场，引导村民进行专业化、产业化的生态种植。农场创办第一年，为了获得村民的认同和支持，刘全影免费提供了三十多亩田地来让大家自由种植。经过近两年的发展，农场的参与者已由最初的五户村民发展到如今的三十多户，达到了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尽管在种植管理、营销推广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刘全影的农场有意识地将

当地农村健康高产的传统种植技巧和先进的生态种植理念、技术相结合，并为留守的老人和妇女提供了发挥一技之长的平台。

福连有机生态示范园的主创人员瞿福连也是一位巾帼英雄。这位年近四十的大姐早在八十年代就在村办农业蔬菜科技队任技术员，九十年代进入城市工作后开始在自家楼顶上进行有机蔬菜种植试验，摸索四五年后，她用经过消毒处理的中药废渣种出的食品获得了家人、朋友和周边人群的赞许。此后，她再次重返农村，租田种地带动村民开展生态种植。

瞿大姐的“个人环保之路”让终选评委深受感动。尽管她的工作模式还有待改进，但正如金陵华软基金创始人、总裁董事长王广宇所说：“我觉得她代表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对环保事业的热忱，是整个中国社会公民价值观的一种回归。虽然模式不太成熟或者还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但值得鼓励。”

### 创绿家的创业交流平台

“创绿家计划”的突出特色之一在于众多企业家的参与，从初选到终选，他们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结合自己多年商业创业经验，或是从宏观的发展方向、创业模式，或是从微观的拓展渠道、资源引入等为参选团队提供众多宝贵意见。

针对“绿色种子计划”团队成员散落各地的特点，王广宇建议他们设置一个小的行政机构，招聘专职人员来负责团队的日常运营，以保证团队的稳定性；在对昆山鹿城环保服务社的考量中，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张醒生慧眼如炬，建议团队积极与当地发达的台资企业达成合作，借助企业力量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面对安徽省阜阳市申兴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同洲电子公司董事长孙莉莉则结合自己参与运营有机生态农场的经验，建议该团队从种植管理、宣传推广和销售渠道这三大方面进行突破……

提出建议之外，企业家们还积极引入各自资源为各团队拓展合作渠道。在了解了 Relight 的“废弃灯箱灯饰艺术展”之后，张醒生在终选结束之后特意将自己在工体的朋友介绍给团队，以便双方在未来进行展览合作，并向 SEE 基金会推荐，让 Relight 在 SEE 生态奖现场进行展览，扩大影响力。终选结束之后，香港泰诺风保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积刚也是特意给项目组发来邮件，让项目组将@小團山香草農莊推荐给福连有机生态园、安徽省阜阳市申兴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两个同在安徽开展有机农业的终选团队，以便于他们取经交流。

对于创业期的团队而言，资源与钱同样重要。“创绿家计划”不仅仅是一个提供资金资助的平台。我们更希望，借助于企业家的力量，借助于他们多年的商业创业智慧和经验，将“创绿家计划”打造成一个环保公益创业交流的平台，让商业和环保公益在这个平台上碰撞出更多的火花，以推动环保公益事业的发展。

守护家园，我们需要更多创绿家。“创绿家计划”常年接受申请，第三季终选预计将于 2013 年

9月份举行。欢迎更多有志于家园创业的团队申请。

附：“创绿家计划”第二季资助团队名单

编号	申请团队	金额（万元）
41	天津绿领	20
50	上海闸北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15
52	绿行家园	6
69	南京市雨花台区百蝶缘生态发展中心	17
72	昆山市环保志愿者鹿城服务社	8
103	西昌市生态与环境保护研究所	8.2
108	安徽省阜阳市申兴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4
112	Relight	8
122	绿色种子计划团队	4.71
137	云南在地自然教育工作室	18
161	上海道融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20
173	青海湖生态文化保护与普氏原羚公众交流基地	13
7	绿瓜子公益团体	2.65
12	北京乐知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3
67	绿行齐鲁行动研究中心	3
203	上海仁渡	3
206	凉山州黑土生态产销专业合作社	3
215	安阳共同家园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3
225	绿佳园	3
232	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娜荷丫环保志愿者协会	3
238	绿色唱响环保服务队	3
243	靖江赤子之心环保公益中心	3

来源：创绿家

地址：<http://www.see.org.cn/clj/NewsDetail.aspx?id=1005>

[【返回目录】](#)

## 盐城红会回应“强捐”：不再定数额

——称今后将坚持自愿原则，阜宁县今年下发捐款文件未执行

5月17日南都报道了江苏省盐城市发文要求公职人员为红十字会按行政级别捐款后，盐城市红十字会昨日在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后盐城市“博爱万人捐”活动将由各级红会自行组织，坚持自愿捐款的原则，不再提出建议捐款数额。

另据了解，阜宁县今年下发的捐款文件并没有执行，在媒体报道后被叫停。

盐城市红会透露，盐城一些县(市、区)早在2006年起以地方党委政府办公室的名义下发《关于开展“博爱万人捐”活动的通知》，明确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捐出一日工资，支持红会开展人道救助工作，2008年，又明确了一日工资的具体数额。

包括阜宁县在内的江苏盐城下辖各县市区，多年来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级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为当地红会的“博爱万人捐”活动捐款，并按级别规定数额。南都报道后，此举遭到质疑。

近年来在江苏盐城，这类“强捐”现象颇为普遍，最早可追溯到2004年的一份会议文件。一般情况下，涉及的县市区以文件的形式要求各级干部向红会捐款，措辞不一，但均规定具体金额。阜宁的“强捐”文件曝光后，江苏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李新平回应称，这些财政供养人群的收入是相对稳定的，对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觉得一点不过分”。又引发新一轮的质疑。

据新华社消息，盐城市红十字会秘书长李书万昨日在接受采访时说，盐城市红会高度重视近日有关阜宁县发文要求为红会捐款的报道，立即召开相关会议，并决定从现在起各级红十字会募捐活动都必须严格坚持自愿捐款的原则，不再明确具体捐款对象、捐款数额。

盐城市红十字会表示，将认真汲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完善组织“博爱万人捐”活动的方式方法，依据有关法律开展红会募捐活动，并及时对捐款和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布，同时接受政府财政、审计部门的审查监督，切实保障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 事件回顾

### 江苏阜宁发文要求为红会捐款

近日，有网友上传一份落款为江苏阜宁县委办的通知文件。这份等级为“特急”的通知要求各级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为当地红十字会举办的活动捐款，并按级别明确了捐款数额。阜宁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南都记者证实上述通知属实，但“这更多的是为了帮红会宣传‘博爱万人捐’活动”。数额“是原则上的，实际全凭自愿，红会没有强制捐款的要求”。

### 江苏盐城连续九年发文要求为红会捐款

江苏阜宁县委办下发特急通知文件，要求各级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为当地红会捐款，此举在网上遭到质疑。南都记者获得的最新资料显示，近年来在江苏盐城，这类“强捐”现象颇为普遍，最早可追溯到2004年。一般情况下，涉及的县市会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级干部向红会

捐款，措辞不一，但均规定具体金额，不局限于阜宁一县。

### 江苏红会副会长回应“强捐”：不过分

包括阜宁县在内的江苏盐城下辖各县市区，多年来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级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为当地红会的“博爱万人捐”活动捐款，并按级别规定数额。此举遭舆论质疑。对此，江苏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李新平日前回应，这些财政供养人群的收入相对稳定，对他们提这样的要求，“我觉得一点不过分”。

来源：南都网

地址：<http://nandu.oceee.com/nis/201305/23/55463.html>

[【返回目录】](#)

## 9 个灾后重建项目签约共计投入 4000 万元

5 月 22 日下午，首批“4·20”芦山强烈地震社会组织灾后重建项目需求对接暨签约仪式在雅安举行。这批项目共计投入资金和物资超过 4000 万元。

在签约仪式上，中国福利基金会等 8 家社会组织分别与雅安市教育、卫生、团委等部门和芦山、天全、宝兴等重灾区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签署了 9 个灾后重建项目的合作意向协议书。

其中包括，中国福利基金会计划投入 1500 万元为灾区 0 至 16 岁儿童及全体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师生提供“免费午餐”；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会计划投入 1000 万元，为灾区 18 岁以下参加了农保、社保的儿童和因地震伤残的 18 岁以下儿童提供大病医疗保险；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捐赠 730 万元，分别用于灾区青少年宫建设和资助灾区贫困学生；长沙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 300 万元用于资助灾区困难学生及援建青少年活动阵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捐赠 110 万元用于灾区壁挂式科技馆、儿童科技文体活动室建设；成都餐饮爱心食堂将为灾区提供 1500 套“爱心自助小厨房”。

下一阶段，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社会管理服务组将依托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站)，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协调服务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援助灾区的项目落地。

来源：四川在线

地址：<http://www.wccdaily.com.cn/shtml/hxdsb/20130523/101262.shtml>

[【返回目录】](#)

## 雅安地震月度盘点：基金会募款金额已超汶川地震

1. 基金会中心网建立统一信息披露平台，方便政府、媒体、公众零成本监督，未来三年将持续跟踪善款流向

截止 2013 年 5 月 19 日 8 点 02 分，根据基金会行业第三方信息披露平台——基金会中心网基于互联网数据信息的整理统计，全国共有 144 家基金会已参与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共募集善款和物资已达 13.79 亿元人民币。其中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募集 2.85 亿元、中国扶贫基金会募集 2.48 亿元、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募集 1 亿元、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募集 7587 万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募集 7056 万元。基金会已支出款物合计 3.05 亿元人民币。基金会中心网已建立在线专题详细披露善款募捐和善款流向的数据和信息，并将在未来三年跟踪善款流向并定期发布报告，保证实时在线向公众公开，方便政府监管部门、广大媒体和公众随时查询监督。网址：

<http://www.FoundationCenter.org.cn/newindex.html>

2. 已有 62%基金会披露支出善款用途，51%基金会披露善款灾后重建使用方向，和汶川地震灾后成鲜明对比

地震发生后 12 小时内，基金会中心网同全国参与救灾的基金会建立联系，发布信息披露标准，并同基金会保持热线沟通。截止 2013 年 5 月 19 日 8 点 02 分，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等 89 家基金会已披露了善款用途，主要用于灾民生活必需品的提供以及教育、卫生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灾害救援工作已进入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阶段，根据本次地震灾区恢复及灾区群众的需求，基金会募集的善款将投入灾后重建阶段的各类软、硬件的建设。144 家基金会中有 74 家已明确了未来善款的主要使用方向，而如何有效地使用善款也将成为下一阶段各基金会面临的巨大挑战，其余没有披露善款用途和资金使用计划的基金会也将成为未来公众关注的重点之一。

五年前，汶川地震之后，中国救灾捐赠高达 760 亿，其中基金会募集的资金达 13.75 亿，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邓国胜教授团队的调查结果，在一年之后，仅有 4.7%的捐赠者非常清楚捐赠资金的流向，三分之二的公众明确表示不太清楚捐赠资金的流向。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国内 35 家基金会于 2010 年共同发起成立了基金会中心网，建立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平台，建立透明健康的公益文化。

3. 《中国基金会 4.20 救灾行动自律联盟公约》即将发布，行业自律迈上新台阶

为贯彻民政部《关于四川芦山 7.0 级强烈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精神，响应中国慈善

联合会《关于动员会员和社会各界救援雅安芦山地震灾区的紧急倡议》，基金会中心网与多家基金会月 4 月 23 日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基金会 4.20 救灾行动自律联盟”。该联盟由参与芦山地震救援、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的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自愿加入。自律联盟即将发布《中国基金会 4.20 救灾行动自律联盟公约》，参加自律联盟的基金会承诺将全程公布接受、拨付和使用捐款的情况，接受捐款人和社会监督，接受政府监管，如实回答公众和媒体质询，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 4. 在线募捐平台和基金会中心网平台强强联手，募集和监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基金会中心网作为专业的第三方信息披露平台，接受微公益平台的委托，联手启动#透明微公益#行动，披露在该平台上发起项目的 15 家基金会，公示其 36 个项目的善款使用情况，确保所有善款透明公开，对 10 万捐款用户负责。根据信息披露专题显示，参与微公益平台筹款的基金会已投入灾区款物合计 1.6 亿元，主要涉及灾后教育、卫生医疗和基础建设等领域。在今天信息时代，专业的在线募款平台同专业的信息披露平台的合作，为建立更有公信力和可持续的公益模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用统一的信息披露平台，增强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对善款流向的监督。

#### 5. 募款额达 5000 万以上的共有 6 家基金会，其中 4 家中基透明指数满分

根据统计显示，144 家基金会筹集赈灾善款总额共计 13.79 亿元，而接受善款在 5000 万元以上的 6 家基金会在中基透明指数排名均比较高，其中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均以 129.4 分的满分表现并列第一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也名列前 100 名。此 6 家基金会接受赈灾善款总额达到 8.4 亿元，占据了 144 家基金会接受善款总额的 60% 以上。透明度逐渐成为新时代公益慈善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来源：基金会中心网

地址：<http://news.foundationcenter.org.cn/html/2013-05/67623.html>

[【返回目录】](#)

## 芦山地震灾后重建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5 月 20 日下午，距离四川 4·20 芦山地震整一个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四川 4·20 芦山地震灾后重建研讨会”在成都召开。这是继 5 月 12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首度发布《4.20

芦山地震灾后重建需求评估报告》后的又一举措，更是公益组织推动政府、民间组织、专家学者共同参与芦山灾后重建工作的首个多维度协调会议。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王行最；秘书长刘文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院长侯水平、副院长郭晓鸣；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总会计师廖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工场协力中心总干事贺永强；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江海、机关党委书记赵京东；雅安市副市长廖磊、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处长邓超；北京瑞森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裁段德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经济发展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四川大学等专家学者；雅安市扶贫移民局、发改委；天全县、宝兴县、芦山县扶贫及发展改革等相关部门领导；四川地区公益机构代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公益时报、经济观察报、四川日报、四川卫视等媒体记者代表共计 100 余人参加了研讨。

与会人员通过交流和研讨希望为芦山灾后重建搭建一个沟通与合作平台，促进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整合资源，有效衔接，以灾区和受灾群众的需求为本进行理性重建，优化配置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阶段资源，进一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让灾区和受灾群众在灾后重建和生计发展中获得最大利益。

#### **政府部门介绍芦山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和思路**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邓超、雅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廖磊在研讨会中分别介绍了四川省政府 4·20 芦山地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思路和雅安市芦山地震灾后重建的策略和规划，为公益组织参与灾后重建工作提供衔接接口和工作渠道。

#### **公益组织发布芦山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和思路**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工场协力中心总干事贺永强分享了各自机构在灾后重建策略与思路，将在各自熟悉和擅长的领域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根据前期形成的灾后重建需求评估报告，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布芦山灾后重建整体思路，力求使灾区民众利益最大化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分享了从灾难到复兴——建设灾损社区防灾与发展能力的主题报告，报告中阐释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救灾工作定位，遵循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宗旨和理念，以扶贫为核心，关注因灾返贫和因灾致贫的问题。

中国农村每年因灾返贫的人数超过 1000 万，是导致贫困的一大成因。在此次地震中，很多受灾户房屋倒塌、受损，多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重返贫困。芦山地震发生后，雅安地区贫困人口从原有的 41.68 万升至 138.1 万，因此，利用灾后重建机会，促进社区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和规模化经

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市场参与能力，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后重建工作的重要方向。

中国扶贫基金会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已经累积了5年的经验，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到2010年的玉树地震，两次灾害共投入资金6.36亿元，其中灾后重建资金投入4.47亿元，灾后重建资金占比70.28%。

在汶川地震后开展的农村经济组织探索——民乐村模式的基础上，在玉树地震灾后重建中投入资金300万元开展了甘达村运输合作社项目，该项目成效显著，形成生计支持初步系统，截止目前，甘达村运输队累计收入375万余元，纯利近300万元，其中财政补贴固定资产投资70万元，建成办公场所一处，占地1000 m<sup>2</sup>，建筑面积近400 m<sup>2</sup>；实现分红三次，累计分红资金、物资120万元；村庄人口由不足1000人，增至目前的1054人，许多因为贫困迁出的人口逐渐回迁；运输队主业由工程运输向粮油批发转型并初见成效，截至2013年3月15日，粮油批发试运营5个月实现收入60万元，纯收入9万元。2011年末至2012年初，玉树发生严重雪灾，整个玉树州平均减畜率达20%，甘达村运输队前后出动载重40吨的大货车20台次，为牧民购买、运输饲草料，最终实现了甘达村1万头牛羊零损失。

针对芦山地震，中国扶贫基金会结合多年地震灾害重建经验，提出的重建策略是以生计类项目为重点，以促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为手段，兼顾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自主能力的发展。关注并支持贫困社区的产业发展、建设以弱势群体为核心的社区服务和照顾系统、提供社区就业机会和金融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公共服务领域、注重培养与灾民共同发展的组织和能力等五大重点领域。

同时，中国扶贫基金会还就政府灾害重建工作提出了解、沟通，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尊重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保护捐赠者的积极性；引导受灾群众理性把握建房节奏，以免价格抬高，增加建房成本等三项建议；就公益组织参与重建工作提出了积极主动与政府规划衔接；加强横向沟通与协调；灾后重建很难一蹴而就，应有三到五年的准备；注意发挥当地的资源和力量；社区自组织能力是社区防灾能力的关键要素之一等五项建议。

### **研究成果公开分享，助力灾区理性重建**

研讨会上，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向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局、雅安市政府赠送了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出版的《5·12行动启示录——汶川大地震社会响应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深入总结了5.12汶川地震紧急救援、过渡安置、灾后重建及NGO参与抗震救灾的宝贵经验等，对于芦山地震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以及未来更加理性地参与抗震救灾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 **钱不是花得越快越好，而是花得越有价值越好！**

对社区而言，灾害无疑是可怕的灾难，但是灾后重建带来的外部资源，又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能否将难得而有限的社会资源用好，不仅关乎项目执行者的声誉，更关乎灾损社区群众的福祉。这

不仅需要对需求的准确了解，对项目内容的理性思考、设计和强有力的执行，更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的沟通和协同。10 年来参与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的经历，让中国扶贫基金会明白相关利益方应有的一个共识——钱不是花得越快越好，而是花得越有价值越好！

来源：中国扶贫基金会

地址：

<http://www.cfpa.org.cn/newDetail.action?articleId=e8b6133dd3da4c489fd84ee96feb596e&p=1c626f8195104222b17f2d4505982ba5>

[【返回目录】](#)

## 壹基金的算盘：为每个捐赠人开发票

297 万人次捐赠了 2.79 亿元。芦山地震两周后，统计上来的数字让壹基金理事会和秘书处感到压力更大了。“钱越多，我们越怕对不起捐赠人，担心辜负了大家的信任。”5 月 7 日晚，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对《中国企业家》说。

当天白天，壹基金刚刚开过紧急理事会，晚上杨鹏约了一些记者通报会议情况。理事会是壹基金最高决策机构，按常规一年只有两次。这次紧急理事会是根据突发灾情临时加的。

深夜 11 点，壹基金北京办公室里仍人来人往。“知道一张 excel 表格的极限是多少条数据吗？”壹基金合作发展部总监霍庆川从座位上站起高声地考问记者。“你们肯定不知道，是 9 万条啊！”

芦山地震发生后，壹基金合作发展部和负责前线的灾害管理部是最忙碌的两个部门。地震当天合作发展部就建立和对接了捐款通道，包括阿里巴巴、腾讯、新浪的网络通道以及招商银行的银行通道。随着捐赠人数的剧增，合作发展部的工作量也剧增，特别是开发票的工作。

舒敏是壹基金上海办公室员工，任合作发展部副总监。地震后，她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就是开发票。年初，壹基金印制了 1 万个发票夹，“按照去年的用量，觉得今年怎么着也够用了。没想到地震了，我们又加印了 2 万个。”

壹基金的发票夹是专门为捐赠人们准备的，原则上每个捐款超过 100 元人民币的捐赠人，只要留下完整的信息，便可以收到来自壹基金的捐赠发票，而由设计师志愿者精心设计的发票夹，则会与发票一起到达。除了壹基金的口号“尽我所能，人人公益”外，上面还印有壹基金理事之一马云的话：“世界的改变不仅因为你的 1 元钱，更源自你心的改变。”

4 月 21 日，即地震第二天，壹基金申请的机打发票机器到了，合作发展部开始测试机器、整理

数据。在其建立的多个支付通道中，支付宝和新浪微公益的数据可以直接导出为办公表格，这个部门的人也第一次看到了一个 excel 表格的极限是“9 万条数据”。目前他们已经得到了 20 多份这样的表格。

不论捐赠额度的大小，每一张发票的开出，至少都要经历“到账-核实个人信息-发票打印-封装-填写快递单-寄送”这几个环节。截止到发稿前，壹基金统计到的发票需求有 2 万多份，已开具发票 7000 张左右，此外还有 8000 多条来自银行汇款通道的信息，需要他们人工录入到系统中再做打印。

4 月 22 日开始递送发票。这一次，圆通快递公司捐赠了发票寄送服务。在壹基金的合作伙伴中，这样以服务捐赠取代现金捐赠的企业还有很多，譬如壹基金位于上海的呼叫中心，便是一家企业以捐赠形式提供的服务。

壹基金第一时间寄出的捐赠发票在微博上引起了轰动。许多捐赠人在网上“晒”起了发票：“收到壹基金的快递，是一张捐款发票，你捐款这么多年，可曾收到过发票？这种被重视的感觉真好。”网友“Ms 丁丁猫”在网上写道。4 月 26 日，壹基金芦山地震捐赠人指南上线，有关捐款通道、发票开具等信息都被公布出来。这期间，支付宝的微博客服和壹基金的官方微博也在网友的微博下留言，请对方去查看更详细的信息。

对于壹基金的捐赠人来说，他们的权利还不仅是获取发票，而且还得知道壹基金的资金使用是否符合自己的意愿。地震之后，壹基金收到的 2.79 亿元捐赠中，约有 2.4 亿元是捐赠人指定用于芦山地震的，但究竟这些钱是用在灾后的过渡安置阶段还是重建阶段，捐赠人可没有指定得那么清晰。

“从捐赠人的角度，他们通常希望壹基金做事快点，赶快去救灾民，赶快花钱。但从壹基金的角度看，如果花钱快了，动作就容易变形，就可能把这个钱用到不太恰当的地方。”杨鹏说，另外大额捐赠人与小额捐赠的意愿也有明显区别，这些既需要调研，也需要壹基金理事会最后决策。

5 月初，合作发展部的工作人员从 50 笔百万级捐赠中抽取了 11 笔，从捐款 5 万-10 万元的个人捐款人中抽取了 2 名分别打电话询问其对捐款使用的意向，并介绍了壹基金希望将重建的费用用于减防灾能力建设上的意向。其中有 4 家企业的负责人当即表示可以，另外 6 家企业的对接人也说可以。“有一家企业则明确提出，他们不希望把钱用在减灾上而是用在教育方面。”舒敏说。

在询问捐赠人意愿同时，壹基金的前线人员，在秘书长杨鹏、灾害管理部总监李弘的带队下，一直在与雅安市、县、乡政府沟通和会面，接洽的是当地的教育局和卫生局，了解他们需要哪方面的支持，而壹基金能做什么。后方的工作人员则联系了四名地震灾害和灾后重建专家，为壹基金的灾后重建提供方向和专业的分析。以这些为基础，5 月初壹基金秘书处形成了一份报告。

5 月 6 日下午，除了灾害管理部的副总监沙磊依然留守雅安外，壹基金其他各部门的总监及副

总监纷纷从深圳、上海和成都飞赴北京，准备参加次日上午召开的紧急理事会。当天晚上，秘书长和全部项目总监又对报告进行最后一轮修改，直到凌晨 3 点。

5 月 7 日 8 点 30 分，壹基金紧急理事会在招商银行北京分行的一间会议室召开。执行理事长王石、创始人李连杰、理事长周其仁及其他理事或代表均参会。作为大额捐赠人之一，中国平安集团的马明哲列席理事会，并与壹基金一起启动了儿童平安计划。

会议开始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蒋海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高孟谭、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顾林生等四位专家给壹基金理事会上了一堂地震和灾后重建的课。

“这是壹基金理事会的特点，大家在形成决策之前，希望有点科学依据，不是拍脑袋。”杨鹏说，这些专家在各自的领域都比较权威，所以请他们过来，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一下情况。

上完课后，杨鹏代表秘书处向理事会汇报了雅安救灾的阶段性成果，并提交了雅安灾后短期工作计划和中长期重建框架。框架需要的资金安排分为三个阶段（见表）：紧急救援阶段为资金 3000 万；过渡安置阶段资金安排为 5000 万；使用资金最多的是灾后建设阶段，此部分的资金安排为 1.4 亿元，主要用于龙门山地震带灾害研究管理中心和建四个减防灾示范村社。

在框架的讨论环节，11 位理事争论得较激烈。资金分三个阶段支出，而每个阶段又有许多子项目，比如过渡安置阶段就包括安置点生活卫生保障还有学校生活配套及网络教育。安置点里又有公共厨房、浴室、净水供应、儿童中心等。

对此，理事中有人强调前一阶段，有人强调后一阶段；有人关心孩子，有人关心互联网。所以理事们就在资金安排比例上不断调适。壹基金的创始人李连杰在关注雅安的同时，也较关心壹基金的月捐项目。他觉得一次灾害只是一个考验，但基金会不能靠灾害活着，要做更持续的模式，更提倡“人人公益”的理念。

“这会开得特有意思，我觉得有点‘共和’、‘民主’的味道。”杨鹏对本刊说。当两个平等的人在一块做生意时，就需要契约精神；当两个平等的人一起做公益时就要有民主精神。壹基金理事会有 11 位理事，一人一票决定壹基金的钱怎么花，11 个人可能有 11 种想法，合并同类项之后也得三四种不同想法，但壹基金只能做两件事，怎么办？“所有人不论社会影响力大小，一人一票，按多数选择决定。”

对于芦山地震定向捐款使用原则的动议，理事们 11 票赞成通过。原则为：个人小额捐款用于中短期紧急救援和过渡安置；企业捐款通过沟通引导其将大额捐款用于中长期灾后建设。这一原则符合秘书处的前期调研，小额捐赠人更愿意看到一袋袋的米，一栋栋房子，而企业捐款数额较大且集中，沟通成本相对低。在壹基金的建议下，淘宝同意将 500 万元用于建设一个灾害教育馆。

在花钱最多的灾后重建项目上大家争议不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往往出于三大原因：一是住房抗震性能差；二是个人和家庭成员缺少自救能力和必要自救工具；三是社区缺少有效的自救组织及设施。“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没有把灾害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但事实上，灾害出现后，应对的顺序永远是家庭自救和社区（邻居）自救，其次才是外部的政府、社会救援。”杨鹏说。

因此，壹基金把灾后重建的理念聚焦在建设未来的减防灾体系上。所有理事都同意这一思路，并将壹基金雅安灾后建设中长期规划思路做出一个饼图。

未来四年规划中实施的龙门山灾害管理研究中心和四个减防灾示范村社都是这一思路的体现。龙门山研究中心的职能主要有：普及地震灾害知识，向政府提出政策和法律建议，建立救援训练基地和建立社会回应救灾物资储备库网络。

壹基金拟建中的物资储备库网络准备将四川地震带附近拥有大型仓库和运输能力的国外、国内、省内的大企业联系起来，建成一个联盟关系，平常大家在一起开会，灾害来时，这个网络系统就会启动。

壹基金将示范村地点选在了芦山地震中损毁较重的天全县的四个村。在这个项目中，壹基金找设计师给村子出整体设计。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与政府配合，根据规划为村民提供一些钢材、水泥、建材，培训当地的建筑施工队，为村民提供低价建筑施工。建设的标准是高抗震、较舒适、低成本且能够适应当地民俗习惯和文化。

在资金方面，政府、壹基金和村民各出一部分钱。按照现在建筑成本测算，大概 15 万元左右可修复一套。四个村，每个村 100-200 户，对这个项目壹金的投入将超过亿元。

村社住房抗震能力提高后，壹基金会组织家庭自救能力培训，以提高整个社区的自救能力，同时建立社区与外部企业、基金会、NGO 的联系，这些是示范村的关键。

5 月 8 日上午，壹基金工作人员纷纷从北京回到各自所在的城市：舒敏依然在与大量的发票做斗争，并且即将启动与每一个大额捐款人的沟通，以期能获得他们对捐款用途的认可，说服他们将资金用于也许会长达四年的灾后重建；合作发展部总监霍庆川依然需要保持与捐赠人、战略伙伴的密切联系；灾害管理部总监李弘则回到了雅安。

这次会议后，直到 8 月的理事会召开前，灾害管理部要在当地完成过渡安置阶段的工作，并且通过调研、评估等，与专家小组一起，参与确立中长期规划方案，以便在 8 月的理事会上形成最后预算方案。

5 月 7 日中午，壹基金紧急理事会刚结束，两位理事李连杰和马化腾就跑到互联网大会上对话。期间，李连杰回答了媒体提问。从武打明星到公益领袖，李连杰现在的角色更像是个社会活动家。

芦山地震，作为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迅速筹得善款，在善款使用上，壹基金是怎样决策的？

李连杰：上午的紧急理事会上，我们一直在研究善款的有效运用，297万人次，近3亿捐赠额对壹基金来说是个考验。经过理事们激烈的意见碰撞后，壹基金理事会已就芦山地震定向资金的阶段支出计划形成共识。

鉴于汶川和玉树地震的经验，有效救援不会是完全迎合市场所有个体捐款人意愿的。我们有个原则，政府做的，我们不做，民间的灾后重建是做政府没有做的。壹基金会与其它民间基金会多沟通，避免重复项目。

如何实现善款使用的公开、透明？

李连杰：今天为什么来参加互联网大会，因为壹基金要利用互联网技术，让每笔善款、每个项目的流程公开化，这是个新尝试。在经济发展的今天，每个人都可以做慈善。壹基金的梦想就是实现日行一善，要完成这个梦想一定离不开互联网，所以壹基金最开始找平台，阿里巴巴、腾讯。今天上午，壹基金理事会还跟平安集团在谈，通过互联网把双方平台打通的问题。流程公开化是今年1月份理事会讨论通过的，芦山地震使这一进程放缓了，希望我们下半年能实现。流程公开化后，捐款人通过网络可以清楚地看到善款的执行流程，如何讨论、投票情况、谁签的字等等。现在壹基金的钱托管在银行，今后我们流程会托管在一家网络科技公司。壹基金从创立到转型，都渴望做到上市公司的管理结构，公开、透明，每一位捐款人都是股东，壹基金是帮助股东打工的。

作为民间慈善机构，壹基金的这些经验，能否对公信力受质疑的红十字会形成借鉴？官办与民间慈善机构在当下的慈善环境下，应该怎样扮演各自的角色？

李连杰：官办和民间慈善机构的角色，是壹基金早期就在想的问题。整个社会结构分三种责任，政府、企业团体和公民。从专业角度上讲，不可以拿红十字会和壹基金做对比，红十字会是全球组织，壹基金只是中国民政部门监管的一家民间公募基金组织。在历史长河中，红十字会一直在救灾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中占主导地位。中国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基金会能做到像红会那样，构建起了省、市、乡、镇甚至小到企业的庞大体系。社会关注红十字会是好事，但要给它时间。

壹基金不可能代替红会，千万别把壹基金捧到道德的最高点上，壹基金也会犯错，不是神。壹基金要发挥公民的力量，做一个可复制的民间救助平台。

搭建人人公益平台前期，壹基金聚拢众多企业家群体，企业家对公民慈善力崛起的作用是什么？

李连杰：企业家进来有两个作用：一，马化腾、马云、柳传志、马蔚华等这些企业家控制的资产都是几百亿，他们不会贪图壹基金这点小钱，他们的加入能体现一种集体公信力；二是，可以汇集成一个集体的平台，比如招商银行平台的金葵花信用卡体系，就是把银行客户对接到壹基金平台上，同理，腾讯、淘宝等平台都对接到了壹基金，这些平台上的渠道是壹基金个体捐赠的重要途径。

企业家比其他人更敏锐，他们看到了公民社会人人公益的需求、可持续公益组织的需求，所以

大家才进来，共同把关。从一开始所有的理事都读懂了壹基金。

早期，我依靠个人的影响力去号召全社会来做人人公益，现在我们 11 位理事都在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做这件事。今天的壹基金是大家做起来的，而我正在往后退，退到壹基金没有我个人的色彩。

来源：环球企业家

地址：[http://www.gemag.com.cn/14/32332\\_1.html](http://www.gemag.com.cn/14/32332_1.html)

[【返回目录】](#)

## 壹基金捐赠人遭遇免税难题 民政税务“踢皮球”

近日，由于壹基金的免税资格在异地取得认可有争议，有 3000 万元捐款在进入壹基金后，无法办理免税，另有近 1000 万元的捐款，由于免税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捐赠企业仍处观望状态，不敢贸然进行捐赠。

企业所得税法为鼓励企业参与公益慈善，明确公益性捐赠享有税收优惠，而壹基金捐赠人遭遇的问题，将一个鲜为人知的政策“灰色地带”展现出来。

### 壹基金捐赠人遭遇免税难题

在咨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北京依据壹基金的捐赠发票，办不了企业所得税的抵扣。

4 月 20 日芦山地震发生后，在华 NEC 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NEC)发动其全国十几个相关机构及公司员工为地震捐款，并选择通过深圳市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金)进行捐款。

壹基金自 2011 年在深圳民政局注册之后，具有地方公募资格，经过民政局、财政委、国税局、地税局审批后，在同年 5 月获取了免税资格，并可对捐赠方开具广东省接受社会捐赠专用收据。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 的部分，准予扣除。

而办理扣税的凭证即为捐赠收据。据壹基金秘书长杨鹏介绍，当 NEC 的工作人员在咨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北京地区依据壹基金的捐赠发票，办不了企业所得税的抵扣。

该会计师事务所的解释为，由于壹基金并未出现在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民政部联合审核确认的《2012 年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团名单》中，因此他们默认壹基金并不具备税前扣除的免税资格。

除了 NEC，还有一些向壹基金捐赠的企业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比如，广州雅芳有限公司、贝恩公司等。

“获得 2012 年税前扣除资格认证的公益机构均在民政部注册成立，而壹基金的注册地为深圳民政局，因此并不在此份名单之中”，壹基金传播部副总监姚遥解释，他们一直认为，壹基金所开具的捐赠发票全国通用，“这样的结果，让壹基金非常尴尬”。

受此影响，有 3000 万元捐款在进入壹基金后，无法办理免税，另有将近 1000 万元的捐款，由于免税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捐赠方不敢贸然进行捐赠。

### 是否免税民政税务踢皮球

壹基金在广东省外地区也同样具有捐赠免税资格，但在执行中却碰到了各地方税务部门对政策理解不同、执法不一的情况。

深圳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具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是否在全国有效，让壹基金感到困惑。

记者拨打了江苏省、上海市 12366 纳税热线以壹基金遇到的情况为例进行询问时发现，两地地税局接线人员均明确表明，企业是否能进行公益捐赠税前扣除，需要参照《2013 年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团名单》，而这份名单在今年仍未发放，因此并不清楚壹基金是否具备免税资格。

更奇怪的是，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税务部门执行的结果差异迥然。

“上海市税务部门比较特殊，有的区一级税务部门即使参照名单也说可以进行免税，有的区则表示不可以”，壹基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

税务部门参照的标准是财政部、国税总局及民政部每年联合发出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团名单。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则表示，在 2010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中已有明确规定，出现类似壹基金的情况，应属于税务部门执行中的问题。

徐建中并没有明确指出通知的具体条款，但根据其第三条对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民政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税务和民政部门每年分别联合公布名单。名单应当包括当年继续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和新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壹基金在广东省外地区也同样具有捐赠免税资格。

但在执行中却碰到了各地方税务部门对政策理解不同、执法不一的情况，让壹基金仍疲于与各地区税务部门来回沟通。

### 灰色地带并未有明确立法

对社会组织来说，没有限制性规定，捐赠票据即可以在外省使用，但地方税务部门可能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认为没有明确规定就不予认定。

公募基金会分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依据是基金会募捐的地域活动范围。

壹基金及其捐赠方遇到的问题源自壹基金是一家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其募捐活动受地域限制，但可以接受注册地以外地区个人或企业的捐赠，可外地税务部门是否认可其出具的捐赠收据则无明确规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表示，按照现行法规，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共同发布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中，并没有规定税前扣除能否异地。

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社会组织来说，没有限制性规定，捐赠票据即可在外省使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NGO 研究所所长邓国胜将这种情况称为“灰色地带”。

当免税资格认定的权利下放给各个地方的相关部门，如何跨地域进行减免税，就只能看各地方税务部门自己的理解。

邓国胜表示，从法律角度来说，只要是公益慈善机构具有免税资格，开出的捐赠发票，捐赠方理应享有减免税的待遇。

不过他认为，出现这种问题是由于各地的地方保护，他们认为没有明确规定就不予认定，也可能是地方税务部门考虑到具有免税资格的公益组织有可能成为企业用来避税的工具，因此并未对外省名单进行互认。

他举例，如果外省有一家较差的公益组织，并未达到本省对于公益组织的要求，但捐赠方仍享受减免税的待遇，这会给当地地方税务造成较大流失。

“如果企业精打细算，可以通过免税将捐赠部分全额抵消”，壹基金的财务人员表示。

### **应统一免税资格认证**

最好国家税务总局能有统一规定，各个省认定的具有免税资格的公益机构，在其他省也同样具有减免税的资格。

“壹基金所面对的问题早就已经发生过，只是这次芦山地震灾后捐款，问题更突出了”，邓国胜说。

邓国胜表示，事实上，免税优惠异地不认可的问题并非只有壹基金一家遇到，而是地方性公募基金会普遍都存在的问题。

对于目前出现的问题，深圳民间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已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并希望得到

解决，同时他们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对壹基金所遇到的问题予以明确，这样就不会造成各地理解存异的情况。

“最好国家税务总局能有统一规定，各个省认定的具有免税资格的公益机构，在其他省也同样具有减免税的资格”，邓国胜说。

贾西津表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应当尽快打破公益机构的属地化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并不符合现代公益的原则。

贾西津说，此前中国对于社会组织采取控制化的思路，要最大限制地把社会组织管理住，对于公益组织来说，横向有业务主管，纵向有分级管理即属地化管理。

这种基于控制性思路所规定的管理政策，当社会组织要大发展的时候，冲突在技术层面就成了限制性条件。

“现在的管理思路已经跟不上慈善行为了”，贾西津说。

最近一段时间，壹基金通过深圳市民政局与民政部沟通，再由民政部联系国家税务总局，由国家税务总局与北京地方税务局沟通，结果是，现在北京地区已经承认了壹基金所开具的广东省捐赠收据。

但这样高成本的沟通，对于壹基金和类似壹基金的公益组织来说，何时才能结束，仍是个未知数。

来源：京华时报

地址：[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3-05/20/content\\_1990544.htm](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3-05/20/content_1990544.htm)

[【返回目录】](#)

## 爱心赶走饥饿：免费午餐将开通网游捐赠平台

当许多年轻人已经对每天一顿午餐感到习以为常时，在一些贫困地区，一两个冰冷的红薯就是孩子们所能品尝到的“美味午餐”，还有更多孩子中午只能靠操场上的嬉戏玩耍暂时忘记饥饿；当一些年轻人还在为减肥而发愁时，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由于营养跟不上而发育不良。贫困地区很多孩子上课期间由于饥饿而无法集中精神认真学习……

5月20日是中国学生营养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新的合作伙伴《魔兽世界》加入了免费午餐，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能够免于饥饿而努力。5月24日起，中国玩家可通过购买虚拟宠物—燃烬猫仔（俗称：火猫）的方式献出爱心。在5月24日至6月23日期间，火猫的全部销售收入将捐献给免

费午餐，为贫困地区的孩子送上朴素温暖的爱心午餐。

“免费午餐”是由邓飞等 500 多名记者和国内数十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该项目倡议每天捐赠 3 元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它致力于帮助因家庭贫困而无法享受营养午餐的学生；同时呼吁更多爱心企业和人士加入到活动中，通过社会捐助的力量，对一些贫困山区学校简陋的厨房条件予以改善。

孩子和教育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此次合作，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年轻人对于贫困地区教育和学生营养问题的关注，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行动起来，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免于饥饿。

此次捐赠数额将在捐赠期结束、相关销售收入统计后，连同善款最终的受益学校，进行公布。

来源：凤凰网公益

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05/23/25641809\\_0.shtml](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05/23/25641809_0.shtml)

[【返回目录】](#)

## 民间康复机构面临注册难困境 期待政府购买服务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月，由于 4 月 2 日是“世界孤独症日”，孤独症患儿的妈妈温洪忙得不可开交，又是举办论坛，又是要接待来采访的记者。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对孤独症患者的关注度又逐渐趋冷。

2012 年，温洪和另外 4 位孤独症患儿的妈妈一起创办了康纳洲孤独症家庭支援中心（以下简称“康纳洲”），希望建立一个专门为患有孤独症儿童提供服务的民间公益组织，使得社会对孤独症的关注不止于一年一度的孤独症日。可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康纳洲在注册和运转时都遇到过诸多障碍。

其实，与温洪她们创建的康纳洲一样，很多民间公益组织在注册时都需要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而这样状况或许将得到改变。

温洪和她的同伴们注意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出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决定》中提到，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这些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希望这个规定能够尽快落实。”在温洪看来,《决定》中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规定,不仅能够使更多的民间力量进入孤独症儿童服务领域,其他类别的民间力量也能藉此机会成立社会组织,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 缺失的社会服务

将面团擀成面饼,再用模具印出各种图案,最后放置烤箱烘焙成饼干……这一套制作饼干的过程在普通人眼中算不上稀奇,可对于患有孤独症的常常(化名)却是一次自我超越的过程。

从幼儿时就查出患有孤独症的常常,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如今,已经 21 岁的常常连简单的擀面饼、用模具都需要身旁的面点师傅指点才能完成。

“如果不为这些大龄的孤独症孩子提供技能培训,他们将来的生存都让人担忧。”温洪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像常常一样,在康纳洲接受烘焙技能学习的大龄孤独症孩子还有萌萌(化名)、芊芊(化名),一共有 12 位学员。”邹文说。作为康纳洲的创办人之一,邹文的儿子康康也是一位孤独症儿童。

在医学上,孤独症又叫做广泛性发育障碍,一般来说是先天的。美国精神病学会 1994 年定义孤独症的三大特点是——社会性功能缺失、沟通与交流障碍、行为和兴趣狭隘刻板。

谈及对大龄孤独症儿童的救助,孤独症社会性康复教育专家甄岳来提到了两个“零”:孤独症的孩子长大后靠自己独立生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社会不接纳这些长大的孤独症孩子,有的孩子之前所做的康复训练的效果就会退回到零。

“大龄孤独症孩子从学校出来基本都只能待在家里,很少有单位愿意接收他们和正常人一起工作。”温洪说。

相关报道提到,目前为止,中国孤独症康复机构有 500 多家,而据中国公益研究院《中国自闭症儿童现状分析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自闭症患儿数约为 164 万人。“孤独症儿童的康复培训机构很少,大部分都是民间公益组织开办的,因为对于孤独症的了解,没有人比我们做家长的更了解,更上心。”邹文说,在她看来,公立的康复机构在数量上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才迫使他们这些家长合力开办民间康复机构。

### 公益组织面临的困境

全国 500 多家孤独症康复培训机构中,多数是民间组织的康复机构,而民间组织的康复机构,往往面临注册难的困境。

据温洪介绍,民间组织康复机构的身份五花八门,有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任何身份的“黑户”。

邹文也告诉记者,成立一个民间孤独症康复培训机构要面临两个难题:一个是注册;一个是维

持。很多民间康复机构如果到民政部门注册，相应的申请身份通常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而据现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我们国家对社会组织进行双重管理，就是说，想成立一个社会组织的话，需要同时有业务主管单位和行政主管单位，这样一来就挡住了很多民间组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华俊告诉记者。

温洪对此深有体会，因为康纳洲起初也是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为了找到“婆家”，温洪为此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幸运的是，去年 7 月，温洪找到了接受他们的业务主管单位“北京市海淀区残疾人联合会”。

尽管康纳洲在民政部门得到注册，但更多的民间组织依然徘徊在民政部门之外。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所长王名介绍，“由于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很多社会组织难以获得合法身份。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就是没有注册成“民非”身份的孤独症服务机构，作为中国第一家孤独症服务机构创办人的田惠萍，也是无奈从事民间组织服务的。她的孩子在 3 岁时查出患有孤独症，由于当时社会对孤独症了解不多，公办康复机构则又是空白，在照顾了孩子 5 年之后，田惠萍决定自己成立孤独症康复机构，但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没有哪个单位愿意给星星雨做业务主管单位，最终，田惠萍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登记开业。

“我们是第一家民间组织的孤独症康复机构，但因为目前的身份需要每年向税务部门交 10 万元左右左右的税，这对我们来说负担太大了。”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执行主任孙忠凯说。

此前一直建言改革我国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王名认为，“社会组织准入的高门槛导致有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没有登记注册，这些社会组织因为没有合法身份，无法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挂靠主管单位这个政策本身就是不可取的，解决注册难就要修改这个政策。”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表示，政府要创新管理体制，降低成立社会组织的门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非政府组织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认为，双重管理审批制度正在逐步放开，但是现在只是提到了几类组织，并不是所有类，少部分放开了，实际上很多组织还是在实行双重管理审批。对于已经放开的几类组织，还没有落实到程序上，应该加快落实的进度。

### 民间组织期待政府购买服务

除了身份问题，民间康复机构面临的共同困境就是何以维持。

康纳洲从开办资金到日常的运转经费，目前为止全部由 5 位妈妈自掏腰包。“康纳洲的场地租金每年要 16 万元，加上给教师开工资，为孩子提供服务，一年下来的成本要 40 万元左右。”邹文说，

“而我们的服务除了电脑班收取极少的费用之外，基本没有来源，全是几个妈妈在往里填。”

成立更久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也面临着生存难题。星星雨执行主任孙忠凯对记者说，星星雨的场地租金加上 14 位特教教师的工资，一年下来要 80 万元左右，收取的服务费用只能填补一半开支，另一半则靠社会捐助。

“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我们会想办法维持下来，因为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提供孤独症服务，北京公办的孤独症康复机构目前有 20 多家，而民间的康复机构则有 100 多家，从服务的专业能力上衡量，很多民间组织的康复机构比公办做得还要好。”孙忠凯说，“我们每年给 200 位家长做教育培训，很多家长都在排队等着上课，现在孤独症康复机构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了。”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五届主席团副主席王新宪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像康纳洲这样的民间孤独症康复机构，对于孤独症康复市场起到补充、弥补了政府对于这个领域服务的不足。他呼吁，社会各方面爱心人士要给予民办机构更多的支持，当然也包括政府方面。

“政府和社会应当共同承担未来的社会服务项目，政府应当承担相当大的资金保障，社会组织则提供具体的社会服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在香港，政府每年的财政综合援助资金大体为 400 亿港元，其中有 100 多亿港元是直接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

事实上，在孤独症领域内，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尝试出资购买社会服务。孙忠凯介绍，由北京市朝阳区政府主办、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承办的第一期自闭症人康复指导员培训班去年就已经开班。

“星星雨为参加培训的康复指导员提供 15 个工作日的专业培训，其中 4 名学员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的 4 家康复训练机构，朝阳区的 4 名学员将享受朝阳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免费培训名额。”孙忠凯说。

与星星雨一样，康纳洲去年也争取到政府部门 36 万元的购买服务项目，为孤独症教师提供培训。“尽管这笔钱全部用来培训教师，对康纳洲本身的运营没有资助，可这样的机会也难得，是民间组织和政府一次很好的合作，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能更多的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帮助康纳洲运营和发展。”邹文说。

“政府购买的是属于政府责任内的公共服务，但是不直接由政府提供，而是由政府提供资金，以购买的形式购买民间公益组织提供的服务。”贾西津说，目前政府购买服务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地址：<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5-23/4846649.shtml>

[【返回目录】](#)

## 小心！“黑客”入侵公益圈！

万涛，中国鹰派联盟创始人，人称“黑客教父”。中日黑客大战、反抗印尼排华大战、中美黑客大战、反台独黑客战役中均有万涛的身影，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08 年汶川地震后，他有了另外一个身份——益云社会创新中心战略顾问。

2008 年汶川地震，公益组织空前活跃，一次意外的契机，万涛找到了“水利万物”的结合点，鹰盟黑客开始专注为公益组织提供信息服务。改变公益生态的“益云”由此诞生。在 4 月 20 日的雅安地震中，益云组织用自己高科技的方式在灾害救援中闪动着自己独特的光芒，见证了民间力量的成长。5 月 16 日下午，万涛在最公益讲堂现场分享了自己如何从黑客教父成为公益达人。以下为现场讨论实录：

万涛：从“黑客教父”到公益达人

万涛：2008 年 5 月 12 日之前我是个公益门外汉，半个都江堰人。从事 IT 网络安全维护方面的工作，是 5·12 汶川地震让我开始关注公益领域。5.12 地震那天，我完全没有办法联系到自己的亲人，非常着急。让我这个平常自我感觉挺好的科技人都倍感失落和落伍。我们开始思考怎样用科技方法提升公益的效率。

2013 年 4 月 20 日雅安地震当天早上，我正在参加一个公益活动，在微博上看到志愿者发出的地震信息，我第一时间往家里打电话时已经打不通了，灾区通讯线路阻断，加上大家肯定都在打电话，挤占了灾区的通信。所以我就发了一条微博，建议大家不要打电话，而是尝试利用短信、数据网络方式进行联系。还有一个强大的方法，就是打开手机 GPS 功能，获取经纬度信息准确定位自己所处的位置。

当天我们赶回加班，中午就开发出“信号弹”的应用，在手机简单按一下，就可以把你事先设好的微博、短信、紧急联系人的电话、自己所在区域的经纬度信息、当前需要求救信息发送出来，发布在后台地图上，后方救援人员可以直观简便地看到你的信息，包括你在哪儿，有什么需求等。



益云地图

益云地图：碎片化信息的终结者

在微博、微信等信息平台上，大家交流和传递灾区需求（比如帐篷、医疗、用水等）的信息量非常大，导致后台救援人员无法直观了解和清晰接收这些信息，所以我们考虑用地图的模式直观地将这些信息呈现出来，当天下午我们开始了救灾地图的开发。第二天，从物资、交通、人员服务、用水甚至危险地带的安全标注都可以在救灾地图上呈现出来。前线人员可以用手机便捷提交现场搜集的各类信息，如此可以把大量的碎片化的信息进行汇聚，后方通过微信群等方式协同运作，尽量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发生，当时我们和华夏公益雅安救灾信息平台合作，大家分别通过各自不同的渠道采集信息，自己也组建了志愿者群，很多成员是互联网公司的精英，比如深圳女人帮等，非常干练。我们组成三个微信群：一个是志愿者培训群；一个是负责做信息采集的群，将各种信息汇总录入；第三个微信群专门对信息进行核实。4月22日开始，各种信息在救援地图上已经非常丰富，分类也非常清楚，我们会根据前线、救援队、NGO、基金会的反馈，不断更新修改地图上面的问题。

总体而言，我们在雅安救助过程中遵循科技救灾、技术救灾的方式提升民间 NGO 信息的分享和沟通，在救灾行动里对信息及时处理、甄别、核实、交换，为未来更有效的救灾创造条件。

我们最近还推出了“行动地图”，可能大家忙于救援、救急，而具体活动进度大家也许还不够清楚，而这些可以在地图上展现出来，包括灾后重建工作。而且我们也增加了时间功能，大家通过“行动地图”可以清楚看到任何时间段的工作状态和进度，包括统计分析，便于以后分析总结救灾过程

中的经验、数据和行动，为下一次救灾和日常机制的提高创造条件。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我也希望以后增加更多的科技和更多技术性的因素提升民间救灾的效率和质量。

### 黑客使命与公益理想

作为一个 IT 人、技术人员，我认为未来民间组织或者救灾联合，大家要考虑的 5 个元素：（1）网络（network），很多人网络和平台不分，网络不是平台。（2）平台（platform），平台要运行，持续支持。（3）信息（information），数据才是真正的核心。（4）传播（communicate），大数据时代一定要有快速的信息传播渠道。（5）system（系统），要建立一个生态系统。这五个环节是我希望在未来的过程中看到大家一起努力构建一个生态体系支撑可能突发的灾难，以及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持续地希望去做，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面去继续发挥 IT 的公益人角色。

结语：传统的黑客是用破坏式的方式去揭露问题，还有一种黑客则是用建设性的做法来推动社会进步，不可否认，万涛就是后者。我们期待更多的“万涛”加入公益事业，共同见证民间力量的成长，助力公益事业前行。

来源：腾讯网

地址：<http://cul.qq.com/a/20130521/017986.htm>

[【返回目录】](#)

## 让环境公益诉讼真正走在“阳光”下

今年年初生效的新民诉法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但遗憾的是，在环境污染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实施不如人意，法院实际立案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依然十分有限。

备受关注的中国草根环保公益诉讼第一案——“云南铬渣污染公益诉讼案”，今年 4 月再生变局。被告云南曲靖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云南省陆良和平科技有限公司明确表示拒绝法院的调解，案件将重新回归庭审程序。

“既然被告不愿意调解，自然之友和重庆绿联会将会积极做好开庭的所有准备工作。”自然之友相关负责人日前在面对媒体时表示，原告方有信心继续通过司法途径，实现起诉书中提出的合理诉求。

至此，这场由民间组织发起的环保公益诉讼又一次陷入扑朔迷离。

事实上，今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出了规定。“《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明确指出，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副教授胡静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坦言，该条款中直接出现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的表述，这是世界范围内少有的“名副其实”的公益诉讼条款。

但至今为止，已经过去了 4 个多月，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大量增加。究竟环境公益诉讼为何当下在中国未能蓬勃发展起来？环境公益诉讼在中国发展又面临着怎样的问题？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 诉讼主体资格有待进一步明确

专家指出，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亟待进一步明确。“尽管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民诉法并没有具体界定属于‘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中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具体范畴，这就让司法机关有法难依。”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祥斌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如是说。他建议，修改现行《环境保护法》，或者由最高法院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明确界定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机关和组织的范围，鼓励民间环保公益组织积极提起公益诉讼。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建国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指出，修改后的民诉法概括性地划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范围，即“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这里有 3 个关键词：‘机关’、‘有关组织’、‘法律’，都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立法精神做进一步解释。”

“尽管民诉法对环境公益诉讼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是管辖法院如何确定，诉讼请求如何限定，原告收集证据的权力有多大？环境损害鉴定如何进行？是否要缴纳诉讼费用？原告能否放弃诉讼请求或者与对方和解？法院能否调解？能否发布禁止令？如何确定裁判的效力范围？裁判文书如何执行？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均缺乏明确的规定，这或将妨碍环境公益诉讼的进一步开展。”肖建国表示。

### 环境污染案件鉴定难度大

自然之友 NRDC 公益律师杨洋在回顾“云南铬渣污染公益诉讼案”诉讼过程时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指出，民间环保组织难以找到合适并愿意承接案件鉴定的机构，“法院要求鉴定机构必须具有环境领域司法鉴定资质，现实中非常之少。如何对鉴定结果进行正确的司法解读，鉴定质量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这些都存在问题。此外，面对高昂的鉴定费用民间组织也难以承担。”

首先是鉴定机构的资质问题。“鉴定机构是否具有资格对环境污染案件进行鉴定，这包括该单位是谁批准成立的，是否在法院名册里，等等；另外，该单位的业务包括哪些范围。我所了解的情况是，不同的鉴定机构对于业务范围有不同的表述，常见的表述主要有以下几种：农业与环保、环境微量检测，环境检测与评估、环境污染损害等。这些表述往往过于宽泛，而且定义互有交叉，对

于鉴定资格与资质的确定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诉讼部部长刘湘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其次是对司法鉴定的理解问题。“很多环境案件在诉前就需要进行鉴定，如果不鉴定就不能确定谁是污染者、不能确定损失的大小，等等，从而不利于立案。但现在也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诉前的界定不叫鉴定，充其量叫专家证言。这两种不同声音的出现，使得司法鉴定的合法性往往遭到质疑。”刘湘表示。

再次是鉴定的质量问题。“环境污染案件的鉴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鉴定人员的能力和技术水平。这方面可谓‘参差不齐’，而且很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缺少优秀的鉴定人员。很多鉴定结果拿出来后，专家再进行研究，发现有很大的质量问题。甚至有些鉴定人员对环境污染鉴定毫无概念和认知。”刘湘对此感到十分担忧。

杨洋透露，“云南铬渣污染公益诉讼案”下一步走向是将正式启动庭审程序。“启动庭审程序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鉴定评估工作，法院希望找到几家有能力和愿意承担鉴定的机构。我们联系了环保部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和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但目前并未得到确切回复。”

杨洋表示，鉴定费用主要包括：第一，对污染场地本身的技术鉴定费用。“这包括对污染范围、污染程度、污染类型的技术鉴定。”第二，还包括鉴定单位前往污染场地进行鉴定的其它相关费用，如差旅费。她表示，虽然这些鉴定费用最后会由败诉方承担，但是仍需前期进行垫付。“从目前云南铬渣污染案来看，光鉴定费最少可能就需要将近百万元。这对环保组织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 可尝试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胡静指出，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发展遭遇重大困境的情况下，赋予行政机关（此处特指跟环保有关的行政部门）以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资格，或许能探索出新的出路。

“首先是赋予行政机关以执法机关的身份。目前来看环保部门提请公益诉讼很多程度上只拥有对被告的建议权，而对被告最终进行判决的权力是在法院手里。而如果能对行政机关赋予执法机关的身份后，行政机关不需要借助其他机关就可以单方面确定被告的问题，从而直接发生法律效力。公益诉讼制度应当规定，环保部门起诉排污企业，可以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限期治理、停产停业关闭、停产整顿。”但是，胡静也强调，这种方式的适用范围是环保部门穷尽自身能力尚无法覆盖的领域。

“既然我国在短期内难以扭转环境执法方面的地方保护主义，尤其是不少地方政府对环境执法敷衍甚至抵制的大背景下，如果能利用环境公益诉讼对某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带来的后果加以矫正，何乐而不为？如果由环境保护立法赋予行政机关以执法机关的身份，提起行政处罚或者其他行政义务的诉讼，就可以在环境行政执法领域实行一定程度的矫正。”

另外，专家指出，行政机关可尝试以国家所有权代表身份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民事诉讼可以要求污染者恢复环境质量和赔偿环境损失。当然行政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国家拥有对某些环境资源的所有权，而且法律授权某些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起诉权。”胡静指出，如果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代表国家起诉污染者，事实上就承认被授权的机关能以国家所有权的代表身份行使起诉权。

那么，如果行政机关拥有了能提起诉讼的资格而不提起诉讼，又该如何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胡静表示，这就需要环境 NGO 和社会各界的共同监督。“公益诉讼需要各界参与才能推进环境管理的善治，相关制度的构建仍需大力完善。”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地址：<http://www.ceh.com.cn/jryw/2013/202602.shtml>

[【返回目录】](#)

## 淘宝挂号上线三天被迫暂停，商业不能染指公益？

上线三天的淘宝挂号被迫暂停，源于官方对网上挂号的“公益”定性，以及对“商业不能利用公益”的要求。不过，公益并不一定需要官方背书，商业机构只要规则透明也可以公平、有效率。

5月20日，淘宝网正式宣布与挂号网达成合作，推出了一款生活应用医院挂号。该平台提供了北京、上海等18个省市600多家医院门诊以及7万多名专家预约挂号服务。可以登录淘宝生活进行挂号预约。

这本是淘宝继生活缴费等生活服务之后的又一次尝试。但随后风头急转直下，三天后这次合作就在相关监管部门的压力下被紧急叫停。5月23日，淘宝网发布公告称，鉴于北京预约挂号平台的强烈要求，与其合作的挂号网将暂停链接北京地区预约挂号平台。

这是由于淘宝挂号和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的冲突。北京市预约挂号平台于2011年7月28日启动试运行，北京联通“114”是北京市卫生局通过招标确定的唯一承担统一预约挂号服务的单位。

北京市卫生局方面强调，根据规定，统一预约挂号平台的实施范围为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鼓励其他医疗机构通过统一平台提供电话和网络预约服务。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通过社会平台提供的预约挂号服务应通过全市统一平台来实现，不得另行委托其他社会平台提供预约挂号服务，以确保服务公益性。

北京市卫生局建议公众直接拨打114或登录[www.bjguahao.gov.cn](http://www.bjguahao.gov.cn)进行预约挂号，并把矛头直

接指向淘宝以及与其合作的挂号网：“公众没有必要为此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而增加信息泄露的风险，也没有必要因此增添不必要的手续，花费不必要的时间。”新闻发言人称：“任何网站、组织和个人不得对公益性、非营利性统一预约挂号平台进行商业利用。”

淘宝方面则向钛媒体解释，此次暂停不会影响挂号网在北京地区独立接入的 301 等 18 家医院，用户依然可以继续通过淘宝生活平台使用挂号网直接的免费预约挂号服务。

淘宝方面回应，淘宝和卫生部门的前期沟通可以做得更好，并且认为“不是商业机构都是为了商业目的出发做事”。

这次事件的关键点在于商业究竟能否“染指”公益？官方对网络挂号的定性是“公益”，并要求商业不能染指“公益”。而作为商业组织运行的淘宝网（以及背后的挂号网），自然被挡在了“公益”门外。

公益并不一定需要官方背书（因为运行不透明而造成的寻租悲剧已经不胜枚举，如郭美美事件），商业机构只要规则合理也可以公平、有效率。关键在于，能不能在一个透明有效的规则下运行，使公益目的得以实现。

这是一个更加宏大和复杂的命题。关系到制度思维的普及程度、盘根错节的医患关系以及的复杂的公共医疗体系，这次事件实际上是在互联网逐渐向传统行业渗透的背景下，再次与社会热点问题（挂号）冲突的一个缩影。可以预料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淘宝挂号暂停”不会仅此一次；作为一个积极连接线上线下的角色，淘宝乃至整个阿里集团的互联网化尝试，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的此类问题，并承担起推动的责任。

来源：钛媒体

地址：<http://www.tmtpost.com/38874.html>

[【返回目录】](#)

## 广东黄埔首创公益监护人制度，将考虑社会人士准入制度

摘要：在港剧《怒火街头》中，流浪律师亦师亦友，专为底层民众发声，深得民心。在现实中有没有类似的角色呢？5月10日，黄埔区成立首支公益监护人队伍，负责保障外来涉罪未成年人的权益，防止其因父母不在本地而遭遇刑讯逼供等。28岁的柯蔚蔓成为第一个接到任务的公益监护人，为一名涉嫌犯罪的聋哑少年争取权益。

在港剧《怒火街头》中，流浪律师亦师亦友，专为底层民众发声，深得民心。在现实中有没有类似的角色呢？5月10日，黄埔区成立首支公益监护人队伍，负责保障外来涉罪未成年人的权益，

防止其因父母不在本地而遭遇刑讯逼供等。28岁的柯蔚蔓成为第一个接到任务的公益监护人，为一名涉嫌犯罪的聋哑少年争取权益。

### 公益监护第一人 曾是警察

黄埔公益监护人队伍成立的第三日，柯蔚蔓就接到第一个任务——到少管所介入一名父母亲属无法到场的河南聋哑少年个案。事后她得知，她被法官推荐的原因是，年轻女性，和未成年人沟通比较容易。按照规定，被监护者有权拒绝或要求撤换公益监护人，不过柯蔚蔓没有被拒绝。

“当时他只是低着头，说什么都没有反应。”回忆起初次邂逅这名监护对象时，小柯坦言确实毫无头绪。由于要通过手语翻译人员沟通，一开始小何的回答像挤牙膏般，沟通很困难。柯蔚蔓通过手语翻译再三表明态度：我是来帮你的，帮你为法官争取减刑。她希望以一个邻家大姐姐的形象出现在监护对象面前，让他敞开心扉。

柯蔚蔓，28岁，广东揭阳人，一头孙燕姿式的短发，其实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柯的正式身份是黄埔区穗东街团工委专职副书记，前年参加公选的她，从一名基层警察“跳槽”成为一名街道团干，负责青少年工作。小柯说，常年与基层各种弱势群体的打交道经验，告诉她要耐着性子去感召这名少年。

### 三次接触 聋哑少年道出父名

被告人小何(化名)来自河南，1996年8月6日生，聋哑人，小学文化程度。去年独自离家来广州打工，一名略懂手语的中年妇女告诉他，只要帮忙在公交车上扒窃，便可解决其吃住。2013年1月15日上午，小何在BRT公交车上扒窃，被事主当场抓获。

在公安侦查阶段，小何拒不提供其家人或近亲属的联系方式，导致司法机关无法执行法定代理人到场监护的程序。

该案在公益监护人队伍成立前立案，柯蔚蔓介入时已到达法院审理阶段，她的权利之一是在法官作出判决前，以监护人的身份争取法官轻判。最后小何被判处拘役5个月，柯蔚蔓表示，小何希望能尽快回家，下一步她会想办法送小何回老家。

小何在接受审讯时一直拒绝透露父母的任何信息。不过柯蔚蔓告诉记者，做了坏事都怕家里人知道，这种心理很正常。经过三次接触，小何终于对她讲出了父亲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 两问

#### 为何要设立公益监护人？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并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原则，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然而，在黄埔区人民法院少年庭的执行过程中发现，不少非本地户籍涉罪未成年人，往往无法通知到其家属，或其家属不愿到场，每年这样的案件就有 40 多宗，这给司法程序的执行带来了困难，相关涉罪未成年人的权益也难以保障。

以往在未有公益监护人制度前，往往会安排一名居委会社工去充当其法定代理人。不过由于这些临时抓壮丁的监护人缺乏相关法律知识，也由于本身工作忙，无法长时间履行职责。

针对这一情况，黄埔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探索建立公益监护人队伍，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审理、社区矫正等司法过程，并代为履行权益维护、司法监督、情感沟通、心理抚慰、感化教育等职能。

目前，新制定的《广州市黄埔区公益监护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活动实施办法(试行)》，明确，公益监护人由团区委、区妇联和区关工委联合推荐，实行兼职聘用制度，聘期为两年。这是全国范围内继江苏、上海之后，广东首个公益监护人试点。

### 为何没有社会人士参与？

在黄埔区首批 29 名公益监护人队伍当中，清一色都是团委、妇联、关工委等政府背景工作人员。监护人遴选要求是工作不能太忙，要随时候命，与基层人士的沟通能力强，并具有一定法律知识。

“我们还在起步探索过程中，未来让社会人士加入是大趋势，但如何设定准入机制，仍在研究当中。”共青团黄埔区委副书记黄晓嫻表示，首批公益监护人队伍中未包含社会人士，是担心志愿者单纯靠公益热情难以持续履职，她指出，公益监护人需要随传随到，陪同一场审讯可能长达数小时，提审也有可能深夜。

“这是新生事物，可能还有很多瑕疵。”黄晓嫻担心一旦引入公益组织发现试点失败，很可能伤害了公益人的热情。

事实上，早在 2007 年，广州已成立了首个未成年人法律维权志愿团体“少年法庭之友”，负责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担任陪审员、社会调查员和社会矫正员，其中就有不少律师和大学老师。不过黄晓嫻发现，尽管他们有一定的专业水平，但由于缺乏与边缘弱势人群的沟通经验，往往难以取得涉罪未成年人的信任。

“保护青少年，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团市委权益工作部负责人刘刚表示，黄埔区公益监护人的做法，预计今年内将向全市推广。

来源：南都网

地址：<http://nandu.oeeee.com/nis/201305/23/55166.html>

[【返回目录】](#)

## ◎公益人

# 张宁的公益开源创意

编者按：一个曾给自己三年时间全职做公益的律师，反而抱有完全开放的心态，不断为公益领域提供优秀的创意项目，成为公益圈里的“另类”。我们带着诸多同道的好奇，走近他和他的公益事业，一探究竟。通过近 3 小时的深入访谈，和数次活动的亲身体验，他独具一格而极具实践效应的公益项目给我们带来很多 inspiring 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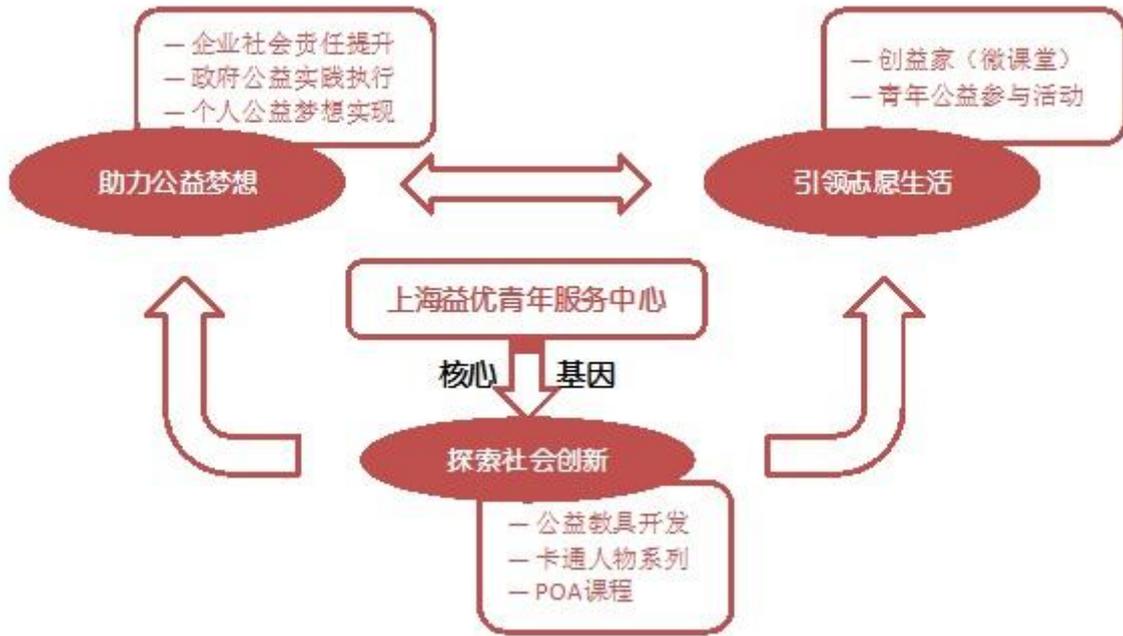
王家沙花苑，上世纪 20、30 年代的洋房林立，历史静默在现今上海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比起门口南京西路的车马喧嚣，这里似乎少了些现代都市的活力，多了几分闲适。唯独一栋有着 120 年历史的老洋房，因为一大面“创益家”的 Logo，显得生机勃勃，我们在老洋房底楼的咖啡馆里与张宁，上海益优青年服务中心（“益优”）的创始人，进行了一次公益访谈。

2011 年张宁接手了他朋友租赁的这栋老洋房，将益优搬了进来，取名“创益家”，寓意是打造一个社会创新人士的“家”。洋房院子里是一家很 fashion 的咖啡馆，出售来自泰国的公平贸易咖啡。整幢楼目前都用于益优的各种活动，专注打造一个社会创新研发中心。

### 益优的三个维度

其实在访谈张宁前，身边公益圈的一些朋友也好奇张宁和他的益优或者创益家到底是做什么的，因为似乎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张宁的身影，但他更多扮演的又是幕后策划者的角色。例如大家熟知的世博会倒计时 200 天的万人长江大桥跑志愿者行动，这个活动的幕后策划者就是张宁。

律师出身的张宁，是个很会总结提炼的人。“助力公益梦想”、“引领志愿生活”以及“探索社会创新”，我们根据访谈以及后续体验，从张宁的这三句话中为益优整个活动体系给出如下大致的架构：



### 助力公益梦想

张宁的团队每年会帮助很多外资企业以及一些政府部门进行 CSR、公益项目的研发，进行长期合作，这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我们所有的工作一定是希望有梦想的人在，这个梦想可以是个人，可以是企业，可以是机构，他的梦想要能打动我们。”所以定位在幕后的张宁，显得较为低调，很少去做品牌宣传，因为既然是助力别人的公益梦想，就应该放大对方，而非自己。

张宁以星巴克为例，向我们介绍了益优与商业企业的合作。益优为星巴克设计了一个“绿色社区 (Green Model)”的社区志愿服务方案，GREEN 五个字母分别代表一个公益方向，G 是 gardening (园艺)，R 是 rubbish management (垃圾处理)，第一个 E 是 eco-class (环保课堂)，第二个 E 是 energy water saving (节能节水)，最后一个 N 是 neighborhood caring (社区关怀)，即建议星巴克倡导绿色社区可以从这五个方面切入。益优为星巴克每个咖啡门店编制具体的操作手册，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而益优每年也会在星巴克的统一安排下，在其全国范围内某些门店做 CSR 活动示范，邀请其他门店店长来观摩学习。“星巴克全国三十多个城市七百多家门面，我们项目一下子就在全国得到推广。”后续益优还不断对手册内容及其中的案例进行更新，至少 50% 以上活动内容每年都要进行修改，这对益优的项目持续设计能力有较高要求，“我们要根据星巴克不同区域的特色设计项目，例如中部区域江西、湖北那边，益优就会专门研发一些鸟类保护项目，与当地的鸟类保护组织一起组织星巴克员工去观鸟。”

此外，渣打也曾携手益优共同开发了关注环保的“垃圾分类工具包”，以及防盲的“爱眼工具包”。通过益优开发的拼图游戏、“小废侠”扑克牌等工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通过真人版大家来找茬、盲

人捏象等游戏推广爱眼意识和常识，在渣打员工和学校同学的互动中实现环保、预防失明等公益目的。

张宁并不认为这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咨询服务，因为他认为双方之间非常平等，不是甲方乙方这种买卖关系。“虽然我们叫帮他实现梦想，但有一点很关键，必须是能够打动我们的共同梦想。然后这个东西我要研发，对方正好可以给钱、给平台、给渠道，而我们开发完了之后可以借他的渠道和平台影响更多人去做。和星巴克合作，我们就特别看重他的影响力，而且我们正好也希望在社区环保服务领域有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星巴克是伙伴关系，为了共同的目标行动。同时，为了确保 NGO 或者政府有能力可以去执行我们的 idea（想法）和研发的方法，我们做项目都用一种‘陪伴式成长’模式，即我们研发完之后要跟他一起实践，并通过实践，不断完善，这也是我们跟咨询服务不一样的地方。”

“每年有将近二十家企业长期跟我们合作，我们 12 个全职员工为了实现他们的公益梦想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此刻，张宁显得非常自豪。的确，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重视 CSR，也对 CSR 的执行有了更长远、系统的诉求，因此，业内提供这类服务（虽然张宁并不认同）的机构也在过去几年迅速成长，这对整个公益行业的推进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微笑 100 天项目，我们的梦想人是刚哥，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侨，他就想去做支教，来找到我，本来我们没有支教这个项目的，但他用十年等待的执着打动了我。因为我不认可短期支教，我认为短期支教是不科学的，它会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但最后我同意了，我愿意帮他。”张宁又向我们描述着另一个助力公益梦想的例子，在这个例子的背后，我们看到张宁的公益逻辑。

“很多企业、个人捐建的乡村图书馆平时都是锁着的，是资源浪费，于是我们就想办法去把这个锁打开。我们参考了大堡礁‘在最美的地方做管理员’的招聘创意，再结合 Gap Year、Career Break 等热门概念，这个项目的模型就出来了。我们称之为不一样的支教，我们招募的是图书管理员，兴趣辅导员，他（她）利用这个图书馆去开展阅读活动，弥补学校本身不具有的功能。”

张宁认为支教活动中，大部分报名的志愿者都没有专业教育经验，也大多没有孩子，直接去教乡村的孩子并不合适，志愿者的需求和学校的需求并不匹配。所以微笑 100 天中，志愿者并不是去做老师，而是做图书管理员。通过之前 10 天高强度的培训，学习参与式授课方法，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将乡村图书馆的效用最大化。“我们会教志愿者很多游戏的方法，配备很多道具，例如给你一本折纸的书，你可以跟孩子开展折纸课；给你个橡皮泥，你可以跟孩子一起玩橡皮泥。”

另外，课前沟通这种参与式方法，以及之后的实践，对志愿者个人的提高是有积极作用的，“做志愿者更多的是实现自己个人提高的，而不仅是去做志愿者帮助别人。”

## 引领志愿生活

“创益家”不仅仅是张宁和他的团队所在洋房的名字，也是张宁研发的一个项目，三句话概括叫“有创意、会才艺、做公益”，即让白领通过学才艺去做公益。“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劳动，但我们反对 labor work（简单的机械劳动），只是简单的 labor work 是不吸引人不够性感的。”

“三堂课教你解密茶语！【创益微课堂】“茶密人生”2013 年度首期开课啦~为了让茶宝宝们全心投入 4 月 21 日 10:30-12:30 和 13:30-15:30 一、二堂课同天进行，由专业茶艺师@悠客宝贝 陈菊英老师亲自授课！茶具、茶叶已备！学费：300 元 / 三堂课 名额：10 人”

这是我们从创益家的微博上随便摘录的一段茶道微课堂的文字公告及书道课的图片宣传，三堂课每次 100 元，老师和创益家各拿 50%，创益家要提供场地和相应教具。

“我们只用三堂课，就把这个才艺教会你。学完之后我们再设计如何拿你的才艺去做公益，你就不是只为你自己学，也为了公益的目标去学。”创益家很多地方都摆放着学员的作品可供拍卖，他们会向学员推荐一些公益组织，或者由公益组织来向学员做路演介绍，最终由学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决定将拍卖所得捐助给哪家公益组织。

“我们认为很多白领现在没什么时间，她其实就是想尝试一下，让她们一下子买十堂、二十堂课可能就怕了。而且这么长时间的学习一定有些人会知难而退，几次课之后她可能就不来了。所以我们也不希望她有这种负能量，因此我们现在就用三堂实践课让你试一下水，尽量让她觉得三堂课任何人都能够成功，三堂课也能让你自己秀一把，例如回到办公室去弹一曲沧海一声笑。然后有感觉有兴趣了，我们还有邀请制的终极版是六堂课。”

在我们看来，正是张宁非常精准地把握了现代都市中很多白领的心态，才有了创益微课堂，再配上后续的公益元素，模式的确非常性感。现在微课堂的课程内容涵盖书法、工笔画、茶道、孝道、太极推手、中医、即兴戏曲表演等等。只是目前课程的安排还相对即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课程时间安排，要参加的只能关注微博或微信获悉。

### 探索社会创新

在社会领域的创新，张宁和他的益优有很多好点子，POA，急猴猴和湖兔兔，赶碳号…这些新奇，充满创意的名词，都来自于张宁的公益头脑。

POA (Power of Action, 行动力), 是张宁通过总结自己的思维过程, 在 2010 年开发出的一套培训课程, 旨在提升参与者达到目标以及改变现状的能力。过去 2 年里, 张宁大概教授了 30 多场 POA 的课程, 对于企业、政府收费, 对于公益组织或者社团, 则提供免费的课程。我们也免费试听了这个课程。生活中“力”取决于其大小、方向以及速度 (力=大小 / 方向 \* 速度), 行动力课程中想传达的核心即 POA (行动力) = Partner (伙伴) / Objective (目标) \* Acceleration (加速度), 虽然公式看上去非常简单, 却包含背后的深意。

“其实 POA 并不只是用在公益上，它自身是一个个人能力培训，也是一套分析方法。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犯错都是有共性的，一个行动的失败它也是有很多共性在里面的。我就找到其中万变不离的这三个因素，非常简洁。”这套当年由强生提供开发经费的课程，现在对所有人都开放。

除此之外，益优还开发了 50 多种游戏教具，用于支持其各种公益项目的执行，例如我们上文提及的与渣打的合作项目。急猴猴和湖兔兔这 2 个卡通人物造型，诞生于一个由益优研发的叫“赶碳号”的项目。这个项目通过趣味桌游、卡通漫画、互动课堂等形式，把复杂而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教育活动切割成标准的微任务。同时把环保知识融入在游戏教具中，调动孩子们的学习主动性，也让环保志愿者从老师角色转变为游戏辅导员，既提升了孩子们的环保知识学习效果，也使得志愿者能以更加简化和切合实际的方式开展环保教育。

近期，这两个卡通形象又出现在市中心街头，配合政府号召的文明餐桌行动，用于向白领宣传“不剩感恩”的新理念。“‘剩下’是因为要的太多”、“点菜不比数，‘常剩’输风度”，相比于名人发起的“光盘行动”，这样的文字似乎更带有上海这座城市精致的追求。

### 三年之约与“性感”的开源

Open source（开源），一个 IT 领域的词汇，用于描述那些源码可以被公众使用的软件，并且此软件的使用、修改和发行也不受许可证的限制（From 百度）。在和张宁访谈的过程中，这个词一直在我脑海中闪现。

“我们，把自己定义为研发中心，尝试去设计更多可复制的项目供大家使用。作为公益机构，我们所有的活动强调是无版权化，欢迎大家把我们设计出来的项目、想法或者模式 copy 走。”

无论是在商业社会还是公益领域，这样的想法着实令人眼前一亮。律师出身的张宁，在做公益实践时非但没有对知识产权这些所谓的“asset（资产）”更为重视，反而欢迎分享，是我们认为这次访谈最有意义的地方。

“我们和所有委托人都谈好条件说，益优的研发成果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属于公共财产，他仅仅是享有第一次发布的优先权，一旦发布公开后，我可以给任何人去用这个创意。”虽然这种初创的活动形式其实是很难防止别人抄袭模仿的，但从访谈中我们体会这种开放的心态并不是出于无奈，而是贯穿全部的原则，而且其背后，更深层的，是张宁对于创新本质的深刻理解：

张宁认为创益家最大的基因就是“开放、合作”，“因为创新无外乎是把各自的优势放在一起，从无到有的创新是很难的，而我们做的创新基本上是改良式创新，必须要有这种开放的合作的心态。”在他看来，当你有着开放的心态，愿意跟各方合作的态度时，创新并不是难事。

从微笑 100 天，到微课堂，从深层次去分析，其实只是创益家通过一个更合理的逻辑把各方（公益机构或个人）优势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串联起来发挥公益效用。

如此开放的心态，也来源与张宁当初与自己的“三年之约”：

1998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的张宁和很多同学一样成了一名非诉律师，2003年又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创办了一家专注于律师人才的人力资源公司，但之后一次偶然的公益活动让他开始思考他的“心之所安”。凭借商业领域的积累和经验，张宁开始为不同公益组织出谋划策。2007年，他和朋友合办“Charyou 公益加油站”，寓意给公益组织加油。2008年四川地震，张宁也陪同一个公益组织一起经历了灾后帮扶，回来后，他决定给自己三年时间，投身公益。

“我想如果我做好东西都留在我自己手里的话，那我三年以后我怎么交出去呀，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就帮别人做吧，做完以后是别人的，这样随时我都可以撤退。”

张宁很享受研发一个新的模式，推进一个新的改变，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所以只要创意或者模式本身具有被实现的确定性，对他来说就足够了，而具体的执行是不是他，对他来说都并不重要，这样他才能集中精力去开发下一个项目。“我们会陪伴梦想人最多不超过两年，最短可能是三个月，这个时间帮你把这个项目执行完，然后我们就撤了，这个项目就是你们的了。因此，我们经常会鼓励公司员工主动去和 NGO 或者社区联系沟通。现在有些公益服务机构的做法是保姆式的，就是他们把社区把活动都事先安排好，公司只要安排员工参加，他们搞定一切事宜，活动完成后公司员工撤离，他们来收摊的这种方式。但我们觉得这样的方式对志愿精神有促进但不明显，因为公司员工觉得他就是个 labor（劳工），一次性活动，并不持续。也不利于企业把好的项目持续健康地开展下去。”

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做了……

当然三年早已过去，他发现他已经离不开公益了。

定位幕后研发的张宁，说自己很少参与公益圈的“social（社交）”活动，也很少为自身机构做宣传，因为并不需要。所以我们好奇，那这些好的想法如何能辐射到更多人群，如何复制带来更大的影响力。

所以张宁认为在公益领域和一般社会领域一样，都应该分工协作，有人专注于内容，有人擅长于渠道，

作为一家民非组织，创益家目前共有 12 个全职员工。对于他们张宁非常自豪，这些人都非常能干，一个当两三个用，给的报酬在公益圈属于中上水平。张宁招人也有自己的逻辑，他更看重一颗公益的心，例如在商业社会中已经证明自己能力的全职妈妈，她们不追求物质报酬，更看重精神层面的满足。

按照张宁的介绍，益优基本上处于盈亏平衡；虽然称不上完全的财务自由，但基本生活质量无忧的张宁，的确非常享受这样的公益过程。

最近四川雅安地震，张宁又一次投入到救灾活动中去，协调成都民间救灾 NGO、外企志愿者，做他最擅长的。

今年的大年初一，我也亲身体会了一下张宁策划的活动，凌晨去市中心马路上清扫一夜爆竹过后的垃圾，这是张宁发起的“雷锋会才艺”的活动之一。虽然活动组织得并不算非常顺畅，但这种想法以及实际付诸行动都是值得借鉴的，当然按照张宁的逻辑，今后谁都可以去用这个想法。那天清晨扫完街路过静安寺，看到善男信女们拥着烧香拜佛时，更加感觉一年之初扫个街，动动身体，难道不是比烧香更好的彩头吗？

来源：中国三明治

地址：<http://www.china30s.com/6964.html>

[【返回目录】](#)

## ◎亮机构

# 微基金：靠“精神领袖”支撑的公益如何走得更远

日前，在广州举行的“微基金”两周年庆祝活动中，“微基金”正式宣布，目前募集到超过400万元的善款，已经帮助西部山区超过5000名学生吃上午餐，让80多名农村儿童免费享受学前教育。

这组数字让现场不少人精神为之一振。2011年4月，民间公益人梁树新与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成立“微基金”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公益项目能在两年内汇集超过40万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们的捐赠。

随着“微基金”知名度的不断扩大，公益人梁树新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许多网友直言，每月定期捐款就是凭着对梁树新的绝对信任。

有评论认为，“微基金”的成绩源自梁树新这个“精神领袖”的支撑，就像“免费午餐”公益项目的“精神领袖”是邓飞一样，一旦“精神领袖”因为种种原因退出公益团队，公益项目能否延续就成了一个问号。

### 转型从“去梁树新化”开始

评论的观点也是梁树新日常思考的问题，他认为这可能戳中了“微基金”长期发展的软肋，“要尝试改变”。

事实上，从看见贵州山区孩子缺少午餐到募集善款帮助孩子，这个最初的过程就决定了公益团队中一定要有个让公众信得过的人，久而久之，这个让公众信得过的人就成了这支公益团队中的“精神领袖”。

转型从“去梁树新化”开始。

2012年7月，梁树新正式宣布辞去“微基金”管理委员会执行主席的职务，只保留“微基金”发起人的身份。

这个决定让贵州省青基会和梁树新都有所担心。人们会不会猜测是团队出现了分歧、裂痕？会不会不再信任我们了？已经捐款的人会不会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

忐忑中，梁树新在自己和“微基金”的微博上公示了这个信息，他还不忘反复解释，自己依然会和“微基金”的团队在一起，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幸运的是，不少爱心人士都对此表示理解，从每天接收到的捐款情况看，数额并没有明显减少。

“基金保持稳定，转型就有了保障。”“微基金”的第二步棋是改革决策机构。

新的决策机构由9个人组成，分别是梁树新、贵州省青基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微基金”执行团队3名专职人员、“微基金”义务法律顾问、“微基金”义务公关顾问和一名可以长期参与决

策的捐赠人。

9人形成的决策机构决定“微基金”的大小事，议事时9个人每人一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唯有义务法律顾问有一项特殊权力：依据法律直接否定涉嫌违法违规的决议。

“我就1票决策权，我的权力被弱化，团队决策有了制度保障。”梁树新说，这样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离开团队而让团队工作瘫痪。

转型还不能仅止于此。和“微基金”长期保持联系的NGO“麦田计划”强化了对微基金决策的监督，在“微基金”团队的主动邀请下，拥有较强公信力的“麦田计划”介入“微基金”项目选点、规划的决策过程。

在最近的一次项目选点论证中，“麦田计划”志愿者直接用扎实的调查结果否定了不具备项目实施条件的备选点。与此同时，网友监督、项目点属地共青团组织的监督、各级教育部门的监督让“微基金”从决策到执行的过程都更加规范。

### 从单一项目到整合项目升级

“转型的目的是什么？”当团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青基会秘书长涂妍抛出这个问题时，“微基金”执行团队的成员不约而同地回答说：“为了长久。”

众所周知，“微基金”诞生最重要的初衷是为了让西部农村地区的孩子免费吃上热腾腾的午餐，随着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午餐计划”实施的空间已经缩小。

“微基金”的使命该结束了吗？

显然，这不是“微基金”团队希望选择的结果，在对“长久”的思考中，涂妍认为，关键在于转型后的升级，“要从执行一个项目升级到整合执行多个项目，那样能复合式的解决问题，也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盼望升级的过程也伴随着纠结，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把大家捐助给孩子用于午餐的善款用作另一个公益项目，捐助人会同意吗？

理想的状态是，捐助的善款能像“微基金”成立之初约定的那样“致力于帮助欠发达地区农村小学优化和提升教育资源”。

梁树新的态度很明确，现有的款项如果捐赠时注明一定用于午餐计划，那就绝对不能挪用做其他公益项目，如果没有注明，那可以在决策团队表决通过的情况下用于其他公益项目。

“其他公益项目”的面纱在两周年庆祝活动上同时揭开，“微基金”计划，在西部偏远山区的行政村里开启“乡村童园”项目，希望能利用农村小学富余的校舍解决幼儿园场地，让大山里的儿童能够享受免费的学前教育。

经过调研，每个“乡村童园”按照师生比1:20的比例计算，30个孩子的童园一年大约需要3

万元经费，“分摊下来，就是一个孩子上一天幼儿园需要 5 元钱。”“微基金”团队成员李婷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计划中，“午餐计划”可以和“乡村童园”项目同时执行，来到幼儿园的儿童每天中午可以在教室里享用一顿有热饭热菜的午餐，这样计算，帮助一个儿童上一天幼儿园（含午餐）的费用是 8 元钱。

涂妍认为，针对目前贵州农村的实际情况，这样复合型的项目可以帮助农村孩子解决许多迫切的问题，团贵州省委也计划在贵州省的部分地区推广这样的做法，“现在是初步探索，未来的公益项目就能沿着这个思路扩展下去，‘微基金’的路也会越来越宽”。

### 实体公益产品让基金更有活力

两周年庆祝活动现场，“微基金”发布了第一个实体的公益产品“微米”——一袋 100 克售价 15 元的生态大米。在此之前，“微基金”在淘宝店里发布的都是虚拟的爱心午餐。出售一袋“微米”所得的 15 元可以为一个孩子提供一周（5 个上学日）的午餐，或者帮助一个农村儿童上 3 天的幼儿园。

“微基金”义务公关顾问连芳菲在微博上解释说，“微米”希望借助有形的、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产品作为载体，承载公众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这不是单纯供食用的产品，更多地是善的见证和爱的累积，溢价部分是大家的爱心与支持。

梁树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一位爱心人士向“微基金”捐赠了 1 吨大米，团队成员商量认为，把大米包装成实体公益产品，更能随着人际传播激发大家的爱心，实体传播的过程也会让“微基金”的知名度提升，从而给基金会带来新的活力。

“微基金”团队希望梦想赞助商能源源不断地出现，从不同的领域给基金会帮助，由此积累越来越多的实体公益产品为基金开辟更广阔的传播渠道，在公益项目被更多人认可的同时让基金更有活力。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地址：[http://zqb.cyol.com/html/2013-05/17/nw.D110000zgqnb\\_20130517\\_3-03.htm](http://zqb.cyol.com/html/2013-05/17/nw.D110000zgqnb_20130517_3-03.htm)

[【返回目录】](#)

## 大爱清尘基金——从抗争到合作

尘肺病是由于在劳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导致末梢支气管下的肺泡积存灰尘，从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如得不到及时救治，会因呼吸困难直接导致死亡。由于尘肺病患者多为家庭主要劳动力，故整个家庭也因此随来源，被拖入痛苦的深渊。目前，尘肺病已成中国最严重的职业病。据卫生部2008年公开报告显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49970例，其中尘肺病676541例，死亡149110例，病死率高达22.04%。根据卫生部相关专家分析判断及我们大爱清尘大量探访发现：目前中国至少有600万尘肺病农民需要救治。

目前，尘肺病已成中国最严重的职业病。而尘肺病不仅没有被公众所认知，尘肺病患者更是因为保障缺失而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欧美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尘肺病的阶段，但后来尘肺病都进入政府直接救助的阶段，通过预防和救治基本实现尘肺病的消除。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因用工企业设备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大量尘肺病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救助。

本次沙龙的分享机构——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简称大爱清尘)，源自2011年6月15日著名记者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该基金由新浪网、腾讯网、搜狐公益、支付宝公益、天涯公益等传媒机构核心支持，于2012年3月经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批准成为独立基金，是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针对尘肺病的公益组织。

该机构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向社会筹集资金为尘肺病患者提供救治经费；第二，推动媒体宣传和政协委员的提案，提升社会公众对尘肺病的认知，致力从市场和政策层面上推动尘肺病问题的解决。截至2013年5月，大爱清尘基金已救助尘肺病患者三百多人。

### 抗争与救助：激情下的坎坷成长

自2011年6月启动以来，大爱清尘基金在体制高压和艰难抗争中，积极而又执着地开展着尘肺病的救助工作，成功地踏出了国内尘肺病救助的第一步，取得了领袖魅力和志愿激情下的坎坷成长。

#### 1. 体制的高压与艰难的抗争

从基金一开始成立，便因救助领域的特殊性及其创始人的敏感因素，而面临来自体制的高压和重重的阻挠。而尘肺病这一非常严峻而又为大众所未知晓的重要职业病，非常重要的救助开展途径便在媒体的宣传和倡导。但在“项目刚发起的时候”，相关部门便“通令全国媒体不能报道”，可谓真实的高压写照。

该基金在开展救助过程中更是面临不少地方政府及企业的高压和阻挠，最初的活动开展尤其是传统媒体报道的路径整个被切断，使得基金如“腿砍断了”不能“行走”活动，基金接受的公益捐

款也几近于零，整体上可谓举步维艰、困难重重。该基金的核心工作人员的行踪甚至到了被监控的地步。但艰难的抗争与救助之路也正始于此。

## 2. 积极的心态和执着的救助

虽然在这种高压情况之下，但该基金却未停止脚步，因为基金的宗旨在于救人于水火。正如其创始人所言，“只要能救命，只要能救人，只要能救6百万尘肺病人，我们隐忍一切，微笑着前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资源救人救命。”

在传统媒体的路径被堵死的情况下，微博等新媒体成为该基金开展各项活动的重要阵地。该基金以积极的心态在各种新媒体中继续着救助的行动，执着地救命救人于危难之中。该基金的运作团队利用自身在媒体方面的资源和影响力，通过吸引微博知名大V的关注和转发等途径，在以微博为首的新媒体中掀起了一股对尘肺病的普及、关注以及对尘肺病人救助的浪潮。

在高压和曲折中，基金以坚定的脚步与阻碍的力量做抗争，执着地以实际行动推动救助的开展，默默地为尘肺病的救助积蓄着力量。基金用扎实、执着的救助工作向所有质疑甚或阻碍其活动与发展的人展现了它强大的生命力，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尘肺病救助工作的突破性进展。

## 3. 志愿的集聚与激情的力量

该基金在困难面前的强大生命力来源于一个庞大的志愿群体的集聚。他们的志愿精神和救助的激情是该基金坚持至今的最大驱动力。这个志愿群体不仅庞大，而且其构成非常特殊，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是媒体工作者，他们熟悉对新媒体的运用，在网络上容易形成巨大的影响力。

正如其创始人所言，机构近两年靠的“是大家对善和人性的一种宗教性的信仰，这是整个我们将近两千志愿者的整体的一个特质。大家在一起，互相比，就是自己觉得做得少，是这种做法的。”志愿者们的激情和坚持造就了整个机构在高压和困难中的延续和成长，是他们激情的力量推动了该基金在坎坷中坚持和走过。

## 4. 领袖的魅力和组织的成长

毋庸置疑的是，从该基金的发起成立到它的坚持与成长，都离不开该基金的绝对精神领袖——王克勤的作用。这位领袖是一位极具正义感、敢于面对社会问题和致力于推动问题解决的资深媒体人士。在该基金的近一年半的发展过程中，这位领袖起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正是因为他的领导魅力与精神号召，才有近两千个志愿者的跟随、参与和坚持。

可以说该基金之所以能在高压之下仍能立于公众眼前，能坚持救助尘肺病人于危难之中，除了志愿激情的集聚之外，组织领袖的魅力和精神也尤为重要，该基金能经历重重困难，从被打压到取得尘肺病救助的突破性进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领袖的强大魅力和强力坚持与推动。在这一阶段，作为一个民间公益组织，该基金的发展离不开这样英雄式精神领袖的存在。

## 合作与共赢：专业化的未来之路

在经历近一年的抗争和救助工作之后，该基金也通过自身扎扎实实的努力和坚持，获得了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更多和更广泛的包容、接纳、认同和支持，踏出了尘肺病救助的艰难第一步，并渐渐开始走上一条与政府形成合作关系的专业化之路。但未来之路却不会如激情抗争时走的那么轻松。

### 1. 初步的成功与埋下的隐患

虽然隐忍奋进的过程异常艰辛，但实实在在做事的风格和一步一步扎实的行动却起着润滑体制区隔的作用。在艰辛的抗争、执着的坚持和扎实的行动之后，该基金终于看到了春天的脚步。政府开始态度缓和，并且开始信任它，甚至开始转向支持基金的行动了。基金在推动公共政策转变的努力中也多了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和可能，比如传统媒体也逐渐可以考虑撬动了，各种政策推动渠道也比以前畅通了。该基金可谓赢来了初步的成功和成长。

虽然生存和活动的空间扩大后，该基金也得到了更大范围内的信任和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获取信任和资源开始慢慢不再成为它的根本性的问题，但当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不再成为问题之时，该基金面对的问题也便发生了转变。

在抗争与救助阶段，仅仅靠领袖魅力和志愿激情，是可以维持和推动基金的运转和成长的，但当进入到与各方合作的阶段之后，该基金恰恰来自其组织自身。正因其第一阶段严重依赖个人领袖和志愿激情这一特点，该基金未来发展的隐患也便在于此。

正如质问的声音“如果您没了，你所有的渠道，你所有的激情的演讲，你所有的资源，你所有的志愿者，还有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就都消失了，那这个传承您怎么下来？”所反应的，该基金在发展中面临着巨大的发展隐患。因为该基金目前仍然严重依赖于其发起人本身，严重依赖于个人而非组织本身，严重依赖于志愿者不可持续的激情，而非稳定可持续的团队和项目运作。作为发起人，王xx也开始认识到组织自身的隐患所在：“团队的稳定性对我们来讲，现在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一个就是钱的问题，一个就是人的问题。这是现在常常让我很纠结的两个问题。没钱就来不了人，没人来不了钱。”

### 2. 组织专业化的未来之路

正如上文所述，当政策的空间越来越放开，传播的渠道越来越畅通，而资源的获取日益不再是问题之时，该基金需要面临的考验也便来自基金自身了。在进入与政府的合作阶段之前，该基金尚可依靠其个人领袖的魅力领导和志愿精神的集聚，坚持行动，产生一定范围的影响和作用，但当基金走过这一阶段，从激情的抗争走向理性的合作之时，基金组织自身的能力便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

虽然目前该基金有近两千个志愿者，但是却只有两个半专职员工，发起人自身也只是暂时性兼职工作，组织团队非常不完善，所开展的项目也并未形成一个成熟的运作模式，一切都像刚刚开始。

该基金的未来发展面临着一个相当严峻的专业化的问题。

针对其存在的问题，在未来的专业化之路上，该基金需要解决四个方面的专业化问题。首先，该基金需要形成和组建一个更为稳定和专业的专职募款团队，增强基金的筹款能力，为更多需要救助的尘肺病患者提供直接的医疗救助；其次，该基金需要更为稳定和专业的研究团队，为推动政策转变做出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研究，形成规范、有力和理性的政策报告，从政策层面力争推动政府救助；再次，该基金需要形成一支更为稳定的宣传和制作团队，推动尘肺病知识的大众化宣传与普及；最后，该基金需在前三条的基础上将机构的各项事务和项目有机地、高效地运转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专业化的运作模式。

总而言之，在抗争阶段结束进入合作阶段之后，基金便面临一个专业化的未来之路。未来之路上能否推动尘肺病知识的普及和尘肺病救助的公共政策转变，需要该基金有更加专业和有力的团队，做出更加可持续的努力与工作，从尘肺病的直接救助到推动政府救助，再到推动预防与救助并重，从而为消除尘肺病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来源：慈讯网

地址：<http://www.icixun.com/2013/0520/1076.html>

[【返回目录】](#)

## ◎国际观察

##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十周年庆特刊（三）：以设计为导向的政府部门创新

在丹麦，设计理念已经广泛应用于公共部门；近年来，这股风潮也影响到包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全球诸多国家。设计主导的政府创新，在全球实施如何？又面临什么挑战呢？

启动一项新业务却遭遇政府繁文缛节和官僚作风的感觉如何？设计一个帮助失业者快速找到就业培训志愿导师的网络平台需要些什么？教育改革究竟如何才能切实鞭策整个国家的学校发生真正变化？还有，相当重要地，该怎样有条不紊地规范、测试和扩大公共部门政策及服务以应对上述的挑战？这些是丹麦政府创新部门——MindLab 过去十年内尝试解决的部分问题。2002 年建立、总部位于哥本哈根的 MindLab 是商业经济增长、就业、儿童及教育等部门的组成部分。这支由民族志学者、设计师和公共政策专家组成的小团队的使命在于，吸引公民和企业共同设计新公共解决方案。

在丹麦，从哥本哈根对垃圾管理的反思，丹麦囚警关系的缓解，再到欧登塞城成年智障服务的改造，设计早已在公共部门的设置中得到广泛应用。其运用的典型方法包括受人种志启发的用户研究、创造性的构思过程以及服务原型的可视化和建模。

丹麦在利用设计引导公共部门创新方面一直走在前沿，但是这种方法正被全球越来越多地区所采用。比如英国，英国在过去 10 年里服务设计发展迅猛。这些发展受 LiveWork、Engine、Participle 及 Think Public 等顾问公司的驱动，与之伴随的是 Deman 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公共服务实验室（NESTA's Public Services Lab）、国家卫生服务创新改进研究所（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和英国设计委员会公共服务设计项目（the UK Design Council's Public Services by Design program）等公共或半公共团体的建立。即使在唐宁街 10 号，行为洞察团（the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同样在为更好理解用户需要和原型干预设计寻求更好的实验研究法（比如改写纳税申报表）。

在美国，为当地方及联邦政府建立更广泛的设计议程也正兴起。这项议程起初着眼于利用科技提高透明度（也就是所谓的开放政府），现在的重点已经转向公民参与、参与式民主、服务交付、领导实务以及组织变革。核心参与者包括：IDEO 及 Local Projects 这样的公司；彭博慈善基金会（Bloomberg Philanthropies）和 Code for America 这样的非营利机构；以及诸如波士顿的新都市技师（Boston's New Urban Mechanics）和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的创新实验室（the US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s new Innovation Lab）这样的政府动案。

亚太地区正在迎头赶上。新加坡公共事业部总理建立设计思维部门，以期待其担当吸引用户重构政策与服务的使命。同时，新加坡人力部正与 IDEO 及英国政府的助推小组合作，重新设计外派员工申请工作许可的体验。

这听起来好像设计引导的创新正在席卷全球政府，至少在西方文化领域内是这样的。但是，三个主要挑战依旧尤为突出。

营造授权环境。尽管像“lab”、“center”还有“space”此类新实体就是为帮助设计扎根而创建，然而将其植入政府的观念仍是一项极为严峻的挑战。确保资金的供给、让变革在组织中锚定，获取管理层支持，真正执行新理念和方案，要做到这些都很难。许多举措依然在决策框架下苦苦寻找自己的合法地位。

增强及评估能力。在设计主导型创新中，公共部门不能单单依赖内部专家；这些部门根本就没有具备这些技能的足够人手。

为公共部门设计提供咨询服务的市场可以说依然不成熟，有些国家甚至呈现下降趋势（比如英国）。而在丹麦这个拥有伟大建筑作品和设计理念传承的国度里，服务设计产业正在发展，即使如此，也没有哪家设计咨询公司挑选公共部门作为其主要客户。这些咨询公司大多数很小，客户以企业为主，而且很多公司仍然将焦点放在产品设计上。与此同时，设计教育也尚未赶上不断增长的服务系统设计需求，设计师们仍然需要学习如何更有效地与政府协作。

破除官僚，协同制作。当公共部门机构开始使用更以用户或公民为中心的方式进行创新时，他们总是发现，许多其它组织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以人为本的设计要求公司和组织采用更广泛、协作及包容的视角，来考虑谁应该参与共同创造的过程以确保其设计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可行。但是，采取以公民为中心和价值导向的社会及公共创新，势必对既有的公共治理范式产生破坏。这对传统层级制组织的指挥控制式管理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线性逻辑，无疑都是严峻的挑战。

以设计为导向的政府部门创新将带我们去往何处？虽然面临这些切实的挑战，但我仍相信：尽管现在仍处于早期，公共部门设计正看涨。

来源：善天下

地址：<http://www.gpcommon.org/ch/2013/05/23/ssir-3-design-led-innovation-in-gov/>

[【返回目录】](#)

##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非营利组织的 10 种资金来源模式

营利性企业经常应用一些商业模式如“低成本供货商”“剃刀和刀片”等作为一种简洁的途径来描述公司组建以及运营的方式。而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并不能很清楚地说明他们的筹资模式，因此直到现在也没有相应的专业术语。

资金一直是非营利组织谈论不休的话题：我们需要多少资金？在哪里可以找到来源？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资金？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经常和紧迫。不幸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容易获得。因为非营利组织领导者们更擅长于组织活动和项目，并不精于筹集资金，而慈善家们通常关注其捐献的资金所造成的影响或者局限性。

当非营利组织和资金来源不能进行很好的搭配时，资金很难流向能够产生最大效益的地方。更多的情况下，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一些很有前景的项目被削减、缩短或舍弃。当资金变得紧张时，最可能发生筹资争夺的混乱。

相比之下，营利性企业在财务问题上比较明晰。当我们试图了解不同的企业是如何运行以及它们所归属的商业模式时，这一点显得尤为正确。尽管并没有关于企业模式的明确清单，但是当投资者和管理者在论及公司策略时会达到充分的一致。这些简洁的商业模式的好处是可以让企业领导者清楚地说明他们如何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并且使投资者们更容易理解这些企业盈利的方式。

而非营利组织很少进行同样简洁和清晰的关于组织长期筹资策略的讨论。这是因为非营利组织从来没有明确定义过不同筹资模式。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匮乏，长此以往会造成人们对非营利组织筹资理解的困难。

通过对美国一些大型非营利组织的调查研究，我们归纳了 10 种最经常使用的筹资模型。希望可以帮助非营利领导者们清晰地说明支持其组织增长的模型，并意识到这种模型的潜力及局限性。

受益者不是顾客。非营利部门没有形成自己专门筹资模式术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运营同样大小的非营利组织比营利企业更加复杂。当一个营利企业找到为顾客创造价值的方法时，它也找到了其收益的来源——顾客为这种价值付费。但通常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非营利部门。当非营利组织找到为受益者创造价值的途径时（比如帮助囚犯重返社会或保护濒危物种），它并没有获得其资金的来源。

杜克大学经济学教授 J. Gregory Dees 在其关于社会企业的研究中提出了需要懂得捐资者的价值主张与接收者的价值主张。非营利金融基金的 CEO——Clara Miller 也陈述了对于这种困境的看法，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忙于两种业务，一种与他们的项目活动有关，一种与筹集慈善资金有关。

由于接受者与投资者之间的差异，非营利筹资模式的关键方面（和相应的术语）需要与营利企业区别开来。这也是我们使用“筹资模式”而不是“商业模式”来描述的原因。商业模式包含了成

本结构的选择和受益者的价值主张，然而筹资模式仅仅关注资金方面，并不关心提供给受益者的项目和服务。

所有的非营利组织管理者们可以使用 10 种筹资模式来促进他们的资金筹集和管理，当组织发展越来越大时，这些模式显得更加重要。

最近我们研究了 144 个自 1970 年起创建的非营利组织，它们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都是找到了相应的筹资模式，通常集中在与其具体的工作相匹配的特殊资金来源上。这些大型的非营利组织都拥有成熟的资金筹集模式。

10 种筹资模式。帮助非营利组织设计筹资模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模式不能太笼统也不能太具体。比如一家政府支持的社区医疗机构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支持的非营利组织都是由政府资助的，但是它们的筹资模式以及决策者控制资金的方式却不相同，不能将它们简单地归为一种模式。

我们选定了三个参数——资金来源、决策者类型和决策者动机定义了 10 种不同水平的筹资模式，并且每种模式都提供了比较有代表性的非营利组织的例子。10 种筹资模式根据投资者的不同而进行的排列。前三种模式主要由个人捐助，第四种是由一些个人或者基金会捐助的，第五到第七种主要由政府机构捐助，第八种由企业资金支持，最后两种模式都拥有不同种类的出资者。

### 1、HEARTFELT CONNECTOR 模式

一些非营利组织，比如美国许愿（Make-a-Wish）基金会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其关注的是各个收入阶层的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为他们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和途径。我们称这种模式为 Heartfelt Connector。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环境、国际和医疗研究领域。这种组织与那些由于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和体育爱好不同而结成的来表达其主张的非营利组织有明显的不同。Heartfelt Connector 模式的非营利组织试图通过特殊的筹款活动将志愿者明确地组织在一起。成立于 1982 年的 Susan G. Komen 乳腺癌基金会便是这种模式的一个代表。Komen 基金会通过 125 个分支机构致力于消除危害人体健康的乳腺癌，他们的主要方式包括资助研究机构，社区的教育和医疗，提醒妇女早期诊断的重要性等。该基金会的愿景与广大妇女产生强烈的共鸣，在 1997 到 2007 每年都募集到上亿美元的资金，尽管平均每人的捐助只有 33 美元。Komen 基金会每年都会组织 120 场左右的跑步比赛（Susan G. Komen Race for the Cure），通过这些活动吸引了大约 100 万名志愿者，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从而使其筹资范围更加广泛。

Heartfelt Connector 模式的非营利组织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是否有很多人已经表示他们将会支持这个领域的项目？

是否可以通过简洁和明确的方式将非营利组织所关注的问题展示出来？ 是否存在一条自然的途径来吸引大量的志愿者？

## 2、BENEFICIARY BUILDER 模式

一些非营利组织，比如美国的 Cleveland 诊所，除了依靠病人医治所付的费用外，还依靠过去曾经在该诊所医疗服务中获益的人们提供的捐助。我们称这种筹资模式为 Beneficiary Builder，其中两个典型的例子是医院和大学，一般来说大部分这些非营利组织的资金都来自受益者对组织所提供服务的回报。尽管捐助的款项与医疗付费相比少了很多（平均大概医院 5%，学校 30%），但是这些资金是一些建筑工程、研究以及捐助基金的重要来源。捐助者积极捐献资金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曾经获得的益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普林斯顿大学的已毕业校友中捐赠母校的比率达到世界最高的 59.2%，2008 年超过 33000 名校友捐资高达 43600000 美元。由于杰出的筹资能力，学校机构日常运行的 50% 的费用均来自捐赠以及捐款产生的收益。Beneficiary Builder 模式的非营利组织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我们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赢？

个人在接受提供的服务后，是否对非营利组织产生深厚的感情？

是否能够在更广泛的基础上与受益者保持联系与合作？

## 3、MEMBER MOTIVATOR 模式

一些类似于 Saddleback 教堂的依赖个人捐款的非营利组织采用 Member Motivator 模式进行筹资。这些个人（通常是非营利组织的成员）之所以捐款是因为 NPO 组织的活动已经和他们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使他们从中获得共同的利益。Member Motivator 模式的组织不是为团体活动寻找理由，而是通过支持这些成员们已经从事的活动而把他们联系组织在一起。这种非营利组织从事的项目通常与宗教、环境、艺术、文化和人文科学有关。致力于保护和扩大野火鸡栖息地、促进捕猎的国家野生火鸡联合会 (NWF) 便是应用该模式的例子。NWF 吸引捕猎者并通过他们的活动使其受益，从而这些捕猎者成为 NWF 的忠实成员与捐助者。当地 NWF 的成员每年举办 2000 多场募款大会，募集金额了全年 80% 的总收入。这些大会提供了多种捐款的机会：入场券（每人 50 美元并拥有一年的会员资格）、商品采购（每个入会者平均 100 美元左右）、抽奖券（每次大会 16000 美元左右）。NWF 总部为大会提供抽奖奖项与出售的商品。所筹集的资金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当地野生火鸡栖息地的保护。Member Motivator 模式的非营利组织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我们的成员是否认为组织的活动直接有益于他们，即使这些利益是被大家共同分享的？

是否能在募款活动中使成员们都参与进来并进行有效的管理？

## 4、BIG BETTOR 模式

一些非营利组织，比如 Stanley 医学研究所主要依靠少数个人或基金会的捐赠，这种筹资模式称为 Big Bettor。一般最初的捐款者也是该组织的建立者，为了解决某些与其密切相关的问题，

主要关注医学研究与环境保护领域。Big Bettor 模式的非营利组织可以吸引大额捐助的主要原因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比如建立一个治疗某种疾病的研究机构就需要很大的开支），或者组织应用某种先进而独特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天然资源保护国际组织(CI)即是 Big Bettor 模式的一个例子，它的目标是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CI 具有在全球范围内确定需要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的能力，因此它能够吸引捐助者大量的资金，从而使他们在保护地球上发挥重要而持续的影响。CI 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少数数额较大的捐助者。

Big Bettor 模式的非营利组织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能否在可预见的期限内提出某个主要问题的可行而持续的解决方案？

我们能否清楚地说明怎样使用大额的资金来达到我们的目标？

是否有基金会或富豪对我们的目标和方法感兴趣？

### 5、PUBLIC PROVIDER 模式

Success for All 基金会与政府组织合作来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比如住房、家政和教育等，这类筹资模式称为 Public Provider。在一些情况下，政府将服务职能外包，但是明确规定了非营利组织接受资金的要求，比如偿还公式或请求建议书等。Public Provider 模式的 NPO 在发展增长的时候，通常会寻求更多的其他经济来源扩大其资金基础。德克萨斯移民委员会(TMC)在 1971 年刚刚成立的时候，利用政府的“启智计划”来支持其最初的工作，帮助移民区的儿童适应双语和二元文化的需要，为上学做好准备。当 TMC 进一步发展的时候，领导者们意识到不能仅仅依靠一个资金来源，并积极寻找其他的来源。现在 TMC 的资金支持已经非常多元化，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当地政府等，并且从德克萨斯扩展到了其他州，提供的新服务包括产前保健和消费教育。

Public Provider 模式的非营利组织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我们的组织是否与一些较大的政府计划有直接的联系？

是否能够证明我们的组织比其他的竞争者完成工作更为出色？

我们是否愿意花费时间去保证定期的合同续签？

### 6、POLICY INNOVATOR 模式

青年村(Youth Villages)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这种筹资模式称为 Policy Innovator。这类非营利组织运用创新的方法来处理与当前政府资助计划不能明确相容的社会问题。他们通过提出更为有效可行和花费更少的计划，说服政府支持他们的替代方法。相比之下，Public Provider 模式的非营利组织是利用现有的政府计划来获得他们需要的资金。Policy Innovator 的一个典型例子是 HELP USA，该组织为流浪者提供过渡性住房和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可以负担的永久性住房。

Andrew Cuomo（前纽约州州长 Mario Cuomo 的儿子）于 1986 年成立 HELP USA，并提出了一个所

谓“公益旅舍”(Welfare Hotels)的救助流浪者的计划。当时流浪与无家可归成为政府的一个主要公众议题,正当政府准备尝试新的解决方案时,HELP USA 提出了创新的解决住房危机的公益旅舍(Welfare Hotels)。政府政策制定者认为该计划更加高效且花费更低,因此 Cuomo 获得了政府的初步支持。2007 年,HELP USA 的收入达到 6000 万美元,其中 80%来源于政府部门的资助。HELP USA 的领导者认为 Policy Innovator 模式的非营利组织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我们是否能够提出优于现状的解决方案,对政府有足够的吸引力使其放弃传统的解决方法。

我们能否为政府管理者提供我们工作计划所依据的证据?

我们能够与提倡变革的政府决策制定者建立牢固的关系?

当前政府变革现状是否面临很大的压力?

### 7、BENEFICIARY BROKER 模式

爱荷华州学生贷款流动性公司(Iowa Student Loan Liquidity Corporation)与其它组织竞争去提供政府资助的服务给受益者,这种筹资模式称为 Beneficiary Broker 模式。这些模式的非营利组织竞争的主要领域有住房、就业服务、卫生保健和学生贷款,它们与其他 NPO 区别的地方是受益者可以自由选择为其提供服务的非营利组织。波士顿城市住房合伙公司

(Metropolitan Boston Housing Partnership),主要负责马萨诸塞州 30 个社区的住房补贴凭证项目。从 1991 年成立之后,MBHP 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住房补贴凭证,现在已经成为波士顿地区最大最可靠的提供者。超过 90%的 MBHP 的收益来源政府为其住房补贴凭证项目提供的小额管理费,其他款项来自于一些公司和基金会。

### 8、RESOURCE RECYCLER 模式

美国爱心(AmeriCares)基金会通过募集来自公司和个人的实物捐助并分发给贫苦的人们而逐渐发展扩大,从事这类活动的非营利组织所用的筹资模式称为 Resource Recycler。一些公司和企业愿意捐助物品是因为这类物品寄存下来有可能成为废品(比如,有保质期的食物),或者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较低。实物捐助一般占到收益的绝大部分,所以 Resource Recycler 模式的 NPO 必须募集额外的资金来维持日常运行的费用,他们通常关注食品、农业、医疗及营养计划等方面的问题。

大波士顿粮食银行(TGBFB)是新英格兰最大的饥饿救济组织,每年将大约 3000 万磅的食品发放给 600 个当地组织,包括救济食品室、施舍处、托儿所、老人中心和收容所。TGBFB 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食品,最主要的来源是零售商和制造商,此外还接受餐馆和旅店的多余食品。2006 年,TGBFB 收益的 52%来自于实物捐助,联邦与州政府提供的物品和资金占 23%,其余的收益来源于个人的现金捐款。Resource Recycler 模式的非营利组织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是否有持续的来源为我们提供可供分发的物品?

我们是否有策略吸引现金捐助来维持组织日常的运行？

## 9、MARKET MAKER 模式

公共土地信托基金会(Trust for Public Land) 人体器官捐助便是一种运用 Market Make 的例子。尽管医学上存在对人体器官的需求,但买卖器官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大部分 Market Make 模式的非营利组织主要关注健康和疾病领域,还有环境保护方面(比如,土地保护)。成立于 1971 年的美国肾脏基金会(AKF)资助肾功能衰竭的人进行透析治疗。现在已经是全国患者肾透析资助的主要来源,2006 年为 63500 名患者提供了大约 8200 万美元的资助。1996 年之前,医疗保健提供者可以为贫穷的透析病人支付医疗保险 B 部分和补充医疗保险(大约占总费用的 20%)。1996 年,联邦政府认为提供者的这种行为是非法的,因为有可能导致其陷入接受某个特别提供者的透析治疗的困境。新的法律使很多患者无力承担透析的医疗费用。AKF 注意到这种弊端,并制定了相应的计划来弥补,现在为患者提供保险费,使他们可以继续自己的透析治疗。AKF 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卫生保健提供者和其它公司。现在 AKF 把在肾透析项目中的原则应用到骨质疏松患者的药物治疗中。

Market Make 模式的非营利组织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是否有资助者对支持我们的工作有兴趣并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

非营利组织更适合去提供此类的服务有无法律或伦理上的原因?

我们是否已经有可信赖的计划和品牌?

## 10、LOCAL NATIONALIZER

美国大哥大姐会(Big Brothers Big Sisters of America)通过建立本地经营的国内网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模式称为 Local Nationalizers。这类组织主要关注贫穷学校或者需要成人榜样的儿童,这对于当地社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单是政府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项目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当地的一些个人、企业捐款或一些特别活动,很小一部分来自于政府机构。本地经营组织的规模一般不超过 500 万美元,但是在总量上却相当的大。

美国教育组织(TFA)便是 Local Nationalizers 模式的一个例子,它招收、培训并使大学毕业生进入各地学校的教学岗位。TFA 成立于 1989 年,2007 年收益便已达到 9000 万美元,其 26 个地方分支机构募集了大约 75%的资金,这是因为 TFA 的目标与地方资助者恰好相同——为了提高 K-12 的教育质量。TFA 认为筹集资金是组织发展的重要方面,它雇佣当地行政领导负责吸引地方的资金捐助。Local Nationalizers 模式的非营利组织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将我们的组织扩展到其他社区是否符合我们的目标?

是否可以在其他社区复制我们的模式?

非营利组织筹资的启示:

在现今的经济环境下，非营利组织领导者们到处筹集资金，有些甚至偏离了自己的轨道，这将是一个错误倾向。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仔细思考自己的筹资策略显得更加重要。我们希望本文可以为非营利组织领导者筹集资金提供一个基本的参考框架。

非营利组织筹资的模式可能变化，并不是所有的组织都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但有一个好消息是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可以从对其自身筹资模式的清晰认识中获益，并且一些组织可以发展特定的模式去筹集大量的资金。

另一方面，慈善家们对他们的捐助变得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的基金会，比如 Edna McConnell Clark 基金会和新利益公司要求其受捐赠者同时促进项目和筹资模式的发展。我们希望本文可以帮助慈善家们更加明白其筹资策略，从而可以更有效地支持他们的项目。

当社会希望通过非营利组织和慈善事业来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时，对这些筹资模式的理解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来源：iJoin 社会创新咨询 新浪微博

地址：<http://weibo.com/ijoin2011>

[【返回目录】](#)

## 集体募资的规模正在越来越大：从热门美剧募资案例看行业动态

日前，由热门美剧《Veronica Mars》改编而成的电影利用“集体募资”（crowdfunding）的形式，创下最短时间在美国群体性募资网站 Kickstarter 上募集到 100 万美元的新纪录。这是该网站迄今为止推广的最大规模的电影项目，出资者之众前所未有的。

沃顿商学院的专家指出，该网站尚未通过“集体募资”的形式为动作大片筹集到资金。但这又何妨：集体募资能够帮助创业者积累资本，而不必他们亲自前往好莱坞。

不过《Veronica Mars》案例确实说明，Kickstarter 和参与集体募资的一众投资者证明了他们的方式可以成为初创企业和成熟企业获取资金的主流、可靠途径。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伊桑·莫里克(Ethan Mollick)认为：集体募资网站不仅为个人募集初创资金提供了一种便宜、方便的方式，潜在投资者也没有辜负期望，做到了“慧眼识英才”。

### 成功的线索具有共性

莫里克在三月份发表的文章（初稿）“集体募资，风险投资以及对企业家的选择”（Swept Away by the Crowd? Crowdfunding, Venture Capital and the Selection of Entrepreneurs）中指出，无

论是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集体募资网站之一 Kickstarter，还是长年以来初创企业募资的首要目标风投公司，投资者考察创业者特质的方式具有共性。

“他们会寻找类似的特质信号，”莫里克指出。“即便你的潜在支持者不确定你是否会成功，某些东西确实会增加你获得（集体）募资的机会。”这些因素包括：“项目发起者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是否建立了原型？是否得到某个知名组织或个人的担保？这些因素会增加企业成功的几率。风投看重的就是这些成功因素。集体募资者似乎也看重这些。”

莫里克在早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集体募资的动态：成败的决定因素”（The Dynamics of Crowdfunding: Determinants of Success and Failure）中写到，虽然绝大部分获得资金的项目平均推迟一个月以上才能交付，但“未能尽力兑现责任的项目只是少数。”换言之，集体募资圈还是比较善于选择那些成功可能性较高的项目的。

集体募资者并不看——或者说至少并不在意的因素包括寻求资金者的性别和所在地。通过对 Kickstarter 上 3200 个技术类项目（涉及硬件、软件、视频游戏以及产品设计等通常比较吸引风投目光的领域）的分析，莫里克发现集体募资“在分布上比风投募资更加民主化”而且“按量级分布的话，获得集体募资的女性创业者的初创企业比例高于风投支持的公司。”

“你要么相信，当前的制度能够让最优秀的计算机科学人才在谷歌工作，最丰厚的入门资金是由风投提供的……要么认为人才和机遇的分布其实更为广泛，而由于机会、地域以及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人们并不能得到同等的机会。”莫里克指出。“集体募资如此吸引人的原因就是让更多人掌握成就一番事业的可能性。”

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小企业贷款越来越难。创意投资研究（Creative Investment Research）是设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从事经济形势分析的企业。该公司 CEO 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说：“大型金融机构放弃了这一领域的业务。投资衍生品比投资小企业贷款对他们来说更加轻松。”而新的初创企业获取集体募资的技术手段“让一切都变了样。效力成倍增加，而且更加便宜”。

### 普通观众凑齐巨额制作费

《Veronica Mars》在 Kickstarter 上的募资活动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它确实在娱乐业内引发了轰动。

募资活动启动于 3 月 13 日。这部剧集的制作人托马斯（Rob Thomas）为电影版设定的募资目标是 200 万美元。而经销权所有方华纳兄弟则许诺在市场推广和影片发行上给予支持，并安排有限的院线放映。在得到这样的许诺后，托马斯在 Kickstarter 上发布了如下信息：一点小投入就可以成就一部中等规模的影片，延续高中美眉校探的故事。其实如果资金再多一些，托马斯和公司就能制作更加宏大的电影，但 200 万美元已经足够了。

托马斯在 Twitter 上发布募资消息后的 11 个小时内，最初的募资目标就完成了。就在上周，30 天的募资窗口关闭，《Veronica Mars》共筹集资金超过 570 万美元，支持者人数达 91,585 人，创下网站记录。这对一部 2007 年播出的三季（两季在 WB 网络、第三季在 CW 网络）观众平均人数只有 250 万的电视剧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Veronica Mars》这个案例有点儿奇怪，”莫里克指出。“既可以说这是（电影制作室）对集体募资的一种接受，又可以不这么说。迄今为止，这还是一个特例。我并不确定那种方式放到这个具体案例情况之外是否还能奏效。”

还有很多热衷于某些被砍剧集的粉丝纷纷表示，希望自己喜欢的电视剧也能跟随《Veronica Mars》的脚步。尽管如此，就连托马斯本人也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在拓宽好莱坞传统募资渠道的这条道路上顺利前行。

“我不能肯定这种 Kickstarter 模式一定能所向披靡，不能肯定每个想要用 300 万、400 万或者 500 万制作电影的人都能在 Kickstarter 上获得资金。”托马斯这样告诉美联社记者。“如果是某个品牌产品，人们愿意作出回应、愿意观看，而且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就可能非常成功。我希望我们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并希望看到更多后来者。”

集体募资电影并不新奇。据 Kickstarter 统计，本年度“美国圣丹斯电影节”的参展影片中有 10% 左右都是用这种方式筹到钱的。然而，对于像华纳兄弟这样不费力气就能筹集到 400 万美元的大制作公司来说，一部通过 Kickstarter 募资的电影所具有的真正价值“是更为过硬、更有说服力的数据，远好过做一个调查，比如‘是的，我希望《Veronica Mars》改编成电影。’”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乔舒亚·艾利夏伯格 (Jehoshua Eliashberg) 这样说道。

“在华纳兄弟看来，这是非常可贵的营销研究，”他补充道。“我认为我们不仅在寻求某种创新的融资安排，让消费者参与电影募资。我认为制作公司还必须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即消费者将对希望拍摄哪些电影、如何拍摄这些电影有越来越多的要求。”

### **股权集体募资时代已经到来**

集体募资也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许可，为投资者和创业者拓宽了募资渠道，潜在风险和回报也双双升高。

2012 年 4 月，奥巴马总统签署《创业企业扶助法》(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简称 JOBS Act)，为初创企业和小企业融资松绑。在该法的相关条款中有一条，就是向美国投资者开放股权集体募资。与 Kickstarter 这类项目有所不同，这种项目的支持者要么直接出钱，要么预订某个产品，而股权集体募资则允许潜在支持者购买某一初创企业的股票，从而有机会获得财务回报。

虽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尚未就《JOBS Act》发布规定，但股权集体募资已经在英国和欧盟出

现数年之久。股权集体募资公司 Seedrs 的首席执行官林恩（Jeff Lynn）表示，英国和欧盟目前有 15 家左右类似的公司，这种集资方式让天使投资圈发生了重大转变。在他看来这是风投募资介入的前一步。

“这种方式并不强调富有和门槛，你不一定要在正确的时间处在正确的地点，我们要做的是民主化。”他指出。“现在这种方式向每个人、每个地方敞开。我看到很多人进入这一领域；我看到了 1 亿个天使投资者。”

### 欧洲模式

林恩表示，相比于传统的集体募资网站，Seedrs 在主持的项目上会做更多功课，包括验证公司属于新企业，且在英国注册。“只有在我们认可的情况下才会把它们放在平台上。”林恩指出，“我们不会把对企业的判断强加于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找到我们的企业中只有约 25%最后可以展示在平台上。”

而在通过审查程序的初创企业中，只有约 12%能够获得注资。它们的平均募资目标是 5 万英镑（约 7.5 万美元）。Seedrs 每年促成的募资总额约为 100 万英镑（150 万美元）。林恩认为，这些公司在 Seedrs 或类似网站上参与了一轮或多轮募资之后，通常更可能寻求风投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支持。

允许投资者直接投资实现了天使投资的民主化。但风险也随之而来。林恩介绍说，Seedrs 上的投资者必须点击并仔细阅读关于潜在损失的信息（他指出，这种提示的内容比绝大多数网站和软件服务用户协议中的要清楚明白得多）。在把钱投进去之前，投资者还要通过风险政策的相关测试。“我们可不希望人们以为这是一种安全的资产，把身家都赔进去。绝大部分人绝对不能这样做。”

随着股权集体募资进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会随之发布相关的监管规定，更多创业者将有望通过这种方式寻求资金支持。莫里克表示，无论是集体募资圈还是它所搅动的传统募资领域，仍然有可能发生很多反复。

“确实有一些改变正在发生：有很多流动资金，有一些相关政策颁布，以及承诺。我们必须关注很多事情。”莫里克指出。“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是否更加民主？是的。但质量才是关键。这很重要，也值得回味。我们还有大量有待思考的问题，尚未找到答案。”

来源：沃顿知识在线

地址：<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index.cfm?fa=article&articleid=2786>

[【返回目录】](#)

## 美国社会组织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2010年,全国44.6万个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各类就业人员618.2万人,与2009年相比吸纳就业人数增加73.5万人,同比增长13.5%。由此可见,社会组织正逐渐成为我国吸纳新增就业的重要领域。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普遍存在人力资源短缺、人才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因此,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是构建与社会组织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发展机制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管理与社会创新建设的重大举措。

美国社会组织体系发达、相关法律制度完善,在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策划、开发、培养和管理等方面拥有诸多先进经验,对我国创新社会组织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构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 社会组织的人才培养

据美国劳动局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大约164万社会组织雇佣了870万工作人员,社会组织管理者的平均小时工资为34.24美元,年薪约计6.6万美元。2008年,社会组织管理者平均小时工资达至44.02美元,年薪约计8.5万美元。2009年-2010年,在金融危机及余波的影响下,美国社会失业率剧增,但美国社会组织就业量仍然保持了1%的增长。如今,美国社会组织就业总量已达到1050万人,占美国就业总量的10%左右,并预计在2018年增至14%。美国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无疑成为拉动美国就业的重要引擎,人们在关注其所带来的广阔就业机会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了社会组织专业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美国的大学是社会组织人才的培养重镇。据相关研究显示,如今在美国已有242所大专院校提供非营利管理课程,66个训练班提供无学分课程,53门课透过终生教育进行,83个学院提供至少一门大学进修课程,146所大专院校的大学科系至少有一门相关课,97个研究所有非营利管理集中课程。在专业设置方面,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社会工作是美国大学社会组织人才培养的两大支柱专业。开设这些专业的大学大多设有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双/辅修学位、在职攻读学位和远程教育学位等,以建立多层次的社会组织人才梯队,满足多元化的社会组织人才需求。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美国大学又兴起了公益创业培养项目,为社会组织发展和专业人才的培养注入了新鲜血液。

#### 1. 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管理专业

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管理专业旨在培养投身于各类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及政府部门的公

共事务管理人才。该专业一般下设于各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在小部分学校下设于商学院的MBA专业下。政府（非营利）组织管理专业教学内容多面向社会实际，在教学过程中通常设置非营利部门实践环节和必修学分，非常重视学生实践能力与专业素质的培养。目前，美国已有百余所高校开设了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管理专业（表格1）。

编号	学校英文名	学校中文名
1	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印地安那大学伯明顿分校
2	Syracuse University (Maxwell)	雪城大学
3	University of Minnesota--Twin Cities (Humphrey)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
4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Evans)	华盛顿大学
5	New York University (Wagner)	纽约大学
6	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Indianapolis	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里斯联合分校
7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rice)	南加州大学
8	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 (LBJ)	德州奥斯汀大学
9	Harvard University (Kennedy)	哈佛大学
10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1	University of Nebraska--Omaha	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
12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Levin)	克利夫兰州立大学
13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Young)	乔治亚州立大学
14	University of Colorado--Denver	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
15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表格1 开设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管理专业的部分美国大学名单

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非常广泛，不仅有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和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理论课程，还涵盖了会计学、财务管理、政府财政、人力资源管理、筹资策略、领导力、信息网络管理、社会创新等诸多培养实践技能和行动策略的实务课程。以纽约大学瓦格纳学院的公共政策与非营利组织管理专业为例。该专业所开设的可选课程多达50门，广泛涵盖公共行政与社会组织管理的理论前沿与实务操作知识，其课程目录详见（表格2）。

编号	课程名称	编号	课程名称
1	公共服务组织的战略领导力	26	倡导研究室：如何带来改变
2	社区组织	27	政府研究：反思 21 世纪的治理
3	非营利组织法律	28	持续质量提升
4	战略管理	29	卫生专业人员预算
5	公共和非营利服务组织的信息系统及其管理	30	项目管理
6	非营利组织推广	31	服务供给管理
7	基金会的非营利运作	32	基于证据的管理
8	非营利组织的文化价值引导	33	劳动管理与合作
9	组织中的种族、认同及多元化	34	政府财政条件分析
10	组织和管理发展	35	非营利与公共部门的成本效率研究
11	组织设计与社会变革	36	卫生保健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表分析
12	发展人力资源	37	会计学基础
13	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	38	公共与非营利组织募资
14	政府预算管理	39	公私财务治理：政策、法律与市场
15	公共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评估和管理	40	管理合作关系与社会责任
16	公共非营利卫生组织的运营管理	41	非营利治理
17	组织政治学：权力与影响力	42	非营利与公共部门管理者战略交流
18	领导力与社会变迁	43	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卫生组织的财务会计
19	国际组织及其管理：联合国系统研究	44	非营利组织管理工具：承诺、内部控制与道德规范
20	国际组织的项目发展及管理	45	公私部门的大规模创新
21	国际非政府组织	46	数字创新实验室
22	人权的组织学	47	卫生保健管理 I：控制与组织设计
23	人类发展的创新领导力：联合国与新千年人类发展目标	48	卫生保健管理 II：适应与专业化管理
24	全球卫生治理	49	卫生保健组织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原则
25	理解社会企业	50	卫生保健组织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热点问题

表格2 纽约大学瓦格纳学院公共政策与非营利组织管理专业课程目录

## 2. 社会工作专业

自 20 世纪初，美国大学陆续开始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如今已发展出成为一套完善的社会工作教育体系。社会工作在美国属于职业教育，一般它都是在独立的社会工作学院，和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并列为职业学院，与学术的文理学院相区分，也就意味着与行业结合更为紧密以及更为注重实务。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医社会工作、工业社会工作、矫治社会工作等等。在美国，社会工作的学位包括本科、硕士（一般为两年制）和博士三种，并且大部分学校提供在职培训项目和进修项目（针对有社会工作本科学位的群体）。

美国的社会工作高等教育是一种综合实践和理论的职业教育，通过课堂和课堂外的实习锻炼实

现对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培养。在课程设置方面，学校会设立课外实践环节，安排学生去各种不同的社会服务机构实习，一般一周要 25 小时左右，与日常课程同时进行。一般而言，社会工作专业可供选择的实习部门多得惊人，以凯斯西储大学社会工作系为例，每年为学生提供的实习部门选择多达 300 家，美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程度可见一斑。

社会工作专业在人才选择环节也很注重申请人的实践背景。社会工作硕士生项目类似于 MBA 模式，旨在培养具有专业化工作技能的社会工作者，而博士生则是学术导向的，侧重于研究美国各类社会问题及其对策。因此，本科学生一般不可以直接申请社会工作的博士项目，需要积累足够的社会工作经验，才能在这一领域继续深造。美国综合性大学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就有近百所。

### 3. 公益创新培训项目

自 1993 年以来，哈佛商学院已有超过 500 部关于社会企业的著作和案例研究发布。进入 21 世纪，美国高校对公益创新教育的追求更是逐渐升温。耶鲁大学企业家学院、哈佛大学豪泽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社会创新研究中心以及位于加州的圣克莱尔大学社会科学技术中心，都是美国高校中社会创新研究的热门地标。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开始为进入公益创新领域的学生提供培训和学位课程，甚至开设了公益创业学位。公益创新培养项目多下设于商学院，被人们称为“绿色商业学位”。目前美国已有 60 多所高校提供这方面的学位，越来越多的商学院学生也开始选择公益创新方向，以结合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创造更多地社会财富。美国最著名的公益创新培训项目，往往与社会企业孵化器和非营利组织研究机构相伴生，为美国社会创新提供源源不断地专业人才和价值理念。

#### 社会组织的人才培训

##### 1. 社会组织的人才来源

美国社会组织的人才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

- \* 在公共卫生、国际关系、医疗、社会工作、工程、政治科学和传媒等领域深造的人才
- \* 高度专业化、经过训练并持相关专业证书的专业人员（社会工作协会会员）
- \* 在政府部门或企业界具有较高声誉、较大影响力的人群（高级管理者或顾问）
- \* 掌握多种语言，拥有广泛游历经历，在国外学生、生活和工作过的人
- \* 对特定事件所处地区或环境工作过，对其特点及事件影响力有充分了解的人
- \* 主动性和参与感强，常常参加志愿活动的人
- \* 对特定服务人群及相关组织有极强奉献精神的人

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美国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中有 82% 为白人，10% 为黑人，5% 为拉丁裔，以及 3% 的其他族群。从性别角度分析，研究表明女性在社会组织人才结构中占据较大比例（平均

68%)，但男性在较大规模社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位的比例更高。

## 2. 社会组织的招募渠道

美国社会组织的人才招募主要通过几个渠道（表格 3）。

实体招募	线上招募
校园招聘	在招募网站上发布信息
在全国人才市场招募	在相关专业期刊中刊登广告
在职员工推荐	在非营利相关期刊上刊登广告
在职实习生续约	新媒体广告
与其他社会组织共同招募	地方报纸刊登广告

表格3 美国社会组织人才招募渠道

在全球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社会组织在应用传统招聘手段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运用网络招募方式，向全国及全球职业申请者及志愿者开放信息和申请平台，以提高人员招募效率，提升人才契合度和质量。以下为美国社会组织用以发布信息、申请者普遍关注的大型招募网站。仅 Idealist 一家网站就涵盖了全世界范围内 75809 个社会组织的 7171 个及时更新的就业机会，16025 个志愿者机会，6210 个实习机会，和 1313 个公益项目信息，由此可见美国公益事业的信息网络发达之程度。

## 3. 社会组织的职业培训

全球公民社会指数（CSI）从结构、环境、价值观和影响四个维度对各国公民社会发展程度做出评价，其中考量公民社会的结构维度的重要指标就是公民社会的多样性和组织层次与内部关系。美国公民社会的结构较为成熟，社会组织类型相当多样，且组织层次清晰，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除了直接运营并参与社会活动的社会组织外，美国还有一大批为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培训、咨询、扶持服务的机构，为社会组织人才向高技能、专业化发展提供了广泛丰富的职业培训资源和平台。人才职业化和专业化是美国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必要保证，也是社会组织获取公信力的必然要求。

在社会工作的人才梯队建设和专业能力提升方面，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NASW 既是美国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主要专业组织，又是美国和世界最著名的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行业自律组织，还是世界上会员数量最大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组织。NASW 为本科社会工作者（有证书本科社会工作者学会）和学校社会工作者（专门的学校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能力的认证标准。前者的注册条件为 2 年工作经验，工作 2-5 年后注册成为“有证书的本科社会工作者学会会员：ACBSW”，工作 5 年及以上的工作者还需加上在专门实务领域中的资格，例如学校社会工作者、

临床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管理等。后者指的是硕士或博士层次的社会工作，注册条件为 2 年工作经验，工作 2-5 年后注册成为“通才或专才的有证书社会工作者学会会员：ACSW”，工作 5 年及以上的工作者同样需加上在专门实务领域中的文凭。此外，1994 年 NASW 首次为有文凭的临床社会工作者建立了考试制度，以建立多层次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队伍结构。同时，NASW 始终与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CSWE）密切配合，共同关注专业社会工作者，实现社会工作教育与社会工作的服务整合。

来源：《中国社会组织》杂志

地址：<http://www.loongzon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859>

[【返回目录】](#)

## 美国慈善业如何在文化领域发挥作用

为什么艺术在其他国家面临严重的经营困境而在美国却有持续不断的资金来源？法国社会学家马特尔在《论美国的文化》一书中给出了答案——

在美国，慈善资助在整个非营利文化领域最为活跃，也是美国文化政策形成、文化体制运作中最核心的元素之一。慈善捐助由于不同国家社会、制度、宗教、文化上的差异使慈善在建立独特的资助体系中，最终产生文化行动中的巨大差异。据统计，在美国，文化资助平均 75%来自个人，9%来自个人遗赠，11%来自基金，只有 5%来自企业赞助。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从慈善界、私人企业界、文化机构与政治生活之间存在的相互渗透对美国慈善资助文化领域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深入的分析。

### 减税是对慈善业的经济考量

马特尔在解释慈善时把慈善家的非营利行为与其职业行为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考虑在内，把捐赠的道德本身看做是一种好“生意”。他认为慈善提高了捐赠者的社会地位，产生交换与贸易的可能，带来社会威信，这对于企业家来说尤为重要，他们需要这种地位，所以这种潜规则所造成的内在激励产生了一种“同僚压力”，使对捐赠的选择变成了一种捐赠的义务。

除了获得社会威望，减税成为美国人对慈善业的经济考量。美国的文化政策是一种税收政策，慈善也具体地依靠税收政策而存在。马特尔认为，由于美国对“联邦税收部门”的不信任，拒绝赋税是美国社会的历史事实和传统，因此美国人习惯于“课税扣除返还”和“减税”。美国的税务运作不是通过直接补贴，而是通过税收豁免，因为他们认为补贴会使那些机构依附于国家。1913 年美国

开创了所得税，而且从1917年开始一个501c3法令(美国税法第501条，c款，第3段)对所有的慈善捐款免税。捐赠可以让捐赠人从“年度可缴税收入”除去捐赠的总额，扣除额度有上限，通常是收入的50%。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收入越多，其缴税率越高，利用增加捐赠减少其应纳税收入，从而减少缴税额。因此，捐赠并非出于热爱，而是根据税务专家的意见更好地享受减税。

马特尔强调最早的基金会和独特的美国慈善精神存在于减税政策出现之前，他认为促成捐赠最主要的推动力是捐赠者能够自主选择。比如资助城市博物馆或曾经就读的大学等，作为税收具有强制性，但作为捐赠可以完全自主选择。

艺术品捐赠在美国博物馆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这些遗赠完全免收遗产税，从而鼓励收藏家去世时将他们的藏品捐出，使他们仍旧享有生前的社会威望。捐赠者可自由确定对其藏品未来的使用，乃至他们如何展出和分组等，这是“有条件捐赠”。因此，博物馆须遵从这些要求，否则会被收藏家的后代告上法庭。捐赠者享有的这种权利通常会为博物馆造成一些麻烦，虽然董事会或专业协会公布一些明确规则以防止捐赠者的任意妄为，但这也也许恰恰就是捐赠的魅力所在。

#### 4种机制构建资助文化机构的“金科玉律”

美国慈善业是如何为公益运作，又是如何介入艺术领域，导致美国支持艺术方式的改变？从基金会和富有赞助人捐赠等传统的文化扶助形式在非营利文化领域的演变可以窥探当今美国慈善捐助的基本模式。如今在美国存在约6.2万个基金会，多数是“私人”基金会，但对基金会的定位是“独立”而非“私人”。由于其目标是公益，而且独立于创立基金会的个人、家族或企业，因此，这种被称作“对捐赠者独立的规则”也是法律所倡导的。

马特尔通过对基金会运作的机制、组织形式以及不同形式的基金会展示了美国慈善资助非营利文化领域整体模式的一部分，尤其是福特基金会负责人麦克尼尔·劳里发明的应用于艺术领域的4种典型机制也是如今美国慈善资助文化机构所遵从的金科玉律，这就是按比例配捐的技巧、杠杆作用的手段、专项基金制度以及普遍借助专业评审。

按比例配捐的方法侧重于共同出资，旨在激励其他基金会，特别是让富有的慈善家捐赠，同时避免不现实的项目，限制任人唯亲，特别是能降低受援助机构依赖的风险。基金会的所有捐款都限定为最多5年，通过规定期限，按比例配捐的意图还在于让走上正轨的文化机构可以依靠自己发展。“杠杆效应”则更注重让慈善具有某种实效，让有时限的捐赠具有持久的效果，涉及长期投资，如福特基金会重视中小学内的培养、博物馆与乐团负责人的职业化，它资助文化经理人去领导剧院，或鼓励创建能够代表职业化的组织，并试图建立一种长效机制，因此“杠杆效应”无疑成为现代美国慈善业最被看重的概念之一。专项资金制度在于一次性大规模辅助一个文化机构，以便让它能够完成发展中的重要阶段。通常由文化机构与福特基金会董事会同时投票通过，董事会由生意人组成，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不会陷入定期支援的方式。普遍借助专业评审制度是将项目与艺术家的选择权委托给一些专家评审会。福特基金会通常将专业评审职能委托给文化专业人士，如艺术家或艺术经理人，在基金会宣布一些艺术家特殊补助时，选拔与提名的程序完全由艺术家或艺术经理人掌握，基金会仅限于中间人、提供方便者、“摆渡者”的职能。

所有制度的共同点是理性化和职业化，委托代理和注重实效，旨在分散权力，避免任人唯亲以及基金会内部的官僚化。马特尔认为，福特基金力图让文化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完美蜕变，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 3个责任层勾勒文化运作领域轮廓图

福特基金会独特的组织形式勾勒出美国非营利文化领域运作的轮廓图。福特基金会虽仿效私营企业但又具有非营利目的的独特模式，其组织围绕着3个责任层：领导层是主席领导的董事会，几乎全部由生意人构成。董事会每3个月召开一次，确定基金会的政策路线，但不具体管理。董事会成员始终是志愿的，包括董事会主席在内，理论上讲甚至不能因这份工作得到报酬。由董事会任命基金会的负责人（或称“执行总裁”），由其真正领导该组织，总裁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可以罢免他，但通常在由董事会决定的总体政策路线下自主确定自己的行动和预算范围。管理基金会日常工作是总裁及其常务团队。在这一级别中，专家占多数，来自重要的大学和公共行政部门，最后一个层级，基金会依靠众多外部顾问，通常是研究人员和大学学者，按合同领取报酬。通过这3个层级，最富有的生意人的财力和企业经营方法与最优秀的大学学者的专业知识和开明的行政管理者的管理结合在一处，这在非营利的框架与公益使命之下构成一种独特的创新。在福特基金会扶助“地方戏剧”运动时，它也要求剧院领导层建立双经理制，一个艺术经理和一个执行经理，前者负责策划和创作，后者负责管理剧院的预算和资金，艺术和市场的完美结合，推动了戏剧行业职业化，这种模式也逐渐成为美国几乎全部非营利剧院的组织模式。

除了福特等单一捐赠者提供资金的基金会以外，马特尔还对社区基金会以及联合艺术基金会进行了研究，这些基金会的资金来自许多个人，是根据非营利的想法由当地公民建立的。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基金会是社区基金会的一种形式，按照公民的明确愿望收集捐赠，将捐赠放进800个小账户（基金），每个账户针对捐款者所选择的事业，这是公民对公共生活参与的最好实例。“联合艺术基金会”则仿效“联合劝募”的体系，为一些由捐赠者选择的明确目标展开募款。以密尔沃基联合演艺基金为例，他们向该城数千名捐赠者募款，然后分配给各个非营利机构。在密尔沃基，21个文化组织接受资助。如今在美国按照这一模式专门为文化募款的联合艺术基金有100多个。

在美国6.2万个基金会中，至少有1000个基金会介入文化领域，但它们都各自确定其政策与标准，形成美国文化资助体制的独立性，这正是美国人所捍卫的。

### 避免文化的“过度投资”

随着文化的商业化问题越来越突出，马特尔在关注新的慈善业发展趋势的同时也对新慈善业出现的众多偏差感到忧虑。在“所有大商店都变成博物馆，而所有博物馆都将变成大商店”的时代，他认为新的慈善业更关注效率，也更加现代化，同时更加考虑“可以衡量”的结果，产生了“强制权的慈善”。慈善业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同经济领域一样，慈善业在艺术领域被要求“创造数字”，一些地方基金会因此滥用资金，强制建立合作关系，出现了像普通企业并购一样的文化机构合并，如在克利夫兰，两个剧院被要求合并，消灭了当地的一个文化特色；在犹他州，交响乐团和歌剧院不得不重组；相隔 500 公里远的圣菲和阿斯彭两个城市分享着圣菲·阿斯彭芭蕾舞团。

在美国慈善业“去中心化”的领域，在捐赠者复杂的捐赠动机下，捐赠对于艺术机构的发展和机构所偏重的文化并非持中立的立场。富有的捐赠者不喜欢将自己的钱捐赠于运营预算的项目上，而是希望随处可见其捐款痕迹，导致慈善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建筑的增多。马特尔认为，这种扩张倾向既可被看做是一种极好的扩建或发展的机会，也很可能成为一种偏差和提前透支，使文化生活变成了单纯的房地产操作，而不考虑里面放置的展品。这就是文化的“过度投资”：机构有太多的钱当作本金，太少的钱用于运营预算。

（本文作者刘颖系国家行政学院访问学者）

来源：中国文化报

地址 [http://news.idoican.com.cn/zgwenhuab/html/2013-05/18/content\\_4870934.htm?div=-1](http://news.idoican.com.cn/zgwenhuab/html/2013-05/18/content_4870934.htm?div=-1)

[【返回目录】](#)

## 谁在改变教育？重塑美国教育的“未来项目”

作为一名职业及成功教练，我每天都在帮助人们追逐工作和生活的最高梦想，并将这些梦想变为现实。然而，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批评者声称梦想是为傻瓜们准备的。

所以当我听闻了旨在“启发一国的梦想家”的“未来项目”（The Future Project）时，我觉得自己必须多多加以了解。最近，我有机会与“未来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坎亚·巴拉克里什娜（Kanya Balakrishna，她是一个能够给人灵感和启发的人物）进行交谈，以便更多地了解该项目的使命和目标。

2011 年 10 月，耶鲁大学毕业生安德鲁·曼吉诺（Andrew Mangino）和坎亚·巴拉克里什娜共

同创办了“未来项目”。他们因在著名的《耶鲁日报》(Yale Daily News)工作而相互结识,其时两人分别担任总编和执行主编。他们都成了华盛顿特区的演讲撰稿人。

坎亚与我分享道,“许多年轻人来到华盛顿特区,梦想着做些真正重要的事。但我们发现,我们这一代正在寻找的不止于此——我们寻找的是一些比自己更宏大的东西、一些新鲜和有创意的新事物。我们发现我们这一代正在等待行动的号令。”

当我们开始与朋友及同事们讨论在美国文化和环境中亟待改变的东西是什么时,答案总是围绕着美国的教育体系。我们意识到尽管人人都在谈论美国学校里的“成绩差距”,但更大的问题是有如此多的学生在学校中压根儿不投入。孩子们告诉我们,他们感到厌倦,没有得到启发,而且看不出课堂所学与他们的校外生活和梦想有何联系。

我们开始设想,如果每一位年轻人在高中毕业前就学会如何树立远大梦想、紧扣他们独特的兴趣爱好,并且把梦想付诸行动,那么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设想有一种体系,能够教人们冒险采取大胆行动、利用他们的想象力、激情、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领导力茁壮成长,并启发他们释放的全部潜力。”

在这些讨论中浮现出了一个核心想法:如果学校变成了这样一个场所那会怎样——每一位学生无论家里情况或背景如何都能发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并且学习如何用自己的热情来以某种方式或多或少地改变世界?

他们与自己能够想到每一个人分享了这一想法。2010年10月,安德鲁和坎亚在纽约城举办了一个研讨会,目的是让有兴趣的各方人士汇聚一堂探讨这个世界最需要什么。有70人出席了会议,而且几周之内60名为这个新方向和使命激动不已的人组成了一支志愿者团队。

尽管第一支团队有点“乌合之众”的感觉——它的确包含了教育工作者,也有新闻记者、设计师、银行家和科学家——但这足以使“未来项目”顺利启动。他们想把该项目建设成一个全美国性的运动,所以他们决定先在纽约、纽黑文市以及华盛顿特区三座城市的四所学校里开展,把每一个城市和学校作为研究他们进展如何的独特“实验室”。

模型很简单:“未来项目”向这些高中派驻全职“梦想指导员”——一些训练有素的世界级领导者和企业家——并让他们负责动员学生和教职员工组成联盟,对他们的爱好进行引导以创立一个由学生领导的“未来项目”(各种活动、组织和产品),该项目将对他们的学校和所在社区有所影响。他们还动员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加入其中,将周围社区的能量和才华带进学校并直接带给学生。

产生的结果非常鼓舞人心并涉及到广泛的领域,包括:在线学校报纸、全校范围内的摄影比赛、预防自杀的活动、“人权觉醒”(Wake Up for Human Rights)会议、癌症研究筹款活动以及像“完美革命”这样影响甚众的项目——这场在纽约举办的集会重新定义了“完美”一词并提高年轻人的

自尊心。

关于“未来项目”成果的更多情况：

从许多关键的社会创新标准来看，“未来项目”都是极其成功的，它提供了非常高水平的支持，并有很多强有力的成果。最初，第一轮项目启动时有 500 位年轻人参与其中。而截至今年，参加学校达到了 8 所，直接参与的年轻人多达 1,000 名，并且所有这些学校中超过 5,000 名学生参与了由学生领导的项目。

去年他们募集到资金 150 万美元，第二年的目标是筹措 300 万美元。“未来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私人性质的个人慈善捐献、中小型基金会，而且刚刚又赢得了全球公益创投德雷伯·理查德·卡普兰基金会（Draper Richards Kaplan Foundation）的捐助，该捐助每年用以表彰排名最靠前的、约 1% 的新兴社会企业。也有一些来自谷歌（Google）、耶鲁大学和许多重要银行的机构支持。现在“未来项目”拥有了一支包括八位超强“梦想指导员”在内的 22 人全职团队，该项目已经做好了继续发展并触及更多学校和学生的准备。

坎亚分享道，“当学生们将他们的梦想付诸行动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驻学校的‘梦想指导员’帮助促进一整所学校的转变——他们是有远见企业家，并提供了强大的领导力——向学生们展示了如何催化梦想并将它们转变为有力行动。”

最终目标就是使“未来项目”成为一个能够自我维持的商业模式，这样就不必再筹集大笔资金以继续开展运动。“未来项目”的目标是“打造一国的梦想家”，要实现这一目标无疑将需要时间、金钱、投入、热情和远见，但坎亚和安德鲁由衷地相信：“未来项目”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团队、“梦想指导员”和外部支持者拥有必要的精神、创新、远见和精力以建立一个将能确保继续发展和扩大的自给自足模型。

其他人也持相同看法。纽黑文市市长约翰·德斯泰法诺（John DeStefano）已经承诺到 2014 年时将帮助从纽黑文募集 50 万美元资金，让每一所学校都有一位“梦想指导员”。特奥会（Special Olympic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蒂姆·施莱佛（Tim Shriver）盛赞“未来项目”是草根学校改革的一个绝佳例子，在这里变化是自下而上的，基于的是孩子们所想要的，而非在大人看来那些对他们最好的东西。他表示这个项目体现了一句古老的格言，好的教育者必须“点亮火把”，而非“装满水桶”。

“关键目标是以启发灌输教育，”坎亚说道，“帮助每一位学生走进自己的内心、头脑和灵魂并做一些与之相关的事。我们正着眼创造一个教育体系，其中每个学生都能自信地朝着梦想的方向前进，并将他们的梦想付诸行动。神奇之处在于孩子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学到了多少。他们做了大量工作、研究和探索，并在自己的愿景中吸纳并领导其他人参与，但他们是如此兴致勃勃，以至于

这感觉起来并不像是在工作。学校变成了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场所。最后，我们希望改造‘梦想家’这一概念，将其内涵从负面的‘软弱’或‘轻率’变为一种强大的催化剂——拥有自己的特定梦想并将其实现以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相信安德鲁、坎亚和“未来项目”已经做了一些给我们所有人以深刻启发的事情：他们找出了解决的严重问题，开发了一个模式来加以改变，激发了启动和测试所必要的支持，并打造了一个有效工具催化所需的改革。我们都能从安德鲁和坎亚那里学到该如何朝着我们梦想的方向自信前进。

梦想做些什么或成为什么？你能从今天起朝着它自信前行吗？

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地址：[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305/0025509\\_all.shtml](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305/0025509_all.shtml)

[【返回目录】](#)

## 大社会资金运营一年回顾

2012 年 4 月，大社会资金（Big Society Capital）在英国正式启动。一年过去了，这项旨在改善慈善组织与社会企业融资渠道的庞大计划究竟运营得怎样？5 月初，大社会资金首份年度报告对外发布，其中一系列关键数据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解读：

2012 年，大社会资金接受了来自“回收基金”（The Reclaim Fund）和银行体系的资金共计 1.194 亿英镑，其中 5660 万英镑用于社会投资，1940 万英镑以签约投资方式放出，共涉及 15 笔投资交易。

正如最初的预期，第一年大社会资金出现了约 107 万英镑的投资亏损。不过即便如此，1.194 亿英镑的资金入位意味着大社会资金仍能够继续资助支持其业务目标。

而大社会资金第一年的投资收益表现为：

仅经过一年的投资活动，2012 年的投资收益已达到 68.5 万英镑

年度报告还总结了“社会影响债券”的进展 - 在 2012 年初仅有一种社会影响债券成功发行。而如今已经发行了 14 种债券。

在大社会资金的信托理事和顾问委员会成员中，男性成员数量远多于女性，不过其 10 位董事会成员中男女数量为 6:4，其中 2012 年收入最高的一位薪水达 14.2 万英镑。

对于大社会资金第一年的表现，顾问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社会股票交易所的非执行董事 James

Perry 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与评估。

首先，他认为大社会资金的基本目标已经实现。顺利成立、资金入位、按计划完成了多笔社会投资。然而他也指出，进入第二年后大社会资金将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包括：

### **资金调配的压力**

大社会资金的资金投入是有相当的回报预期的，必须谨慎地选择投资对象，确保清晰与风险可控。因此，目前资金的供需有着很大的不对称。应对这种不对称的一种方式，就是重点关注数量较少、但规模较大的、针对成熟市场参与者的投资交易。当然，如果这种方式是以牺牲小型但更为创新的投资交易为代价，那么大社会资金在投资资本与公民社会对接方面变革的主导作用可能会打折扣。

### **政策干预**

从现阶段看，旨在推动社会投资市场发展的税收优惠还未达到最优化。通过针对社会投资的税收优惠，可以引入更多市场所急需的风险偏好（即企业愿意在市场上所承担的风险量），因为税收政策有助于抵消一部分风险的负面作用。

### **主动性**

通常投资者愿意对显而易见的市场机会做出反应。在尚不成熟的社会投资市场，很多市场必须扶持的领域或许仍为真空地带。大社会资金对此有较他人更清晰的洞察，也表现出积极应对的意愿，对此是需要欢迎鼓励的。

### **培育新文化**

对于大社会资金而言，最艰巨的挑战莫过于创建新的机构文化。这也是所有社会投资机构所面临的 - 需要真正地运用“双语”，一方面是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社会变革。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同等地认同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大社会资金需要自上而下地加强这种组织文化。

### **联合投资人的压力**

大社会资金的初衷是培育一个市场，吸引更多投资方加入，但目前社会投资人还比较薄弱、参与程度有限。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会有更多投资人进入。短期来看，大社会资金应被赋予更多自由，抛开其他投资方的参与度，坚持投资正确的项目。

### **政治化的风险**

工党认为“社会投资银行”的创意实际上源自于工党政府期间的“未认领资产委员会”，在大社会资金成立阶段秀出支持的姿态。现任联合执政政府的目标是将伦敦打造成全球的社会投资中心，与此同时又在大幅削减公共预算。所有这些相互交织，令人对 2015 年下届大选前的前景充满关注。

James Perry 认为，领导力是指去做正确的事情，而非做最容易的事情。大社会资金供需之间

的一些不对称带来了一个战略问题。若维持现有的投资回报预期，那么大社会资金与一些最优秀社会组织合作的能力将严重受到制约，因为它不得不倾向于“安全”的社会投资，无需过多针对市场失灵的干预。他建议，可以将大社会资金的资金划分成不同投资回报预期的档次，这样资金需求方的回应与协作模式可能因此而改变。

大社会资金的终极目标是要向资本方展示，社会投资能够创造回报，并为公民社会组织引入大量资本。然而，如果我们无法证明这一点，社会投资就很难主流化。

综合编译：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

信息来源：<http://www.pioneerspost.com/>（有删减）

来源：英国文化协会

地址：<http://dsi.britishcouncil.org.cn/zh/policy/20130516/1175.shtml>

[【返回目录】](#)

## 社会企业改变传统援助发展模式

导言：传统援助(aid)的效果已不如以往。除了灾难紧急救助，拿援助做为消除贫穷、甚至稳定政治的工具，已被证明与目的背道而驰，且更具破坏性。

传统援助(aid)的效果已不如以往。除了灾难紧急救助，拿援助做为消除贫穷、甚至稳定政治的工具，已被证明与目的背道而驰，且更具破坏性。发展经济学家 Dambisa Moyo 的著作《Dead Aid》，与 William Easterly 的《White Man's Burden》同时提到，传统援助的模式忽略了造成贫穷的根本因素；且在贪腐猖獗的环境下提供援助，将无法有效达到原有目的。

中东及北非地区(MENA)尽管获得大量援助，但整体发展仍不见太大的起色。像美国提供埃及的各项援助，多经由埃及军事部门进行；而该国的小麦产业仍面临美国条件式援助(conditional aid)所带来的挑战；条件式援助产生的经济利益，援助国比受援国得到的更多。

根据《The Bottom Billion》作者 Paul Collier 的说法，传统援助无效的原因，是由于非营利组织的援助者倾向对贫穷社会加诸某些浪漫情怀，使贫穷社会的政府几乎无法运作。Collier 在“定位社会企业：援助发展中的南方创新”演讲中，强烈表达非营利组织将贫民与相关议题简化、理想化，正是促使援助者以贫户恩人自居的罪魁祸首。Collier 建议，中东及北非地区的国家与其依赖援助国的援助来减少贫困，倒不如以资助社会企业的方式，通过企业模式注入更多创新思维，提供具可持续性的方法来减少贫穷。

援助国如美国、英国与加拿大皆已注意到社会企业在发展领域的潜力，其援助机构亦开始与社会企业合作拓展伙伴关系。

2010 年至 2011 年，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United States Agenc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利用 “Aid for Trade” 计划来减少贫穷，透过贸易过程进行能力建构 (capacity building)。USAID 最近即运用创业精神 (entrepreneurship)，经由 “创新发展创投 (Development Innovations Ventures, DIV)” 来解决贫穷问题。

据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指出，良好治理与强健的组织能赋予阿拉伯世界民众消除贫穷的能力，也被视为扶贫 “万灵丹”。在治理与组织强化之前，必须先有创业精神与小企业，而促进创业家与小企业发展的良方，则是透过非政府组织创立的微型贷款计划。

政府与多方援助机构亦很快地跟随这项潮流，在财务与技术上给予协助。这些计划促成低收入国，如摩洛哥，至 2009 年拥有最多有效借贷者。然而，埃及、摩洛哥等北非中东国家仍受贫穷之苦；可持续经济发展专家提出结论，用来帮助赤贫人口脱贫的微型贷款无非是言过其实。另一方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10 分析文章 “摩洛哥扶贫经验：给阿拉伯世界的一课”，强调良好治理对于消除贫穷的重要性；但要由此认为强化治理能对扶贫有多大影响，或许还言之过早。

近期加拿大国际开发总署 (CIDA)、USAID 分别与其国家外交与贸易部、国务院外交事务部合并，援助发展由外交利益出发的角度更显而易见。这些组织改组的方向亦招致发展经济学家们的批评，如：Collier、Moyo 及 Jeffrey Sachs，三人主张以多管齐下的方式，推动以企业模式达到发展目标，逐步使发展机构能熟悉、并吸收私人企业相关营运准则。

社会企业家正顺应了这波发展新趋势，以市场导向模式，解决快速都市化、环境与医疗保健系统缺陷等社会及经济问题。要为社会企业取得资金，则可透过基本的用户付费模式，或经由社会效益债券 (Social Impact Bond, SIB) 募集资本。SIB 透过按绩效付酬的方式 (即当投资标的成功达到社会目的，就能得到财务上的回馈)，协助社会企业可持续经营，如英国即利用 SIB 解决当地游民问题。

Moyo 与 Collier 批评，政府的援助忽视解决社会问题的替代方案，而这能由 SIB 与社会企业家来弥补政府援助较低开发国的计划在施行与效益中的差距。

约旦与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为援助发展的试验性指标案例。两国一直以来除接受经济援助，亦同时获得技术协助，通过相关训练，达到多方面能力提升。相较于纯粹利用经济上的援助，前述两国的模式与社会企业更有带动就业机会的潜力。社会企业如何将活水导入援助发展社群，转变其文化与行为模式，并带动新一波有效的行动，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社企流

地址: <http://www.seinsights.asia/news/131/1132>

[【返回目录】](#)

## 国外志愿者培养：从小培养“回报社会”精神

一个芦山地震志愿者被村民骂走的消息在网络上不断传播，引发了人们对志愿者如何“帮忙不添乱”的讨论。而在志愿者服务相对完善的欧美等国，志愿者往往被视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国家不仅鼓励民众从小投身志愿服务，还建立了相关培训机制，制定有关法律，为社会培育基数大、素质高、能应急的志愿者队伍。

### 从小培养“回报社会”精神

在不少发达国家，很少有当地人一生没有做过志愿服务的。从小做起，让这些国家的志愿服务被外界认为有更高的含金量。

在英国，虽然年纪小，但少年志愿者能做的事情仍然不少，像帮助宣传保护小动物，提醒大家保护牙齿、注意环境卫生等等。这些小义务宣传员们经常身披荧光绿的马甲站在街头，向过往路人做宣传。面对这些孩子天真的笑脸，很多成年人都愿意停下脚步来和他们聊聊天。按照“英格兰志愿者”机构干事霍布齐对《环球时报》记者的介绍，英国人鼓励孩子们从小就当志愿者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回报社会”的思想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扎根。“我们需要看到这些孩子们一旦长成大人发现街头有人跌倒主动去搀扶，遇到无家可归的人，知道应该介绍他们去哪里接受安置”。他同时表示，在这些方面他一直认为英国做得不错。

对于霍布齐的说法，《环球时报》记者也深有体会。记得一次在伦敦乘坐火车，突然有人遭遇心肌梗塞昏迷。记者身边的英国男女老少不少人都迅速冲过去抢救，同时有人在判断出症状后，立刻拨打了相关医护部门的电话号码，并且熟练地按响火车上的紧急呼叫按钮，通知列车长。记者事后好奇地问过其中的一些英国人，“这些都是从哪里学来的？”而“小时候”多半是他们不加思索的回答。

为了从小培养志愿者，德国设立了专门的“训练营”。《环球时报》记者采访到一名12岁的德国小姑娘卡罗塔。作为德国“温暖之家”协会的小志愿者——“时间赠送者”，她已有3年志愿者经历，现在的工作是负责照看一名患有重病的同龄人菲利普。为了做好这份工作，卡罗塔之前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训练营。在训练营里，她不仅要掌握急救知识，还要全面了解自己所照顾病人的情况，以及怎样和被照顾者沟通等。培训老师会随时考验他们，比如扮演病人、故意闹情绪等。培训

期间，她还有机会和其他青少年志愿者一起学习交流，经过最后的考试合格才能“正式上岗”。

而加拿大孩子们之所以特别热衷参加志愿者活动，在业余时间培训、拿证，不光因为当志愿者有意义，更因为这样做“有好处”——甚至“不这样做没好处”：在许多加拿大省份，学生需要积累足够“义工时长”才能升学或毕业，即便没有这项硬指标，“社会服务状况”也是学生操行评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当志愿者还能积累人脉和重要的“本地工作经验”，对于留学生或移民子弟，这是获得更好工作的敲门砖，对当地青少年则关系到第一份工作的好坏，老资格和专业性的志愿者，找到更理想工作的概率，要比“菜鸟志愿者”大得多。

### 重技能培训，需持证上岗

相对于面向“小志愿者”的基础性培训，为了获得更多的“救援高手”，不少发达国家在提高志愿者应急能力和技能水平方面投入很大。他们不仅设有专门的培训机构，严格要求志愿者的资质水平，还在社会层面激励高素质志愿者。

由于灾害频发，日本十分重视对志愿者各项具体技能的培训。即便是普通的非救灾志愿活动，日本志愿者的培训活动也有模有样。去年《环球时报》记者曾经参加东京都水道局组织的活动，到东京的西部水源林参观。维护两万多公顷的水源林，是一项工作量巨大的工作。东京都水道局除了让专业人员护林外，还动员志愿者组成多摩川水源林森林队参加护林，现在已经有约1000名志愿者报名参加。森林队的活动主要有修整树木、砍伐、造路等等，他们每年举办五次体验培训活动，让初学者了解保护森林工作的主要程序和具体操作方法。对于志愿者的服装和携带物品也有严格的要求，比如一定要戴安全帽、手套，穿工作服，带毛巾、雨具、常备药等。

英国并不是一个多灾国家，一年到头没有多少地震洪水等灾害需要应付。但英国人并不因此就忽略对志愿者技能水平潜移默化的培养。在“Doit”志愿者机构网站上，有意申请志愿者服务的人，每隔45秒就可以找到一份志愿者的工作。这些工作看起来非常琐碎：分辨各种药物，陪伴情绪紧张的病患或者帮助维护一些古旧文物或是艺术品等等。长期下来，志愿者学习到很多知识，即便在英国用不上，前往其他国家提供志愿服务时，往往就会派上用场。很多英国人会参加本国的“红十字会”，前往非洲灾区服务。一些英国人则在本国学习了一些农业灌溉技术后，前往亚洲国家帮助当地人发展农业，而这些平民能手汇集到当地，都很受欢迎，不会被当地人看作是“帮倒忙”。

在加拿大这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因为劳动力价格很高，许多公益活动、社区服务，如果雇佣过多人手则财政势必吃不消，所以很多活动都是义工唱主角、挑大梁。作为一个“做什么都需要证书”的社会，在加拿大做志愿者陪护老人、在医院帮忙、在海边参与活动组织、陪更小的孩子参加体育锻炼等，都需要一张甚至几张专门证书，这些都要求必须参加专门的培训，一般社区活动中心或图书馆都有这类课程。虽然证书有的很容易拿，往往参加一次活动就能拿回来，但也有证书很难拿到，

如应急救援之类的证书，不经过一定课时培训和严格考核，休想过关。

德国人更是把志愿者技能培训做得极为体系化。记者了解到，负责灾害救援的德国联邦技术救援署是德国最大型的志愿者服务平台之一，也是培养灾害救援志愿者的“孵化器”。为了让旗下志愿者个个成为“救援高手”，该机构在德国设有两所专门学校：一所在下萨克森州的豪亚，每年培训近7000名学员；另一所在巴登符腾堡州的诺伊豪森，主要做提高救援领导的培训，每年培训6000名学员。

培训分为三级。一是基础培训，以救援小组为单位，主要是公民保护、危险物品、救援常识、常规救援行动、急救、极端天气下的行动等知识，教师通常由经验丰富的老队员担任。二是专业技术培训，内容包括通讯、水处理、交通、电力、定向爆破、装备仪器的操作与维护等技能培训，专业技术培训时间为1周左右，培训形式主要是现场操作和讲授相结合。三是指挥培训，培训内容包括高级指挥人员协调能力、后勤管理等内容，培训方式主要是模拟演练。此外，记者还了解到，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德国联邦技术救援署还开通“网上培训学校”，学员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网络培训。

### 志愿者能成为“国家财富”

从小培养国人的志愿服务精神，不断提高志愿者的应急能力和技能水平，被不少发达国家看作是国家发展的一项根本举措，为了确保志愿者服务长效发展，它们还制定有专门的法律和激励举措。

按照英国一些地方的当地法律规定，即便是一个小学生，也可以在校方组织下，定期参加一些志愿服务。在多灾的日本，志愿者服务始终与救灾联系密切，一些救灾方面的法律甚至还专门提及志愿者。例如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发生，日本全国137万志愿者赶到灾区，当年被称为日本“志愿者元年”。当年7月政府就修订了《防灾基本计划》，补充了“防灾志愿者活动的环境整備”、“接受志愿者”等条目。同年12月，“志愿者”这一词汇，正式写入修正后的《灾害对策基本法》。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社会教育学者绍尔贝格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德国把志愿者活动作为一项国策”。德国联邦议院专门设有“公民志愿行动的未来”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促进德国公民志愿行动，制定具体的政策战略与措施。德国外交部也设有名为“文化延伸”的国际志愿者机构。德国政府还积极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志愿者参与社会服务的统一性和标准化。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高志愿者的积极性，德国早在50年前就制定了《奖励社会志愿者年法》等法规，鼓励民众投入志愿者行列。比如，参加者可获得社会保险等方面的优惠奖励，所支出费用可以报销等。平时，志愿者参加活动时的住宿、工作服、培训等也是免费，还可获得一定的补贴。绍尔贝格对记者表示，志愿者项目大幅降低德国的社会管理成本，有效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

是德国的巨大财富。

来源：环球时报

地址：[http://hope.huanqiu.com/exclusivetopic/2013-05/3940224\\_2.html](http://hope.huanqiu.com/exclusivetopic/2013-05/3940224_2.html)

[【返回目录】](#)

## 非洲取水项目启示：评估标准要清晰简明

据美国《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杂志报道，世界宣明会通过“如何明确措施，并确保措施简明有效”的解决问题思路，帮助非洲国家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清洁饮用水。

“要完成一项工作，必须先对其进行适当评估。”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对于国际非政府组织来说，通常是由当地社区来评估其工作的有效性，并且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捐助者为评估工作提供资金支持。要保证评估手段的简明性，并确保该评估手段对于捐资者和当地社区来说都有意义，这样才可以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对健康的生活和生计抱有共同的愿景。

以世界宣明会在非洲设法帮助居民获取清洁饮水为例。儿童的健康与福利高于一切，撒哈拉以南非洲一半以上的儿童死亡都源自污染水，恶劣的卫生条件和卫生设施的严重缺乏。三年前，世界宣明会改变了原有方案以确保社区获得清洁的水和卫生设施，并且定下了一个激进的目标：在五年内，满足 500 万名需要清洁水和卫生设施的居民。这个目标的完成需要一个快速扩大的项目进程，包括每年在在西非的三个国家建造足够的井来帮助大约 200,000 人，并且每年要在十个国家帮助约 100 万人。

但要吸引投资者和当地社区的认真参与，世界宣明会需要评估其面临的挑战以及潜在的影响。而整个评估过程必须考虑到当地村民、钻井团队和潜在的捐资者。

首先，要明确需求，即获取清洁饮用水。迄今为止，参与该项目的每个国家对“需求”的内容定义都不同。世界宣明会通过社区讨论协商，最终确定了“需求”的内容：清洁饮用水的获取意味着要有一个全年可用的受保护水源，并且居民从家到该水源地的路程应该不超过 30 分钟。根据该评估标准，只有 45%生活在非洲社区的人能够获得清洁饮用水，前提还是这些社区有世界宣明会的长期资助。剩下的 1500 万人口仍然无法获取清洁饮用水。然而，通过制定一个评估标准，世界宣明会得以婉转地向捐资者提出需求，并且为当地社区立下了一个理想目标：把他们每天艰苦跋涉以获取清洁饮用水的时间缩短到 15 分钟。

其次，要确保清洁水能持续获取。要完成这一步，就需要成立一个社区饮水委员会，来负责取

水点，并且每年向每个居民收取 1 到 2 美元，以解决日后取水设施的维修费用问题。另外，由社区提名挑选 7、8 个人参加专业训练，日后来负责取水设施的日常维修工作。委员会还必须确保村民能够认识到清洁饮用水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还必须关注钻井的维修工作。加纳的一项研究显示，90% 超过十年的钻井仍能工作，不过，钻井的维修工作有时很不稳定。

这些简单的措施和社区的承诺使世界宣明会能够为非洲严重缺水的地区募集更多的资金，这样以来，就能够聘请到参与到此项目的专业人才。更重要的是，这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他们能为此项目做出巨大的努力，包括购买设备，聘请技术人员等。

最后，任何项目都需要清晰简明的效能评估标准。世界宣明会评估此取水项目效能的指标就是，每户居民获取清洁饮用水的成本是否有所降低。在项目进行的前两年，每户获取清洁饮用水的成本从 80 美元降到了 50 美元，这都多亏了钻井新技术的使用和有效钻井的增加。另外，世界宣明会还以当地居民的痢疾发病率以及当地女孩的入学率作为取水项目的效能衡量标准。

世界宣明会在非洲地区获取清洁饮用水的一系列措施激励了世界其它缺水地区积极地在此项目上进行思考和探索。到 2012 年为止，世界宣明会已经提高了非洲清洁饮用水的获取率，并且每年组织 100 万人进行卫生培训。更重要的是，世界宣明会在网络上与全球分享其取水方法和结果，使评估方法成为广泛的学习对象。

来源：环球网

地址：<http://hope.huanqiu.com/globalnews/2013-05/3954627.html>

[【返回目录】](#)

## 打通“最后一公里”健康之路

美国国际开发署全球发展联盟曾这样评价“生活用品”：许多项目都表示具有可持续性，但只有“生活用品”是少数具有改变当前局面潜力的模式之一

想象一下，假如我们的身边没有百货超市，没有网购，也没有能送货上门的快递服务，那将是一个怎样的生活环境？而这样的生活确实存在于许多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中。

### 传统经济的苦恼

在众多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尚有数亿人口无法获取可靠的医疗用品和服务。诸如疟疾治疗药物、清洁炉灶、营养品、卫生棉和太阳能照明灯等用品，能够极大地改善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人们的生活。但大批能够拯救生命和改变生活的产品无法到达所需者的手中，这是制约全球战胜贫穷

和重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非洲，现今有 2.7 亿人口依然缺乏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一个持续有效的物资发放系统的建立，仍然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之一。

在公益慈善界，我们经常谈论“最后一公里”的解决之道，而这“最后一公里”的运输难题又何尝不是消费品行业的发展瓶颈之一？从商业角度来说，不少公司也发现了这些偏远地区市场所蕴含的潜力，但要破解这道“利润密码”却谈何容易。在这些地区，经销渠道往往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受规模所限，运输和销售成本也难以下降。于是就造成只有为数不多的商家能够在这些土地上维系着运作。

表面上，用于公共部门的药品都是免费的，但这一系统却往往缺乏资金、缺乏人手、缺乏库存。而经营药品的私营部门，却陷于层级众多的销售商制度不能自拔。其结果就是，药品的零售价达到了出厂价的 350%、假药泛滥、谈不上任何保证的药贩子遍地开花。

面对这道出给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共同难题，一家尝试在其间建立销售平台来“送货到户”的社会企业或许是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 远在非洲的“雅芳小姐”

查克·斯劳特(Chuck Slaughter)曾是美国最大户外用品品牌“旅行者”(TravelSmith)的创始人，该品牌在美国有着十亿美元的年营业额。数年前，他前往肯尼亚的一个慈善机构担任志愿者，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发展中国家的实体店所能接触到的顾客极其有限。2004 年，斯劳特竟索性卖掉公司，专心研究可在非洲行得通的销售模式，并在 2007 年创办社会企业，希望用自身商业经验为这片土地带来积极的改变。

最初，斯劳特观察到雅芳这个美国品牌在 1876 年成立后雇用女性，即雅芳小姐，在不同的城市及乡村挨家挨户推销美容产品，而如今已经年营业额超百亿美元、市场遍及一百多个国家。他决定要运用“雅芳模式”来尝试改善乌干达的医疗质量，他认为：“我想用这种模式做实验，让女性走进小区做生意，而不是枯坐在店里等顾客上门。”

斯劳特将企业简单地命名为“生活用品”(Living Goods)，并采用微型加盟(microfranchising)的模式，雇佣受过六到十年教育的乌干达乡村女性作为销售员。这些女性参加过两星期的医疗保健培训和实习后会成为本村落的医生，身穿制服挨户询问家庭健康问题，并介绍“生活用品”品牌，提供低于市价的健康相关产品(如药物、营养品、肥皂、蚊帐等)。各地区每月也会花半天时间聚集区域内所有销售员进行进阶培训和经验分享。

受小额信贷的启发，对新进销售员，“生活用品”会先以借贷方式提供价值 60 美元的商品，销售员会从卖出商品营业额的 15-20%获得收入，用以偿还其借贷，再向总部进货。而“生活用品”能够持续经营的关键，在于借助销售沐浴液和洗衣粉等基本生活用品与消费者保持接触，顺便介绍蛔

虫药等药物，而销售生活用品又能对药物产品进行交叉补贴，使药物的价格可以低于市价三成。

此外，“生活用品”与乌干达目前最大的抗击贫穷组织 BRAC 合资，约有 600 位女性销售代表也来自于 BRAC 的招募。这样的合伙关系让“生活用品”延伸其影响范围，也让 BRAC 自身的网络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 比免费还便宜

“比免费还便宜”，这是“生活用品”的宣传口号。如何理解呢？“生活用品”所销售药物(如治疗疟疾药物约 0.75 美元)在乌干达的医疗保健体系中是免费提供的。虽然如此，消费者前往医院需要额外交通成本(6-8 美元)，也须承担医院可能没有存货、必须再去药店购买的风险。相反地，假如村落中有“生活用品”销售员，即使小孩在半夜生病需要药物，销售员仍可以随呼即到，且不会遇到没有存货的情况。

随着手机在村庄中越来越普遍，销售员现在也使用短信记录销售与追踪存货，“生活用品”则会直接发送促销和健康的信息给顾客，特别是顾客在购买药品之后会收到关心与提醒用药的信息。

目前，“生活用品”已在乌干达培训出 600 名女性销售员、拥有超过 30 个分部，有些销售员一周收入可超过 100 美元。培训一个销售员的成本为每月 200 美元，仅是开设一家商店的十分之一。加盟机制也让“生活用品”拥有受保障的供应链、低成本的进货和值得信赖的品牌等优势，并带来许多合作关系，例如“生活用品”正与联合利华、雀巢洽谈开发新的营养产品，促使这些企业采用微型加盟来扩张市场。

即使许多分部在财务上已可自给自足，目前“生活用品”总部尚未获利，仍需要慈善资助，斯劳特希望未来能够开创在资本市场的投资报酬率，以吸引更多投资者。

他认为在公司扩张前，找到合适的经营模式更为重要，也坦承规模化后会面临不同挑战——例如品牌市场占有率和销售员的增加会影响到传统药店与医生的既得利益；要招募到大量能力与意愿兼具的销售员并不容易等。

“俗话说，当有人威胁你时，表示你做的事是对的。”斯劳特如此乐观地说道，“我希望‘生活用品’能让更多非洲女性学会如何通过做生意为自己村落的健康把关，而这正是社会企业精神所在。”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gjal/201305/a9bea79ea1284907beffba84f0bb6d13.shtml>

[【返回目录】](#)

## 大公司问路“穷人经济”

不稳定收入人群的增加，是一个社会悲剧，但对企业来说同时也是一个空白市场，一些企业开始关注这个边缘顾客群。“低成本”和“商业互助”应运而生。

一直以来，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对穷人兴趣都不大，因为穷人被认为缺乏必要的消费力。

但是，那些落后国家的企业除外，他们必须关注穷人，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为此，美国印度籍研究者 C. K. Prahalad 在 2004 年提出了一个新概念——BOP，即“金字塔底部经济”。典型的例子有：印度外科医生 Devi Shetty 创办的低成本心脏手术医院，以及非洲和印度的手机运营商在西方国家以难以置信的价格提供手机套餐服务等。

不过近几年，跨国公司也渐渐发现，“金字塔底部经济”不仅是非洲企业才需要关注的领域，现在也成为了他们需要面对的新问题：在西方国家不仅同样存在贫穷，更糟糕的是，这些年它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在以罗曼蒂克著称的法国，贫穷笼罩了总人口的 14%，约有 800 万至 900 万人月收入少于 950 欧元，而指望藉由财富不断增长而缩小贫富差距，被认为基本不可能实现。

### 低成本时代

很多迹象表明，大公司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

比如 Unilever（联合利华）高调宣布在欧洲（尤其是西班牙）投放小剂量的洗涤品，仿效其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做法；Auchan（欧尚超市）也宣称应一部分经济不太宽裕的消费者要求，打算大力普及各种小包装产品。

其他抛出“低成本”杀手锏的还有航空公司（瑞安航空，易捷航空）、铁路、汽车（Logan）、手机（免费手机）等，低成本最近几年已成为很多大公司的主流策略，以便有效地以更适宜的价格向收入较不稳定人群及其他顾客群提供服务。而在以往，这些产品和服务只有富裕阶层才能享受得到。

低成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高明的”低成本，奠基于真正的技术革新，或是通过在设计和生产流程中进行流程重组而达到；另一种则只是通过简单地降低产品质量或服务水平，使用临时工，以降低成本。后面这种“低成本”，本质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因此，要在不损失利润的前提下，满足较不富裕的民众的消费需求，并且不在质量上做出让步，实在是一项真正的挑战。

### “社会”业务

如今，“穷人经济”已经正儿八经地成为了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并受到商业高校的关注。除了“低成本”外，经济学家们还致力于研究“商业互助”给企业和穷人分别带来的好处。HEC 高等商

学院在 2008 年底设立了“社会商业，企业与穷人”教授职位，他们的课题是：“如何让企业将他们的产品带给收入较不稳定的消费者为目标（尤其是指那些第一必需品），但同时要避免三大暗礁：原有市场的流失、对目标人群的侮辱以及门槛效应”。

该课题的主讲教授 Frédéric Dalsace 解释说，他希望通过研究企业与穷人的关系，帮助企业建立“补充的商业模式”。

Frédéric Dalsace 所倡导的，更像是一种商业与社会公益结合的新型关系。在这个关系里，企业关注的不是利润多少的问题，企业应该可以接受零利润或利润极少，当然也要避免亏损。而其关键点是，“以边际成本为售价”：比如说，餐厅的售价只包括餐桌上食物的价格（边际成本）而不包括租金和专用的设备、厨师和服务生的薪水。

欧洲有一个叫做“光明互助”的项目就是如此：合作企业向较贫困长者提供眼科诊断服务，并以优惠价格提供眼镜（镜框+镜片），受众最后只需为这全套服务支付不足 60 欧元，而在正常的商业互动里，普遍消费者通常要为此花费 200 欧元。

### “商业互助”的好处

低成本与商业互助，在消费者眼里非常相似。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投身到这种“社会业务”里有什么好处呢？

它跟人们熟知的公益营销不一样的是，其在形象上的收益是有限的。“我们会要求加入‘商业互助’计划的公司承诺不宣扬，目的是为了 avoid 被指责利用穷人做‘营销手段’。”Frédéric Dalsace 说，“不过，企业也从这些项目中学到很多。一方面，他们开始与很多以前没接触过的新的合作者沟通，或是更进一步——交往频繁。因为所有这些创新的商业互助举措都是以多方合作交流为前提的。”

其次，“商业互助”项目虽然不涉及赢利，但产品生产与销售规模的扩大，同样可以为企业增加边际利润。最后，企业通过这些项目跟其受众深入互动，相当于开发出了一群潜在客户，作为回报，一旦他们财政宽裕了，很可能会因为对这个公司的好感而留下来。

然而，这当中也有风险。企业如果要保证正常业务和利润不受“商业互助”项目的影响，就必须避免其他的顾客群被这种零利润的供应所吸引和影响，以保证仍然可以以“正常”价格向他们提供相同服务，否则，正常的利润有可能因此被挤压掉。这也是与纯公益项目不一样，企业往往会在“商业互助”项目中保持低调的原因。

因此，在推出这类措施时，企业通常会联合非政府组织、协会、互助经济行动者等，由企业帮助企业寻找需要这些供应的民众。依视路公司（Essilor）是互助光明活动的合作者之一，它就是这样和互助会及保险公司合作的，互助会和保险公司可以帮他们锁定那些受益于获得医疗补充险补助

的人士为目标对象。

法国移动通讯营运商 SFR 则在几年前开始与互助组织 Emmaus Defi 合作，为赤贫人士提供手机及低成本（5 欧元）的话费套餐。达能公司（Danone）借助红十字会参与体验“淘气鬼计划”，以低成本销售 Blédina 奶给那些有需要的家庭（否则的话，他们可能会过早地给幼儿进食牛奶）。至于雷诺公司（Renault），其“移动计划”（在互助修车行向工作需要用车的赤贫人士以原价供应汽车）则在汽车协会（Voiture & Co）的协助下进行，该协会旨在帮助所有需要交通工具的人，包括这些弱势群体。

来源：中国财富

地址：<http://www.qikan.com.cn/Article/zgcf/zgcf201301/zgcf20130133.html> [【返回目录】](#)

## ◎企业社会责任

### CSR 专家访谈：经济效益是引导“负责的”中国供应链的关键

在接受环球资源的采访时，可持续发展咨询机构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的创始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访问学者 Richard Brubaker 教授阐述了为何经济因素对于中国制造商的企业社会责任构建至关重要。他也指出，大型的零售商在推动“更加负责的”供应链时面临着一些挑战。Brubaker 认为，在未来 5 年中，CSR 不会创造直接的竞争优势，但将有利于培育龙头制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旨在成为促使可持续理念进入核心商业理念的催化剂。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与政府、企业、学界和非营利伙伴共同致力于知识分享、团队建设、工具开发等，以期推动并执行具有“可持续性”的商业案例。

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是指商业对社会的影响，但通常被理解为可持续性、企业公民权、“绿色”公司或建筑、“清洁”技术和供应商社会责任等。而其中哪些概念对中国的制造商以及中国的国际进口商有借鉴意义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因行业而异，如果考虑到用工标准、环境排放、能源依赖等因素，则会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制造商。这些因素无一例外都在恶化，企业正在远离 CSR，转而追求更为简单的“更负责的”商业模式。Richard Brubaker 是位于上海的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的创始人，也是亚洲 CSR、可持续性和领导责任的权威之一。

CSR 和“负责的”有何区别？

从传统来看，CSR 与商业模式是脱离的，采取项目的方式运作。“责任”是通过战略性的、系统化的方式来实现的。在资源成本上升时，企业将会提高效率。而在透明度提高时，企业将会更加遵纪守法，在与一线工人签订合同时更多地考虑劳工福利。

大型零售商对其供应商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它们符合“供应商规范”，甚至中止了与违规的供应商的合作。这些大型企业在中国推动“更负责”的供应链时会遇到哪些挑战？为了实现“合规”，它们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主要挑战之一是培养实现变革的内部能力。与同等规模的企业合作时，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引入国际规范并加以实践。地方分公司需要一段时间来理解总部对可持续性的要求及在地方层面上可能产生的影响，随后才能向总部提出资源诉求以实施这一战略。这一过程通常会涉及多方参与，例如在具备专业能力（如可持续性、劳工、EHS 等）的第三方的支持下动员供应商等。

有时这一过程也包括教育与动员。经济发展时，供应商可能不愿意既承担所有成本，又被迫降

低价格。于是强制执行就会最终以投资的形式出现，如苹果、百胜和美泰公司等。如果没有能力投资于基础设施来实现对问题的监管和校正，就会导致失败。供应链的外包也会存在风险，实现风险最小化的唯一渠道是系统投资，确保供应链的完整和有效。投资是需要钱的，也需要人，更需要明智的决策来挑选合作伙伴。

你为什么认为中国的制造商没有践行 CSR？

小规模制造商对效率的理解有限，对长期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考虑也不足，它们重视经济。但是在商业模式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理解劳工需求并加以解决。溢达集团在新疆的棉花企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家族企业是如何在“责任”中赋予长期战略考量的。这一过程经过了多年的规划和试错，现在已经成为核心商业行为的支撑。也有一些企业试图建立有效的员工成长体系来做“正确的事”，它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但真正实现供应链合规仍然任重道远。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例如孟加拉和柬埔寨，劳工标准仍然是个问题。

制造商做“正确的事”会得到哪些战略性收益？

“行善”最终需要获得经济价值。一些制造商在“清洗”它们的采购商的同时也将维持长期的、较高的盈利水平。战略性收益分为外部收益和内部收益。从内部来看，较低的员工流动性会降级成本，投资于绿色、清洁产业的过程也会因减少资源浪费而降低成本。从外部来看，制造商选择最佳合作伙伴的过程也会催生并拓展商业机会，而这些机会是最具竞争力的。同样地，“合规”的供应链也将带来长期的收益。

你认为有越来越多的国外进口商在寻求负责任的供应商吗？

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绿色的、有机的产品的利润越来越高。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一些企业正在改变其原本的品牌策略，正在尝试“正确的”方式。其中一个例子是 Wobabybasics 和 Bambu 的创始人通过与跨国集团的合作寻找到一种更好的路径来围绕具备可持续性的产品推动公司发展。这 2 个企业都设在中国，都已经证明了一个企业能够在维持社会、环境和经济可持续性的同时，一样能够在经济上获益。

国际进口商应该向潜在的供应商提出哪些问题，以测试它们对自身可持续性的理解？

理想状态下，一个公司要理解其供应商对“责任”的理解（和努力）程度，光靠提问是不够的。当然我们可以发放问卷供它们填写，但这也只是走了法律程序而已。我认为需要投入时间，可能还有金钱，才能了解供应商在劳工、环境、产品质量和内部治理等方面的运作状况。对于决定开展这些投资的企业而言，其收益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也能够在更少犯错的前提下获得更加高质的产品。这是一种长期的品牌投资，而投资并不能等同于成本。

中小规模的制造商要想变得“更负责任”，首先应该做什么？

第一步是价值链评估，以明确制造商所面临的风险和机遇。许多公司都拥有第三方供应商，于是风险就存在于价值链的每一阶段，这样就需要加以评估，首先关注最大的风险。接下来可以制定发展愿景或战略，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在采取行动时都要切实遵守。最好是先进行试点，在评估试点影响之后，再系统地推开。

中国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来鼓励可持续生产？

我认为，中国政府在推动 CSR 和可持续性方面有 3 个方面可以入手。中国的最层规划者们正在试图通过下一个五年计划来实现变革，使中国的经济从制造业对低端、低效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的依赖中解脱出来。这一目标的实现将会提高制造部门的质量，而降级整个经济增长的集约程度将是重中之重。第二个方面是执法。中国的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是政府强制执法的最重要领域。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工厂因为违反法律规定而被罚款或关闭。政府能够有所作为的第三个方面是激励企业将调整和拓展生产模式纳入平衡经济、环境和社会利益的发展策略。中国正在寻求价值链中的攀升，在这个领域也已采取了大量的行动。

你如何看待未来 5 年内中国的 CSR？

CSR 不能直接创造竞争优势，但未来 5 年内，CSR 将成为龙头企业的核心组成部分。CSR 可以成为风险缓减战略的一部分，降低企业重蹈覆辙的风险，同时也成为稳定职工队伍的防御机制，减少生产环节的失误，同时在外构建社会资本。

你的公司如何帮助中国企业践行 CSR？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核心关注客户的价值链，为客户量身定做解决方案，将客户的商业使命与市场中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因素结合起来。同时也针对另一些客户开展外部风险缓减的项目，主要手段是意识提升和相关利益者参与。但是我们也越来越多地与那些希望重新定位商业模式的公司合作，使它们的商业模式不再是就商言商，而是为市场所面临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译者：公益慈善周刊

来源：环球资源

地址：

<http://www.globalsources.com/NEWS/Brubaker-CSR-economic-incentives-responsible-China-supply-chains-050913.HTM>

[【返回目录】](#)

## 中国海外投资需恶补“社会责任”课

中国似乎有了新的、向西方先进经验学习的迫切需要，那就是在对外直接投资时，要尽快补上社会责任这一课。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以控制企业全部或部分产权、直接参与经营管理为特征，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的资本对外输出。通俗地说，就是拿中国的钱去国外建厂或收购现成的企业。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不长，满打满算35年。1970年代末从零起步，至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超过600亿美元，2012年当年更是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五。但亮丽的数据背后还有一个略显尴尬的现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交了巨额学费。而且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水平至今没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事实上，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向西方学习。上一次，是在走出去头些年。第一次与国际同行同台，竞争对手是那些在国际投资领域拥有两三百年历史的老店。几乎是在一瞬间，中国企业就认识到自己在与商业投资有关的软硬件上的全方位落后。

幸好，当时的中国还有国际大势可借。于西方而言，中国是制衡苏联野心的“友好的非盟国”；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它们和中国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和中国有着或“同志”或“兄弟”的友谊，中国很容易就替代了有殖民主义污点的西方国家。

不过，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跻身世界五百强，亿万富翁的统计名单中出现越来越多中国人姓名拼写，许多中国人、中国企业自认为已经领悟了市场、竞争的精髓，曾经的迫切，也就不再那么迫切。

新的迫切性，源于中国基于自己的经验一向觉得不会出问题的一端。

看一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分布：美国遥遥领先，欧洲十分重要，亚非拉长期保持不错的份额。而这一次的迫切性就出现在亚非拉。为什么有了向西方成熟企业学习的新迫切性？最重要因素，不是政府，而是这些国家的反对党、工会、行会、非政府组织、叛乱武装，甚至还有村社以及小生产者、小商贩。他们反对中国投资的理由，和民族大义、国家友好无涉，常常与生存需要、工作机会，工人薪资、工作条件、福利水平及中国资方对待工人的态度直接相关，较为常见的议题，还有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多样性等等。

偏偏中国对亚非拉的投资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这就使得问题变得愈发突出。

对于参与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和商人来说，这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无论国企还是民企，习惯上遵循的路径是，在国家友好的政治前提下，首先确保投资对象国相关政府机构的合作。几乎所有问题一旦纳入中外友好的范畴，往往就波澜不惊。这是中国资本在这些国

家得到的主要经验。于是，中国企业、商人习惯了“政治庇护”下的经济交往，这也让他们越来越重视政府公关。

于是，当新情况出现——在伊拉克、利比亚、苏丹……，是战乱之中反对派武装、平民的哄抢，以及民众怀疑的目光；在肯尼亚、赞比亚……，是政治角逐中各政治派别不时泼来的污水；在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是极端势力武装组织的敌视——与当地政府曾经的密切关系，反而成为中国资本最无法规避的原罪。

更糟糕的是，中国资本至今没有学会如何与受投资影响的社会底层相处。中国资本习惯了在政府保驾护航下的顺风顺水，他们不习惯于听到抗议，不习惯耐心地倾听、面对面交流，不习惯设身处地为受到项目影响的底层民众着想，牺牲某些眼前利益以换取长远利益。而这些，恰恰是西方资本自殖民时代开始，积两百年经验所得：企业必须有超脱政治权力之处，那就是企业的品格。不能设想，没有品格的企业会永远得到当地人的支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到了树立品格的阶段，而履行社会责任构成了企业核心竞争力。2013年，中国商务部 and 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试图用国内文件的形式对中国资本提出社会责任方面的约束。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来源：南方周末

地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90726>

[【返回目录】](#)

## 沃顿商学院研究综述：社会影响的财务影响

“社会影响”（Social impact）已经成了商界的流行语，但是，社会影响计划是否成功是否有实证证明呢？在不同的研究论文中，沃顿商学院的三位教授——德伯拉·斯莫（Deborah Small）、弗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和苏珊·沃切特（Susan Wachter）——探讨了在不同背景下“做好事”是否“有好报”的问题：被认为是“好心”的企业是否不太可能成功呢？银行如何才能在为农村人口提供服务的同时依然保持盈利呢？在某个城市地块植棵树这么简单的事情能大幅提升房地产的价格吗？

这项研究反映了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尤其是该学院的“社会影响计划”（Social Impact Initiative），为探讨如何利用商业知识和战略杠杆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所付出的持续努力。4月8日至12日已被确定为“沃顿商学院社会影响周”（Wharton Social Impact Week.）。

## 好人不得志？

你在企业界、球场甚至单身酒吧总能听到这样一句话：“好人不得志啊！（Nice guys finish last.）”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真相信这一俗语吗？如何将这句俗语与“好人有好报”的普遍观点协调起来呢？

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Deborah Small）德伯拉·斯莫和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市场营销学教授弗恩·林-希利（Fern Lin-Healy）研究了这一谚语背后的观念以及在其新研究中发现的相反结果，她们这篇题为《好人不得志与不得志即好人：做好事与有好报之间的冲突》（Nice Guys Finish Last and Guys in Last are Nice: The Clash Between Doing Well and Doing Good）的论文已发表在 2 月的《社会心理和人格科学》（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杂志上。

斯莫和林-希利在这篇论文中关注的“好事”是指旨在帮助他人的利他行为和善行。具体来说，她们关注的是好事背后的动机，以及他人对“好人”的看法。“我们每个人在心目中对利他主义都有个标准，”斯莫谈到。“如果从行为和背景中发出的信号背离了这个标准，就会招致冷嘲热讽。”

虽然这则关于好人的谚语通常都是指个人，不过斯莫认为，关注公司行为同样很重要，因为消费者往往会将公司人格化。为了检视一个好人（或好心企业）的动机，她们首先研究了促使人们做好事（或不做好事）的知觉过程。她们采用的方法是请实验参与者阅读涉及到个人和公司利他行为的情景介绍。

为研究个人利他行为问题，她们为参与者呈现了这样一种情境：职业橄榄球赛的观众如果为慈善事业捐赠 100 美元，就有机会参与和运动员共进晚餐的抽奖。有些实验参与者看到的脚本是：一个人想参与抽奖，是因为他非常想赢得这次晚餐机会；其他参与者看到的是：有人参与了抽奖，是因为他希望帮助儿童慈善机构。

随后，研究者问参与者，捐赠者有多大可能赢得抽奖。研究者指出，与“好人不得志”一致的是，“与怀有自私动机的捐赠者相比，参与者认为动机无私的人赢得抽奖的机会更小。”

为了检验人们对公司的认识，研究者要求实验参与者阅读有关一家公司的情况：为了更加环保，一家公司将花大价钱改变其产品制造过程。这个改变对公司的财务影响极大，以至于只有来年在该公司运营的地区出现非同寻常的大降雪量，公司才可能盈利。一半参与者看到的是这样的脚本：该公司之所以改变产品制造过程，是因为公司领导层希望承担社会责任；而另一半参与者则被告知：该公司实施这个项目纯粹是为了获得舆论的好评。就像个人利他行为的那个例证一样，参与者认为，拥有良好愿望的公司获得积极结果的可能性更小。

在这项研究的“不得志即好人”阶段，这篇论文的作者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到了做好事的结果上。研究者采用了与最初阶段相同的情境，她们让实验参与者阅读一个由一支橄榄球队组织慈善抽奖的

脚本。一半脚本称，球队（组织慈善抽奖活动）只是为了卖票；另一半脚本称，任何购买头盔纪念品的人都自动获得进场观看比赛的资格。当她们要求参与者描述观众在每种情况下的慈善情怀时，他们认为，相比购买头盔纪念品的人，慈善抽奖活动的胜出者没有那么慈善——即便脚本没有提到两种情况下人们为什么要进入慈善抽奖活动。

为了研究在公司身上产生的这一效应，研究者请实验参与者阅读了有关企业改变产品制造过程的脚本，一个脚本称企业是为了环保而改变，另一个脚本称，企业的现状已经符合环境标准。企业的财务表现会因为大量降雪而更好，或是会因为降雪量低于平均降雪量而低于预期值。同样，参与者认为，与收益低的企业相比，因为大降雪量而受益的企业行为并不那么利他。

斯莫和林-希利两人都谈到，第二项研究的结果让她们深感吃惊，在这个研究中，人们认为，良好的心愿应该导致更糟糕的结果，无论情境多么随机。“我发现这些结果非常让人惊讶，因为这些情境是完全随机的，而且是不可控的。”林-希利谈到，“我们在实验中发现的效应有悖逻辑。此外，它们也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宗教教义相矛盾。”

举例来说，这项研究的结果与人们普遍接受的“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相抵触，这一信念是指好人会有好报。“我们的研究结果全然违背了这一信念。”斯莫谈到，“我认为，这是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利他主义与利他行为带来的好处是不相容的。”

正如研究者在论文中指出的，“人们认为，真正的善行是牺牲，自己不应从中获得好处。而当一位行动者从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中获得好处时，他的慈善就受到了私利的污损。”斯莫和林-希利谈到，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就是一位“利他主义者的典范”，当荣获诺贝尔奖时，她拒绝出席特有的颁奖宴会，并将奖金捐赠给了慈善事业，“（她之所以成为典范）不但是因为她的很多善行，而且还因为她对善行的牺牲立场。”

这些与理论相悖的研究结果也可应用于真实世界的实践，其中包括要努力弄清动机和结果会如何影响判断。“公司和个人必须认识到，人们对他们行为动机发出的信号很敏感。”斯莫谈到，“单单有行动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对这些行为的解读。”

林-希利补充谈到，她们的研究还表明，当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想吸引投资者时，公司或许要做出妥协。“一方面，客户很看重拥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而另一方面，投资者则看重拥有良好财务前景的公司。公司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在它们之间达成平衡。”

### 肯尼亚一家企业如何将银行引入农村地区——同时还能盈利

2006年，肯尼亚只有14%的家庭拥有银行账户。而3年以后，拥有银行账户的家庭则达到了近四分之一。在此期间，总部设在内罗毕的金融服务公司Equity Bank在这个东非国家的分支机构，也从44个增加到了110个，其中包括很多农村地区的分支机构，增加的分支机构带来的储蓄额占该银

行总储蓄额的 50%，而它们发放的贷款额则占该银行在肯尼亚发放贷款总额的 30%。

Equity Bank 在依然处于传统银行业边缘的地区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激起了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弗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和波士顿大学（Boston College）金融学教授钱军以及他们四位同事的兴趣，他们决定一看究竟，看看让 Equity Bank 的分支策略奏效的因素到底是什么，以及该银行的扩张对家庭获得银行业服务到底有什么影响。他们在去年夏季发表的题为《改善获取银行服务的条件：来自肯尼亚的证据》（Improving Access to Banking: Evidence from Kenya,）的论文中公布了这项研究的成果。

“他们探索出了一个低成本管理银行账户并可将业务发展到农村地区的策略。”艾伦在谈到 Equity Bank 时说道。“这是个奇妙的成功故事，他们在实施这个策略时依然能保持盈利。”

研究团队不只调查了 Equity Bank 的客户数量和分支策略，还检视了竞争状况，包括肯尼亚的本土银行和外国金融机构的格局。举例来说，从 2006 年到 2009 年，肯尼亚的银行分支机构的总数增长了 68%，达到了 1,000 个（Equity Bank 的分支机构数量同期则增长了 155%）。论文指出，Equity Bank 这样的本土私人银行，更可能扩展到更贫穷的农村地区。此外，研究者还检视了 FinAccess 的调查数据，该公司在 2006 年和 2009 年分别对 4,420 和 6,598 名肯尼亚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的样本涵盖了所有地区，调查问卷向他们提出了理财习惯等问题。

除了从 2006 年到 2009 年肯尼亚银行业的基本事实以外，艾伦、钱军及其同事还想出了将失真因素考虑在内的计算方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猜测是该银行设立分支机构是个随机事件。“（人们猜测）Equity Bank 分支机构的出现更多可能是银行业务相对发达地区的一个标志，而不是为了更多地吸引账户。”研究者在论文中写道。

“我认为，只是检视分支机构的数量等数据还是不够的。”艾伦在谈到利用各种计算方法来评估 Equity Bank 扩展分支机构的真正影响时说道。研究者认为，Equity Bank 分支机构的出现，“对家庭使用银行账户服务和银行信贷具有积极而且重要的影响。这一效应在低收入、没有受薪工作、没受过多少教育以及没有自己住房的肯尼亚人身上尤为明显。”

钱军谈到，让 Equity Bank 的分支策略取得成功的是，该银行开始在拥有收入较高的家庭但外国银行还没有进入的地区扩张。一旦 Equity Bank 在这些较为富裕的社区扎根，之后就会扩展到这个国家不那么发达的地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可持续盈利的增长模式，一种能在向农村地区扩张的同时保持盈利的模式。”钱军谈到。

钱军还谈到，让 Equity Bank 的分支机构在吸引客户方面大获成功的主要特色有两个。第一，该银行聘用了能说该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员工。第二，Equity Bank 对开立一个银行账户只有最基本的要求，只需客户提供身份证和一张照片（照片可以在分支机构拍摄），而很多外国银行则规定，开立账

户最少需要存入 2 万肯尼亚先令（约合 222 美元）。论文写道，“看起来，Equity Bank 比其他银行更快地抓住了这样的机会，无论 Equity Bank 的动机何在，其结果已表明，该银行因此而拥有了更大的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

钱军和艾伦认为，肯尼亚的其他银行，以及寻求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其他国家的银行，也可以复制 Equity Bank 的分支策略和商业模式。事实上，Equity Bank 已经扩展到了乌干达和南苏丹。艾伦谈到，其他银行也应该考虑聘用能讲地方语言的员工。此外，正如 Equity Bank 所做的那样，其他银行也应采用更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将业务扩展到非发达地区。举例来说，肯尼亚金融领域的另一个巨大成功就是 M-PESA 服务（在当地斯瓦希里语中，M-PESA 意指“移动货币”。——译者注），已有 40% 的肯尼亚人在使用这个移动支付系统。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Equity Bank 的商业模式……都可以成为阻碍金融部门发展的金融服务覆盖面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篇论文的作者写道。

钱军谈到，虽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来说，非盈利性小额信贷机构是主要的贷款发放人，但归根结底，想在为穷人提供银行服务方面取得成功的任何组织都必须盈利，而且无需政府和基金会资助的支持。

“即使生活所在地根本就没有银行的人也能通过银行开展业务，而且（提供服务的机构）还能挣钱，这一模式在肯尼亚的成功让我深感吃惊。”钱军谈到。“我想，最重要的是，一个地区的人无论多么贫穷、社会地位无论多么低下、基础设施无论多么缺乏，他们依然有望获得金融服务。”

### 栽一棵树的实证经济学

如果一棵树长在布鲁克林——或者费城、芝加哥以及任何城市社区——那么，它就不只是能在夏天提供荫凉、在秋天以漂亮的颜色装点景观了。沃顿商学院房地产教授苏珊·沃切特（Susan M. Wachter）的研究表明，它还能将附近的住房价格提升 10%。

沃切特和前沃顿商学院教授格雷斯·王·布奇艾勒瑞（Grace Wong Bucchianeri）在其题为《一棵树价值几何？绿色城市战略、信号和住房价格》（What Is a Tree Worth? Green-City Strategies, Signaling and Housing Prices）的论文中陈述了这一事实，该论文已发表在《房地产经济学》（Real Estate Economics）杂志上。

“科学和文学都谈到过树木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它们有助于保持水源清洁、空气清新，而且还有微气候效应。但在我们进行这项研究工作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城区中的树木有什么经济影响，尤其是对处于衰退中的社区的影响。”沃切特谈到。

在这项研究中使用的的一个植树计划，是费城园艺学会（Philadelphia Horticultural Society）运作的一个计划，该计划针对低收入社区展开，需要街区居民同意购买树木，需要他们共同提出植树要求，

并同意参与管理树木。另一个植树计划由费尔芒特公园委员会（Fairmount Park Commission）运作，该计划根据个人请求实施，而不是面对特定的社区或者社会经济群体。尽管来自低收入社区的数据没有显示出房价出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上涨，但公园委员会计划中的住房价格则出现了相当于在住房增加一个车库的上涨幅度（相当于房价的 10%）。

研究者在这项研究中确定，树木本身的价值，在住房售价的上涨幅度中占有大约两个百分点，沃切特和布奇艾勒瑞采用的方法是：计算树木周边 100 英尺内的住房价格与那些与树木距离超过 1,000 英尺的住房价格之间的差异。房价上涨的其余部分表明，树木价值的很大一部分已经沉淀在了实物资本和社会资本中，并转化成了一种能力——它对未来居民发出该地区作为居住地颇具吸引力的积极信号。

据费城园艺学会称，这项研究的成果已经被知会各个城市植树计划。

“对大部分人来说，如果你想要一棵树，你可以去买一棵，把它栽上就完事了，”沃切特谈到。“人们都喜欢树——房地产开发商会用树木来为新项目营造景观。但是，城区里的树木则不同。这些树木带来的好处不只属于各个房主，城市中的树木，尤其是那些早就失去了大树华盖的城区，它们带来的好处不但属于植树者，而且也会惠及社区。”

自这篇研究论文发表以后，费城园艺学会报告称，将树木和公园引回城市并创造步行空间的理念已日趋流行。尽管这可能还不是城市最重要的需求——犯罪问题和教育通常位居首位——但营造富有吸引力的社区已经被证明是健康家庭生活的考虑因素。

沃切特说道，她已经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已被用于增强与她研究的费城园艺计划类似的植树计划。“如果就是这么简单，那么，人们完全可以行动起来。如果你在树木上投资，那么这些在城市窘困社区的投资可能会带来很高的回报。但高回报也表明，这个投资过程中还存在着某些需要协调的困难，所以，将树木引入水泥森林依然可能是一场战役。”

来源：沃顿知识在线

地址：<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index.cfm?fa=article&articleid=2773> [【返回目录】](#)

## 让世界更加可持续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可持续发展报告(又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正从一种非必要的企业操作变为企业管理的主流方式之一，而一个非官方倡议—GRI 指南则成为了改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质量

的主要参照。

2013 年 3 月,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表明, GRI 指南是欧洲公司最广泛认可的 CSR 指南, 其使用频率(31%)仅次于全球契约(32%)。GRI 副行政长官 Teresa Fogelberg 说: “这项调查表明, GRI 指南是欧洲大型企业编写可持续发展报告时最主要的框架。”

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之一, 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致力于推动全球可持续经济提供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导原则。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益相关方——如投资人、合作伙伴等——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GRI 指南在全球的接受度正不断提升。

“支持 GRI, 体现出企业的一种承诺——以和社会对话的方式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将这视为解决问题的良好开端。” GRI 副总裁 Nelmara Arbex 在接受《中国慈善家》记者专访时表示。

### 最大国际网络组织的诞生

GRI 的诞生, 源于一个商业、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共识。

由于一次在印度博帕尔地区因环境问题引发的危机, 壳牌公司意识到了公布环境报告的重要, 但当时尚无任何国际标准可供参考。于是, 壳牌公司召集了来自商业、政府、当地社区和媒体等领域的 200 多人, 为其环境报告提出建议。这次讨论的结果便是 GRI 指南的最初模型。

1997 年, 总部位于美国波士顿的非营利组织“对环境负责的经济体联盟”(CERES)和 Tellus 研究院发起成立了 GRI, 最初目的是建立一个指导性框架, 保证和帮助企业遵循 CERES 的原则之下生产更环保的产品。1999 年, 随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加入, GRI 开始在全球平台上展开活动。

2000 年, GRI 发布了第一份指导方针《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 目的是使这种对经济、环境和社会三重业绩的报告成为像财务报告一样的惯例。《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本身并不制定评价标准, 而是规范企业或组织披露信息的范围和程序。

2002 年, 在约翰内斯堡举办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 GRI 颁布了第二代《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2 方针, 获得了政府、商界、社会和劳工界的强烈响应。目前,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已更新到 G3 版本, 全世界有超过 1000 个机构在其指导下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就在发布 G2 方针的同一年, GRI 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 并以 UNEP 官方合作中心的身份成为了联合国成员。2003 年至 2006 年间, GRI 相继完成了一系列机构的任命, 建立了自身独特的治理结构, 并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设立办公室, 作为永久性总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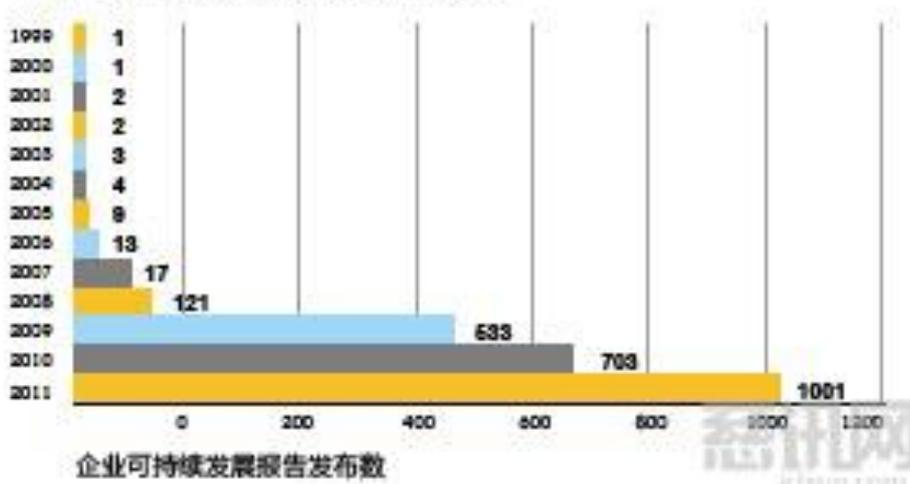
GRI 由五大常设机构组成, 包括董事会、利益相关方委员会、技术咨询委员会、利益相关组织和秘书处。在这些常设机构之外, 作为一个由数以千计的商业团体、市民社会、劳工界和专业机构组成的国际组织, GRI 的网络中还包含了各种促进推广的活动和组织, 以及针对各种议题和项目的工作小组。

除去大型项目，GRI 的运作每年大概需要 400 万欧元，20% 来自和政府的合作，其余部分则来自大概 400 至 500 家公司——这些公司主要是来自美国、欧洲和巴西等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小部分来自印度、中国等新兴国家。

基于一个全球的、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框架，GRI 使来自商业界、投资界、公民社会、工会组织和世界上各种背景的专家共同探讨的期望成为可能，并通过不断从全球社会网络收集各种意见逐渐发展壮大。2012 年，GRI 收到的最新公众评价超过 2300 份，大约 2000 份来自公司和大型企业集团，其余主要来自专家和个人。尽管 GRI 的全职工作人员人数并不多，但在其背后，每天有超过 3 万人为其提供支持。

2010 年 8 月初，GRI 与威尔士亲王发起的可持续发展会计体系项目(A4S)联手成立了国际整合报告委员会(IIRC)。成立之初，IIRC 即明确其宗旨是帮助促进并制定新的全球公认的报告方法，该方法将以明确、清晰、持续和可比的方式，提供更多关于对某组织历史和未来产生影响和取得业绩的整合信息。整合报告框架通过整合财务、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方面内容，创建一种新的年报格式，协助理解及评估企业业绩的可持续性。

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历年统计



### 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中国历程

2007 年，GRI 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并着手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展开合作。据 GRI 首席执行官 Ernst Ligteringen 介绍，GRI 之所以来到中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越来越不容小觑，“作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如果缺少中国的参与，就不能称之为‘全球性’。而且，随着中国逐渐被世界所认识，中国的上市公司也需要一个能被世界看懂的语言来介绍自己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绩。我们的模板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事实上，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历史并不算长。国内第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是由壳牌(中国)

公司于1999年发布的。2007年12月，国资委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而此前，国内报告市场一直相对低迷。随后，上交所鼓励其上市公司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也将重点篇幅放在环境问题上一环境问题正是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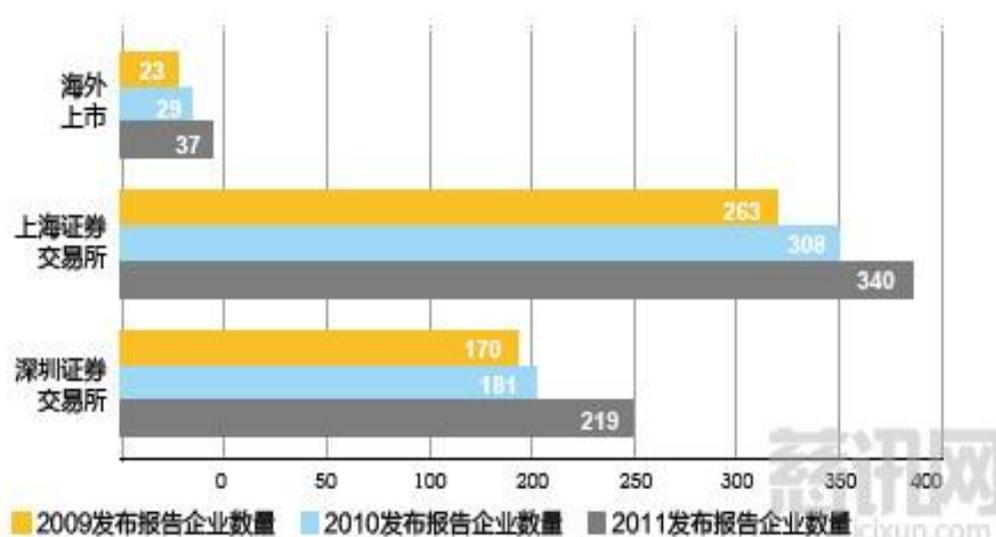
之后几年，中国企业开始积极主动地学习和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而了解和学习GRI指南则成为其必修课之一。

从已发布的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可以看出，GRI的G3指南已成为报告框架的主要依据。大多数企业都依循GRI指南及其三重底线原则，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披露企业的相关战略、政策、管理和绩效。

但在Nelmara Arbex看来，社会责任应该与企业的整体战略相关，中国大多数企业的领导人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知识，所以并不知道该怎样做。而GRI指南提供的正是一个企业在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过程中必须懂得的原则，以及编制报告所需数据和资料的选择方式和标准，以保证报告能够拥有高质量的信息。

针对目前许多中国企业对于可持续性发展报告认识不足的问题，Nelmara Arbex建议，企业应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选择性的使用，引入重点关联的信息，制定出符合企业发展状况或者利益相关方信息需求的报告，因为“一个好的报告并不要求把指南中涉及的所有信息和数据都列出来，一份高质量的报告可以非常薄，专注于特定的领域和信息。”

### 发布报告企业的上市情况



在GRI的协助下，从2008年开始，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三类上市公司必须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包括230家作为公司治理板块样本的公司、50家在境外上市的公司、21家金融类的公司，并鼓励其他公司进行披露。

第二年，中国的 CSR 报告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接近 600 份，占全球报告总数比重由 2008 年的 5% 增长到 2009 年的 15%。发布报告的企业类型由大型央企迅速扩展到各行各业，其中以制造、金融、电信和电力行业占到多数，此外还有 33 家机构通过寻求第三方验证来提升报告价值和自身形象。

2012 年 7 月，在 G3 指南推出的六年之后，GRI 开始重新修订指南。“为了提高透明度和解决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和投资者需要更全面的信息以评价风险，衡量绩效和发现市场机会；世界各国政府和消费者也需要更全面的信息以制定政策和作出购买选择。”谈及 GRI 指南的修订情况时，Nelmara Arbex 表示，“G4 版本关注的问题包括如何构建一个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体、2020 年的发展情况将会如何等。”

在新版 G4 指南的公众咨询阶段，GRI 邀请了全球不同国家地区和行业的相关人士，对草稿进行评估鉴定，给出修改意见。同时，GRI 也有意让中国公司加入到对 G4 指南的主要技术修订工作中，并把中国公司的反馈和意见吸收到这个全球性的报告指导构架中去。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所有消费者都对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负有责任，一旦他们决定购买商品，可能就在影响着世界。Nelmara Arbex 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向人们解释其日常生活和世界问题的相关性，但这不是贫困人群的责任，而是那些富裕阶层、公司和政府的责任。“人们越来越期待商业能够朝着有利社会的方向发展。而从改善世界的目的看，商业比慈善更有力度。”她说。

来源：慈讯网

地址：<http://www.icixun.com/2013/0521/1084.html>

[【返回目录】](#)

## UNEP 发布知识与合作平台，促进向更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转变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下简称“环境署”）作为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十年框架（10YFP）秘书处，发布了全球可持续消费和生产（SCP）信息交换中心作为知识与合作平台，旨在鼓励政府、企业、研究人员、民间组织和所有的 SCP 从业者或其他参与者，分享计划、新闻、想法、最佳实践方案和工具以创建一个全球范围的动态数据库，创建一个专家网络，并通过市场合作、工作组和论坛的方式培养和加强合作伙伴关系。

在今年 2 月环境署理事会预启动活动上，全球 SCP 信息交换中心从 100 个国家的 500 多个组织中记录了近 800 名新成员。著名的包括环境署、国际稻米研究协会、路易达孚贸易公司（Louis Dreyfus

Commodities) 和凯洛格公司 (Kellogg) 共同发起的可持续水稻平台, 巴西最大的连锁超市发起的公共运动, 智利、印度尼西亚和坦桑尼亚教育部和环境部支持的可持续消费主流教育项目, 日本国际绿色采购网络 (GPN-J), 葡萄牙预防工业废料国家计划 (PNAPRI), 地球宪章倡议等已经提交信息交换中心的计划。

全球 SCP 信息交换中心由欧盟委员会、挪威政府、西班牙外交与合作部、西班牙农业、食品和环境部和瑞典环境部共同支持而成立。多年来, 各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一直在开发有助于 SCP 的行动计划和工具, 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但是, 现有信息的分散性导致人们无法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该中心通过采用社交原则, 汇集全球的 SCP 社区团体, 创建一个一站式的 SCP 知识与合作中心。该信息交换中心是一个独特的地方, 在这里能浏览各地区和各专题的 SCP 社区, 从可持续的公共采购、城市与建筑到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教育。

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署执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纳表示,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不是指消费更少的资源, 而是指少消耗, 多办事, 办好事, 是关于提升资源效率和促进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消除贫困。” “通过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创建一个知识平台和合作市场, 环境署希望加速向更持续的生活方式的转变, 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向这些生活方式转变。”

来源: 证券时报

地址: [http://csr.stcn.com/content/2013-05/22/content\\_8433071.htm](http://csr.stcn.com/content/2013-05/22/content_8433071.htm)

[【返回目录】](#)

## 世界资源研究所发布企业价值链排放核算最新指南

要制定有效的企业气候变化战略, 必须充分了解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企业主要利用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的范围一和范围二框架对自身经营活动和电力消耗所产生的排放进行测量, 而往往忽视了更广泛的价值链上产生的排放, 从商品的采购到废旧处理阶段。

发布于 2011 年末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 企业价值链 (范围三) 标准》是唯一国际公认的企业价值链排放核算方法。在这一标准的基础上,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发布了全新指南, 以帮助企业更便捷地制定企业价值链排放清单。该指南可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网站上免费下载。

### 企业应如何使用新指南?

对整个价值链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评估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很多刚刚启动企业价值链排放评估的企业往往不知从何入手。为帮助企业克服障碍, 新指南为企业提供了所有相关计算方法的详

细技术指导和企业价值链（范围三）标准中未包含的许多信息，例如：

计算企业价值链（范围三）中 15 大类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如采购的商品和服务、运输和分销、售出产品的使用等）； 如何选择合适的计算方法； 举例说明每种计算方法。

该指南可帮助企业了解整个价值链对气候变化的全面影响，并制定更有效的温室气体减排战略。更好地了解上述信息，对于企业自身、供应商、顾客和其他价值链伙伴都大有裨益。该指南由世界资源研究所与英国碳信托有限公司（Carbon Trust）共同制定。英国碳信托有限公司在温室气体测量方面具有丰富的技术和实践经验，对指南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评估范围三排放提供了清晰和连贯的方法。

该指南可在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网站上免费下载，企业价值链（范围三）的分类排放指南可单独下载。

更多信息：为进一步帮助企业管理价值链排放，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也提供企业价值链（范围三）在线培训。下次的培训时间是 5 月 7 日、8 日和 9 日。如欲了解更多信息或报名参加培训，请登录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网站。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

地址：

<http://www.wri.org.cn/xinwen/shijieziyuanyanjiusuofabuqiyejiezhilianpaifanghesuan%E6%9C%80xinzhinan>

[【返回目录】](#)

## 公益遭遇营销：奥克斯要找美丽新娘

日前，中国空调领军巨头奥克斯，高调宣布联合中国国际公关协会发起中国首个创意产业大型公益项目——IBC（创意美丽中国）公益计划，并启动首个“人·沙·敦煌”沙裸艺术行动呼吁保护敦煌文化瑰宝。随后，“寻找中国美丽新娘——保护敦煌公益活动”也在奥克斯全国万家销售终端全面拉开，最终社会公益与市场营销在奥克斯相遇，掀起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

### 这是市场营销，还是公益行动？

对此，奥克斯空调国内营销公司总经理何剑坦言，“企业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主体，有责任也有义务积极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去。而支撑企业持续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最大动力，是来自于企业的市场表现和综合实力提升”。

在业内人士看来，企业是保持公益事业长期、持续实现的主要力量。近年来的一系列企业社会实践操作表明，只有将社会公益与企业营销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推动公益事业的延续和发展。

### **奥克斯为何要找美丽新娘？**

近年来，因水土流失等现象频发，敦煌莫高窟等文化遗址遭受风沙侵蚀较严重，已经被列入 50 年后世界将消失的十大美景之一。此次，奥克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敦煌莫高窟”绚丽壁画的文化价值，特别面向社会公众启动了新一轮的“寻找中国美丽新娘活动”，意在以美丽为媒、以公益为纽带，唤起更多人对于敦煌的认知与关注。

据奥克斯空调工作人员介绍，“在空调市场销售旺季的 3 个月期间，奥克斯将会在每个月抽取 10 对中奖者，让他们与奥克斯一起参与到保护敦煌公益行动中来，身体力行推动这项公益活动影响更多的人”。

### **家电“攻心战”**

#### **在空调业率先打响？**

从去年开始，整个空调产业的竞争就已经从技术概念包装炒作，步入产品品质和设计的新竞争轨道。就在今年五一期间，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亲自带领空调公司的营销推广技术研发生产制造等部门负责人，前往市场一线调研用户和客户对产品品质和工业设计的意见。

毫无疑问，奥克斯人已经意识到，随着空调产业竞争步入“寡头主导时代”，空调产业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高举高打”野蛮扩张时代，步入“捕获芳心”精耕细作时代。这意味着，未来整个产业的竞争，将是一场围绕消费者需求和想法展开的“攻心战”。

来源：晶报

地址：[http://jb.sznews.com/html/2013-05/24/content\\_2492887.htm](http://jb.sznews.com/html/2013-05/24/content_2492887.htm)

[【返回目录】](#)

## ◎公益布告栏

**更美好的世界——福特汽车环保 NGO 系列工作坊**

环境问题渐渐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漫天雾霾，污染的河水，给我们造成了恐惧和困扰。波澜不惊处，未必没有拒斥的声音。环保的力量犹如一道巨浪，誓要打破愈发残缺的风景。但只有拥有更多的学识和能力，才能为中国的环境做得更多，才能影响和鼓励更多的人参与环保。此番我们将集中举办一系列不同于传统教学的工作坊，让中国的环保公益人学习到前沿的体念，体会到多重角度的思考方法，并且用这些知识与能力去实践，去理解，去传播。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尝试理解什么是专业，并且面对自己的愿望，面对实现愿望需要多少勇气和能力。

一个工作坊可以改变的很少，但每个参加的人只要改变一点点，整个环保公益领域就会成长一点点，认识环保了解环保支持环保的人也会多一点点，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做起！

三地工作坊	地址	日期	时间	内容
更美好的世界——福特汽车环保 NGO 系列工作坊上海站	上海市徐汇区嘉善路508号	6月5日	09:00-11:45	更美好的世界——2013 福特汽车环保奖暨绿色晋级项目启动仪式
			14:00-18:00	《创新是可以学习的》
		6月6日	9:00-17:00	《如何同 CSR 打交道》
更美好的世界——福特汽车环保 NGO 系列工作坊北京站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北里育慧南路与文学馆路交叉口	6月20日	14:00-17:30	《Better World 是如何炼成的》福特汽车项目分享会
			9:00-12:30	《创新是可以学习的》
		6月21日	13:30-17:00	《如何同 CSR 打交道》
更美好的世界——福特汽车环保 NGO 系列工作坊深圳站	南山区华侨城创意园 OCAT 北区 A4 栋 216	6月27日	14:00-17:30	《Better World 是如何炼成的》福特汽车项目分享会
			9:00-12:30	《创新是可以学习的》
		6月28日	13:30-17:00	《如何同 CSR 打交道》

**《创新是可以学习的》讲师介绍**

Amena Lee Schlaikjer

Amena Lee Schlaikjer 在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 FIT 流行设计学院分别学习过亚洲经济及时尚界

营销, 她将两者结合, 专业于健康、美丽、生活方式领域, 并在上海发起了 Vogue、M.A.C、Zagat Survey。随后, 她创办了自己的品牌--THE WELLNESSWORKS, 旨在通过创意与活动鼓励大众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她是乐活亚太地区的总代理, 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生活方式、服务、旅游、食物、娱乐和人道主义等各种主题, 与最具有创新精神的团队共同研究及工作。

#### 兰菲菲(Flora Lan)

拥有经济金融的学术背景, 4 年前对社会企业、社会创新发生兴趣后, 随英国大使馆的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搜集整理过相当数量的社会企业案例。之后为用创新方式解决可持续发展挑战的社会企业 Greenovate 效力, 服务的客户有 FedEx, Standard&Charted, InterfaceFlor 等, 开发的环保系列视频观看量超过 300,000 次。目前 Flora 是 Greenovate 的中国区负责人, 带领团队与沪上兼具创新与环保的人们合作, 一起为一个更绿色的未来而努力。

#### 《如何同 CSR 打交道》讲师介绍

##### Darcie Goodwin

她拥有丰富的企业与 NGO 工作经历, 历任联邦快递中国公关经理、国际奥比斯(NGO)高级公关经理、中美商务发展特殊项目官员; 还是台湾基督教青年会海外支援志愿者。获得德鲁大学经济政治学学士以及雷鸟全球管理学院 MBA 学位。

欲知工作坊详情, 请点击 <http://vdisk.weibo.com/s/CbHnm> 进行信息手册阅览与下载。

#### 活动适合对象:

环保 NGO 从业人员

有兴趣参加福特汽车项目中的培训, 导师计划, 孵化, 环保奖等内容的环保公益人

对环保领域的社会创新或者企业筹款有兴趣的环保公益人

#### 报名方式:

更美好的世界 -- 福特汽车环保 NGO 系列工作坊上海站报名请点击  
<https://yopay.cn/event/15612204>

更美好的世界 -- 福特汽车环保 NGO 系列工作坊北京站报名请点击  
<https://yopay.cn/event/99313977>

更美好的世界 -- 福特汽车环保 NGO 系列工作坊深圳站报名请点击  
<https://yopay.cn/event/23862995>

#### 联系方式: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 613 号 A 楼 211 室

新浪微博: @SEI 社会创业家学院

邮箱: sei@npi.org.cn

官网: www.sei.org.cn

电话: 021-33150386

来源: NGO 发展交流网

地址: <http://www.ngocn.net/?action-viewnews-itemid-87191>

[【返回目录】](#)

## JA 中国“金字塔底端的创新”青年创业培养项目征集

### YESxBOP 项目简介

JA 中国“金字塔底端的创新”青年创业培养项目 (Young Enterprise Solutions for China's Bottom of the Pyramid, 简称 YESxBOP) 致力于为全球范围内 18 岁到 30 岁的有志于以商业手段促进社会发展的青年人提供一个综合性、互动性成长平台。通过参与这个项目, 青年人将努力在中国社会金字塔底端人群中寻找独特的市场机遇, 锻炼商业嗅觉, 提出服务 BOP 的商业解决方案, 并将之付诸实践。

该项目由 JA 中国发起, 由坦普顿基金会支持, 为期三年。在这三年中, JA 中国将定期举办一系列的关于创新创业和金字塔底端人群相关的主题讲座, 工作坊及各类交流分享活动, 并举办全球性的商业计划大赛。在大赛中脱颖而出的队伍将被提供种子基金、孵化机会、导师指导以及投资人引介机会; 通过这些机会, 获胜队伍将把计划变为现实, 而他们的针对金字塔底端人群的商业方案也将转化为一个可盈利的企业实体。(三分钟视频带你了解 YESxBOP: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2NTQ2Nzc2.html](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2NTQ2Nzc2.html))

我们希望, 参与该项目, 全球范围内 18~30 岁的青年人将有机会:

- I. 成长为积极、自信且独立的创业人才;
- II. 运用商业手段构建更美好的社会;
- III. 传播创新思维在商业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的重要性, 激励青年人。

### YESxBOP 项目的独特性在于:

- I. 汇聚富有创业激情且积极推动社会进步的青年人、专家、资深企业家、风险投资者, 同一个平台, 同一个梦想。
- II. 将世界最大却尚未充分开发、由金字塔底端人群构成、价值高达 5 万亿美元的市场 (其

中，中国金字塔低端人群市场占有很重要的比例）纳入青年人的创业梦想中。在这个市场里，该人群是潜在的生产者、消费者、商业合作伙伴及创新者。

III. 为有想法可操作的商业计划提供孵化平台，包括种子基金、来自各行业的商界人士的辅导机会，以及持续性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分享，帮助青年人能够将理想变成现实。

IV. 搭建一个拥有丰富线上资源及丰富线下活动的青年人创业分享平台，分享青年人及专家，企业家的一手创业，研究和管理经验，帮助更多青年人实现能够帮助社会发展的创业梦想。

### YESxBOP 商业计划大赛流程



### 常见问题答疑

#### 一、什么样的人可以提交 YESxBOP 商业计划？

参赛团队成员的年龄应该在 18 周岁到 30 周岁之间。地点不限，学历不限。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我们相信都可以有非常好的想法和计划。我们同时也鼓励青年人能够与不同专业背景、有不同技能的或不同想法的志同道合者组队参与，碰撞出更有意思的想法和火花。

#### 二、YESxBOP 向你征集什么样的商业计划？

概括而言，YESxBOP 提倡用商业手段去提升 BOP 人群的生活，从市场出发，以从 BOP 的需求出发的商业模式，构建盈利性的商业解决方案。通过商业模式解决他们的需求和他们面临的问题。

关于 YESxBOP 相关案例，请登录 <http://yesbop.jachina.org/yesxbop-interviews-case-studies/> 了解面向 BOP 市场创业的案例精选。

#### 三、你怎样准备和提交 YESxBOP 商业计划？

请参赛团队/个人通过 <http://yesbop.jachina.org/bp/> 在线提交 YESxBOP 商业计划，参与 YESxBOP 商业计划大赛初赛。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准备商业计划，我们建议在撰写时可以考虑以下方面：

## 1. 参赛团队成员信息

一个优秀的商业计划离不开优秀的团队。我们鼓励大家通过对团队的详细介绍，说明你的团队独特优势，以及你的团队成员的独特的经历、背景和技能如何可以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能够实践你们的商业想法的完美团队。我们期待看到各位的创意展示！大家可以通过在商业计划提交页面上上传 PPT 文档，或者团队介绍视频的网络地址，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大家的想法和能力。

## 2. 商业计划概要（文档或 PPT 或其他形式）

该概要将帮助你描绘你的商业图景。通过概要，我们将可以了解你的商业计划的市场分析，商业模式以及相关的可行性分析及实施策略。一个有效的商业计划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 1) 商业计划纲要

远景和使命：你的商业计划将解决什么问题？并将提供怎样的解决方案？

策略和计划：你希望你的商业计划将对这个问题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何衡量是否完成了目标？

### 2) 金字塔底端的创新

描述你所提供的解决方案的创新之处，或者你能提供的独特的价值。

为什么消费者愿意购买你的产品或服务？

你所承诺的产品或服务如何实现你的公司的使命和目标？

### 3) 市场分析

描述你的商业计划的目标市场。该市场的价值何在？它在哪里？有什么特点？

你是如何看待将这一市场与 BOP 联系起来的？

这个市场的独特需求是什么？你的创新如何能够满足这些需求？

### 4) 商业模式及策略

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你如何产生利润，让你的公司持续发展？

你的公司的短期（一年）运作计划和目标是什么？

四、进入总决赛后，你可以得到什么支持？

2013 年 6 月底，JA 中国将公布进入总决赛的参赛团队名单，并且提供来自对应行业的 JA 资深志愿者（涵盖知名企业高管、青年创业家、行业专家等），为参赛团队出谋划策，并帮助参赛团队更好地准备总决赛。

五、成为总决赛优胜团队，你会得到什么样的激励？

### 1. 10000 元的现金奖励

我们希望该现金奖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优胜商业计划继续向实践层面迈进！

2. 进入 YESxBOP 孵化器，通过其提供的各类资源，实践自己的商业想法，还有什么事情比梦想变成

现实更美好呢?!

六、你可以从 YESxBOP 孵化器得到什么样的支持?

YESxBOP 孵化器将不断地进行资源的整合, 提供参赛团队如下支持:

1. 来自业界专家的辅导机会

JA 中国拥有强大的企业志愿者阵容, 以及由知名企业家组成的 JA 中国董事会, 包括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复、强生(中国) 医疗器材总裁谢文坚、丹佛斯总裁 Jorgen Clausen、玫琳凯(中国) 总裁麦予甫、摩托罗拉系统(中国) 有限公司总裁蒋浩等一批知名企业家都有可能成为你们的导师, 只要你或你的团队够优秀!

2. 名企实习机会

JA 中国目前和梅赛德斯-奔驰、摩托罗拉、汇丰银行、埃森哲、巴宝莉、陶氏化学、黑莓、福斯、SAP、飞利浦等数十家世界顶级企业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成为 YESxBOP 商业计划大赛优胜团队, 你们将获得 JA 中国的实习推荐。

3. 名校商业经营训练营直通车机会

JA 中国已经和长江商学院达成合作意向, 为 YESxBOP 商业计划大赛优胜团队提供商业经营训练营直通车机会, 我们正在积极拓展更多的相关资源。

4. 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机会

5. 针对创业孵化的各类活动

当然, 不同的参赛团队会有不同的需求, 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需求, 匹配相关的资源, 长期支持大家实践自己的金字塔底端的创业梦想。

YESxBOP, 让你成为改变的力量!

创新改变世界, 创业改变社会。

现在就加入我们, 去共同实现: 金字塔底端的创新!!!

### 关于 JA 中国

JA 是全球最大的致力于青少年职业、创业和理财教育的非营利教育机构。JA 通过与企业和教育界紧密合作, 在大中小学开发并实施经济、商业、创业、理财、职业、领导力、品格培养等课程, 帮助学生提升就业准备、创新创业、金融理财的综合素质, 激励并帮助青少年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目前, JA 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 每年有 900 多万学生接受 JA 的教育。

伴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 中国更加需要培养具备全球视野的商业人才, 基于此, JA 中国一直和中国各类学校和企业保持密切合作, 在大中小学开展创新的商业和经济项目, 包括就业准备、创新创业、金融理财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创新课程和体验式活动, 用一流的企业和大学生志愿者、教师

和一手的经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培养具有品格、创造力和领导力的人才，激励并帮助中国青少年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

在 2011/2012 学年，从 JA 中国教育项目受益的学生达 815,329 名，项目共吸纳了 8,129 名企业志愿者和大学生志愿者的参与。自 1993 年成立至今，从 JA 中国教育项目受益的中国学生累计已达 3,779,716 名。

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

YESxBOP 网站：<http://yesbop.jachina.org/>

YESxBOP 官方微博：[@金字塔底端的创新](#)

YESxBOP 人人主页：[YESxBOP](#)

YESxBOP 微信主页：[YESxBO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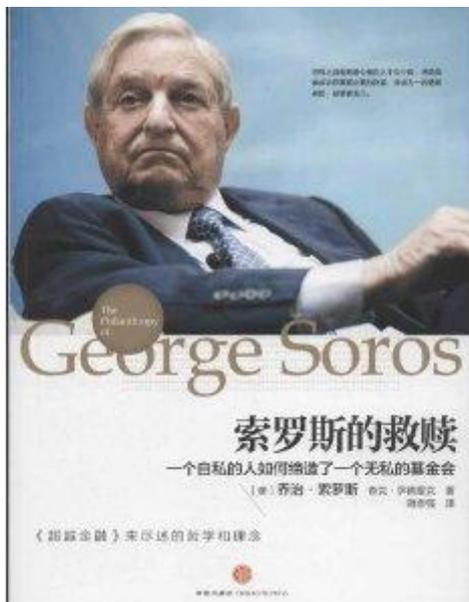
来源：NGO 发展交流网

地址：<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sortinfoview.php?id=8290>

[【返回目录】](#)

## ◎新书快递

## 《索罗斯的救赎》



《索罗斯的救赎》系投资大师、慈善大家索罗斯新作，《超越金融》未尽述的哲学和理念。世界上具有慈善心肠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能够成功积累起必要的财富，并成为一名慈善家的人，却寥寥无几。

内心的良知让我有自知之明，还使我意识到我这个终将逝去的凡人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换句话说，对我这样一个凡人来说，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只有通过致力于人道事业，才能为自我意识找到足够的发挥空间。我渴望让世界更美好。

我认为，利他主义和慈善事业不仅仅是一种义务，而且是一种乐趣和成就感之源。这是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得起的奢侈品。我对慈善事业的偏爱远远超出了其他事情。慈善事业让我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让我突破了自我封闭的状态。当我在郎德豪街上心脏病复发时，我就觉得为了聚集财富而死真的太不值得了。自那以后，在基金会开展的活动中，我多次面临致命的危险。我不想刻意寻找这些危险，但是为了慈善事业，一旦出现危险，我却甘愿冒风险。从事一项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事业，给我带来一种成就感。

——索罗斯

## 【刊物简介】

公益慈善周报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策划编辑，旨在为 NGO 领导人以及政府民间组织管理负责人提供一周公益慈善新闻回顾，把握当前公益慈善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从而为 NGO 机构发展与地方民间组织政策推动发挥积极作用！

## 【主办机构简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关注并参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人文与发展学院先后参与了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亚洲开发银行非政府组织参与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民政部民间组织局相关政策调研项目、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基金会项目案例研究以及众多国际与国内 NGO 的项目评估与监测项目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公益慈善领域主要关注的重点：

- 公民社会基础理论研究
- 公益组织发展咨询研究
- 公益项目开发、评估与监测
- 公益组织能力建设

## 【刊物订退阅】

如果您的同行或相关人士希望订阅此刊物，请发送您的姓名、工作单位、职位至 [gycsweekly@gmail.com](mailto:gycsweekly@gmail.com) 即可。

如果您希望退订此刊物，也请直接回复上面邮箱告知。

---

主办机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主 编：董 强  
编 辑：赵丽霞、杨文、蒋育龙、陈婉君、阳慧颖  
办公电话：010-62731470  
电子信箱：[gycsweekly@gmail.com](mailto:gycsweekly@gmail.com)